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下]

(3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卷

下册

目 录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 8 6 0 年

1.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月12日) 429
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30日) 430
3.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月31日) 431
4. 马克思致约阿希姆·列列韦尔(2月3日) 433
5.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2月6日) 434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8日) 435
7.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2月13日) 437
8. 恩格斯致弗兰茨·敦克尔(2月20日) 443
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0日) 444
10.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2月21日) 446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23日) 448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3日) 452
13.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2月24日) 454
1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7日) 475

15. 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2月27日)	476
16. 马克思致穆赞比尼(2月27日)	478
1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29日)	479
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3日)	489
19.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3月3日)	494
20.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3月7日)	508
21.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3月13日)	510
22. 马克思致律西安·若特兰(3月13日)	511
23.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5日)	513
24.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3月27日)	515
2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4月4日)	516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9日)	517
27.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4月9日)	519
28.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4月9日)	522
29.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4月11日)	524
30.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13日)	525
31.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4月16日)	526
32.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4月19日)	527
33.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21日)	528
34.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莱茵兰德(4月24日)	529
3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24日)	529
36.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24日)	531
37.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4月25日)	532
38.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5月8日)	532
3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5月15日)	533

40.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6月1日)	536
4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2日左右)	538
42.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6月2日)	549
43.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6月23日)	551
44.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8月2日)	553
45.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8月15日)	554
46.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8月20日)	555
47.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8月21日)	556
48. 恩格斯致《军事总汇报》编辑部(8月24日)	557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7日)	559
5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15日)	562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15日)	565
5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2日)	565
5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23日)	566
5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5日)	567
5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1月21日)	568
56.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1月22日)	569
5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1月24日)	570

1 8 6 1 年

58.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月3日)	571
5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月3日)	572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16日)	573
6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28日)	575
62.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7日)	576

63.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2月13日)	577
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15日)	579
65.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2月27日)	580
6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7日)	582
67.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3月24日)	584
68.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3月28日)	587
6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4月2日)	588
70.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4月13日)	589
71. 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5月3日左右)	592
72.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5月6日)	594
7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8日)	597
7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29日)	600
7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1日)	602
76.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7月17日)	603
7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2日)	606
78.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9月24日)	610
79. 马克思致路易·瓦托(11月10日)	611

1862年

80.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亨·维贝尔(1月15日)	613
81.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2月26日)	614
8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28日)	616
83.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6月4日)	620
8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6日)	622
85.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3日)	626

8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13日)	627
8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14日)	628
88. 马克思致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威廉·什瓦尔茨 (8月19日)	629
8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20日)	629
90.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21日)	631
91. 马克思致威廉·沃尔弗(10月4日)	631
9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7日)	632
93.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2月15日)	635
9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28日)	636

1 8 6 3 年

95.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亨·维贝尔(4月22日)	639
96.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2月15日)	640
9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2月23日)	642

1 8 6 4 年

98.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2月20日)	644
99.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3月29日)	647
100.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4月14日)	649
101.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9日)	652
10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10日)	655
103.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13日)	656
10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5月17日)	658
105.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5月24日)	659

106.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6月25日)	661
10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7月12日)	664
108.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8月17日)	665
10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9月2日)	667
110.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9月12日)	669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8月14日)	673
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0月5日以后)	674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16日以前)	674
4.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底)	676
5.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4月初)	677
6. 马克思请斐迪南·拉萨尔代办恢复普鲁士国籍事务的 委托书(1861年4月12日)	678
7.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1月初)	679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1月24日左右)	680
9.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63年11月24日左右)	681
10. 燕妮·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64年6月中)	683
注释	687—784
人名索引	785—83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840—870
期刊索引	871—881

插 图

卡尔·马克思(1861年于伦敦)	166—167
------------------------	---------

恩格斯 1863 年 5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	343
附在马克思 1863 年 7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说明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图表	361—36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4 年于曼彻斯特)	398—399
马克思 1864 年 6 月写的威廉·沃尔弗的简历	403
马克思 1861 年的护照	604—605
马克思 1864 年 5 月 9 日就威廉·沃尔弗逝世一事给	
燕妮·马克思的信	653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860年

1860年

1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感谢您为我的事奔忙。⁴¹¹这封信耽搁了，是因为我为您的书同一个出版商进行商谈，他一天一天地拖延不予答复，而最后表示拒绝。⁴¹²

找本特利对您不合适。可以找约翰·默里试试看。在给这些人写信时，请不要忘记签上：前部长。对这种谄媚者来说这样做是会起些作用的。

忠实于您的 阿·威·^①

您在下一封信中能否费心把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告诉我？

^①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我本来以为——这种想法我也写信告诉过恩格斯^①——你不写信是因为我的上一封信¹⁰惹你生气了。

我只有几分钟的闲时间，因为今天必须为《纽约论坛报》写一篇社论。因此信将写得很简短。

1.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②，我立即给你寄去。我记得，你早先已从我这里得到过一本。

2.福格特竭力不让他那本捷列林格式的¹⁶拙劣作品⁹——它的第一版——运到这里来。不论弗莱里格拉特（我方才去过他那里）、金克尔、《海尔曼》，还是此地的任何一个书商都没有得到。帝国流氓⁴¹³自然是想赢得时间。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国民报》上看到的。⁴¹⁴这完全是施梯伯式的谎言。为了以诽谤罪对《国民报》起诉，我已经写信给柏林我认识的一个法学家^③。你对这种诉讼程序有什么看法？请立即来信谈谈。

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福格特自己承认他间接地被波拿巴收

① 见本卷第8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费舍。——编者注

买过,因为你的匈牙利革命者们的狡猾手段**我是知道的**。我曾在伦敦一家**英文**报纸上揭露过他们⁴¹⁵,并给科苏特先生寄去过五份报纸。他保持沉默。纽约等地的**匈牙利流亡者**通过了**反对他的**决议。

你关于福格特问题的论证我不明白。⁴¹⁶我一得到他那本拙劣作品,就要写一本小册子,但是同时我要在前言中声明,我毫不在乎你的德国公众的意见。

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依**我**看来,奥格斯堡《总汇报》一点也不比《国民报》和《人民报》差。

从我在《国民报》上看到的那些摘录中可以得出结论,福格特同谢努或者德拉奥德²⁷是一路货。

3.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到第二分册出版时,仅仅完成第一册的第一篇,而全部著作共有六册。因此你不能等**全部著作完成**。⁴¹⁷然而等到包含有全部**精髓**的下一分册出版,则**对你自己有好处**。至于这个分册在柏林还没有出,那要怪环境太坏。

祝好。

卡·马·

3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1月31日于 [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先生:

您的沉默使我断定,您因为我的上一封信而见怪了,然而我敢

说,这没有充分的根据。您想必不会否认,是您自己的上上一封信使我不再受我对您的诺言的约束。⁴¹⁸另一方面,您随时都可以写信到柏林去,让出版商敦克尔先生证实,他曾要求我把他所期待的手稿²⁵寄去,不要再推迟。最后,我推荐卡范讷先生的目的自然是为您效劳,而不是为我,而且我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才推荐的。

同时我曾设法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在《威塞尔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您的小册子的广告(或者确切些说,是关于它即将出版的预告)。只要我一拿到您的小册子,就乐于马上给《纽约论坛报》写一篇评论它的长文。科苏特曾企图通过给格拉斯哥的麦克亚当再次写信来引起英国公众的注意。这次他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有一件事,我需要从您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而且我认为我有权向您提出这一请求。

福格特教授(日内瓦的詹姆斯·法济手中的工具,而法济也象福格特一样,同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交往密切)发表了一本关于他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小册子^①。这本小册子对我捏造了最荒谬的谣言,因此我不能不回击这种无耻的诽谤,尽管我也觉得被迫在如此讨厌的问题上耗费时间是可惜的。好啦。现在他肯定说,他的宣传费是从匈牙利革命者那里得到的,并且隐约地暗示,这笔钱直接来自匈牙利。这是不足信的,因为科苏特自己都未能从这个来源得到任何东西。您能否较确切地把意大利战争³³爆发前克拉普卡的经济状况告诉我?因为我不得不在我打算写的这本抨击性著作^②里较详细地谈谈科苏特及其一伙,如果您把您所知道的关于他最近的金钱交易的新材料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他有没有从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三百万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一个匈牙利军团的军饷或装备费呢？(我是说，分给军官和文官的那些钱除外。)

非常关键的时刻就要到来，我希望任何误会都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共同行动。

忠实于您的 阿·威·^①

4

马克思致约阿希姆·列列韦尔 布鲁塞尔

[草稿]

1860年2月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列列韦尔：

1848年在科伦有个波兰人^②带着您的一封介绍信来见我，可惜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同您保持联系。我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有个福格特，是日内瓦的教授，发表了一本小册子^③，其中充满对我和我的政治活动的最惊人的诽谤。他一方面把我描绘成渺小的人，另一方面把最卑鄙的动机强加在我身上。他歪曲我的整个过去。因为当我住在布鲁塞尔时有幸同您保持亲密的关系，——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在1848年2月22日波兰革命纪念会⁴¹⁹上当众与

①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科斯策尔斯基。——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我拥抱所给我的荣誉，——所以请您给我写封私人信，证实您对我的友谊，同时也证明我在布鲁塞尔同波兰流亡者保持过友好关系。⁴²⁰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夫人希望您还记得她，她誊写了我给您的信，因为我的字迹潦草。

5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书面声明**^①，恳请予以刊登。这个声明我同时寄给柏林的《国民报》和《政论家》(该报的方针我不清楚，但是据说它在那里销路很广)，还寄给《科伦日报》、《法兰克福报》、汉堡《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如果您把下述情况告诉拉萨尔，我将非常感谢。

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他回信。

关于科苏特的文章^②我寄给了巴黎的瑟美列，讲好一定要立即寄还给我，可是他已把它压了好几个月。现在我要用刀按在他的

①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脖子上上——当然，这是比喻的说法。

如果拉萨尔把福格特的书^①按照恩格斯的私人住址(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我将到那里去³⁸)直接邮寄给恩格斯,那他就帮了我的大忙。最后,我很希望他按照这个地址寄给我几份载有我的声明的柏林报纸。

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0年2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作为你的一个党内的老同志和个人的老朋友,我认为有义务把我为柏林诉讼所要采取的步骤告诉你,这些步骤一定很快——但不是现在——就会为公众所知道。

你大概记得,或者至少从寄给你的铅印的英文通告信^②中知道,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纸)上不仅引用了霍林格尔的证词,而且还引用了排字工人维耶的书面声明作为证据,证明我说了“明显的谎言”,证明我断定说他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是霍林格尔给他印的,而且总之是从霍林格尔的印刷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所里出来的,“那是一种虚构”。⁴²¹现在我把这个维耶对弯街法官的宣誓声明的原文逐字逐句地告诉你。我得到了这项声明的经官方签字证明无误的一个副本。另有一份已送交柏林的检察机关了。

我认为给这个文件加一个字的注释都是多余的。

你的 卡·马·

“去年11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Zur Warnung》)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菲·霍林格尔先生的妻子)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他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酬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实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先生那里工作;

(2)正好是在排印传单《警告》(《Zur Warnung》)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勒)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先生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转载传单(或者抨击性文章)《警告》(《Zur Warnung》),我本人又把

它重新排了一次。这传单刊登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号上；

(5)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

今天，1860年2月8日，弗里德里希·维耶在
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法官 托·亨利

治安法庭
英国国徽
弯街^①

请你暂且不要把这份 affidavit^②的抄件给任何人看。这种证词在英国这里会引起什么样的刑事后果，你当然是清楚的。

7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2月1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上星期我写信给柏林的一个朋友^③，请他给我介绍一位律师，

-
- ① 马克思把这几个字圈在圆圈里，表示这在原件上是盖的法庭圆戳。——编者注
- ②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 ③ 费舍。——编者注

以便进行我必须对柏林《国民报》提起的诽谤诉讼。⁹今天我收到了回信,我的朋友在信中指出,您,法律顾问先生,是柏林最著名的律师。

因此我冒昧请您在这个诽谤案件中当我的律师,案件的详细情节我下面再谈。

如果我随信附上的十五塔勒预付款不够的话,那就请来电告知,我将立即把所需之款寄上。

附上我的委托书,希望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我恳请您立即向法院起诉,以便不错过时效期,并且务请用电报通知我,您是否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同时我在伦敦这里对《每日电讯》提起诽谤诉讼,因为该报用英文转载了《国民报》的诽谤文章。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见背面)

我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国民报》的文章刊登在该报第37号(1860年1月22日,星期日)和第41号(1860年1月25日,星期三)。这两篇文章都是社论。我在以后的通信中还有机会向您阐述这两篇文章中贯穿的精神。至于我在下面明确提出的几点,是我要提起诽谤诉讼的依据,而且我认为从法律上看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即:

(1)在第41号(文章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第3栏末尾写道:

“布林德在《总汇报》上两次断然声明,他不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而且

他这样说不是为福格特辩解,他并不同意福格特,而是反对马克思—李卜克内西—比斯康普……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变成替罪羊,对于该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这种控告就必须由某一个能对此承担责任的相当的人来进行。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可见,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控我以别人的名义“伪造”传单。其次:由于《国民报》在这同一篇文章(见同一栏,往上一些)中自己向自己的读者叙述,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费格勒在证词中说,“他根据以前的手稿认得布林德的笔迹,他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亲自排了传单的第一部分,霍林格尔本人排了第二部分”⁴²²,所以《国民报》在上面援引的那段话中不仅荒唐地指控我伪造传单,为了欺骗而使传单具有布林德“作品”的形式,而且还干脆武断地说,我有意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一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自己的诽谤癖达到完美的境界,该报继续写道:

“11月2日霍林格尔就此发表声明说:断言传单是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或者传单的作者是布林德,这是恶意的臆造,在他那里工作了十一个月的排字工人维耶可以证实这个声明。总是随机应变的马克思在11月15日的《总汇报》上回答说:‘霍林格尔的声明简直可笑。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此外,马克思几次援引以下的说法,即早在传单出现之前布林德就向他口头转述过传单的内容,而且写过后来传单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因此,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从一开始布林德就被认为是传单的作者。”

为了把上面援引的那些侮辱我的话发表出来,《国民报》在这里故意不提我在1859年11月2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附刊上刊

登的一篇声明^①中在法学家看来,特别是在英国法学家看来最重要的部分。我附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剪报,并给您标出我的声明中《国民报》故意省略不提的一些地方。

按照一切法律惯例,《国民报》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它所提出的侮辱我的指控是**真实的**。但是我将寄给您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它的指控是虚假的。您会看到,根据英国的法律,只要**我愿意**,我甚至能够现在就以“秘密勾结”反对我的罪名把布林德先生送去服苦役。

(2)在《国民报》第37号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第二栏里,一字不差有这样一段话: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⁴⁷或者也以**制刷匠帮**⁵⁰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我将给您寄去证据,证明在这里把两个根本不同的日内瓦团体混为一谈,这两个团体**从来没有**同我有过任何联系,也没有建立过这样的联系。^②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一段话,我要用这段话来作为诽谤诉讼的**第二点**依据,现将这段话照抄如下:

“硫磺帮(据称它在我的领导之下)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让《国民报》对它指控我的这种极端卑鄙行为提出证据,不要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67—469页。——编者注

它向法院交出几百封信,甚至不要交出一封信,而只要它交出能证明这种卑鄙敲诈行为的哪怕仅有的一行字——关于这仅有的一行字,如果不能证明是出自**我本人**之手,至少也要证明是出自曾经同我有过某种联系的**某人**之手。该报紧接着上面引证的地方写道:

“根据‘谁要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原则,任何反对**这些阴谋**(即反对上面所说的那些诈钱的恐吓信)的人,不仅要在流亡界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我被描绘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国民报》当然不难在被塞满了的“反动报刊的各栏”中指出**怕仅有的一行字**是我或者我的朋友写的,并且包含着对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告密”。

完全正确,——而且这是**唯一**的事实,——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首讽刺诗^①反对金克尔先生的**革命公债**²⁰¹和他在**合众国的革命旅行**;起初他把这首诗刊登在我的朋友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杂志^②上,后来刊登在《晨报》^③上。这当然不是“告密”。其实是所谓民主主义流亡者(德国的)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谣言塞满了德国报刊。在我认为需要予以答复的**唯一**的一次,我给一家报纸寄去一篇反驳文章,它却**不予刊登**。⁴²³

我在被迫流亡后只为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这就是《**新奥得报**》。该报大约从1855年1月初到7月发表过我的通讯,在这些通讯中我一次也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② 《革命》。——编者注

③ 《知识界晨报》。——编者注

至于说到**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李卜克内西的通讯,它们完全与我无关,这些通讯同样一次也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顺便说一下,这些通讯(我是指它们的内容)使他获得很大的荣誉。关于这点我将较详细地告诉您。^①

我同德国和法国秘密警察的同盟,对我说来自然是个趣闻。

(3)在上面援引的《国民报》第41号上《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中,它指控“无产者的党”——称我是这个党的领袖,因而也就是指控我——于1852年在瑞士搞过“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并且指控它于1859年也玩弄过类似的“伎俩”,因此德意志各邦“在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似乎不得不向瑞士“联邦委员会”^②提出质问。

以后我将较详细地来谈这样一个问题:我同这一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从1850年9月起我完全停止任何宣传鼓动,并且早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1—1852年)我就解散了我所在的共产主义团体⁴⁴,从那时起我没有加入任何秘密的或者公开的团体。《国民报》在这一点上也是蓄意诽谤,这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它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材料中一定已经知道,我本人通过科伦律师揭露了那个似乎于1852年在瑞士作为警探活动过的家伙,施梯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家伙从1850年起就同我处于敌对的关系。必要时我将提出证据,证明这个家伙(舍尔瓦尔,他的真名是克利美尔)从来没有,甚至在1850年以前也没有同我有过联系。

(4)提起诽谤诉讼的最后一点,应该根据第41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第二栏中的这样一句话:

① 见本卷第463页。——编者注

② 瑞士政府的名称。——编者注

“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如果把这句话同两篇社论的总的精神联系起来看,——这两篇社论把我描绘成是与秘密警察、反动分子以及以揭发革命活动来威胁和敲诈勒索的**硫磺帮**同流合污的人,——那就是暗指我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让《国民报》为这种诽谤提出证据。我将把我为《人民报》弄钱的事实告诉您,如有必要,也把察贝耳先生所怀疑的我的经济情况整个告诉您;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国民报》上的卑鄙的诽谤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

请您在回信中同时指出,有哪几点您还需要我作补充说明。

又及:为了使这封信不致延误寄发时间,委托书将迟一些(明天)寄给您,但是如果来得及的话,今天晚上就另函寄出。

8

恩格斯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13日的信我已收到,但是很抱歉,今天才能把手稿随信寄上⁴²⁴。我想,手稿不会超过三印张。

您由于有原则性怀疑而提出的保留条件我不完全理解,也许您向来是不看到手稿就不愿作出决定的。我不能设想,您愿意为您那里出版的一切作品——从马克思的到雅科布·费奈迭的,从拉

萨尔的到帕累斯克的——承担道义上的、逻辑上的和美学上的责任,或者您愿意使自己的出版社符合《人民报》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无法评论,因为在曼彻斯特得不到《人民报》。但是,如果您的原则性怀疑同拉萨尔关于意大利的小册子³³有关(这本小册子的确不符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末我当然会对您的这种想法作应有的考虑。但是我也知道,拉萨尔也许会第一个反对考虑这些想法。因此我要写信给拉萨尔,因为我深信,如果认为他能够阻碍一篇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见解有分歧的作品出版,哪怕是有一点点阻碍也好,他也会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

然而,如果在您看来小册子的篇幅或者其中的原则是您的出版社所不能接受的,那末我请您在收到小册子之后二十四小时内把它转寄给柏林列宁街173号雕塑家伯·阿芬格尔先生。

给波克罕的信我已转去。

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寄来福格特的拙劣作品^①。下面再详细谈它。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敦克尔也许已经告诉您,我向他提供了一篇类似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的东西^①,他愿意承印,但提出关于“原则性怀疑”的保留条件。对某一作品中的原则承担责任的是出版者而不是作者,这对我来说虽然是十分新奇的,但是我仍然作了努力(尽管白费力气)去弄清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要知道,敦克尔是不希望他的出版社成为《人民报》的一个简单的附属品的,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过《人民报》。最后,我想起敦克尔可能探听到,在意大利问题上我同您持有不同的见解,由于过分尊重您的小册子^②他才提出这种保留条件。我深信,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末我只要提醒您注意此事,您就会让敦克尔对此放心的。我知道,您对问题是抱客观态度的,如果有人猜测,您仅仅由于某一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与您的观点不一致,就会哪怕是稍微表示不希望出版该书,那末您会觉得这是对您的侮辱。说实在的,我考虑了很久才下决心提醒您注意此事,因为我担心您可能单是由于我认为别人可能有这种猜测而生我的气。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我就无法解释敦克尔的怀疑。

要对付福格特是毫不费力的。这种被重新搬出来的陈词滥调,我们早在八年前就揭穿了⁴²⁵(关于这一点,藏在偏僻角落里的日内瓦的庸夫俗子是一无所知的),现在我们要彻底清算它,让它只剩下从福格特身上散发出来的他那种特有的臭气。不过,布林德的声明、比斯康普的声明⁴²⁶、特别是鲁普斯的声明⁴⁶已经使这个家伙声誉扫地,要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会真的无事可做了。此外还要加上沙伊伯勒关于传单《警告》的来源的声明⁶²。这项声明将把整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个奥格斯堡的诉讼¹⁶勾销,并且最后会迫使福格特在伦敦起诉,如果他要提出相反的证据的话。因此,我们自然必须重新翻阅我们所存的全部文献,从那里面可以找出这整个民主主义集团的历史,根据这个历史我们就能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完蛋。对这个无知的福格特,我们还要给他个厉害看看,尽管他有泰霍夫的信(况且这封信是他偷来的)³⁷,又有他那些琐碎无聊的日内瓦的流言蜚语,他又认为,我们其余的人都象他一样的无知、一样的卑鄙和一样的胆怯。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恩格斯

10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2月21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最尊敬的法律顾问先生:

我没有在我的第一封信^①之后立即把委托书寄给您,因为我在那封信中曾另外请您打电报给我。我等了几夭,后来认为最好是等到您从柏林寄出的回信可以到达伦敦的那一天(即昨天,2月20日)。

由于没有收到信,另一方面,您的电报没有拒绝我提出的当我

① 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

的律师的请求,因此我认为您已经接受了我的委托,为了不致再耽误时间,现在用这封挂号信给您寄去:

(1)委托书。

(2)七个附件,其中原件用英文写的都附有译文。

这七个附件是:

(1)奥·费格勒的 affidavit。^①

(2)约·弗·维耶的 affidavit。^②

(3)我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③

(4)和(5)奥格斯堡《总汇报》就这一事件给我的两封信。

(6)1860年2月15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第五版第五栏中的一段: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标题是《反对福格特的传单》。

(7)1859年9月8日卡·布林德给李卜克内西的信。⁴²⁷

明天也许您的信已经寄到我这里,那时我就可以给您寄去对这些文件的说明。您一眼就可以看出,《国民报》第41号上对我进行的无耻指控(把我描绘成是那些以别人的名义发表文件的匿名作者),可以在法庭上无可辩驳地揭穿是卑鄙的诽谤。

关于几份 affidavits(向法官作的声明,用以代替宣过誓的证词)我只提出下面一点:

您从作为附件二的 affidavit 可以看到,《upon oath》(宣过誓的)这几个字被法官勾掉了。法官向我们解释说,在他们面前作的声明可以被认为是宣过誓的声明,他还说,作假声明等于犯刑事罪,要受流放的惩处,但是根据英国的法律,只有被告在场时宣誓

① 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37和436—437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才算是真正的誓词。

其余的一切我明天再写。

谨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停留多久,因此今后一切来信请寄我的住处: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我在委托书上留下空白地方,以便填写《国民报》的编辑们的姓名。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0年2月2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现在我再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就福格特事件给你写信。你对我的前两封信^①甚至不回信说一声收到了,而你对任何一个庸人倒是会回信的。我不能相信,你竟会认为我要从你那里弄到一封信,好用来发表。你知道,我这里至少有二百封你的来信,其中有足够的材料能用来——在必要时——确定你同我以及同党的关系。

^① 见本卷第435—437页。——编者注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你作为一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大忙人,看来对于我在伦敦和柏林提起的诉讼⁴²⁸的意义理解错了。这些诉讼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柏林诉讼的意义之所以更加重大,还由于将同时审理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为注意中心的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²⁹。

看来,你对我有下述不满的地方:

(1)我滥用了你的名字(象你对孚赫所说的那样)。

(2)我在你的营业所好象跟你“闹了一场”。

关于第一点。我除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声明过布林德对我讲的话大体上也告诉过你以外,^①我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的名字。这是事实。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指出传单^②的真正来源是何等重要,而且我也有权利引证听到过布林德的话的证人。

至于李卜克内西写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那封提到你和我的名字的信(关于布林德)⁴²⁹,那末,他在必要时会宣誓证明,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这样做;我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也同样事先并不知道他把传单《警告》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当奥格斯堡《总汇报》由于福格特向它追究责任而找到李卜克内西的时候,他还怀疑我是否会利用机会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而当我立即向他声明我将尽全力帮助他的时候,他甚至感到惊奇。

在寄给你的信⁴³⁰中,我为他进行了辩护,我反对你给他的信,只是因为:从你这位享有声誉和社会地位的人物来说,对一个居住阁楼的不知名的党员过去那样亲密无间,现在却这样尖刻地攻击,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够宽宏大量的。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马克思指的是传单《警告》。——编者注

至于我的信语调气愤,那是由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

首先,使我深受刺激的是,看来你相信布林德甚于相信我。

其次,你给我的有关《晨报》(关于席勒纪念活动的文章)的信,是用极其气愤的口吻写的,从这封信看来,你认为我竟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情:我不仅把侮辱你的地方偷偷地塞进布林德的文章里,甚至过后又当你的面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布林德玩的鬼蜮伎俩。⁴³¹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应遭到这种对我说来是那样可耻的怀疑。

再其次,你把我给你的私人信件给布林德看了。

最后,我有权期待,尤其是在《凉亭》上的文章^①发表以后,你会给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加上哪怕一点说明,以消除这样的印象,即这一声明意味着同我个人决裂,意味着公开脱离党。你的第二篇声明同布林德的声明一起发表,⁴³²你的名字充当了他的谎言和歪曲的护身符,这种情况也不能使我感到高兴。无论如何,我可以向你保证:李卜克内西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一切声明,在报纸上出现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⁴³³

关于第二点。正好在我到你的营业所去的那一天,从柏林寄到我家里两号《国民报》(在第一号上载有后来在《电讯》^②上发表的卑鄙的摘录和评述)。当时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激动,我的可怜的妻子情况实在可怕。同时,我收到了一封德国的来信,信中告诉我,除了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以外,在福格特的卑劣的书中还有你的一封信⁴³⁴。据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你同福格特的亲密关系,而且可以看清楚,你的名字是福格特借以捞取政治

① 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

② 《每日电讯》。——编者注

资本,并使他的卑劣行为受到公众重视的唯一起作用的名字。你不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并反躬自问一下,你在这种时刻能够不丢掉自制力吗?

我再说一遍:这封信所谈的并不是**私人利益**。在伦敦诉讼中,我能够不经你的允许而使你被传到法庭做证人。对于柏林诉讼来说,我手头有你的信件,必要时我可以用上它们。况且,在这一案件中我决不是孤立的。福格特的无耻攻击,给我在一切国家——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提供了意外的同盟者,甚至包括完全是其他派别的人在内。

但是,为了我们双方,为了案件本身,当然采取一致行动是比较好的。

另一方面,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朋友**当中的一位。

如果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那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①

当然,我完全理解,在你目前的处境中,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对你来说都一定是很不愉快的。

但是,从你自己方面来说,你将不能不同意,完全把你撇在这一案件之外是**不可能的**。

首先,因为福格特借用你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而且还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玷污整个党是得到你的赞同的,而这个党却以你是它的成员而感到自豪。

况且,你是从1849年底到1851年春住在科伦、而从那以后一

^① 原话是:“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直住在伦敦的前科伦中央委员会^①的唯一的委员。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②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

怀着最诚挚的友谊。

你的 卡尔·马克思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2月2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现在我必须进行两起诉讼,一起在柏林,一起在伦敦^③,另一方面,我还得纯粹为谋生而工作,所以我只能给你写几行。

你在福格特的小说^④中发现了“许多真理”,这一点在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感到非常惊奇;同样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你向我提出的

①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马克思套用圣西门的用语“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在圣西门的许多著作中都可看到这个用语。——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4—475页。——编者注

④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那些胆怯的劝告。

唯一不是完全臆造的事实是泰霍夫的信³⁷。但是这封信,或者确切些说,这封信的内容,我早在七年以前就在纽约出版的一本题名为《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抨击性小册子中作了相当彻底的驳斥,以致使得所有爱叫嚷的人——那时他们还纠合在一起——都张口结舌,不敢提出一个字来反驳。

我希望从你那里知道的,而且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查明谁是《每日电讯》报驻柏林的通讯员,以及这个畜生住在柏林什么地方(街名和门牌号)。看来,这是一个姓迈耶尔的犹太人。凭你在柏林的地位,要打听出这一点,对你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请尽快把打听到的告诉我。附上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①。

你的 卡·马·

又及。至于说我的不信任(你迫使我用大政治家布林德的语言说话——见奥格斯堡《总汇报》)⁴³⁵,那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抱怨。例如,我随这封信寄给你一封来自巴尔的摩(美国)的便函。这封便函是我通过私人关系得到的。⁴³⁶在同盟的文件中有对你的正式指控(其中有杜塞尔多夫一个工人代表团的证词^②),这些文件不由我掌握,我不能支配。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

13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尔

柏 林

1860年2月24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我感到奇怪,直到昨天我还没有从柏林得到关于您收到我2月13日寄上的挂号信^①的通知。

昨天我从这里——曼彻斯特——寄给您第二封挂号信,内附委托书和七个附件^②。今天我要引用上述编号的附件,对重要的几点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这几点是对柏林《国民报》提起诽谤诉讼时所必须特别注意的。同时附上1852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③和一本我在1853年发表的《揭露》^④。

1. (a) 匿名传单《警告》。

在柏林报纸《国民报》第41号第1版发表的标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3栏这样写道:

“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象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① 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6—448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总之,这一栏的整个意思是,把我描绘成是**伪造**上述传单的人,同时卑鄙地**指控**我,说我把这个传单弄得好像是**布林德伪造**的。

在谈昨天寄上的附件中的证据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简单地告诉您这件事情的经过。

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同福格特进行诉讼的时候,同其他文件一起发表了我以下的信:

“1859年10月1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攻击过《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我。但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附去的文件**,要是在伦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的作用的。不知在奥格斯堡是否如此。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人说过的话,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他对匿名传单里所进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博士”^①

致《**总汇报**》的这封信中所附的文件该报也发表了,文件写道:

“当着卡尔·马克思博士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面,特此声明如下:《**人民报**》第7号转载的那个题为《警告》的没有注明印刷地点的匿名传单,(1)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和印刷的,原稿一部分由我本人排版,另一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2)原稿是卡尔·布林德的笔迹,我是根据卡尔·布林德为《**海尔曼**》报写的稿件和卡尔·布林德写的一些匿名传单认出他的笔迹的,这些传单的印刷地点表面上说是在‘美国

^① 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河畔法兰克福’，而实际上，它们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霍林格那里排版和印刷的；(3) 菲德利奥·霍林格亲自对我说过卡尔·布林德是那张反对福格特教授的传单《警告》的作者。

排字工人 奥古斯特·费格勒

(本签字由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博士证实)

1859年9月17日于伦敦”⁴³⁸

(见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文件第30、31页。)

对此，《总汇报》第313号和《科伦日报》上出现了下面这封卡尔·布林德的信和信中所附的霍林格和维耶的证词。

“1859年11月3日于伦敦圣约翰
伍德区汤斯赫德路23号

为了驳斥关于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声明，我公布下面的文件。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替卡尔·福格特辩解，他的品德自从我们在半年前知道以后，我和共和派里的朋友就无条件地予以谴责。我能够证明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的报道是真实的，这里确实由福格特提供过酬金，目的在于激励这里的德国人在一定的意义上对祖国的报刊起作用。

卡尔·布林德”。

(a) “兹声明：排字工人费格勒在《总汇报》第300号上断言传单《警告》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传单的作者，纯属恶意捏造。

菲德利奥·霍林格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
利奇菲耳德街3号”

(b) “本人十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霍林格先生所说确系实情。

排字工人 约·弗·维耶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

(参照福格特的书。文件,第37、38页439)

我在《总汇报》第325号上对此作了答复^①。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剪下的有关材料,我已经附在从伦敦寄给您的第一封信中。^②

卡尔·布林德在12月11日《总汇报》的附刊上从自己方面发表了新的反对意见。编辑部在附刊上声明说:

“卡尔·布林德先生说的基本内容如下:‘我再一次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维耶签名的文件,并最后一次声明,断定我是经常提到的传单的作者这样一种纯系诽谤的说法,是明显的谎言。对我的别的说法则包含有最粗暴的歪曲。我再重复一遍,我作此声明只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马克思—比斯康普—李卜克内西的攻击,而不是替我早就反对的福格特辩解。’”

关于这个声明,《总汇报》编辑部加了如下按语:

“因为在本报上继续对这些情况进行解释和争论,广大读者早已不感兴趣,因此我们要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继续争论。”⁴⁴⁰

(参照福格特的书。文件第41、42页)

文件的公布暂时到此为止。当我一看到《国民报》上的文章摘录了福格特小册子中的话并且对此加以评论时,我就首先公布了致伦敦报纸《自由新闻》编辑的英文通告信^③(附件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迫使卡·布林德以侮辱罪对我起诉,从而使我有机会,第一,向伦敦法院提出关于传单《警告》的印刷和作者的证据,第二,迫使这个传单的真正作者向英国法院提出他所拥有的反对福格特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8—442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的证据。

这个通告信(附件三)——它刚一印出我就立即给卡尔·布林德寄去了——的最近的结果,是卡·布林德在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发表的**声明**。在这个标题为《反对卡尔·福格特》的声明中,布林德重申他不是那个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作者”,但是我为我的通告信所迫,不得不提出一些论据来证明福格特是在伦敦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代理人。我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公布通告信(附件三)——的**直接**结果就是这样。

同时,我得到了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 affidavits^①(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些 affidavits 证明:**第一**,我的论断,即传单《警告》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的并且是布林德亲笔写的,是符合**实情**的。**第二**,布林德在《总汇报》第313号和《科伦日报》上报道的、后来他又在12月11日《总汇报》附刊上提到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是**假的**。**第三**,布林德和霍林格尔(见排字工人维耶的 affidavit,附件二)为了弄到反对我的假证词,使我在大众心目中成为撒谎者和诽谤者,他们进行了 conspiracy(秘密勾结)。根据英国法律,这种秘密勾结是**应受刑事惩办的行为**。只是由于考虑到布林德的家庭,我才没有对霍林格尔和布林德提出刑事追究。

两个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 affidavits(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抄本,我寄给了某些常同布林德见面的流亡者,他们已经把这两个抄本给他看过。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沙伊伯勒医生**在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上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称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并且自己承担传单中斥责福格特的责任(见附件

①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六)。因此,如果福格特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就必须重新起诉,而且是在伦敦。沙伊伯勒关于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声明,决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传单是在霍林格爾的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拿去印的,也是布林德亲笔写的,他所提供的霍林格爾和维耶的证词都是假的,最后,霍林格爾和布林德企图通过这些假证词使自己摆脱出来并败坏我的名誉。

没有必要进一步向您说明,费格勒和维耶的 affidavits (附件一和附件二)和沙伊伯勒医生2月15日在《每日电讯》上的声明(附件六)给予您确凿的证据,证明我在这封信的 I . (a) 项中援引的《国民报》的诽谤性责难是骗人的。

(b) 我和《总汇报》的关系。

1859年10月16日《总汇报》编辑部给我的两封信(附件四和附件五),和上面 I . (a) 项中援引的我在1859年10月19日对这两封信的答复,就是我与《总汇报》的全部通信。因此我们的通信仅仅限于我给《总汇报》提供了一个书面文件,这个书面文件是为了说明《总汇报》由于转载而被福格特控告的那个传单的来源。

1859年5月9日,卡·布林德在戴维·乌尔卡尔特召开的公开的群众大会上,把对福格特的一切指责都告诉了我,后来他在传单《警告》中重述了这些指责,传单是在下一个月即在6月才出版的。他要我相信,他手中有这些指责的证据。我并不认为他告诉我的事情有特别的意义。福格特的一本名为《欧洲现状研究》的小册子,其次,福格特同“日内瓦的暴君”法济的联系以及法济同路易·波拿巴的联系,早已使我确信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他是居心不良还是出于好意,是取报酬的还是不取报酬的,这对我完全一样。在布林德告诉我那件事情以后的两三天,同我从来没有私人联

系也没有政治联系的比斯康普先生到我家里来了,是李卜克内西把他带来的。比斯康普请求我和我的朋友给予他所创办的《人民报》以物质上和写作上的帮助。起初我没有接受他的请求,理由是一方面缺少时间,另一方面我应当更好地了解《人民报》,然后再推荐我的朋友为它撰稿,而当时它只出了第一号。同时我强调指出,我迄今为止原则上完全避免参与伦敦的德文报纸。在这次会见的时候,我当着比斯康普的面把布林德在乌尔卡尔特的群众大会上告诉我的事情向李卜克内西重述了一遍。同时我还提到,南德意志人由于妄自尊大而喜欢夸张。后来,比斯康普先生在5月14日《人民报》第2号上写了一篇由他个人负责并由他亲自作了补充的文章,标题是《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⁴¹。在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的诉讼》的《文件》一章中第17、18、19页上援引了这篇文章。后来,大约在6月中旬,那时我不在伦敦,而在曼彻斯特,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爾的印刷所里从霍林格爾那里得到了传单《警告》的校样,他立即发现这上面转述了布林德口头告诉我的事情,而且他从排字工人费格勒那里得知,是布林德把传单的原稿交给霍林格爾付印的。李卜克内西把这份校样寄给了《总汇报》,该报转载了它,因而招致了福格特对它提起的诽谤诉讼。李卜克内西有权这样做(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不在伦敦),何况他已知道指控福格特的布林德本人曾被福格特邀请去参加拟议中的宣传活动。这个人答应给德国报刊上一切有利于波拿巴计划的文章付奖金(见福格特的书^①中与此有关的自供,给勒宁博士的信,《文件》第36页),因此必须利用象《总汇报》这样销路广的报纸来对他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进行“警告”。

一当福格特由于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而对它提起诽谤诉讼,《总汇报》编辑部就立即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坚决请求他提供证据。李卜克内西就来找我。我告诉他去找布林德,并且根据他的要求,我亲自陪他到布林德那里去了一趟,关于这一点您从布林德的信(附件七)中可以看到。我们正碰上布林德不在家,他在圣莱昂纳兹的疗养地。李卜克内西给他写了两封信。几个星期都不见回信,直到布林德估计奥格斯堡诉讼将近结束时他才回信。(这估计错了,因为在这期间《总汇报》使诉讼延期了。)最后,在9月8日的信(附件七)中,布林德极端无耻地回答李卜克内西说,正如他“以前已经说过的”,他“与这事毫无关系”,至于“那些私下的谈话”,他打算“以后有机会时作口头说明”。李卜克内西带着这封信来找我。

我明白,现在需要采取强制办法使布林德开口说话。我想起了我在5月27日的伦敦《自由新闻》报上读过一篇匿名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⁴⁴²,文章基本上转述了传单《警告》的内容和布林德口头告诉我的事。文章的风格和内容使我毫不怀疑它的作者是布林德。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自由新闻》的责任编辑科勒特先生那里去了一趟。他犹豫了一会之后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布林德。此后不久,我收到排字工人费格勒的书面声明,说传单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印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于是李卜克内西又写了一封较详细的信给布林德,告诉他,现在我们手上有他与传单《警告》有关的证据,同时引证了《自由新闻》上的那篇文章,再一次要求他提供他所掌握的材料。卡·布林

德未作答复,而且不论在奥格斯堡法庭审理以前还是在法庭审理期间,他一分钟也没有打破他的沉默。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布林德决意抱不承认态度和外交上不予理睬的态度。因此我对李卜克内西说,如果《总汇报》向我要书面的东西,我就准备把我掌握的费格勒的声明转寄给它。我在收到《总汇报》10月16日的两封信后,确实这样做了,在10月19日的回信中附去了那份声明。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如下:

第一,我认为,既然李卜克内西最先从我这里听到布林德关于福格特的议论,那我就有责任使李卜克内西得到证据,证明他并没有捕风捉影地散布对第三者的指责。

第二,我认为,《总汇报》完全有权转载传单《警告》,因为该报知道,传单出自那个被福格特先生本人竭力吸引来参加他的宣传活动的人。虽然《总汇报》属于同我敌对的一派,并且总是采取同我本人敌对的态度,甚至不止一次地发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谎言,虽然我意外地处在奥格斯堡法院的权限范围之外,因而《总汇报》不可能强迫把我传到法庭去做证人,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第三,在6月2日俾尔的《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的附刊上(参照福格特的书中的《文件》第31页),福格特发表了一篇诽谤我的文章^①,显然他认为我是比斯康普发表在5月14日《人民报》上的那篇反对他的文章的作者。他在对《总汇报》的控诉中,同样也是从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这样的设想出发的。显然,布林德决心要永远维持这种非常符合福格特心意的“误会”。

^① 见本卷第23—24页。——编者注

第四,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使福格特和他的原告们当面对证,而且是在必定能使事情了结,双方又都没有可能使用任何诡辩手段的地方对证。为此,重要的是要把传单《警告》的真正作者和出版者从暗处硬拉出来。我的想法是对的,这可以从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附件六)和上面援引的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布林德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

我同《总汇报》的通信只限于奥尔格斯博士的两封信(附件四和附件五)和我在上面(在I.(a)项中)援引的我在10月19日写的回信。而福格特先生(和《国民报》)认为凭这点就足以把我叫作《总汇报》的撰稿人,而在德国公众面前把他自己描绘成“反动分子”和极左分子的阴谋活动的无辜受害者。

李卜克内西从1855年起就是《总汇报》的通讯员,正如福格特先生本人早先是该报的通讯员一样。在必要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将宣誓证明以下事实,即我从来没有利用他给《总汇报》塞去过哪怕一行字。他同《总汇报》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同我毫不相干。一般说来,他的通讯仅仅限于英国政治方面,而他在《总汇报》上所捍卫的那些观点是他过去和现在在激进的美国德文报刊上所捍卫的观点。在他的通讯中没有一行字不反映他的观点,因此,也没有一行字不是他无论在哪里都能加以捍卫的。在英国对外政策方面,李卜克内西所持的观点接近于布赫尔在柏林《国民报》上所持的那种反帕麦斯顿的观点。在英国对内政策方面,他始终捍卫英国最进步的政党的观点。他一次也没有在《总汇报》上写过一行关于伦敦流亡者的流言蜚语。关于我同《总汇报》的虚构的联系,就这么多。

II. 在《国民报》第41号第1版发表的标题为《怎样伪造激进

传单》的社论第2栏正数第45行和以下几行,一字不差这样写道:

“去年5月,上面所提到的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了《人民报》……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同《国民报》第41号上的整篇文章和第37号上的社论——这里把我描绘成“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同我在Ⅲ项中援引的那段话联系起来看,以上援引的那段话有这样的含意,即我是用**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的。

对此,必须作以下的说明:

福格特本人在《国民报》所说的他那本小册子开头的《文件》部分第41页上,援引了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上刊登的编辑部声明中的一段话:

“我们可以满意地告诉本报读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决定支持《人民报》。”⁴⁴³

由此可见,在6月中旬以前我还没有给《人民报》以任何支持,而且在此以前它的**财政**状况完全与我无关。我还可以顺便地说一下:比斯康普当时在伦敦靠教书过活,他经常**无代价**地为《人民报》编辑。所有其他撰稿人,从该报创刊到停刊也都**无代价**地寄来自己的稿件。因此唯一必须开支的费用是印刷费和递送费。但是这些费用往往大大超过卖报所得的钱。在我为该报撰稿之前,赤字是用从住在伦敦的德国人那里公开募集的钱来抵补的。后来我弄到了二十到二十五英镑(一百三十三到一百六十六塔勒),这些钱**完全全**是由博尔夏特博士——开业医生,龚佩尔特博士——也是医生,黑克舍尔博士——也是医生,威廉·沃尔弗——教员,弗里德

里希·恩格斯——商业家(所有这些都住在曼彻斯特)和我本人所捐献的。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完全不同意我、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的政治观点。然而,他们都认为起来反对在流亡者当中进行的波拿巴派阴谋活动是非常适时的(而这也正是《人民报》的主要任务)。

结果《人民报》欠了大约八英镑(五十三塔勒)的债,这笔债由比斯康普负责偿还。他为这笔钱开的借据在霍林格尔那里。

这就是《人民报》的全部财政情况。

至于比斯康普先生,他本人现在在1860年2月15日《总汇报》第46号附刊上作了这样的声明:

“我和马克思先生的全部政治联系仅限于他为我所创办的……周报《人民报》提供了几篇文章。”

至于我本人的收入来源,我只想说,我从1851年起就是《纽约论坛报》——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的固定撰稿人,我不仅为该报写通讯,而且还写社论。这家报纸拥有二十万个订户,能适当地付给稿酬。此外,几年以来我还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之一德纳先生所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①的撰稿人。我想,在法庭审理之前我还来得及收到德纳先生从纽约寄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信。⁴⁴⁴如果这封信不及时寄到,那举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就够了,他是伦敦皇家交易所大厦2号瑞士银行总行的分行经理,多年以来他热情地帮我把美国的期票兑为现款。

福格特以及站在他一边的《国民报》,由于我同一家不付稿酬的报纸有关系而无耻地对我产生怀疑,可是正是这个福格特却在

^①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国民报》所提到的他那本书的第226页上公然声称,他“今后仍将从凡是它能够拿到钱的地方拿钱”以用于自己的目的,这就显得他们更加无耻了。

Ⅲ. 在《国民报》第37号一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中(第1版第2栏,正数第22行及以下几行)说了下面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是据以提出诽谤诉讼的分量最重的一点: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几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无产者’(我被描写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国民报》毫无保留地采用了福格特先生的这段卑鄙的话,并且向它的九千个订户进行了传播。关于这段话,我要作如下说明:

第一:正如我在给您的第一封信中已经指出的,《国民报》有责任从“**几百封**”恐吓信中举出哪怕是**仅有的一封信或者仅有的一行字**,它的作者是我或是某个真正同我有关系的人。

第二:我重复一下我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过的话:从1849年7月起,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唯一的例外是在布勒斯劳^①出版的**《新奥得报》**(1854年),那时候它的编辑是埃尔斯纳博士和施泰因博士。我从来不认为需要哪怕用一个字谈到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流亡者, 不仅该报本身表明了这一点, 埃尔斯纳先生和施泰因先生无疑也会乐于证实这一点。

让《国民报》从“塞满了”我或我的朋友们的“告密”的“反动报刊”各栏中哪怕仅仅举出一栏来。但是, 伦敦的相当一部分德国流亡者在这好多年当中经常用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塞满形形色色的德国报纸, 这倒是确实可靠的并能够找到证据的。而我从来没有利用我同《纽约论坛报》、同宪章派的各家报纸以及同《自由新闻》的关系来进行报复。

至于说到“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 那末, 众所周知的法国警探赫尔弗很长时间是金克尔流亡者协会在巴黎的主要代理人。而且他还和同时充当普鲁士警探和《科伦日报》通讯员的贝克曼有过联系。另一方面, 同样众所周知的法国警探恩格兰德尔很长时间是卢格集团在巴黎的通讯员。可见, 伦敦的“民主派流亡者”完全建立了“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 对这一点, 当然他们自己是不怀疑的。

最后, 福格特和追随他的《国民报》谈到:

“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间, 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 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 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 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次要的, 但是为了说明和揭露福格特和《国民报》的诽谤意图, 我还是要作以下说明:

所谓的**硫磺帮**是年青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团体, 他们在 1849 年至 1850 年住在日内瓦, 并且把“欧罗巴”咖啡店作为他们聚集的大本营。这个团体既不具有政治的性质, 也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而是真正的“**寻欢作乐者的团体**”, 他们竭力用狂妄的举动来抑

制被驱逐的初期的痛苦。这个团体的成员有：爱德华·罗森勃鲁姆——医学系学生，麦克斯·康海姆——商业职员，科尔恩——化学技工和药剂师，贝克尔——工程师以及路·西·波克罕——大学生和炮手。除了1848年在科伦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⁴⁴⁵上同贝克尔先生有一面之交以外，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1850年年中，除科尔恩外，这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驱逐出日内瓦，而各奔东西了。

以上所说的关于这个我早先一无所知的团体的情况，是承蒙波克罕先生的好意我才得到的，他现在是西蒂区(马克街44号)的一家大商行的主管人。大约两星期以前，在我向波克罕先生提出书面请求要他告诉我这些材料⁴⁴⁶以后，我才认识波克罕先生本人。

这就是关于硫磺帮的全部情况。

至于制刷匠帮，这个名称是一个名叫阿布特的人(他现在是夫赖堡的主教^①的秘书)给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取的一个骂人的绰号。事情是，阿布特在一次流亡者全体会议上被宣布为无耻之徒，出席会议的既有前法兰克福的议员，也有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流亡者)。为了报复，他写了一篇抨击性文章，在文章中他给工人教育协会起了个制刷匠帮的绰号，因为协会的主席当时是一个名叫藻伦海美尔(Sauernheimer)的制刷匠(Bürstenmacher)。⁴⁴⁷这个日内瓦的工人教育协会不论同我还是同我所属的伦敦共产主义协会^②都未曾有过联系。1851年夏，这个日内瓦协会的两个成员——律师席利(居住在巴黎)和彼·伊曼特(丹第一所中学的教员)——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他们前往伦敦，在那里参加了当时由维利希和

① 马利耶。——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沙佩尔领导的工人协会¹,但是几个月以后他们退出了该协会。他们同我的关系是同乡和有私交的老朋友。我从普鲁士被驱逐出来(1849年)以后,只跟在日内瓦的一个人保持过联系,这就是德朗克博士,现在他是利物浦的商人。

所以说,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名称,正如这两个名称所表示的两个不同的团体一样,都只是同日内瓦有关系。这两个团体从来没有同我有过任何联系。在伦敦,人们从伦敦的日报《每日电讯》摘要转载的《国民报》社论中初次知道这两个团体。

因此,我同“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联系是福格特蓄意编造的谎言,而《国民报》也加以散布。

IV.《国民报》第41号第1版上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1栏正数第49行写道:

“起初福格特只谈到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

这家报纸就是这样把我同“无产者的党”混为一谈,因此,它关于这个党的一切言论也就都涉及到我本人。此外,在这同一篇社论第2栏正数第18行和以下几行还写道:

“因此,1852年,对瑞士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这个密谋若不及时揭穿,会给瑞士当局带来极大的不愉快。”

往下,在同一栏,正数第33行写道:

“‘无产者的党’对瑞士怀有特别的仇恨……”

《国民报》应当从1852年10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知道(正如福格特从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知道这一点一样),我从来没有同那个据说1852年在瑞士搞这种阴谋的舍尔瓦

尔有过联系(关于这一点,卡尔·沙佩尔先生准备作全部说明,他住在伦敦培德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在科伦案件之前,舍尔瓦尔同他保持过关系)。这家报纸应当知道,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我通过律师揭露了舍尔瓦尔是施梯伯的同谋者;根据施梯伯本人被迫提供的证词,舍尔瓦尔在1851年,也就是他在施梯伯领导下在巴黎炮制德法密谋⁴⁴⁸的时候,属于一个敌视我的协会。《国民报》专为福格特的书写了两篇社论,因此它从这本书中知道,在科伦案件结束以后我还在瑞士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揭发过舍尔瓦尔是个奸细。在科伦案件期间舍尔瓦尔据说是从巴黎监狱逃跑了,而实际上他是作为奸细来到了伦敦,当时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工人协会非常热情地接纳了他,但是由于科伦的律师(就是施奈德尔第二)按我的指示在审讯时向施梯伯质问了舍尔瓦尔的情况,结果使他被该协会开除了。

由此可见,要我对由一个明明仇恨我的、被我揭露和控告过的人所完成的所谓的瑞士功绩负责,是福格特和追随他的《国民报》对我进行的一种最无耻的、完全有意识的诽谤。福格特说到同舍尔瓦尔有过来往的“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走狗”。但是即使现在,也同1852年一样,我同住在瑞士的任何人都没有保持联系。

我把我以前写信告诉过您的情况^①再重复一下:1850年9月15日,我和我的朋友们跟当时存在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叫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中央委员会中在维利希领导下的那一部分分裂了,因为他们玩弄“民主派流亡者”的革命和密谋的把戏(不过这种把戏是极其幼稚和安全的)。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并

^① 见本卷第442页。——编者注

且除了同科伦通信以外,没有同大陆上的任何部分进行过任何通信。正如科伦案件所证实的,这种通信不包含任何犯法的东西。从1851年春天协会的个别成员在科伦被捕的时候起,我们(即协会的伦敦部分)就立即断绝了同大陆的全部的和任何的往来。我只同一个我本人并不认识的、被捕者的朋友(贝尔姆巴赫先生,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继续通信商谈辩护办法的问题。我在伦敦的朋友每周集会一次,设法使施梯伯无耻采用的每天翻新的警察伎俩不能得逞。在11月中(1852年),科伦案件结束以后,经我的朋友们的同意,我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从那时到现在我没有参加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曾经是共产主义协会会员,而且从1848年秋天到1851年春天在科伦,从1851年春天到现在在伦敦,他可以证明以上所说的全是实情。此外,附上的1852年11月19日的信^①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封信是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在他的旧文件里找到的,信上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

附上的福格特和《国民报》所援引的小册子^②,是我在波士顿(美国)印的,在此以前,在巴塞尔由沙贝利茨出版了第一版,印数二千册,在巴登边境被没收。您从这本小册子里以及以后从在柏林挑起的施梯伯—艾希霍夫案件²⁹中可以看出,1852年11月中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共产主义协会的活动中没有可据以控诉的任何犯罪构成。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我和我的伦敦朋友们所能采取的办法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很有成效地粉碎了警察设下的种种阴谋罗网,以至于最后——正如曾当过施梯伯的密探,现在被监禁在

①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的全文见本卷第482—483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汉堡的那个叫**希尔施**的人在1853年4月22日《纽约刑法报》上发表的自供⁴⁴⁹中所表明的——为了保证给被监禁的人判罪，希尔施不得不冒充豪普特到科伦去，扮演豪普特的角色向法庭提供假宣誓证词。但是，据希尔施说，冯·辛凯尔迪先生在执行这一计划的前夜写信说：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不言而喻，附上的小册子仅仅对于弄清我同施梯伯—辛凯尔迪和当时的普鲁士警察制度进行的斗争来说有法律价值。其中所提到的那些团体早已成为历史了。

V.最后，为了让您弄明白以诽谤罪对《国民报》提出控诉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要简短地谈一下《国民报》的社论在伦敦所引起的那些后果。

在1860年2月6日的《每日电讯》（伦敦的一家日报）上用两栏半篇幅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文章。

这篇注明写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实际上是在**柏林**写的文章，经过最粗率的对照就可以看出，它的一部分是《国民报》第37号和第41号的社论的简单重述，一部分是这两篇社论的逐字逐句的译文，我认为《国民报》的这两篇社论是有罪的。与此有关的那一号《每日电讯》，我将于日内寄给您。在《电讯》的这篇文章中，正如在《国民报》上一样，第一，把我和我的朋友说成是“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第二，逐字逐句地翻译我在第IV部分引用的《国民报》关于**硫磺帮**、进行敲诈的恐吓信的那段话，还有关于我同舍尔瓦尔在瑞士伪造假钞票的关系等等的话。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我立刻就写信给《每日电讯》的编辑^①,威吓要对他提起诽谤诉讼(action for libel),要求他向我公开道歉。他回答说,已把我的信寄给他的德国通讯员了,将等待后者的答复。这个答复刊登在1860年2月13日的《每日电讯》上,逐字逐句的译文(过几天您将收到原文)如下: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月8日。现在我只简短地回答马克思博士就我寄给您的一篇通讯而提出的指责。他简直是找错了对象。如果这位博学的先生指责的是福格特博士本人,或者是引用过福格特博士的书的成百个德国编辑中的一个,那末他的这一行为是合乎事态所要求的。但是,马克思博士对于在他自己的祖国向他提出的无数指责不予反驳,而宁肯向一家英国报纸发泄他的怒火,只因这家报纸刊登了在几乎所有多少知名的德国城市都刊印了和转载了的论述。看来这位博学的先生忘记了这一情况:既然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追究在他的祖国制造和散布谣言毁坏他声誉的人的责任,他就没有丝毫权利对一家英国报纸刊载几篇使他不愉快的报道而提起诉讼。最后,我表示有充分准备承认上述报道中的论述是错误的,只要马克思博士能使人们相信这些论述是错误的。如果他有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证据,那末要得到如此合乎他愿望的结果,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至少有五十个德国城市供他选择,他能够在这些城市提起诉讼,并且能够使编辑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他不想采取这样的途径,那末一个英国通讯员完全没有责任去驳斥那些论述,因为这不是他独创的,他只是由于相信可尊敬的来源有毋庸争辩的威望才加以重复了。”

顺便要指出《每日电讯》报的柏林通讯员(好象是一个叫迈耶尔的犹太人^②)竭力用来掩饰他抄袭《国民报》的行为的那种夸张说法。最初他说成百个德国编辑,后来说数千个(也就是,德国有多

① 卡·马克思《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② 《每日电讯》的柏林通讯员是阿贝尔(见本卷第536页)。——编者注

少知名的城市,也就有多少编辑),而最后说,我至少应当对五十个编辑起诉。他所说的**可尊敬的**来源也就是他的**唯一来源**——柏林的《国民报》。

还要顺便提一下,在2月6日我给《每日电讯》编辑的信中,也就是在他亲自写信告诉我已转寄给他的德国通讯员的那封信中,我曾通知《电讯》的编辑,并且通过他也就转告他的通讯员,说我即将以**诽谤罪**对柏林《国民报》起诉。

依我看来,这里唯一具有决定作用的情况是,《每日电讯》以它的通讯员为掩护,在我对德国报纸中的一家起诉之前,它将拒绝向我作任何道歉。该报提到《国民报》的“可尊敬的”威望,因为唯独《国民报》刊登了《每日电讯》上发表的这方面的论述。

《电讯》的文章在伦敦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这您是了解的。我认为这种轰动应归咎于《国民报》。单是为了我的家庭,我也应当以**诽谤罪**对《电讯》起诉(action for libel),这方面的预付费用——在案件结束以前——至少需要二百英镑。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福格特能堕落到如何**极端卑鄙**的地步:他散布恶毒的谰言,说我同《新普鲁士报》的所谓联系,是由于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我希望**立即**得到(如果您给我的信还没有寄出)您收到以下信件的通知:

(1) 2月13日由伦敦寄出的信,附有十五塔勒的预付款。

(2) 2月21日由曼彻斯特寄出的信,附有委托书和七个附件。

(3) 2月24日由曼彻斯特寄出的这一封信,附有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我在1852年11月19日写给弗·恩格斯的

一封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的信。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

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伦 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请向沙佩尔介绍一下福格特的书^①。到他那里去一趟。他会告诉你,我给他的信中写了什么。

根据我昨天收到的我的柏林律师^②的信来判断,这个案件进行得很顺利。我在寄给他的材料中同时也叙述了跟你有关的情况。请详细研究一下福格特书中整个有关你的那一部分,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加以利用。但是要准确地把握住事实。

此外,1860年2月6日工人教育协会为保护我而通过的、并由协会主席^③签名的那个反对福格特的决议⁵²必须立即得到法官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法律顾问维尔。——编者注

③ 弥勒。——编者注

的证实(即签字)。因此必要时跟维尔贝^①谈一下。

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15

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 伦 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沙佩尔：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信，请他向你介绍一下福格特的书^②，以便你本人能够确信，在柏林对《国民报》的诉讼(对《电讯》^③的诉讼是次要的)，对于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声誉以及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是多么重要。我昨天收到了我的柏林律师^④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国民报》的察贝尔先生势必要为他对福格特的热心而去尝尝铁窗的风味。我的律师认为重要的是，你尽快地向伦敦的法官(弯街的这个法官是个合适的人，他已经认识李卜克内西，而李卜克内西可以陪你去一趟)提出如下的 affidavit^⑤，或者与此类似的

① 约瑟夫·瓦伦亨·维尔贝。——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③ 《每日电讯》。——编者注

④ 法律顾问维尔贝。——编者注

⑤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affidavit:

“兹声明,在某年……舍尔瓦尔(别名克列美尔……)经我本人介绍参加一个叫作《Der Bund》(同盟)^①的德国互助团体(顺便说一下,这个团体早已不存在了)的伦敦支部;这个舍尔瓦尔于1848年某月某日路过科伦时同我进行过简短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我甚至没有向卡尔·马克思博士提过。他当时根本不认识舍尔瓦尔这个人;1851—1852年,舍尔瓦尔住在巴黎时,属于一个叫作‘同盟’的德国互助团体的巴黎支部,并和它通过信,当时领导‘同盟’的是我和现在住在合众国的辛辛那提的维利希先生。1852年秋,舍尔瓦尔从巴黎回到伦敦以后,参加了一个叫作‘工人教育协会’的公开的德国工人团体,他原先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那时领导这个团体的是我和上面所说的维利希先生。由于在科伦审问贝克尔博士^②和其他人时公开揭露了舍尔瓦尔,以及由于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材料,这个舍尔瓦尔被公开开除出所说的德国工人俱乐部,此后不久他就从伦敦溜走了。”⁴⁵⁰

恩格斯向你衷心问好;顺便提一下,他本人今春某个时候将来伦敦一趟。请你不要耽误时间。

你的 卡·马·

在 affidavit 里说“互助团体”,因为这类东西在英国法官听起来是完全无害的;况且对于“互助团体”随便怎样理解都行。

①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16

马克思致穆赞比尼

伦 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①

亲爱的穆赞比尼:

孚赫先生大概已经告诉您,正好现在我在进行两起关于诽谤的诉讼,一起是在柏林对《国民报》起诉,另一起是在伦敦对《每日电讯》起诉。两起都同波拿巴代理人福格特那本攻击我的小册子^②有关。

因此,对我来说极端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关于以下问题的确切材料:关于克拉普卡将军同瑞士银行总行以及同奥斯曼银行的关系;关于这两个银行的相互关系;关于奥斯曼银行同穆苏卢斯的关系;以及关于后者同俄国的关系。如果您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给我寄到我现在在曼彻斯特的住址,我将非常感谢您。

请代我向候穆赞比尼夫人。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马克思在日期下面写了这样的字句:“装入给我妻子的信中;注有上述日期的寄给穆赞比尼的信如下:”。——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1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0年2月29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来信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只和很少数的人交朋友,然而我却很珍视友谊。1844年成为我的朋友的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至于你信中正式谈到的事情本身,那是出于严重的误会。因此我要作如下的说明:

1. 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²⁹

我给了尤赫一份“材料”(同时我还向他声明,由于下面两个原因,他和艾希霍夫都不能得到我的支持:第一,由于他们在《海尔曼》上谈论科伦案件的那种方式;第二,因为我确信,艾希霍夫不过是前任警务顾问敦克尔手中的工具,后者企图对施梯伯进行报复,完全象以前维多克在巴黎对日斯凯进行报复一样;但是,仅仅为了替我死去的朋友丹尼尔斯医生报仇,我也要尽一切可能来协助打垮和惩罚施梯伯)。这份“材料”的内容如下:

我给了尤赫一本《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请注意,这是我先在瑞士,后来又在波士顿出版的著作,并且被福格特当作众所周知的书籍引用过,所以绝对不是“秘密材料”。

我向尤赫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了。

最后,我向他指出,列伐尔特(艾希霍夫的辩护人)应当要求被拘禁在汉堡的希尔施出庭作证。这一点做到了。希尔施现在已经宣誓供认,“记录本”是普鲁士伪造的,其他一切从法律上看都是违法的。

这样,在这一案件中根据我的“材料”所要作的“揭露”,会给过去的“同盟”盟员连犯罪的迹象都洗刷掉,并且还会“揭露”普鲁士的警察制度,这种制度由于“科伦案件”和科伦陪审员的可耻怯懦而确立下来之后,现在在普鲁士已经发展成为连资产者本身和奥尔斯瓦特内阁都终于感到难以忍受的一种统治力量了。事情就是这样。

此外,我非常惊异你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在某些方面能替警察效劳。请你回想一下你所知道的科伦来信(1849—1850年),这些信直接责备我不该使同盟的宣传活动停顿下来(我当时这样做,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的,绝不是出于个人考虑)。

2.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在我的著作^①出版以后(从1859年秋天起)我曾向某些先进工人,其中也包括以前的同盟盟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但这种讲演与不公开的团体毫无共同之处,它与这种团体的关系,比方说,甚至比格尔斯滕堡先生在席勒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还要更少。

你会记得,我曾经从设有许多支部的纽约共产主义者协会⁴⁵¹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的领导者(其中有住在纽约交易所广场44号通用银行的经理阿尔勃莱希特·康普)那里接到了一封经你手转交的信,这封信实质上是请求我改组旧的同盟。过了整整一年我才写了回信,当时我说,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此后,伦敦谢尔策尔先生的《新时代》曾不止一次地激烈攻击我的这种“无所作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攻击什么人是不言而喻的。

当勒维(第一次)从杜塞尔多夫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时他也常去拜访你),他甚至想以在伊塞隆、佐林根等地发动工厂工人起义的诺言来引诱我。我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又危险的愚蠢想法。另外,我还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加入这类组织,至少因为这类联系会给我们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勒维回到杜塞尔多夫,正如不久以后有人写信告诉我的,他对你赞扬备至,而对我的“空谈主义的”冷漠态度则尽量揭露。⁴⁵²

可见,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末我就是个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⁴⁵³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在柏林我需要证明两件事情(有关这个旧的并且已经过了时的同盟的历史):

第一件是从1852年起就不存在以我为成员的这类团体;

另一件是福格特先生是一个最无耻的诽谤者,因为他对存在到1852年11月的共产主义者协会进行的诽谤超过了捷列林格。

就后者而言,你当然是一个见证人,而且你给卢格的信(1851年夏天写的)还可以证明:在这里所谈的那个时期里,你把这类攻击也看作是对你个人的攻击。

发表在《晨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人民报》上的那个声明^①,你也签了名。科伦案件的卷宗里有这个声明的一个副本。

此外,当在我的《揭露》(波士顿版第47页)中重新提到这一点⁴⁵⁴的时候,你也丝毫没有表示反对。

你的名字还作为收款人出现在我们印发的为被判罪者募捐的呼吁书中。⁴⁵⁵

其实,也无需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但是,让我的柏林律师^②手里有我给恩格斯的下面这封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司法文件,因为它是不装信封寄出的,而且上面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的邮戳。

“1852年11月1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③,同盟^④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附上给英国各报用的**声明**……此外,我还写了一篇石印通讯(我后来没有出石印通讯,而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法律顾问维尔。——编者注

③ 1852年11月17日。——编者注

④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是在沙贝利茨那里出版了小册子^①),详细地叙述**警察当局所干的卑鄙勾当**等等,并且向美国发出关于救济被捕者及其家属的呼吁书。收款人是**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所有的人都签名了。(以下几行无关紧要。)

你的 卡·马·”⁴⁵⁶

在这样的文件里我当然不能删掉**任何一个名字**。这是我用你的名字来**证实一个事实即同盟解散**的事实**的唯一的一次**,因为你的名字偶然出现在我于1852年写的一封信中。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损害你声誉的地方。

有一封你在1851年写的信,我打算收在案件结束以后出版的小册子^②里。信中**绝对没有**在法律上可能危害于你的东西。但是,由于这还要拖延好多星期,这件事情我以后再和你面谈。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

“党的会议、决议和行动”在1852年以后已属于**幻想世界**,这不用我证实你也会知道,而且根据你给我的许多信件来判断,看来你是知道的。

我和大洋彼岸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志**在1852年以后还继续了一段必要的时间即继续到1853年年底的**唯一的**活动,就是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革命儿戏**进行了正如1851年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在《论坛报》上所说的那种“轻蔑嘲笑的做法”⁴⁵⁷。你抨击**金克尔的诗**^③以及你在这一期间同我的通信都证明你和我在这一点上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③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这与当前的案件毫无关系。

捷列林格、**班迪亚**、弗略里等人从来没有加入过“同盟”。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在革命时代闻不到玫瑰油的香气,时而有人甚至被溅一身脏东西,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拚命地反对我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通通彻底违犯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不是福格特或捷列林格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法庭上可以驳倒的无耻诬蔑)来反对整个党,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或事务关系中,难道能够避免肮脏龌龊的事情吗?那里正好是藏垢纳污的自然场所。例如罗·卡登爵士(见议会关于贿选的兰皮书)⁴⁵⁸;又如**克拉普卡**先生,关于他的为人我已得到最确凿的材料,克拉普卡一点也不比“**班迪亚**”好,也许比他还更坏。尽管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留下了英雄业迹,尽管我公开地揭露了他^①,可是直到现在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仍然在君士坦丁堡庇护着他,只是因为他深知他们的底细。从个人方面来说,班迪亚比克拉普卡要体面一些。他养了一个姘妇,而克拉普卡却长年靠姘妇生活,等等。愿贝塔的纯洁能抵当捷列林格的卑污,

^① 卡·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历史上有趣的一页》。《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编者注

甚至赖夫的放荡也能与保拉的贞节相当,不过保拉无论如何不是党员,而且也没有冒充党员。

有支付能力的(这也象每次商业危机所证明的那样,必须作一些极为含糊的保留)道德所表现的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在我看来,丝毫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而后者不论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和我们过去的“同盟”,都没有完全避免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相互交往中人们才习惯于失去这种对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的感觉。

3. 福格特—布林德的特殊事件。

在费格勒和维耶提出 affidavits^①(大家知道,提出假的 affidavits 是要受到流放惩罚的)以后,在由于有了这些证词布林德不得不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作了声明,沙伊伯勒医生也不得不发表声明(在2月15日《每日电讯》上)以后⁴⁵⁹,事件就昭然若揭了,因而你就这个问题提供证词现在已完全成为多余的了。在布林德的事件中,我感到麻烦的只是材料太多。

我就这一事件去找过厄内斯特·琼斯,由于他对布莱特、吉耳平等人的愚蠢态度,我已有两年没有同他见面了,现在他已公开放弃这种态度。⁴⁶⁰我去找他,首先是因为他象其他许多人(其中有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一样,2月6日的《电讯》一出版,就主动地向我表示他对福格特的卑劣行径感到极大的愤慨⁴⁶¹,因为福格特竟无耻地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目的(并且在1849—1852年在这方面进行了活动)是以告密相威胁,向住在德国的被败坏了名誉的人勒索金钱;福格特还根据我和冯·威斯特华伦的“姻亲关系”

^①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得出了我同《新普鲁士报》有“联系”的结论，等等（由于我的妻子的缘故，我对琼斯的这种表示感到很高兴，因为不能要求夫人们对政治上不愉快的事情无动于衷，同时也因为她们通常正是根据患难来衡量友谊的真假程度的）；其次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在法律上对布林德极不愉快的事件去找真正的英国律师——不是为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着想。出于同样的考虑，我没有把英文通告信^①寄给《晨报》，而且除了《电讯》以外，也没有寄给任何一家英国报纸。

琼斯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你可以——我将亲自陪你出庭——根据维耶的，affidavit 争取立即下令以秘密勾结的罪名逮捕布林德。可是，你要注意，这是刑事追究，一开了头，你就无法再把它撤回。”

当时我问琼斯（他能向你证实这一切；他的地址是：西区肯辛顿剑桥广场5号）：他能否对布林德提出警告，从而迫使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福格特的一切，迫使他承认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是假的。

琼斯回答说：

“秘密勾结的案子，因为属于刑事犯罪性质，律师想要促使撤回诉讼或者和平了结的任何企图，都要担负刑事责任。”

琼斯在《电讯》的案件中将作为我的律师出庭。

听了琼斯的话以后，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一方面，为了我的家庭，我应该迫使《电讯》辟谣，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愿采取在法律上会损害布林德家庭的任何步骤。我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把两个

^①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affidavits 的抄本连同一封信寄给布林德的朋友路易·勃朗,在这封信中我写了如下一段话:

“如果我将被迫对布林德提起刑事追究,我将感到很遗憾,但不是为了完全罪有应得的布林德先生本人,而是为了他的家庭。”

我的这个步骤引出了沙伊伯勒(可怜的人!)的一篇声明,正象我的铅印通告信(一印出来,我就马上寄给了布林德)引起了同一天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他反对福格特的声明一样。布林德尽管具有巴登人的小聪明,但是他忘记了他是在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这个人在事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或者他的党的荣誉时,是毫不留情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对《每日电讯》已经提起诉讼,但是我的律师将把它拖到对《国民报》的诉讼结束以后。如果沙伊伯勒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福格特的一切坦率地告诉我(沙伊伯勒当然是布林德手中的驯服工具),那末在2月15日的《电讯》上发表他的声明以后,我就根本用不着把这些 affidavits 转交给伦敦法院了。而在柏林,这对布林德不可能有任何司法上的后果,要避免这样做自然是不可能的。沙伊伯勒是不是“传单”^①的真正的(文字上的)作者,这并不能改变根据 affidavits 所确定的下列事实: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②是假的,它们是通过秘密勾结弄到的,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亲笔写的,并且是他交给霍林格尔印刷的。

① 传单《警告》。——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

所有这些事情当然都使人厌恶,但是并不比1851年以来欧洲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外交、军事、文学和信贷方面的全部发展在内,更使人厌恶。

“不管这一切”^①,对我们来说,“受庸人攻击”这一口号始终要比“让庸人踩在脚下”这一口号更好一些。

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②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

你的忠实的朋友 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才接到妻子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最好你在星期六(后天)(不是星期五,因为我还要算上星期二寄出的那篇文章)在《论坛报》账上付给我十六英镑。我的“全权代表”^③将同平常一样前来拜访。

① 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③ 看来是指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立即给你回信,不过写得很简短(但我希望能写清楚),因为两起诉讼的准备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1.关于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你对诉讼的结局是无法判断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我手头有些什么样的文件,其次,你也不知道福格特的谰言是纯粹的捏造。但是,你应当一开始就赞成**进攻**。第二起诉讼是我对伦敦报纸《每日电讯》提起的,因为它曾转载和传播《国民报》的文章。《电讯》是伦敦一家**最卑鄙**的日报(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决不是一家小报。在伦敦的**所有**日报中间,它的发行量**最大**。它专门受到帕麦斯顿的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乐意登载这类**攻击我的肮脏东西**的缘故。

《高尚意识的骑士》^①你一定会收到。

2.“庄严的姿态”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⁴⁶²。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已给恩格斯、沃尔弗和我妻子看了,而按照他们**一致**的看法,信中可以感觉到由于福格特的**卑劣小册子**^②而产生的某种**惶惑不安**

①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既然三人成会^①，看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我把这封便函^②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是要让你清楚地看到，你会由于这类肮脏东西而如何大发雷霆，尽管便函并没有发表，而且它也绝不能同福格特的诽谤性谰言相比拟。

福格特控告我犯了**应受刑事处分的罪行**。在你的几封来信中我看不出你对这个庸人感到丝毫的气忿，按照你的意见，我甚至应当向他公开道歉。如果福格特知道你同我的关系，而且手头有维斯的便函，那末，他就会把它当作“硫磺帮”⁴⁷历史上的真实文件发表出来。你推测我已在某处公开提到(除了给你的一封信⁴⁶³以外)布林德掌握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欠考虑的。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这一点我已从他的书^③中看得非常清楚。当维利希(泰霍夫只写了维利希在1850年私下对他说的话)于1853年在合众国对我进行类似的诬蔑的时候，魏德迈、雅科比医生和克路斯在我获悉这件事以前，就已出来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诽谤。⁴⁶⁴在德国，我当地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表示过任何抗议，反而给我写来了家长式的训诫信。

因此，我把这个便函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使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你对我所处的境地有一种正确的、热情多一些、空论少一些的看法，这是完全合适的。

我寄给你的**不是**维斯医生那封信的**副本**，而是原本(即从美国寄给我的那个副本)。德朗克根本不知道这封便函。

① 拉丁谚语，原文是 tres faciunt collegium，意思是三个人以上开会作出的决定可以有法律效力。——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欧洲状况研究》。——编者注

至于说编造记过簿,那是谈不上的。⁴⁶⁵我在寄给那个收到维斯便函的人^①的私人信中,说你是我们党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看来,那个收信人——由于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曾把我的这封信拿给维斯看了,或者至少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过他。这就是维斯这件事的缘由。我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跟维斯发生任何联系。过去他曾表示愿意为《新莱茵报》效劳,还寄来过一篇通讯,我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在纽约(在魏特林的报纸《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半打反对我的愚蠢文章。

我使用“正式”指控这个词^②,只是把它同维斯的“秘密”信相对照。现在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词太滑稽——要知道我是在匆忙中写的。

我不能不守信用说出杜塞尔多夫的那些人是谁^③。但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我没有同他们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于说工人忘恩负义,那与我亲身经受的来比,这种对你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儿戏。无论如何,勒维不是这种人,也不是这种人里面的一个。贝克尔、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乌伦多夫(后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反对你的话或有关你的事。⁴⁶⁶

我没有同贝克尔^④“发生过联系”。同盟^④中央委员会被迁往科伦。最后的决定是在那里通过的。(这个同盟正象所有同它有关的事情一样早已成为往事,同盟的文件除两三份外都在美国。)贝克

① 克路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

③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④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尔是在科伦被吸收入同盟的。这样他就同我有了联系。

如果现在你把所提到的事实与你对它们的解释对照一下,那你就明白你具有“不信任”的特殊才能。

至于说到我的不信任,那在我公开活动的这十八年中,我只知道在两件事情(你若能举出其他事实,我将感谢你)上,可以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责难我犯有这种精神上的毛病:

(a)我在《新莱茵报》上刊登过从巴黎寄来的对巴枯宁的告密。这是出自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来源。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波兰人^①。另一个是巴黎的石印通讯。即使我不登出来,这家通讯也会把它塞给各家报纸的编辑部的。公开提出指控,既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巴枯宁。《新奥得报》发表的巴枯宁的反驳文章,我马上就转载了。科斯策尔斯基被巴枯宁派到科伦来向我转达决斗的挑战,当他看了巴黎的信件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有责任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立即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科斯策尔斯基成了《新莱茵报》最好的、最可贵的朋友之一。我在《新莱茵报》曾公开发表一项恢复巴枯宁名誉的声明,我个人又同他在柏林言归于好(1848年8月),以后又在《论坛报》(1851年)上出面维护他。⁴⁶⁷

(b)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②中,有些人,特别是沙佩尔、奥·迪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维利希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但是沙佩尔本人(迪茨在一封给沙佩尔的信中也这样)承认:我反对他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如果他们不被怀疑,那倒是怪事;那时维利希发疯了,准备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我,而

① 艾韦贝克。——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且实际上也对我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行动。

最后:

“至于说我的**不信任**,那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抱怨”^①那句话,是对你以下这句话的**公正**的反驳(我这里是凭记忆援引):“对了解你的人说来,福格特的小册子是无损于你的……”我就是对这个安慰人的保证作出回答。

至于说“许多真理”的说法^①,那我必须以后在伦敦再看看你的信。

我希望所有各点现在都说清楚了。

你的 卡·马·

还有一点。你劝我等到把福格特的书读完以后再“起诉”。但是,难道在《国民报》上登载的摘录还不够吗?难道一个“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的”^②人在这之后还能等待吗?

阿道夫·施塔尔是否知道《电讯》^③的通讯员?后者至少由于金克尔夫人的逝世而刊登了一些带有芬尼·列伐尔特气味的东西⁴⁶⁸。

① 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

② 贺雷西《颂歌》第一册第二十二首颂歌。——编者注

③ 《每日电讯》。——编者注

19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2月22日的信我已收到,首先对您接受我的委托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我完全同意您办理这一案件的种种设想。如果我根据正式理由提起诉讼得不到法律上的结果,那末至少提起诉讼对于舆论是极其重要的。

作为对下述附件^①的注释,并且为了结束我的情况介绍,我以为可以作以下的说明,同时要预先指出,因为我2月13日给您的那封信没有留底,所以诉讼的几个要点的编号按我2月24日的最后一封信。^②

对于第Ⅳ点关于舍尔瓦尔。

您从转寄给您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可以看到,卡尔·沙佩尔先生曾是1850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与我敌对的那部分人的两个领导人之一,我曾谴责他们对当时存在的秘密团体的宗旨作了错误的理解;根据我的信念,这个团体应该从事某些观点的传播,但是不应从事任何阴谋活动。因此,我不仅通过科伦法

① 见本卷第498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4—475页。——编者注

庭上的律师^①之口,而且还在上面提到的我那本后来在瑞士和美国出版的小册子中,公开谴责沙佩尔先生及其一伙为施梯伯及其密探们的警察阴谋制造了借口,从而使我在科伦的朋友们受到司法追究。

尽管在法律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沙佩尔先生的自尊心来说该是多么痛苦,但我仍然知道他是个诚实的人(他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校对员),所以才在从这里寄出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向伦敦的法官提出一份关于这一点的 affidavit^②。^③他立即满足了我的要求(见附件 a。译文:附件 f, 1)。

沙佩尔先生和我一样,已经多年不从事任何宣传鼓动。

沙佩尔的 affidavit 消除了我同坏蛋舍尔瓦尔的关系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疑点;不过,如果《国民报》哪怕是粗略地看看最有影响的普鲁士各报所转载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和11月)的公开报道,它对于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怀疑。这家报纸在对我提出侮辱性的指控之前应该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因为它自己在社论中曾多次提到这一案件,那就更应该做到这一点了。沙佩尔的 affidavit 证明,舍尔瓦尔同我从来没有联系,而仅仅同我当时的反对者有联系。关于舍尔瓦尔,我还可以从一封旧信中摘录下面几段话加以补充,这封信是我写给曼彻斯特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1852年10月28日),他还保存着。

“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

第一,判决以后,他马上从巴黎监狱奇怪地逃出。

① 施奈德尔第二。——编者注

②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76—477页。——编者注

第二,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却毫无阻碍地呆在伦敦。

第三,雷缪扎先生(我委托施奈德尔第二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密探的身分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而现在是在波拿巴的密探了。”⁴⁶⁹

从信中摘录的以上这段话的内容,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可以证实,如果您认为有必要请他到柏林去做证人的话。在以上援引的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德·雷缪扎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曾是路易-菲力浦手下的大臣,至少是路易-菲力浦时代最杰出的议员之一,也是这一时期的所谓空论派的最有名的作家之一。

对于第Ⅱ点。(关于《人民报》的资金)。

我寄给您的附件 b (译文:附件 f, 2),是关于我提供《人民报》使用的那笔钱的来源问题的我的代替宣誓证词的个人声明。⁴⁷⁰

因为办理我对伦敦《每日电讯》提起的诽谤诉讼的律师住在曼彻斯特,所以我必须在曼彻斯特逗留一个时期,这样一来我只好向曼彻斯特的 Justice of the Peace (治安法官)作 affidavit。因此,根据英国的法律,在证词上没有印章。

对于第Ⅰ点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于第Ⅲ点我要作如下说明:

说到我同“秘密警察”的“联系”问题,我可以要求让我的内兄,即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来做证人。但是我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妹妹,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家庭丑闻。这一点我完全交给您斟酌处理。

附件 c(译文:附件 f, 3)是合法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格·弥勒的一份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这是从我一到达伦敦时起(1849年9月或8月)直到我后来在各家德文报纸(其中包括当时存在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公开声明退出该协会^①时(1850年9月中)为止,我在伦敦参加的唯一的工人团体(上面提到的那个根据我的建议于1852年11月解散的秘密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除外)。总之,这是我居住伦敦期间有某些联系的唯一的德国工人团体。这个协会在它的成立纪念日那天(1860年2月6日)(恰好在这一天,伦敦的《每日电讯》报转载了《国民报》的文章),一致通过了一个为保卫我而反对福格特的决议,尽管我已经有十年不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了。

正如您在附件中看到的,该协会的主席在伦敦把这个决议写成能够在法庭上作为正式文件提出的形式。

对于第 V 点。我在这里(附件 d)附上《每日电讯》对《国民报》一篇文章的转述,以及在我提出抗议后收到的《每日电讯》通讯员(柏林的)的答复(附件 e),答复的译文见我2月24日的信^②。

我认为,在诉讼进程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完全没有必要提到我的朋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名字,唯一的例外是我在1852年11月19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这封信我已在2月24日的信中转寄给您了^③。我认为这封信对于从法律上判明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3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4、471和482—483页。——编者注

除了下面的补充说明,我随信附上以下的附件:

附件(a)沙佩尔的 affidavit; (b)我本人的 affidavit; (c)格·弥勒的 affidavit; (d)2月6日《每日电讯》第5版第1栏中一篇标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文章; (e)2月13日《每日电讯》第2版第6栏中一篇标题为《德国》(本报通讯员采访),2月8日寄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 (f)三份 affidavits 的译文; (g)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12月纽约版; (h)临时政府成员弗洛孔的信,1848年3月1日于巴黎; (i)列列韦尔的信,1860年2月10日于布鲁塞尔; (k): (1)律·若特兰的信,1848年5月19日于布鲁塞尔; (2)他的另一封信,1848年2月25日于布鲁塞尔; (l)一本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版; (m)厄内斯特·琼斯的信,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 (n)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1860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⁴⁷¹ (o)戴维·乌尔卡尔特的信,1854年12月9日于格拉斯哥; (p)附件 m、n 和 o 的译文。

我还应当给您提供的唯一的文件,就是《纽约论坛报》编辑的一封信⁴⁷²,信中谈我从1851年年中到目前为止同这家居于美国英文报刊首位的报纸的关系。这封信最近能收到。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补 充 说 明

不言而喻,在对《国民报》的诉讼中,我只涉及《国民报》自己在其社论中作为引文或者作为引文的评论引用的福格特诽谤文章中的那几点;而且我只提对《国民报》说来应受刑事惩办的那几点。其

余的一切我留待我对福格特的书面答复时用,书面答复要在审判案结束后才能出版。

因此这些补充说明只求达到以下的目的:

(1)我对《国民报》上那些对于诉讼本身毫无意义的地方补充一些说明,以备在需要时反驳对方的律师。

(2)由于我本人是律师的儿子(我父亲是特利尔的已故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他曾长期担任那里的律师公会会长,而且以自己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我知道对于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律师来说,对自己的委托人的为人有个十分清楚的概念是多么重要。此外,您将看到,关于第2点所引用的某些东西可能在审讯期间有用。

对第1点。

在《国民报》上,在我2月24日信中第Ⅲ点中援引的那段话^①之后,还有下面一段话(《国民报》第37号第2栏正数第65行及下面几行):

“顺便说说,福格特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的一封长信,信中……”

但是,首先,与只读过《国民报》而没有读过福格特本人的诽谤文章的读者所容易设想的不一樣,这封信没有一字一行谈到《国民报》就在这段话前面同福格特一起并跟着福格特所断言的东西,也就是根本没有谈到什么“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以便以告密相威胁来诈骗他们的钱”,什么“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等等的话。

^① 见本卷第466页。——编者注

泰霍夫所说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他有一次同我、恩格斯和施拉姆(现在已去世,当时——1850年——是恩格斯和我在汉堡出版的杂志^①的主要出版人)一起喝酒,当时他为了要我们敬佩他,把自己装扮成瑞士一个秘密团体⁴⁷³的非常严肃而重要的全权代表,我们跟他开玩笑,他却很认真。这是指他的信的**理论部分**,他在这里描述他同我们的谈话(这样的谈话从来也没有过),极尽歪曲之能事,达到可笑的地步。谁都不能要求我这个已经有十五年以上用德文、法文和英文书面发表过自己观点的人去认真讨论一个前中尉对我的理论所作的叙述,而这个人一生中只同我一起度过几个小时,而且是在酒馆里度过的。从下面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泰霍夫先生当时的**表里不一**和**心术不正**:起初他在从瑞士写给我和恩格斯的信中痛骂维利希(见附件g:《高尚意识的骑士》第3—4页⁴⁷⁴),而后来他在他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无保留地重复维利希所散布的对我的谣言和诽谤(维利希当时表现出最愚蠢的自命不凡,他满以为他自己非常重要,而他想象中的对手则在想方设法陷害他)。其实,泰霍夫——假如他有一点点理智——当然应当懂得,他在伦敦总共只呆了几天,而且只和我们**当时的**反对者交往,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说话。

以上我谈的仅仅是所谓泰霍夫的**信的理论部分**(在福格特著作^②的第142页和下面几页转载了这封信,我当然不知道它是否被歪曲了)。

现在我来谈谈**该信中似乎使我罪过加重**的那部分,泰霍夫在这一部分谈到我的亡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维利希的决斗。如果《国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民报》转载了这封信,我就会附上施拉姆的信,他在信中——已经是在决斗之后很久——责备我受维利希的影响,因为我曾劝他不要决斗,尽管我的劝告没有生效。

这里只指出附件 g 第 5—9 页⁴⁷⁵就够了。(当这本小册子在 1853 年 12 月在纽约出版的时候,他们两人,不论维利希还是康·施拉姆,都已经在美国。)

谈到这本小册子(附件 g),那就必须多少谈一谈它的产生经过。

1852 年 12 月,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几个星期以后,我把我的关于这一案件的《揭露》的手稿寄给了巴塞尔的出版商沙贝利茨。沙贝利茨拖延了几个月才印,后来他在运送小册子的时候干得很愚蠢,使全部运往德国的出版物在巴登边境上被没收了。因此我又把手稿寄到北美合众国,在波士顿刊印,起初是在 1853 年 3 月的几号《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后来出版了单行本。

与在美国发表《揭露》同时,维利希先生和金克尔一起来到了美国。他们两人是为了募集革命公债²⁰¹到那里去的,因为按照金克尔当时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阐述的观点,只要有搞革命所“必需的钱”,“搞革命就象建铁路一样容易”。⁴⁷⁶我坚决反对了这种愚蠢的做法。在美国发表了《揭露》以后,维利希至少等了四个月,而后才仅仅在《纽约刑法报》上刊登了一篇答复。⁴⁶⁴

这篇答复所包含的那些蠢话和诽谤同泰霍夫的信一样(1850 年泰霍夫写给瑞士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维利希当时在伦敦私下对他说的和 1853 年维利希在纽约发表的东西)。我当时由于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而在美国的英文报刊上已经获得了公认的社会地位,因此我更应当给予答复。不过我决定,问题虽然要从本质上

分析,但要采取诙谐的形式,在《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泰霍夫,维利希也一样,是可以答复我的,但是他们宁愿沉默,而且在迄今为止的七年时间内也没有打破他们的沉默。

《国民报》(它想方设法报复我1848—1849年在《新莱茵报》上对它的批评⁴⁷⁷)竟把老早就被公开驳倒了~~了的~~流言蜚语当作确实的真理奉献给读者,它的无耻和荒诞已到了何等地步!

附带提一下,我在伦敦一拿到福格特的书,就把书连同我的一封信一起寄给了在澳大利亚的泰霍夫先生,大约过四个月以后可以向公众公布他的答复。

此外,下述关于公布泰霍夫的信的情况对福格特来说是能说明问题的。

住在巴黎的律师席利在一封注明“1860年2月6日于巴黎”的信中,给我这样写道:

“这封信(泰霍夫的信)经过几个人的手终于到了我手里,在我这里一直保存到我被驱逐出瑞士(1851年夏),那时它才通过拉尼克(曾与维利希有联系的一个工人)落到福格特的手里。问题在于我不能去整理自己的文件,因为我是在日内瓦街上突然被捕的,既没有任何关于驱逐的预先通知,也没有任何其他警告,我在那里被拘留起来,立即就经过各种拘留所押送到巴塞尔,又从巴塞尔押送到别的地方。我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整理的,其中就有拉尼克。他就是这样弄到了这封信。后来我从伦敦写信向拉尼克索取这封信,但是没有拿到手。他作为维利希的特别代理人(维利希从前同他一起住在伯桑松),在他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计划或指令……现在拉尼克是一个很出色的装订厂的厂主,而且这个厂是为日内瓦政府(其首脑是福格特的庇护人法济)服务的。拉尼克既是维利希的崇拜者,同时又是福格特的耳目。”

福格特先生就是通过这种体面的途径获得泰霍夫这封信的。

如果您一定要提到这点,那我请您不要提**席利的名字**,因为福格特作为波拿巴的代理人,有足够的力量把他驱逐出法国。

关于这一点我还应当作以下补充,维利希刚一(1853年)发表后来泰霍夫的信中复述的那些胡言乱语,我在英国还没有得知关于此事的任何消息以前,就在那同一家《**纽约刑法报**》上登出了约瑟夫·魏德迈(从前他是普鲁士炮兵中尉,后来是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的编辑之一,而现在担任艾奥华州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的一篇致命的答复,在伦敦分裂的时候和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还有阿·雅科比医生,他本人是科伦的被告之一,但是已被宣告无罪,现在是纽约的开业医生。⁴⁷⁸

关于《**国民报**》第37号第2栏正数第31行和以下几行的一段话:

“在流亡者中间他们(即我和我的同伴)继续进行《**莱茵报**》的工作,该报在1849年进行宣传反对任何参加运动的行为,并且经常攻击所有的议员……”

我要说明一下:

完全正确,《**新莱茵报**》从来没有象《**国民报**》那样力图把革命变成摇钱树;而只是以牺牲大量资金为代价并且冒着个人的危险,我才得以把报纸一直维持到被普鲁士政府封闭的时候。说《**新莱茵报**》“在1849年进行宣传反对任何参加运动的行为”,特别是出自《**国民报**》之口,这是一种可笑的指责,对这种指责最好是由该报的内容本身来反驳。至于我在革命时的态度如何,可以看附件1:《**两个政治审判案……**》。

还有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新莱茵报**》总是以讽刺的口吻谈

到福格特先生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其他空谈家,对他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何况福格特(正如他在小册子中自己承认的那样)早在1846年就是取得瑞士国籍的公民,也就是说外国公民,他在德国无事可做。说《新莱茵报》“攻击所有的议员”,这是不真实的。该报曾同许多极左派的议员保持最友好的关系。福格特本人及其一伙差不多直到该报关闭之前是多么想要博得它的欢心,哪怕从这么一点也可以看出,即他们在成立三月同盟之后,向德国全国各地散发了一个通告,硬向他们的公众推荐订阅某些报纸,“好的”报纸标上一个星花,“最好的”标上两个星花。他们赏给了《新莱茵报》“两个星花”。我一拿到这张通告,立即就在《新莱茵报》(好像是在1849年3月份的一号上)的一篇简短的社论中,对那些在个人品质和政治才略都很少受我尊重的人们所强加的这种保护表示了抗议。⁴⁷⁹

对于第2点。1842年(当时我二十四岁),我是旧《莱茵报》的主编,该报最初受到一般的书报检查,后来受到双重的检查,最后终于被普鲁士政府强行封闭(1843年春)。康普豪森先生是我当时的同事之一,他在三月革命以后当上了普鲁士首相。旧《莱茵报》无疑地破坏了普鲁士书报检查的效能。(我秘密地对你说,当然不供发表:在《莱茵报》封闭以后,普鲁士政府通过我父亲的朋友秘密监察顾问埃塞尔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时埃塞尔和我都在克罗茨纳赫疗养地,我在那里同我的妻子结婚。在他通知我这些建议之后,我就离开普鲁士到巴黎去了。)

在巴黎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亨利希·海涅、阿尔诺德·卢格(后来我同海尔维格和卢格决裂了)一起出版了《德法年鉴》。1844年底,根据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的要

求,我被(基佐先生)驱逐出境,到了比利时。⁴⁸⁰我在巴黎期间在法国激进派中间所处的地位,从附件 h,即从 1848 年 3 月 1 日弗洛孔的一封信中可以很好地看出,弗洛孔在这封信中代表临时政府要求我回法国,并且通知我,基佐关于驱逐我的命令已被撤销。(秘密: 1844 年复,在《德法年鉴》的出版者(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破产以后,我在巴黎收到克拉森医生代表康普豪森和《莱茵报》其他股东写来的一封信(内附一千塔勒)。在这封信中我的功绩被估计得太高,单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里没有附它。)

从 1845 年初到 1848 年 3 月初,我住在布鲁塞尔,此后我又被驱逐,于是我遵照弗洛孔的信回到了法国。在布鲁塞尔我除了为各家激进的巴黎报纸和布鲁塞尔报纸不取稿酬写稿以外,还同恩格斯合写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哲学著作,1845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吕滕出版社出版)^①、《哲学的贫困》(经济著作,1847 年由福格勒在布鲁塞尔出版,并由弗兰克在巴黎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两卷关于现代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②(没有出版,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 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⁴⁸¹)以及许多传单⁴⁸²。在我留居布鲁塞尔的整个时期内,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义务地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我把这些讲演汇集成本一小册子,由于二月革命而未能刊印。⁴⁸³我在布鲁塞尔的激进派(各种不同色彩的)中间所处的地位,从我作为德国人的代表当选为公开的国际协会⁴¹⁹的委员会委员这件事可以看出。列列韦尔(现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在是八十岁的老人,1830—1831年波兰革命的老战士和博学的历史学家)作为波兰人的代表当选,安贝尔(后来任巴黎土伊勒里宫的警卫队长)作为法国人的代表当选,布鲁塞尔的律师,前制宪会议员⁴⁸⁴和比利时激进派的领袖若特兰,作为比利时人的代表当选,他同时又当选为主席。您从若特兰(他现在已经是老人了)给我的两封信(附件 k, 1 和 k, 2)和列列韦尔的一封信(附件 i)中可以看出,在我留居布鲁塞尔期间我同这些人是什么关系。若特兰的一封信(附件 k, 2)是在1848年2月22日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我同他发生分歧之后写的,在这以后,我送交给他一份关于我退出国际协会的声明。⁴⁸⁵他给我的第二封信,是当我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的时候写的。

1848年3月到5月底,我第二次住在巴黎。⁴⁸⁶(秘密:弗洛孔曾表示愿意提供我和恩格斯一笔钱作创办《新莱茵报》之用。我们谢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我们作为德国人不愿意从即使是友好的法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

1848年5月到1849年5月底,我在科伦出版了《新莱茵报》。

您从附件 l 可以看出,我曾当选为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民主主义者的三个领导人之一。⁴⁸⁷(秘密:当我到达科伦的时候,康普豪森的一个朋友曾建议我到柏林他那里去。我没有理睬这种暗中的拉拢。)

1849年6月到1849年8月,我在巴黎。在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我被驱逐。

从1849年底⁴⁸⁸直到今年1860年,我住在伦敦。在这段时间里,我出版了:《新莱茵报评论》^①,1850年在汉堡出版,《路易·波

① 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出版),《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伦敦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等等。我从1851年起直到现在是《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当我是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成员时(从1849年底到1850年9月),我作过不取报酬的讲演。

您从附件 o(它带有机密性)中可以看出,我是怎样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发生联系的。从那时候起我就为他的《自由新闻》撰稿,一直到现在。我同他意见一致的是在对外政策的问题上(反对俄国和波拿巴主义),而不是在对内政策上,在对内政策方面我同(与他敌对的)宪章派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有六年的时间(为宪章派的报刊(特别是为《人民报》)写稿而不取稿酬(见附件 m)。

1853年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那篇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①,曾不止一次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小册子的形式再版,印数一万五千到二万册。

附件 n 是只研究外交问题的一个乌尔卡尔特俱乐部的秘书的信,它是1856年按照设菲尔德俱乐部的委托寄给我的,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同乌尔卡尔特派是什么关系,尽管我们在对内政策问题上观点有分歧。

附件 m 中的信是伦敦的律师(barrister at law)厄内斯特·琼斯写的,他是宪章派的公认的首领,也是公认的诗人。

附件 o、n、m 的译文在附件 p 中。

至于某些德国人士在伦敦散布的关于我的流言蜚语,那末在附件 g《高尚意识的骑士》第14页所援引的我的朋友施特芬(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的教官,现住在波士顿)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题。⁴⁸⁹

尽管十年来不断受到攻击,关于我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烦扰德国读者。但是对我的律师,在象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

至于意大利战争³³,我应当说明的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本小册子是1859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在把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寄往柏林之前,先把它寄给了我。

我们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比所有德国报纸都更坚决地主张自由独立的意大利,现在我们也这样主张;我们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态度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希望波拿巴(同俄国秘密勾结)利用意大利的自由或者任何其他民族问题作为破坏德国的借口。

20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副本]

1860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因为我离开了这里几天,所以没有能立即答复您的来信。

至于印刷费账单,我在2月6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信中曾

冒昧地请您把它寄来,您忘记寄了。请您把它寄给马克思夫人。

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由于我对布林德采取的措施,他不得不作这项声明)⁴⁹⁰,只需要指出如下几点:

1. 布林德是不是传单的“文字上的”作者——这个问题我不管。从法律上来看,他是作者。

沙伊伯勒的声明(照他的话说,三个月来“情况”不允许他在《电讯》^①上作这项声明,但是我把在弯街治安法庭所作的两份 affidavits^②的抄件一寄给路易·勃朗,就马上迫使他作出了这项声明)提出不利于福格特的充分证明。但是它丝毫没有提出有利于布林德的证明。它丝毫没有证明他是无罪的。手稿是他写的(如果不是他起草的话);是他让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他付了霍林格尔的印刷费,在《奥格斯堡报》^③上发表了两个假声明;他和霍林格尔秘密勾结反对我,为此目的迫使(您知道这完全成功)排字工人维耶给他们提供假证词。但还不止于此。象您从他9月间寄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知道的,布林德竟敢厚着脸皮硬说,他与这件事毫无关系。最后,他和沙伊伯勒现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有可能以“秘密勾结”罪受到刑事追究。

2. 沙伊伯勒医生看来已让布林德把他当作替罪羊。据我所知,他是听任布林德摆布的工具。

3. 我所追求的主要政治目的,由于沙伊伯勒的声明已经达到。这个声明使奥格斯堡的案件⁴⁹¹化为乌有,宣告无效,成为一个虚构的案件,因为案件中既没有证人,又没有原告和(真正的)被告,实

① 《每日电讯》。——编者注

②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③ 《总汇报》。——编者注

质上连法庭也没有,因为英明的福格特并没有向按照巴伐利亚的法律应该审理这一案件的那个巴伐利亚司法机关起诉。至于福格特本人,那只要举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他本人居住的日内瓦,一家瑞士报纸(《新瑞士报》1859年11月12日的那一号上)声明说,它愤怒地拒绝了福格特想用法国的钱收买它的企图。这家报纸在社论中建议福格特对它起诉,正象我在《奥格斯堡报》和汉堡《改革报》上由我署名发表的声明中建议他对伦敦的《人民报》起诉一样⁴⁹²。虽然福格特是日内瓦的联邦院议员,因而也是有公职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些呼声并没有响应,而是借助奥格斯堡的滑稽剧——确切些说是闹剧——来预先取得愚蠢的德国自由派的支持。

请您把这封信当作机密的信件,因为在柏林和伦敦为我办理诽谤诉讼的律师们认为,在法院审理终结以前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打破沉默是有益的。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21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副本]

186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的书^①我还没有收到。否则我已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对

① 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它的评论了。

我给您寄去了一篇针对科苏特的文章⁴⁹³,条件是您一定要把它退还给我。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为了某种目的需要用它。

我在柏林和伦敦对那些无耻转载福格特诽谤作品^①的报纸^②以诽谤罪提出了两起诉讼。十年来我总是在最肆无忌惮的诽谤面前保持沉默,但是我以为现在已经到了公开反驳的时候了。

我的朋友(我是在他家给您写这封信的)也许对您有用(他是商业家)。请您寄一份您的酒的价目表给他(地址: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但是您可不要利用施托夫雷根那类人来当您的代理人。

忠实于您的 威廉斯^③

过几天我就返回伦敦。

22

马克思致律西安·若特兰 布鲁塞尔

186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先生:

承蒙您从布鲁塞尔惠寄给我一封信,而我至今没有回信告诉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指《国民报》和《每日电讯》。——编者注

③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您信已收到,请您原谅。我非常感谢您这封信,虽然我不想以任何方式利用它。如果我认为需要公布与我过去的的生活有关的某种正式文件,那末为了说明布鲁塞尔的插曲——在涉及我同比利时激进派的关系方面——最好是使用我现在在我的文件中找出的您的两封信(1848年2月25日和5月19日写的)。⁴⁹⁴

由于您属于共和主义者的美国学派(我只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同意这派的观点),也许您会对这一情况感到兴趣,即我将近几年来一直是最有影响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论坛报》的主要通讯员之一。我曾利用这种关系在斯皮特霍恩先生路过伦敦时给了他几封去合众国的介绍信。如果您什么时候想在《论坛报》上发表有关贵国问题的东西,那您可以指望我为您效劳。

不久前对我的无耻攻击(对此我提出两起关于诽谤的诉讼,一起在柏林,一起在伦敦),都来自波拿巴的营垒。路易·波拿巴先生通过他的私人秘书莫卡尔先生,曾公开对《纽约时报》表示感谢,因为它为了抵销我从1852年起在《纽约论坛报》上对小帝国⁴⁹⁵的批判,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它的这个“一切”是具有十分卑劣的性质的)。

很荣幸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

我在曼彻斯特这里只逗留几天。我的地址是: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如果您能用德文阅读的话,我将很高兴把我正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寄给您一本。

23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3月15日^①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为我的小册子^②费心同敦克尔交涉。我本来是会同意署自己的名字的，然而小册子那时候已为别的出版者^③所接受(当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这一著作也许已经出版)，而且我认为，在尉官们正式(也就是在扉页上)看到《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并非军人以前，有必要为作者在军事著作方面树立一定的地位。您来信说，您无疑还会使我们改变看法，因此，说出自己的名字，就会使我们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对意大利事件所持的见解而败坏自己的名声，那对我们是不利的。从主观上来说，这个理由当然是不容置辩的；但是我们也能使您相信，我们同样认定我们会使您改变看法，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见解是根据对外交材料的周密研究得出的，这些材料在伦敦差不多很齐全，至少在某些问题方面是这样，而在柏林，公众无疑就看不到(大部分在柏林根本没有)。

马克思前天收到您的信，他将给您回信。现附上《高尚意识的骑士》^④，马克思以前忘记寄了。

① 原稿为：2月15日。——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③ 贝伦兹。——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附带说一下。几天前我们收到了诺特荣克的信。这个可怜的人在被释放以后，“由于多年不在”(!!)而被剥夺了他在缪尔海姆的公民权，并被禁止在距科伦五德里之内活动。他在布勒斯劳^①当了摄影师，费了很多周折才在那里取得了居住权。现在他必须缴纳迁入税、立户税以及其他只有在普鲁士的词典里才能查到名称的税。您明白，在长期的监禁之后，加之这一监禁又使他回不得故乡(在任何别的国家可能有这类事情吗?)，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而在那里还采用这种奇妙法律的情况下，他若应付不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无法生存。可不可以在你们那里为他想点办法呢? 1848年以前，这类事情在莱茵省里会是骇人听闻的，甚至那些支持把这种可耻的法律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资产者也必须帮助这个可怜的人。由于被囚在普鲁士监狱里而多年不在就使他回不得故乡——试把这种事情说给某个英国人听听吧!他的地址是：回廊巷7号，澡堂，摄影师彼·诺特荣克。凭您在布勒斯劳的联系，您不难为他想点办法。此外，我们这位从前的裁缝看来在监狱大学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信写得非常文明。

我现在正在写一篇关于普鲁士新军事组织的短文，并且已经答应给敦克尔。

您的 弗·恩格斯

我差点忘记说了：马克思已经写信给红色沃尔弗。⁴⁹⁶但是我们多年来丝毫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顺便说说，福格特又同卖身投靠的坏蛋克拉普卡一起在普隆—普隆那里吃了饭。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这封信本来已经封好了,由于里面没有放《骑士》,我又把它拆开来,告诉您一下,我们没有能够找到在曼彻斯特这里仅有的那本《骑士》,准是谁把它拿走了。在伦敦马克思那里还有几本,他已写信要马上给我们寄来,等书寄来后我们立即给您寄去一本。

请您帮忙立即给我邮寄(不贴邮票)几号正在讨论军队体制问题的《人民报》和《国民报》,以及一两本在德国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请把这些都作一个印刷品邮件寄来。不然,要过很久很久才能拿到这些东西,而报纸则根本收不到。

24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3月2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现附上**最后**两个文件,可以作为对先前寄上的材料的补充。**第一个**文件是《**纽纳论坛报**》主编给我的信⁴⁴⁴。我附了德译文。

第二个文件对证明下面这件事非常重要:可鄙的舍尔瓦尔,也就是纽金特,也就是克列美尔,甚至在日内瓦的时候同我也没有联系,相反,他是由于我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①的小册子而被驱逐出那里的。这封信是巴黎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写的(贝克尔由于1830—1831年事件被迫流亡国外;在1848—1849年,他起先是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巴登起义者的领导人,后来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上校;现在是巴黎的商人;他可说是德国流亡界的老将),受信人是同他有商业联系的伦敦商人莱茵兰德尔。我认识莱茵兰德尔先生,承他把这封信⁴⁹⁷转交给了我。

除了我的这封信以外,我曾寄给您:

(1)2月21日——一份委托书连同附件。

(2)2月24日——一封信连同附件。

(3)3月3日——两个邮件连同附件。^①

希望您立即写信给我,第一,证实一下我寄给您的几封信已经收到,第二,告诉我关于诉讼进展的情况。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2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4月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先生:

我还没有收到您的小册子^②。

恩格斯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因而他会尽力为您效劳

① 列举的信见本卷第446—448、454—475和494—508页。——编者注

② 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的……^①

我不认识施托夫雷根,但是在曼彻斯特各种商人[告诉过我]^①, [他]^①不识时务,惹人厌烦等等。不过他在郎卡郡的某些下层社会里也许能够象其他任何人一样把您的酒卖出去。

如果您回信告诉我佩尔采尔将军的地址,我将非常感谢。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说明。⁴⁹⁸您同佩尔采尔的关系怎样?

一切顺利。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原址)

亲爱的拉萨尔:

自收到你最后的一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恩格斯的父亲去世了,恩格斯经普鲁士政府许可,在普鲁士逗留了两个星期。而我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也只能很简短地给你写一点。

1. 我的柏林律师^③要我一定不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尽管我给他寄过许多材料并且一再提醒他,他已经有六个星期毫无音信,如果他再这样沉默下去,那就要你去向他施加压力了,因为到4月22日就满时效期。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③ 法律顾问维尔。——编者注

2. 福格特到过巴黎普隆—普隆那里。我的一些熟人看到过他，还同他谈了话。尽管如此，他却厚颜无耻地在德国报纸上声明(自己或通过别人)，说他没有到过巴黎。

3. 洪堡的书⁴⁹⁹我没有收到。

4. 《高尚意识的骑士》今天寄给你^①。

5. 根据已把自己的中心从纽约迁到芝加哥(伊利诺斯州)的美国工人同盟⁵⁰⁰(合法团体,合众国各地都有它的分会)的建议,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辞去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魏德迈将在芝加哥一家用工人股金创办的日报^②担任编辑。芝加哥越来越变成美国整个西北部的中心,那里德国人的影响占优势。魏德迈请求我为该报征求一些通讯员,我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巴黎以及在瑞士都征求过了。⁵⁰¹我建议你担负德国的通讯工作(尽可能每周两次)。报酬是谈不上的;这是党的工作,但是很重要。魏德迈是我们的优秀分子之一。如果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表示同意的话,那就马上干起来,稿子寄到:合众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6. 翻阅《新莱茵报》(为了福格特的事需要翻阅一下),发现我们曾在—篇简短的社论中支持柳德米拉·阿辛格夫人,反对《福斯报》,这使我很高兴。

7. 你能否寄给我一篇关于《国民报》的崇高的察贝尔反动时期以来的活动情况的简要介绍?这篇介绍可能作为由你签名的信件发表在我的小册子^③里。这样,你就会同那些在这本小册子中介绍

① 见本卷第513、515页。——编者注

② 指《人民呼声》。——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别人情况的十分受人尊敬的流亡者并列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些人匿名,另一些人用自己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不属于我们的党派。

你的 卡·马·

27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

日内瓦

[草稿]

1860年4月9日 [于伦敦]

公民:

几天以前,在济贝耳从瑞士回来的途中,我在这里弗莱里格拉特家见到了他,他对我说,我在2月26日从曼彻斯特寄往“《新瑞士报》编辑部”交您收阅的那封信落到了布拉斯手中。原来我听人说,您是《新瑞士报》的编辑,而这家报纸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写了那封信,因为我从革命的编年史中知道您的光辉的名字;至于布拉斯先生,我是不会写信给他的。

我是想从您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福格特的活动的说明。现在我不断收到属于革命政党各个派别的各国流亡者寄来的有关福格特以及其他波拿巴代理人的活动的材料。但是我要持批判态度,要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由于您深知瑞士的情况,因此您所提供的材料对我将是极其宝贵的。

至于济贝耳给我的您那本小册子《在幕后》,它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认为很有必要出版它的第二部分。我也许能为第二部分

给您在这里找到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出版人。至于第一部分,我想我能推销三百本,每本一法郎,一部分在伦敦各团体中直接出售,一部分则通过书商。但是,为此必须先收到这些书。如果您同意的话,请把书寄来,书店的地址是:“伦敦,佩奇……”。

最后,我还想对您提出一个建议。我的朋友约·魏德迈(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前编辑之一),根据合众国的工人同盟(它的中心已从纽约迁到芝加哥)的建议,辞去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以便在芝加哥担任《人民呼声》——由工人和体育团体创办的一家日报——的编辑工作。他请求我在欧洲物色通讯员,我在这里、在巴黎以及在柏林都进行了。我冒昧建议您担负瑞士的通讯工作,开始每周一次。每次稿酬为两美元(十法郎)。稿酬暂时很低,对于这种报纸,而且尚在初创时期,这是可以意料的;随着报纸的巩固,稿酬是会提高的。直到目前为止,在伊利诺斯州只有一家日报——《州报》^①,而芝加哥一天天越来越变成美国整个西北部的中心,在那里德国居民很多。对准时付给报酬我可以担保。如果您接受这个建议,就请在这星期立即开始,并费神将此事通知我。通信地址是:合众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回过头来谈福格特。您大概从我在德国各家报纸上的一项声明(2月初)^②中已经知道,我打算等我因柏林《国民报》摘录转载福格特的书而对该报提起的诽谤诉讼结束后,就对他的诽谤著作^③作出回答。

① 《伊利诺斯州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在第180—181页上(见有关的地方),福格特谈到他在洛桑工人庆祝会上所挫败的“密谋”。您能不能就这些自吹自擂的话给我提供一个说明?书里的话逐字抄录如下⁵⁰²:

这里问题在哪里?

最后,我还要冒昧提一下,如果您对福格特活动的说明用信件的形式寄给我,我将把它作为用您的名字写的单独的一部分收入我的小册子^①(由于柏林的诉讼^②,这本小册子只能晚一些出版)。这样您就会列入其他流亡者的十分光荣的圈子里。自然,出版人付给我的按页计算的稿酬中您所应得的那部分,我会转寄给您的。我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了解流亡者的生活条件——我自己除了很短的几段时间,已经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了十七年,——而且侵吞从出版人那里得到的别人的稿酬,那是不对的。由于柏林的诉讼以及福格特的主要打击等等是针对我的,我的小册子将有很好的销路,并且一定能在德国找到很好的出版人。试问,为了事业的利益,是不是最好把进攻的力量集中起来呢?当然,您完全可以自己酌情处理这个问题,我深信您不会把我的直率了解成坏的意思。

祝好,握手。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

您如果写信给我,请寄以下地址: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阿·威廉斯^③先生。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5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28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巴 黎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格拉弗顿坊9号

贝克尔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的信、对您向济贝耳口头说的情况以及对**转寄信件**，表示衷心的感谢。福格特先生的攻击，撇开其他一切不谈，单凭它使我同我们革命和流亡中的老将接近这一点来说，就应当看成是一件值得我庆幸的事。不过我不象庸人那样对您一生所表现的坚毅精神表示惊讶。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举例来说罢，如老勒瓦瑟尔、科贝特、罗伯特·欧文、列列韦尔、梅利奈将军——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

我写这封信的最直接的原因——除了想亲自向您表示感谢以外——是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委托我在欧洲为《人民呼声》物色通讯员。这是**美国工人同盟**目前在芝加哥创办的报纸；同盟的中心已从纽约迁到芝加哥。这是一家日报，它将具有日益重大的意义，因为芝加哥越来越变成西北部的一个大都会。现给您寄上计划的引言部分。

条件是这样的：您每周要写一次通讯——每次稿酬两美元。这样一季度约为五英镑或一百二十五法郎。稿酬很少，但是工人报纸

不能不是这样。不过我的朋友魏德迈的人格可以担保按时付酬,这是美国其他德文报刊通常做不到的。如果您接受这个建议,就请从下星期开始,但是请预先告诉我一下。

装有非常重要的信件的那个邮包,在济贝耳到达伦敦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我将把信件编好,随时准备供您使用。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一个起来反叛维利希的纵队写的,它是对这个唐·吉河德的绝妙的描绘。⁵⁰³

您非常了解法济,如果您能寄给我一篇关于他**自政变以来**所作所为的**简短介绍**,并对这个人的品性刻画一下,那就太好了——这对我的**小册子**^①十分重要。我认为福格特不过是法济的仆从,我只在巴黎见过法济一次(1843年),但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是《国民报》的前撰稿人(那里连最好的撰稿人也是坏的)。

洛美尔的那篇玩意儿^②很有趣,其中有关于1847—1848年的一些有益的揭露。不过,他在谈到革命年代事变的起因时把一切都归结为琐碎小事的做法,我不能同意。但是也许正是他的见解狭隘,才使得他能够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他个人所接触过的领域。

您的关于莱布尼茨的两首小诗和《一切不值一提》,我非常喜欢;您要是把它们附在给魏德迈的第一次通讯中(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的话),那就很好。他的地址是:

合众国伊州(伊州即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1345 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祝好,握手。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格·洛美尔《在幕后》。——编者注

29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0年4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你以为哥·欧门最近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1.他是想分批付清母亲的股份,然后独力经营。

2.我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继续留在他那里当四年职员!

这个人以为我们会这样轻易地把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产业交出来给他,而我又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在他面前忍受这种屈辱。

谈判是在完全友好的方式下进行的。我马上就拒绝了他提出的对我的建议,之后他答应我过四年以后我有可能当他的合伙人,但是我要求在讨论这个建议以前由他作出保证。我还对他说,我们共同的意见是:如果一定要分手,我们将坚持按实物分,并召开债权人会议。这使他非常吃惊,谈判也没有进展。他以为我们在巴门迫切需要钱用(这一点我对他作了相应的解释),就企图来利用这种情况。总之,他对这次谈话十分失望,现在会对我们提出别的建议。详情以后面告。

有了这件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可以指望查理^①;他已经认为,我们两人将能够迫使哥特弗利德^②去做我们想叫他做的一切,

①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也许甚至迫使他离开企业。

你的 弗·恩格斯

30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4月1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上次给您寄去最后一批文件,并请您通知我您是否收到我的信和附件,以及请您稍微谈谈案件进展情况^①,从那时到前天已经两个星期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据您2月22日的来信说,起诉的时效期到4月22日截止。此外,您在那封信中还说,我不久就能得到您的消息。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① 见本卷第515—516页。——编者注

31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

圣 埃 尔 耶

1860年4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将军先生：

我要出版一本论述波拿巴派活动的著作^①，因此不揣冒昧向您，最杰出的欧洲自由的前卫战士之一写这封信。您在上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您已识破骗局，因此已及时退出舞台——这是您比科苏特这个丑角及其谄媚者高明的重要证明。可惜我把这篇声明丢失了。我为此请巴黎的瑟美列帮忙^②。他要我给您写信。如果您能费神把这篇声明的副本连同对意大利的匈牙利人所受欺诈的说明寄给我，您就为这件好事出了力。

我1859年夏天在《纽约论坛报》和伦敦《自由新闻》发表的文章^③中，曾把您称为在匈牙利流亡军人中唯一不受法俄外交的收买和欺骗，也不为科苏特的魔术所迷惑的人，我也会很乐意在我准备出版的新书中给您以应有的荣誉。

我不揣冒昧提起您注意，我早在1848—1849年任《新莱茵报》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编者注

主编的时候,就是德国支持革命匈牙利的最坚决战士。我现在也完全和那时一样,把匈牙利的独立和自主看成德国摆脱被奴役地位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同样坚决地拒绝那些要把一些民族贬为掩盖俄国佬和十二月帮阴谋活动的外衣的努力。

致崇高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32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

曼彻斯特

[草稿]

1860年4月19日于曼彻斯特

尊敬的先生:

我在午休时间把成本核算簿带回家去,您感到不满,为此我毫不犹豫地向您表示歉意。因为与我们办事处有关系的别的一些人过去也把簿子带回家里去,所以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会使您感到不快。如果说我有意用不体面的方式从这当中为自己谋得什么好处,那您也知道,这本簿子中的各项成本核算都早已过时,哪一项都不符合当前的实际价格。因此,我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意图,我希望,您目前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情绪,绝不是由于看到将来可能出现一个停止公司业务或对它作任何其他调整的协议的缘故。如果谈判能够本着友好互让的精神来进行,那对各方面来说都要好些。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恩格斯

33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4月2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我十一天以前给您寄过一封信^①,在信中指出,对于我从这里和曼彻斯特寄出的许多封信(附有文件、委托书等),我已经两个月既没有收到您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证实这些信件已经寄到的消息,尽管您2月22日的信曾使我有理由期待很快就会得到复信;而且,从那封信看,起诉的时效期到4月22日(即明天)就要截止了。因此我才请求您作些说明。

但是连这封信我也没有得到答复,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我的信——虽然除最后一封以外,全都是用挂号寄的——您都没有收到;要么您至少有一封信被截去了。**

如果这封信也遭到前几封信同样的命运,我将去质问这里的邮政总局和普鲁士大使馆,必要时我将在**伦敦报纸《泰晤士报》**上公开表示抗议。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① 显然是4月13日的那封信,见本卷第525页。——编者注

34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莱茵兰德尔
伦 敦

1860年4月24日 [伦敦]

亲爱的莱茵兰德尔:

请费心让施泰歇尔先生确切地(尽可能确切地)告诉您,舍尔瓦尔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到达日内瓦的,他在那里呆了多久,他失踪的事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为此我将非常感谢您。

请您抽空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您的 卡·马克思

3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你寄来洪堡的书^①和费希特的著作。后者我还没有

① 指《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一书。——编者注

读过⁵⁰⁴，而你却很机智地把它用上了。收到你的来信后，我请恩格斯把你的信和法律顾问维贝尔发自柏林的信寄给了我。读了后面这封信，我看出那里只是说，我在报上公开报道时不要提他的名字^①。因此在这方面是我误会了。

今天我接到维贝尔的信。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以下情况。起初他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本月18日，他收到了如下的答复：

“原件由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退回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并通知：此案不具备使我有理由进行干涉的**公众利益**(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4月18日于柏林……利佩”

对这个决定维贝尔向检察长^②提起控诉。与此同时，为了使时效期延长并使自己留有采取别的途径的可能，他以侮辱的罪名向民事法官提起控诉。

我为自己的小册子^③当然在巴黎和瑞士进行了调查。我甚至派了自己的使者^④去日内瓦。现在我手里有证明福格特是法国代理人的**证据**。目前他感到在日内瓦的立足点再也不牢靠了，他在考虑怎样在别的州取得公民权。

附带说一下。我的一个熟人^⑤(柏林人)断定说，《每日电讯》的通讯员⁵⁰⁵是一个叫迈尔或迈耶尔的人^⑥，他与阿伯拉罕公司(或“阿伯拉罕父子公司”)有关系，住在柏林维多利亚街。你能否叫你的女士们打听一下这件事？

① 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

② 施瓦尔克。——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④ 济贝耳。——编者注

⑤ 孚赫。——编者注

⑥ 见本卷第473—474和536页。——编者注

你的信我晚些时候再回。
这封信也许在柏林已碰不上你了。

你的 卡·马·

36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谨寄上十五塔勒预付费，同时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又及。经我委托在巴黎、瑞士，特别是在日内瓦进行调查以后，现在我掌握有证明卡尔·福格特教授是法国一名普通代理人的证据（以后，在诉讼结束之后，我将在小册子中公布出来）。此外，我认为尼斯和萨瓦的兼并甚至会使瞎子也能看清“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和威胁德国的危险，看清那些预先警告过这一点的人们是正确的。

37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巴 门

1860年4月25日于曼彻斯特

[电报]

星期六来信部分同意——星期五晚携限定全权委托书抵达——星期四晨动身——希面晤布兰克。

38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
柏 林

[副本]

1860年5月8日 [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给我来信和为我奔走。最近几天我将把小孚赫关于迈尔^①的一封信给您寄去。

至于筹办的报纸，我不反对参加。⁵⁰⁶不过事先我需要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企业，了解一下报纸的倾向等等。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而这大概一定是英国通讯的主题），我认为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当然，最主

① 见本卷第530页。——编者注

要的是了解该报在普鲁士将采取什么立场。如果它不是持极端片面的党派立场,那末在德国正处于危急关头的现在,我以为持不同观点的各派人士是能够在彼此不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共同反对外部敌人的。

致深切的敬意。

卡·马克思

同时(5月8日)寄给了:恩格斯、波克罕、埃卡留斯、佩奇和魏德迈。

3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0年]5月15日 [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附上柏林寄来的关于驳回刑事诉讼的决定。民事诉讼也不会有什么结果。⁹ 请写一点关于案件的情况给《中莱茵报》。你把信的内容告诉龚佩尔和鲁普斯^①以后,就请把信寄还给我。

关于抨击性著作^②,我还根本没有同任何一个书商谈妥,暂时还拿不定主意,我是否值得向莱比锡或者汉堡接洽?

恩格斯昨晚离开这里,他十分健康。⁸²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斯芬克斯》⁵⁰⁷我还没有从你那里收到;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连布斯特拉巴³⁰⁹都不认为是斯芬克斯,更不认为卡尔·格律恩先生是奥狄浦斯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要给《中莱茵报》寄一篇标明发自“柏林”的短文,来谈我的诉讼过程,那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也捎带谈一下5月11日柏林第一审级对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的最后审讯。事情是这样的:艾希霍夫以“诽谤”施梯伯的罪名被判处了一年半徒刑。这一诽谤的要点是揭露(在伦敦报纸《海尔曼》上)施梯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中发假誓、盗窃等等。²⁹以下几点足以说明普鲁士法院的行径:

1. 艾希霍夫的揭露是以(如果不算我的抨击性著作,它自然不应该被提到)科伦审讯期间刊载在《科伦日报》上的报道⁵⁰⁸为根据的,而且无论施梯伯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从来没有对这些报道的真实性表示过异议。法院却宣布这些报道**不能作为**证据。每当情况有利于施梯伯的时候,法院就宣布刊载在《福斯报》上的报道⁵⁰⁹(可能是施梯伯本人写的)是**真实的**,而这只是**因为**施梯伯先生认为它们是真实的。然而每当情况不利于施梯伯的告密人的时候,这同一个法院则宣布当时法院秘书在记录中所作的可怜摘要**是唯一真实的**根据。

2. 施梯伯在策划1852年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主要同谋者和助手警务顾问戈德海姆和警监格莱夫,每次都被免除了反讯问,因为

法院不愿使这些先生处于这样的抉择(法庭庭长^①公开谈过此事):“要么发假誓,要么证明自己无罪”。另一方面,他们的供词则被用来作为说明施梯伯无罪的证据。

3. 施梯伯和格莱夫在1851年迫使普鲁士警探罗伊特钻进奥斯渥特^②屋里偷去了文件,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曾利用这些文件作为证据(虽然它们实际上同案件毫无关系⁵¹⁰)。这次盗窃就是艾希霍夫揭露施梯伯的几件事情之一。但是现在请注意!王室国家检察官德朗克曼提出了以下新得出奇的盗窃理论,他声称:

“这些文件是否盗窃来的,这个问题可以暂且撇开不谈;从对被告判罪的观点来看,这没有意义。即使文件确实是偷来的,那末对于用这种办法弄到文件的警务官员,从法律观点来说也不能指控为偷窃,至多只能说行为不道德。法律上的盗窃,需具备恶意欺骗性质,但这不适用于被迫让人去进行这种偷窃的警务官员,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而是为了国家利益。”

因此,一个警务官员若是在伦敦闯进一所房子进行“偷窃”,那从法律观点来说丝毫没有犯罪,“至多”是行为不道德。这看来象是普鲁士国家对英国人的一种恩赐:习惯法暂停生效。

4. 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提供了宣誓证词,说记录本⁵¹¹是他和弗略里在格莱夫监视下伪造的。为什么没有把希尔施弄到柏林去,为什么在审讯期间没有把他作为证人进行讯问?

① 哥贝尔。——编者注

② 迪茨。——编者注

40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

柏 林

[副本]

1860年6月1日 [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三个星期来肝病折磨着我; 这个期间我完全不能写东西和工作, 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复元。结果我这里积压了很多工作, 最近几个星期我的全部精力要用在这上边,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立即开始为新报纸写稿^①。您能不能给我寄一两号报纸看看? 并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新企业的主要领导人? 黑、红、黄——这是现在可以向国外颇有成效地使用的颜色。⁵¹²

我向您推荐日内瓦咖啡馆大院路北方路 85 号格奥尔格·洛美尔先生为报纸驻日内瓦的通讯员。

日内瓦现在是波拿巴阴谋的集中地, 而洛美尔消息非常灵通。我深信, 他会在要求很不高的条件下同意写通讯。

关于阿贝尔: 衷心感谢您的这一发现。⁵¹³ 这个阿贝尔是谁? 您如能把比较详细的情况告诉我, 我将非常感激, 而且最好是快点告诉我。

我大概告诉过您, 检察长已经批准检察官的决定, 拒绝我的关于诽谤的控诉, 说这个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现在就要提起民事

^① 见本卷第 532—533 页。——编者注

诉讼。

想必您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伦敦电讯社的所有者、犹太骗子路透已被介绍给女王^①。原因很简单:路透(他自己写东西几乎是文理不通的)的得力助手就是维也纳的流亡者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这个恩格兰德尔以前在巴黎是受当时的警务大臣庇护的石印通报的撰稿人;同时他又是法国的间谍。东方战争⁵¹⁴爆发时,恩格兰德尔被驱逐出巴黎,因为发现他是俄国特务。于是他来到了伦敦,最后到了早先就与之有联系的路透那里任职。既然路透通过他的电讯社控制着全部欧洲报刊,而俄国大使馆又通过恩格兰德尔控制着电讯社,所以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帕姆^②把路透介绍给了女王。据我所知,同这件事有联系的是俄国加入奥普电讯同盟。我已把这些事实告诉了科勒特。也许您从您那方面也能加以利用。

致深切的敬意。

卡·马克思

恩格斯的小册子^③除了唯一的一本以外,不论恩格斯还是我都还没有收到。看来出版者先生也没有在报上刊登关于小册子的通常出版广告。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帕麦斯顿。——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4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6月2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患肝病大约已有三星期了,这病使我不能做任何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这种状况使我无心写信。

在答复你的信以前,我先说一点事。《每日电讯》驻柏林的通讯员叫阿贝尔。你能否为我弄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材料?

检察长施瓦尔克在第二审级也驳回了《国民报》的刑事诉讼,理由是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不久将提起民事诉讼。

现在来谈你的信。

我不到柏林去。⁵¹⁵我当时不在科伦,关于施梯伯在那里的宣誓证词,我只是从《科伦日报》的报道中知道的。我在《揭露》^①中提出的批判是以这些报道为根据,因此我不适宜作这一案件的证人。如果想就某一点询问我,那我愿意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提出证词(显然这是对其他流亡者常用的做法)。

当艾希霍夫案件还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海耳曼》报的出版人尤赫为这个案件找过我。⁵¹⁶我给了他一本《揭露》,劝他邀请科伦的施奈德尔第二作证人,并提醒他注意:有必要讯问一下关在汉堡监狱里的希尔施。看来这次讯问安排得很不好。本来应该把希尔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施弄到柏林来,要他亲自提供证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切实的反讯问,才能当众揭露这一切可耻的阴谋,因为希尔施知道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弗略里的全部秘密。

另外一个必要的证人,就是现在呆在巴黎的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毫无疑问,普鲁士本来可以要求引渡他,因为他是由于伪造票据而逃出亚琛的。但是政府将拒绝这样做。另外,他是法国的狗间谍,因而他还受波拿巴的保护。

其余值得讯问的大部分人都在美国。其中只有一个人还在这里,这就是维斯巴登的一个叫德·拉斯佩的人,他在英国警察局当翻译。我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 [同他]^①会见,我要弄清楚,他是同意 [去]^①柏林,还是同意在普鲁士大使馆提供证词。1853年, [他]^①曾试图在《泰晤士报》上揭露施梯伯。文章由于本生的干涉而没有登出来……^①

[现在]^①我指出几点,你也许能够用上。《揭露》是我在科伦案件一结束就写成的。但是我对这个案件十分关心,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我还要预先指出,把施梯伯的主要同谋者戈德海姆和格莱夫传来作被告证人,无疑是艾希霍夫提出的一个绝妙的想法。总之,现在情况是,只有政府决定对科伦案件进行调查,施梯伯之流才能受到法院审讯。但是政府不会这样做。

据说施梯伯(见我的《揭露》第10页)⁵¹⁷在科伦宣誓作证说,由于柏林警察总局把“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寄到伦敦他手里,他才“注意到”保存在伦敦奥斯渥特·迪茨那里的“密谋的档案”。这个宣过誓的假证词是很容易推翻的,只要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查阅科伦案件的文件（其中一定也有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行了。

当时情况是这样。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是维利希—沙佩尔同盟⁵¹⁸驻巴黎的通讯员,他以这个身分同奥斯渥特·迪茨通信。同时舍尔瓦尔又是普鲁士驻巴黎的公使哈茨费尔特伯爵的密探。他不仅向哈茨费尔特报告他那个同盟伦敦执行委员会秘书迪茨的情况,而且还常给迪茨写信,以便以后可以把这些信件作为物证。施梯伯和格莱夫(正如**格莱夫本人**当着弗略里的面向希尔施所说的)从哈茨费尔特那里取得情报。他们通过罗伊特知道了迪茨的住所,然后,弗略里由施梯伯指派同罗伊特一起偷了迪茨的东西。这件事希尔施也知道。

顺便提一下,还必须注意希尔施先生所熟知的下面这个情况。弗略里将罗伊特偷到的信件复制了精确的副本,并把它们读给希尔施听了。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施泰翰从汉诺威写的,施泰翰在信中说寄给流亡者三十塔勒。施梯伯(同他的汉诺威的朋友维尔穆特一起)把这改成“**给首领们五百三十塔勒**”。据我所知,施泰翰在艾登堡,他大概能就这一点提供代替誓言的证词。施梯伯往下发誓说(根据《科伦日报》的报道,见《揭露》第11页)⁵¹⁹,迪茨的档案是从伦敦寄到柏林他那里的,他是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其实,施梯伯是1851年7月20日自己把这个“档案”从伦敦带到巴黎的。前面提到的拉斯佩如果愿意,恰恰可以宣誓证实这一点。

格莱夫先生在柏林宣誓作证说,他不认识希尔施,或者只是泛泛之交。而实际上,希尔施在阿尔伯茨当时的私人住宅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阿尔伯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正是通过格莱夫认识弗略里的。这已经是在格莱夫从希尔施

那里收到关于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的报告以后。从那时起,格莱夫—弗略里—希尔施(由格莱夫领导)就在一起活动,一起编造了假记录本。

1853年4月,戈德海姆和施梯伯又来到伦敦,目的是炮制科苏特火药密谋和柏林密谋(拉登多夫的)⁵²⁰之间的联系。希尔施当时(即科伦案件结束后过了许多个月)经常陪着他们在伦敦走来走去,并同他们一起行动。

为了说明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警察局向法院承认,弗略里是它的密探——我要说一下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弗略里姓克劳泽;他是那个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年以前因谋杀雪恩贝尔格伯爵夫人及其侍女而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的皮鞋匠克劳泽的儿子。科伦案件后过了一个时候,这个弗略里—克劳泽因伪造案在伦敦被判处两年或三年苦役。现在他刑满出狱,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

法国密谋(德法密谋)⁴⁴⁸是在施梯伯领导下由舍尔瓦尔伙同格莱夫、弗略里、贝克曼、佐美尔和法国间谍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雷)暗中编造的。在舍尔瓦尔的坚持下,格莱夫(他同施梯伯一样发誓说,他不认识法国—普鲁士的间谍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去了一趟北德意志,主要是为了在汉堡打听一个叫提茨的裁缝的住处,去取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委托写给他的信件。在汉堡,他到提茨未婚妻的住所去,“作为提茨的一个朋友”要求取得某些危险文件以便保管。但是这个图谋没有得逞。

格莱夫通过德拉奥德—杜普雷还同莫帕就释放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的事通过信。舍尔瓦尔一到伦敦,格莱夫就规定给他每周一英镑十先令的固定工资。正是这个格莱夫派他到泽穆去,以便在那里策划一次大的政治密谋。后来格莱夫同舍尔瓦尔的联系中断了。

希尔施先生如果愿意,是可以宣誓证实这几点的。这几点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格莱夫这一次又发了假誓,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涉及到舍尔瓦尔同施梯伯的关系,也涉及到施梯伯在科伦所作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词的“真实性”。正当施梯伯在科伦发誓作证说,他不知道舍尔瓦尔的住处等等的时候(见《揭露》第27页)⁵²¹,在舍尔瓦尔和受施梯伯指派进行活动的格莱夫之间实现了这种合作。但是,当然,这一切按法律手续只能由希尔施(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也许会说)和舍尔瓦尔(这个人很难说)的供词来证明。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当然会保持沉默,德拉奥德、贝克曼、莫帕等人也是一样。

希尔施和弗略里(他为了这个目的在伦敦弗利特街费特巷斯坦伯里印刷所租了一台石印机)受格莱夫指派炮制了《致农业无产阶级》、《致人民的儿女》等传单,格莱夫把这些传单作为马克思派的传单寄给了普鲁士政府。

汉堡的证人豪普特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突然“失踪”以后,辛凯尔迪通过信使责成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物色一个能顶替豪普特角色的人物,他要能向陪审法庭“宣誓证实”豪普特的告密。警察总局答应为此付给一千塔勒的报酬。辛凯尔迪写道,政治警察局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这个案件的结局。希尔施同弗略里(后来他说这是出自“高尚的”动机)谈妥以后,表示自己愿意干。一切都已经安排停当,突然弗略里从普鲁士大使馆带着停止执行的命令回来了。辛凯尔迪新写的一封信中说道: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普鲁士在巴黎的间谍贝克曼本来也得到去科伦的命令,以便

证实梯伯关于德法密谋的证词,也由于同样原因收到了取消以前命令的新命令。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此事希尔施先生非常了解而且也很能说明施梯伯和戈德海姆的为人。

弗略里得知,我打算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威·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的真实签名按法律手续在伦敦立案。他知道,有个叫贝克尔的流亡者跟维利希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他就以贝克尔的名义写了如下一封信:

“致崇高的柏林王国警察总局

即日于伦敦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

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

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

施梯伯在科伦向陪审法庭说,他得到这个记录本已经有两星期(在他把它交出以前),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曾考虑很久。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作为信使而来的格莱夫带给他的。而戈德海姆先生则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写道:

“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

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是写给柏林警察总局的。如果它真是出自贝克尔之手,那就应当寄往柏林。但是这封信寄给了科伦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而这封信的信封寄给了柏林警察总局。信封内附了一张字条:“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此用途将作详尽说

明。”因此，施梯伯是知道伪造这封信的目的的。弗略里也曾专门就这一点写信给戈德海姆。

可见，关于这个伪造物，在弗略里、戈德海姆、施梯伯和普鲁士警察总局之间是存在一种默契的。

(施梯伯没有利用这封信，因为他还在这以前就被迫放弃了记录本，因为施奈德尔第二不依靠我寄给的立了案的签名，已经在科伦弄到了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签名，此外，他根据我很早以前写的一封信知道，记录是希尔施伪造的。施梯伯打听到，施奈德尔和跟随他的其他律师，在法庭办公室里核对了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的签名。于是在下一次开庭时他忽然说出了他想出来的H·李卜克内西(见《揭露》第38—40页⁵²²)。)

施梯伯知道记录本是伪造的。否则他对真正签名的立案根本用不着害怕。

10月29日戈德海姆到达伦敦。施梯伯把他派到那里是为了就地同弗略里和格莱夫商谈如何挽救记录本。戈德海姆不得不毫无结果地回去，并告诉弗略里说，施梯伯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决定在万不得已时让他弗略里的名誉受损害。

于是弗略里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把手稿带给了希尔施，要希尔施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一篇声明，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市长提供伪证，说他希尔施就是李卜克内西，要市长证明这篇声明是真的。当弗略里把上述手稿交给希尔施去临摹的时候，他对希尔施说，手稿的笔迹是写记录本的那个人的，是戈德海姆从科伦把它(手稿)带来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科伦拿出来的记录本并不是希尔施和弗略里所写的那一本；施梯伯亲自让人复制了一本。这一本与弗

略里和希尔施炮制的那本不同,除了其他一些非本质的地方以外,主要是弗略里所寄的记录没有签名,而施梯伯拿出来的记录有签名。)

希尔施尽量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了声明。(他离开伦敦时,手稿还在他那里。)声明的内容如下:下面签名人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他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和真实的。希尔施在去见市长的路上说,他不准备在市长面前宣誓。弗略里回答说他自己来宣誓。在这以前弗略里到普鲁士领事馆(在那里他当然是非常出名的),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作为李卜克内西的签名)是真的。然后他同希尔施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市长要求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过了一天——但已经太晚了——弗略里在律师那里证明签名是真的。)

希尔施在他向弯街治安法官贾丁作的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中谈了这整个丑事。他的证词提交给了上诉法院院长哥贝尔,与此同时它的两份副本寄给了施奈德尔第二和律师埃塞尔。

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希尔施本人从汉堡弄到柏林来,让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提供证词,并同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对质。但是要把现在还是头号“文明人”和“解放者”的舍尔瓦尔弄来,在现存制度下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自己去提供证词,自然我就根本不能说我是怎样发现这个或那个事实的——不然就会说出各种各样不应该说的东西来。况且这样的证词也不能成为证据。

如果政府能秉公办理,那案件非常简单,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办理这个案件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来谈费舍^①。

从1853年,即从我的第一本反对帕麦斯顿的抨击性小册子^②问世时起,我就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和他的拥护者(我不说他的党,因为在他的专门领域即对外政策方面,除了认为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先知者的那一派以外,所有英国党派——从托利党到宪章派——都有他的拥护者)建立了某种契约关系。从那时起,我就不断地有时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有时不取报酬地为他们的《自由新闻》提供文章(例如,我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以及论文《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③等),并把我个人掌握的关于俄国密探如班迪亚等人的材料交给他们使用。费舍可说是乌尔卡尔特派在柏林的公认的正式代理人,但是关于他在那里的活动,我只是凭传闻知道他出版《公文集》^④而已。这就是我怎样同费舍发生关系的情况(我只是偶然在伦敦一家报馆的办事处里碰见过他,并利用这个机会要他向你转达了问候)。他在柏林为我和恩格斯代办过各种事情。在对内政策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同他交换过一句话,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我同乌尔卡尔特自从下面这件事以后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有一次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我是一个革命者,而他也是如此坦率地对我说,他认为,所有的革命者要么是彼得堡内阁的密探,要么是受彼得堡内閣愚弄的人。

在我们和费舍来往的信件中,他总是十分审慎,只限于谈论我们同乌尔卡尔特分子观点一致的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① 见本卷第59—61、532—533和536—537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编者注

④ 《新公文集》。——编者注

你大概读过乌尔卡尔特的著作,因此在这里来分析这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是多余的(即便不谈这点,这封长信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下就已经使我非常疲劳了)。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浪漫主义者)(当然不是从任何一个**真正**反动的党派都是反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而是从所谓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

他的德国拥护者,如布赫尔、费舍等人(后者的小册子《俄国佬》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读也知道它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甚至学去了他那种具有独特的混乱批判性的“盎格鲁撒克逊”怪癖,这我根本不在乎;正如,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乌尔卡尔特是俄国所害怕的一种**力量**。他是在英国唯一有勇气和良心反对舆论的**官方**人物。他们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能收买的人(不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名誉地位)。最后,迄今为止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例外地,我遇到的**都是诚实的人**,因此在没有**证明**情况相反以前,也应当认为费舍是这样的人。

至于费舍和哥达公爵^①的关系,我根据很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不是一种**雇佣关系**。因为这个公爵属于乌尔卡尔特用来反对帕麦斯顿和任何内阁篡权的英国王朝(洪堡预感到这种内阁篡权时间道:“为什么从来不向内阁阁员开枪呢?”),所以对乌尔卡尔特来说,最方便的就是在德国用他的名义反对俄国和帕麦斯顿。因此费舍的小册子《作为革命者的暴君》英译本就题为《科堡公爵的抨击

^① 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性小册子》，而帕麦斯顿对它那么重视，竟亲自用一篇专门的（匿名）抨击性文章⁵²³来予以答复，从而使他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要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是用不幸的科堡家族来做他亲俄的替罪羊的，而这本小册子迫使他放弃了这个阴险的诡计。

完全可能，费舍反帕麦斯顿的言论在柏林没有多大意义。然而它们对英国却很重要（因而反过来对德国也很重要），因为乌尔卡尔特派巧妙地利用这场论战，把它夸大，把它描绘成德国对帕麦斯顿的看法而在英国的论战中加以利用。

我们同乌尔卡尔特派一起对俄国、帕麦斯顿和波拿巴进行的这场战争，参加的有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欧洲所有首都的所有党派和阶层的人，费舍也是其中之一。相反，我同布赫尔却从来没有交换过一句话，因为那没有好处。假如他住在柏林而不是住在伦敦，那是另一回事。

一当我们在德国进入革命的时代，我们当然就会停止搞外交，即无论哪一方面都丝毫不掩掩盖盖，甚至不口是心非的外交。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些英国的联系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象“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在德国现在根本不存在革命的政党，而反动的最丑恶的形式，我认为是譬如在《国民报》上所表现出来的普鲁士王国的宫廷民主，这在《人民报》上也有某种程度的表现（对坏蛋芬克、摄政王^①等人的赞扬）。

无论如何，乌尔卡尔特派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熟悉情况”，他们这派不熟悉情况的成员从熟悉情况的成员那

^① 威廉。——编者注

里得到启发;他们追求明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同俄国作斗争——并同俄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伦敦唐宁街⁵²⁴进行殊死的战斗。让他们去设想这个斗争会使“盎格鲁撒克逊的”秩序建立起来罢。我们革命者必须在他们还有用时利用他们。这并不妨碍我们,当他们在对内政策上反对我们而成为一种障碍时就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乌尔卡尔特派对于我用我自己的名字同时为他们所切齿痛恨的厄内斯特·琼斯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当它还存在时)写文章,从来没有过意见。厄内斯特·琼斯曾笑话乌尔卡尔特的胡言乱语,在自己的报纸上嘲笑他,但是就在这同一家报纸上,他曾公开承认乌尔卡尔特在对外政策方面有非常珍贵的作用。

最后,乌尔卡尔特的浪漫主义,尽管对法国革命和一切“公共事物”怀有狂热的仇恨,但却是特别自由主义的。它的坚决主张是个人自由,只是意思极其含糊。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点,它给“个人”披上各式各样古老的服装。

祝好。

你的 卡·马·

42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6月2日 [伦敦]

亲爱的先生:

我长时间没有写信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我从曼彻斯特回来

后有很多事情要做。后来病了。我至今还在受医生的照料,几乎不能写东西。

至于您同恩格斯先生的事,那是由于他不得不再次突然去德国而耽搁的。他在返回曼彻斯特途经伦敦时⁸²对我说,他要马上付清那笔不大的账。他很遗憾未能对您更多地帮忙,而且决没有想要您负担往回运酒的费用^①。

您的书^②我读了感到很愉快,而且很受教益。我基本上同意您对恢复匈牙利的条件的看法,但是不同意您替波拿巴和帕麦斯顿辩护。后者在1848—1849年象出卖意大利那样出卖了匈牙利。在这以前,他对波兰也这样干过;后来他又同样地对待切尔克斯亚。他从1829年起就是与彼得堡内阁保持密切联系的俄国代理人,现在依然如此。他是无法割断这种联系的。当然,俄国希望毁灭奥地利帝国,但是它决不希望让这个帝国的组成部分各自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匈牙利的真正恢复,比起动荡的、不稳固的和胆怯的奥地利来,对俄国的东方政策会是个更大的障碍。为了您自己的利益和您国家的利益起见,我但愿您不要收入给帕麦斯顿的《备忘录》⁵²⁵,不要谈论俄国的真正利益,甚至不要暗示瓜分土耳其。而现在,您所疏远的英国政治家,正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更愿意尊重您,都更少受科苏特派诽谤者影响的人。(科苏特不久前曾通过他的一些代理人声称,您在阴谋反对他,因为他至少在原则上是个共和派,而您却属于“立宪的和贵族的党派”,而且他竟能把他的这个观点强加给了某些周报。)

请原谅,我冒昧地向您坦率指出了我不能同意您的几点。希望

① 见本卷第55页。——编者注

② 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我对您的著作和您的活动感到兴趣这一点,将足以为我表白。您什么时候再来伦敦?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顺便提一下。佩尔采尔给我回信了^②,信中承认我对他说的那些有点滑稽的恭维话是公正的,但同时又非常客气地拒绝提供我所希望的解释。看来,他写信时心情相当忧郁、伤感和沮丧。

还可以告诉您一件奇闻,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③去年冬天就我发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作了讲演⁵²⁶。

43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巴 黎

1860年6月23日 [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您能否费神把附上的这封信转寄给洛美尔?我通过您寄信,是因为在日内瓦我只知道洛美尔本人的地址,而这个地址看来是靠不住的。洛美尔至少在他最近的几封信中没有提到我寄给他的一些信,我问他,他通知我已寄出的那个邮包怎么还没有寄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也没有回答。

请代我向席利致衷心的问候。请您快点把拉尼克尔寄给他的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

③ 巴布斯特。——编者注

信⁵²⁷寄给我。

我能重新工作,才只有几天,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正在复元。

7月初将在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报》的出版人,通过第三者^①向我建议为他们撰稿。我还没有作最后答复。我想先比较确切地了解一下这个新机构的成员和它的倾向。但是,从目前报上发表的广告来看,我以为它将持“民族联盟”¹⁸的立场,据柏林的一位朋友^②来信说,最好是从外部对它的倾向给予有力的影响。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直接从柏林或通过伦敦接到相应的建议,您是否会同席利一起为这家报纸——看来它是有经费的——写通讯?请您立即答复我,因为我当然只有先保证在巴黎得到同意,才能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

阿布的抨击性小册子^③有这样一个功绩,就是哥达派⁵²⁸的用语在这里正式被承认完全是属于波拿巴的。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萨宗诺夫。

祝好。

您的 卡·马·

给洛美尔的信请尽快转寄。

① 费舍。——编者注

② 大概是费舍。——编者注

③ 艾·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编者注

44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尔贝

柏 林

1860 年 8 月 2 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 9 号

尊敬的先生：

很抱歉，我今天才收到您的信⁵²⁹，因为我有好几天不在伦敦。现附上三十二帝国塔勒，并深深感谢您为我操心，请您向**最高法院提交控诉书**。我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是我还是不愿放过争取自己权利的任何一个机会。我认为上诉法院的理由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请您**立即**把您在 1860 年 6 月 21 日提交的控诉书原件寄给我，如果控诉书暂时还必须留在案卷里，那就请您委托您的秘书把控诉的几点大体上抄一份（并列论证各点的附件）寄给我。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45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⁵³⁰

伦 敦

1860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既然必要，那我不管好坏一定写一篇文章^①。今天济贝耳派了一个巴门的年青人来纠缠我，弄得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希望明天能坐下来写这篇东西。此外，不可原谅的是，摩尔甚至对我提出的关于济贝耳的问题都不答复；我已经拖了十天没有给济贝耳回信；他至少可以写信告诉我，我应当向济贝耳说些什么。找出版人的问题至今还什么事也没有做^②，这也是荒谬的；其次，谈判谁知道会拖延多久，再加上德国印刷方面司空见惯的拖拉作风——我们将这样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爬进1861年；这不能怪任何人，而只能怪摩尔先生自己和他的过分认真，因为他自己既没有对出版人的问题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使济贝耳有可能去做这件事。而同时整个欧洲会乱叫乱闹起来，公众也会完全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个硫磺帮⁴⁷实际上究竟是谁，传单《警告》⁴²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泰霍夫的信³⁷中哪些是谎言，哪些不是。我们总是写出最精彩的东西，又总是尽量使它们永远不及时出版，结果成了无用的东西。

用三个印张立即答复福格特，无论如何会比那时以来所做的

① 弗·恩格斯《奥地利病夫》。——编者注

② 指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找出版人。——编者注

一切意义大得多。请尽一切力量就出版人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并使小册子最后完成。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自己破坏所有的机会,结果弄得根本找不到出版人。

现在谈一件滑稽的事,但这是很秘密的,不能让它从格拉弗顿坊9号的墙缝里透出去。请想象一下,这个可笑的济贝耳来到巴门,跟一个庸俗女郎一见倾心,在那里同她订了婚,打算不久就结婚并定居巴门。这么个笨蛋。他在我面前不好意思,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他在极严格的保密等等情况下告诉了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发生变故,会有一场开心的喜事。

衷心问候摩尔和小姐们。

你的 弗·恩·

46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8月2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大约两星期以前,我曾请您将上诉法院驳回的您的控诉书中控诉的几点抄一份寄给我^①。我必须重申这个请求,因为没有这个抄件,上诉法院的决定中有几点我无法理解。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① 见本卷第553页。——编者注

47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8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接到您非常友好地寄给我的短信，不胜惊喜。

我自己没有写信是不难说明的。自接到您的最后一封信后，我长时期患严重的、折磨人的肝病，这病几乎使我无法握笔。后来有一个熟人告诉我您在伦敦，因而我就不能肯定寄往巴黎的信您是否能收到。

正如您正确地指出的，重大的事件将要发生。但是据我看来，在欧洲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大的危险是盘踞在华沙的**合法反革命**与盘踞在土伊勒里宫的**非法反革命**之间的战争。可是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形势，并且尽可能更好地利用它。即使加里波第（他的真实意图我从寄给我的私人信件中得知）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旗帜，我也仍然希望来年春天有机会使各民族的事业同法国反革命勾当永远一刀两断。

我有一件事向您请求。最近科苏特竭力想挽回他在美国失去的影响。我打算揭破他的伎俩，因此您如能将这个假英雄的最近的行径**尽快地并尽量详尽地**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他曾经在（或者现在还在）巴黎；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他到过都灵；为了什么事？也许您还可以补充一些1859年战争时期他在意大利第一次出现时的滑稽可笑的趣闻。

鉴于即将来临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要确立德国自由派和匈牙利人之间的友善关系而排除任何怀疑——我不久将有机会向德国说明自己的意见(不是口头,而是在报刊上);另一方面则要使双方都不承认科苏特这个所谓匈牙利民族的代表。

在伦敦这里,我仍旧住在而且以后还打算住在老地方,即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如果您再来伦敦,我希望您不要再忘记我的地址。此外,我的妻子对于未能亲自认识您感到十分遗憾,她早已从您的著作中了解到您的卓越才能。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48

恩格斯致《军事总汇报》编辑部
达姆斯塔德

1860年8月24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军事总汇报》编辑部
达姆斯塔德

我是贵报的一个订户,而贵报又于去年就我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柏林敦克尔出版)发表短文予以好评,使我很受鼓舞,所以我不揣冒昧向贵报投寄一篇文章^②,也许贵报读者会对此感到兴趣。如果除此以外我再寄上某些问题的报道、通讯等等而对贵报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又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

有用的话,我将很乐意这样做。顺便提一下,我也许不久就能给贵报投寄几篇有关惠特沃思火炮等方面的有趣报道。贵报自然非常清楚英国在军事上的进步对德国也具有的意义。因为在德国以外,归根到底只有英国是我们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天然的和必要的同盟者。

如果贵报要求撰稿人提供服役经历,那对我的经历当然不会感到满意;我在普鲁士近卫军的炮兵旅当过一年志愿兵,只做到炮手为止,后来和武装起义者一起参加了1849年的巴登进军。但是脱离现役以后,我总是不断研究军事问题。

我的文章如蒙贵报刊载,请立即按印刷品邮寄给我一份清样。我将把这篇文章的译文立即作为《军事总汇报》文章的摘录登载在英国报纸上,而这只会对贵报有利。不然请把手稿退还。因为通过书店来的《军事总汇报》,要在报纸出版后一个月才能到达,如贵报不把文章寄给我,那就要过很久,它在这里就不会引起任何兴趣了。

请贵报尽快就我在4月份出版的最新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刊登一篇公正的评论。

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 琛

1860年9月7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很高兴终于又得到你的信息,美中不足的是你不能告诉我关于你的健康状况的更令人愉快的消息。我自己一直患肝病;这不像痛风病那样疼痛(而且至少在英国人看来,也不是那么雅致),但对于脑力劳动也许妨碍更大。

我的反对福格特的著作^①之所以延迟出版,除了因为我必须做些更急迫的工作以外,是由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1.我本来想等到对《国民报》的诉讼结束以后,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打算。

诉讼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检察官,接着是检察长都驳回了控告,理由是案件不代表足以引起官方干涉的“公共利益”。于是就提起了民事诉讼。市法院作出了驳回控诉的“决定”,因为侮辱性的几段话只是“引证”的(注意,这是不真实的)。上诉法院宣布市法院的理由是不正确的,但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理由是污蔑性的几段话没有牵涉到而且不可能牵涉到我(法院通过“不正确的引证”来证明这一点),《国民报》没有侮辱我的意图等等。“决定”的笔调清楚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不过地证明这些家伙的惊惶失措。现在案件已转到**最高法院**。这样,我对普鲁士司法的认识就更丰富了;现在我知道,私人一般能否使案件得到**公开审理**,要取决于法官的决定。要知道所有这些决定无非是些企图阻止我在法庭上当众控诉《**国民报**》的“预防措施”。看来,法律顾问维贝尔丝毫不了解我同普鲁士政府的友好关系,因此他在他的信中对这些“无法解释的”决定表示惊讶。

你知道,我对《**国民报**》提起诉讼是在收到**福格特**的书^①以前。结果我是做对了,因为《**国民报**》以值得称许的机警收集了福格特书中一切,确实是一切要受到刑事追究的**诽谤指控**(我这里所说的是符合刑法典规定的那种诽谤,对这些先生们的一般谩骂我不愿意按法律手续去追究),而有的地方甚至比书里说的更尖刻。但是对每一点我都能够不是要求对手来**证明他的指控的真实性**,而是自己**证明这种指控的虚假性**。唯一例外的一点是关于往德国寄了几百封恐吓信去进行敲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报**》当然必须从它的朋友福格特那里弄到一封这样的恐吓信。因此,各级法院都明白,如果弄到公开审理的地步,那末《**国民报**》就要被判罪,而这——尤其是在法庭上的胜利——就会“与**公众利益相矛盾**”。“**最高法院**”一定会想出一种新的花招。无论如何,普鲁士人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种材料,他们很快就会在伦敦报刊上看到它的令人愉快的后果。

2. **出版人**——这是目前阻碍全部事情的一个困难。小册子在普鲁士显然无法出版,因为其中一些涉及施梯伯等人的地方会使出版人遭到控诉。我同汉堡等地进行的交涉至今毫无结果。这些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先生不是干脆拒绝,就是对小册子的笔调和内容提出条件,当然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要是奥·迈斯纳不是在这以前出版了除你和格律恩以外也有福格特及其一大帮人——班贝尔格、西蒙^①等等参加的《民主研究》,那他是会承担这件事的。

最好是在这里刊印小册子并通过这里的一个德国书商在大陆上推销(福格特在日内瓦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不象福格特那样拥有使我能在这里刊印十二到十五印张的小册子的波拿巴津贴。

情况就是这样。你明白,我在反对福格特时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慈悲,这是不合乎德国出版者对待这位教授先生的心意的。我对他就象对骗子和小丑一样蔑视,也就是给他以应有的蔑视。

我也收到来自瑞士和美国的许多询问小册子出版问题的信件。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我已经有几个月避免同弗莱里格拉特见面了,因为我不愿意同他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另一方面,在这种关键时刻胆小怕事(由于怕损害同他的老板詹姆斯·法济在业务上的关系)使我很反感。(我认为特别不合适的是,我已用司法文件向他证明,布林德不怕罪过加重,从排字工人维耶那里骗取了关于传单《警告》的假证词⁴²来放在《总汇报》上发表,在这以后,他仍继续同布林德保持密切来往。)虽然表面上我们同过去一样是“朋友”,但是我们家庭之间的来往已经完全中断了。你是知道的,我妻子是个性很强的人。

希望很快能得到关于你自己的好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路德维希·西蒙。——编者注

5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 琛

1860年9月15日 [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信写得很简短,希望你还能收到。

1.我已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前天),请他答复你的问题⁵³¹。没有得到回答。当然罗!答复这样的问题是会违背他的职责的。

2.关于福格特的书^①。经过种种尝试,我深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在伦敦付印。不过,书是有意写得不可能被没收的,因此即使它不能在柏林付印,也还是能够象其他任何书籍一样,通过莱比锡在德国推销。可以把书直接从这里转寄到瑞士、比利时、美国去。一部分钱由恩格斯付,一部分钱由我付。但此事花费很大,因为一印张在这里要花四英镑半。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去筹一部分钱。我指望能成功,已经让人在下星期就开印。如果钱筹不到,那我们只不过损失到那时为止所印成的那几印张的费用。

3.加里波第以前完全象马志尼一样同意我对波拿巴的**使命**的看法。我有过加里波第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但是,过去的事现在没有意义了。加里波第一旦使意大利人的斗争不依赖于波拿巴(而这正是他的目标,他在给我的一个英国熟人(格林)的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这样说)^②,革命政党内部所有的争论问题就会消除。但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7页。——编者注

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纲领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如果你拟好一个草稿,那恩格斯、沃尔弗和我会同你就可能进行的修改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的“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大的党”(因为其他政党不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或者不愿干自己所知道的事),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正是由我们(在英国这里)从民族立场出发采取行动,这在我看来——姑且不说这种政策的内在合理性——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正确的。

4.至于我们对俄国的态度,我以为你是弄错了。我和恩格斯所持的观点,是完全独立形成的,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力气,对俄国外交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才得出的。诚然,在德国,人们仇视俄国,而我们早在《新莱茵报》创刊号上就已宣布对俄国人的战争是德国的革命使命。但是仇视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5.你对我的书^①的称赞使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出自权威的评论者之口。希望在复活节以前能出版第二部分²⁵。形式将稍有不同,将稍微通俗一些。这决不是出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也比较具体。

我的书在俄国引起了轰动,有一位教授^②在莫斯科就这本书作了讲演。我还从俄国人和懂德语的法国人那里收到许多封关于这本书的友好信件。

6.关于亨·毕尔格尔斯³²。这很象温柔的亨利希。诚然,他名义上担任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但是他除了一篇文章以外,从来没有在该报写过什么东西,而这篇文章还被删掉了一半,改写了另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巴布斯特。——编者注

一半。毕尔格尔斯气得要死(这是在该报初创的时候),要求普遍表决。我例外地同意了,但同时声明,在报纸编辑部里应当实行专制,而不是普选权。普遍表决的结果表明大家都反对他。从此他就不再写东西。此外,监狱似乎使他变得很温和了。在这方面被囚的狼^①值得称赞。他是与毕尔格尔斯完全相反的人。

但是比毕尔格尔斯更使我恼怒的是,我们党的一个很有才能而又精力充沛的成员哥丁根的律师米凯尔归附了卞尼格先。

7.在柏林出版了艾希霍夫博士的《警察剪影》。写得不好,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使人对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警察局”和“法院”看得一清二楚。书立即被没收。有一本顺利地寄到了这里。

8.至于说到普鲁士的诉讼程序,我应当承认我是完全无知的。我从来没有设想能得到实际的满足,但是我以为诉讼程序至少应当让我能达到公开审理。这就是我所曾希望的一切。

难道按照(旧的)莱茵省的诉讼程序,私人控告侮辱或诽谤也要得到司法当局即政府的事先批准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⁵³³

亚 琛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刚给你发出一封信,就收到这封信,现在奇上。

你的 卡·马·

5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10月2日 [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我立即转寄给他了。

当然,我给你写信,说你应当想办法“去筹”一些钱,我用的是含糊的说法。决不要去找同我个人没有友好关系的人。如能快些收到这笔钱总是好的。不过,我认为这钱不会白费,因为生产费用无论如何是能够收回来的。

恩格斯在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猎兵的文章^①,后来又被译载在曼彻斯特的《志愿兵杂志》上。全部伦

① 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编者注

敦报刊都在转载和讨论这篇文章。

就我直接从加里波第的营垒中收到的信件来看,情况令人忧虑。卡富尔完全是波拿巴的工具,并且他掌握着维克多-艾曼努尔。加里波第将很难抵抗住波拿巴和皮蒙特军队,况且意大利的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匪帮都是同卡富尔站在一起。加里波第自己的军队素质变坏了一些,因为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分散到那不勒斯的败类和皮蒙特的士兵当中去。

这一次我没有回你的信,只写了这么几行,请你原谅。除了看校样^①的(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日常的事务以外,我还受到一种犒赏——整个左边头部讨厌的神经痛。

祝好。

你的 卡·马·

最高法院还没有作出决定。一旦这事失败,我得不到公开审理,我就要在这里出版一个一印张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司法》⁵³⁴。

5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10月23日 [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只给你写几行,请原谅。我现在除了日常事务以外,正忙于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校样。——编者注

看校样。

如果你把能够寄给我的钱在11月初寄来,我将**非常**感激,因为我已向印刷厂主开出一张11月初到期的期票(其实,对伦敦的印刷厂主通常是**按周**付款)。

今天我收到最高法院的最后驳回的决定,内容如下:

“您今年8月23日对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于今年7月11日就《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侮辱卡尔·马克思博士一案所作决定提出的控告,经审查有关文件后,认为理由不足而予以驳回。王国上诉法院并不认为《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在**客观上有侮辱起诉人名誉之处**,也没有发现其中有**侮辱起诉人的意图**,因此,驳回对侮辱的起诉是正确的。

确定客观上是否侮辱荣誉,是否有侮辱的意图,实际上是对事实的裁决,只有当上诉法官的决定在这点上犯了法律的错误时,才能对他的决定向王国最高法院提出控告。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费用……”**

你的健康怎样?我的身体还是很不好。

祝好。

你的 卡·马·

5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1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非常感激地告诉你,十二英镑我已收到,是星期六寄到的。你提到的那两个人^①,你还是**不要**去找。

^① 阿辛格和敦克尔。——编者注

瑟美列的声明使我吃惊,不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任何事情总 是会使我吃惊的。瑟美列的行为决不是出于个人动机,而是由于患有“治国才略”的毛病!

印书的事^①一结束,我就能腾出手来,那时,将详细地写一封信给你。

你的 卡·马·

在合众国,这一次取胜的,应当指望,而且很有可能是共和党(《论坛报》是它的机关报)。

今天我给我的律师维贝尔写了信,要他把同我的诉讼有关的文件转交给你。请你暂时代为保存。

5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伦 敦

[1860年]11月21日 [于伦敦]

亲爱的瑟美列:

由于我的妻子患很重的病(神经热),我没能星期日同您会面,也没能在那以后的某一天去拜访您。波克罕先生告诉我,他在上星期日见到了您。

《奥格斯堡报》^②上提到您的那篇文章,是住在我附近的一个朋友比斯康普博士写的。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我的妻子和我向您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11月18日的《星期日邮报》杂志刊登了一封注明“1860年11月14日于维也纳”的信，这封信完全是按您的公开声明的精神写的。

56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伦 敦

1860年11月22日 [伦敦]

亲爱的瑟美列：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友好的信和科苏特—科布顿的备忘录⁵³⁵，这在我的上一封信中忘记提到了。

我妻子的病情还没有好转。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是我过去给您的那本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现住在：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星期日邮报》我有时从一个巴黎朋友那里得到。这个加内斯科是不是瓦拉几亚人？无论如何，从他的名字看，他原籍不是法国。

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5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60年11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恳请您把附上的声明^①尽快地在《人民报》上刊登出来，并寄给我一份报纸。

下星期您大概可以收到一本我的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②。我将给我的朋友拉萨尔寄去三本——一本给他，一本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本给柳德米拉·阿辛格夫人。

您能否费神把这件事通知拉萨尔。同时告诉他，我的妻子患很危险的神经热已有一个星期，照医生的嘱咐我不得不使我的三个孩子离开了家。拉萨尔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写信给他；如果他自己写信的话，我将非常感激。

致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1 8 6 1 年

58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1年1月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济贝耳：

祝你和你的夫人新年愉快！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你，我的藏书以及你的来信都已寄到。

请你从你预定的六本《福格特先生》中，寄一本给《科伦通报》，寄一本给《北德报》（汉诺威），由你自己斟酌寄三本给文学杂志。而主要的是你自己要读一本并给我提出意见。

至于《科伦通报》，那你可以利用这家小报来反对《科伦日报》。

书^①的销路很好，因此佩奇“打算”出第二版。为此极重要的是，你要尽可能把在德国出现的有关这本书的一切情况都弄到，使我对这一切都能了解。（我在这里只看《总汇报》、《新普鲁士报》和《人民报》。）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在《自由射手》上已经发出爱·梅因的凄惨的“绝望的号叫”^①。别人也会跟着叫的！

希望下次你能抽时间，比较详细地写一封信给我。

最近我的处境很困难。我的妻子五周来病得很危险，我不得不把所有三个孩子都带出家去。

至于席利，我们要使他重新清醒过来。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5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 门

1861年1月3日 [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我刚刚发觉，写给你的信——今天收到的信的复信——我寄错了地址，写成：爱北斐特，留局待领，小卡·济贝耳。现在来纠正它。再一次向你衷心问好。

恩格斯刚才告诉我，高傲的博尔夏特医生很不满意我在《福格特先生》中提到曼彻斯特的“三个德国医生”曾给《人民报》提供经费⁵³⁶。真是一个可怜而又傲慢的傻瓜。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爱·梅因《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揭露》。——编者注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1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首先向你表示最良好的、但是迟到的新年祝贺。

我的妻子正在恢复健康。她这一生病，连我自己也生了重病，目前正患肝炎。这也是出人意料的新年快事。这病一直是慢性的，而现在是急性发作了。

这就是我没有写信的原因，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对你的痛苦在内心里都是极为同情的。但愿你能在下一封信中告诉我们关于你自己的较好的消息。你要是能给我寄来比较详细的病历，那我可以去请教一位医生，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医术天才^①。不过他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曼彻斯特。

王国普鲁士的大赦¹⁴⁶——它实际上把所有流亡者都排除在它的恩典之外——使我感到很可笑。不过，刚刚加入民族联盟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凭着对“恩典法令”的相应解释，是能返回祖国的。至于布赫尔、弗莱里格拉特、波克罕、施潘道的威美尔曼和其他许多人，则早已成了“归化了的英国人”。

曾担任《新普鲁士报》驻伦敦记者，后来是《晨星报》(曼彻斯特

^① 马克思指的是龚佩尔特。——编者注

学派⁵³⁷)编辑之一的孚赫,其实是一个跟任何人都合得来的人,因为他不仅不掩饰,反而公开显示他那柏林式的随风倒的特色,凡是知道他的人,一般谁也不在政治上严肃看待他,而这个孚赫以为他现在可以扮演普鲁士的科布顿的角色了。请便吧!至少他在离开伦敦时的计划是这样。

我的一个朋友约·菲·贝克尔现在在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那里。他来信说,南意大利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完全是由马志尼的拥护者组织的,加里波第不太聪明,在他的朋友们的营垒里是一片慌乱。此外,加里波第同意马志尼这样的看法:卡富尔对维克多—艾曼努尔始终怀有不良意图,他不如说是波拿巴的直接工具;在加埃塔进行干涉¹⁵⁶,后来委派拉法里纳去西西里岛,委派法里尼去那不勒斯等等,都无非是周密安排的几着棋,以便迫使维克多—艾曼努尔向法国再作领土让步,并在南意大利向缪拉特让步。这点他是做得到的,不久就会看出来。

美国的奴隶占有制危机几年之后将在英国导致可怕的危机;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现在就已开始战栗了。

我很少读德国的东西,但是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本阿·巴斯提安的书《人在历史中……》。我发现这本书不好,条理不清,装腔作势。他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超出虔诚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历史作“心理学的”论证表明,这个人既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也不知道历史是什么。

达尔文的著作^①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

①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最近我较多地看到德国报纸。都是些讨厌的东西。而且是自命不凡的平庸东西,真是令人作呕。

你能否寄给我艾希霍夫的《警察剪影》第二卷?这里弄不到。

现在我还读完了瓦勒斯罗德的《死人的检阅》。那里有很美的故事!但叙述得很不生动,不过这要归咎于该书出版的时代。

衷心祝愿你恢复健康,并代我的妻子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

刚刚到过巴黎的梅洛斯拉夫斯基告诉我的朋友席利说,情况“不好”。同时他对“克拉普卡”反映很不好。但是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我也不十分清楚。

6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1月28日 [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今天信写得很仓促,甚至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西蒂区写的。最近就会给你一封答复你的全部问题的详尽的信。首先感谢你寄来的东西。其中一份我已转寄给弗莱里格拉特,第二份将寄给恩格斯,第三份留在我这里。这是一份很能说明当代历史特点的出色文

件¹⁵²。

请费神把附上的便函⁵³⁸立即送给艾希霍夫先生。

在目前你的健康状况下,出于对朋友的责任,我不能强迫你从事新的写作。否则我认为,写一本你所构思的那种针对察贝尔的抨击性小册子,倒是一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

妻子向你和伯爵夫人^①衷心问好。她的健康正在迅速恢复。至于我,我想在一段时间里可以不服任何药物了(昨天喝完了最后一瓶药)。

请代我向候伯爵夫人。下一次给你写信时,我也要给她写上几行。

完全属于你们的 卡·马克思

62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1年2月7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已同恩格斯谈好,那三十英镑你随时都能收到,而你垫付的费用,在得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能还给你。因此不必去找裁缝了,请你告诉恩格斯,他应当在什么时候寄钱。^②

我必须亲自去荷兰一趟,否则我无法度过目前的危机。请费神向你熟识的某个商人打听一下,在荷兰关于护照的情况怎样?是否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52和154页。——编者注

一定要有护照?《论坛报》的“卑劣做法”^①,再加上其他倒霉的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更加恼火,是因为这使我不能遵照医生的嘱咐为恢复我妻子的健康而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尽管我不属于“德国的受难者”之列,而且总是对这类人抱敌对态度,然而我认为我已饱尝了流亡的苦楚。

除了拉萨尔的建议以外,德国其他两个地方也建议我写政论。但是我以为——你大概也同意我的意见——风暴还没有临近到现在就接受这种建议的程度。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要是把发表在《评论》^②上的恩格斯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③同阿尔诺德向你撒的谎对比一下,那你就看出,卢格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骗子。

63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 门

1861年2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七份签了字的契约寄还,第八份留在我这里。⁵³⁹应当说,如果

① 见本卷第148和152页。——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不是因为你,我很难决定走这一步。肯定能留给我们的父亲的企业就只有这一家,要我自己放弃它,心里很难过,况且,我认为这样随便地放弃,并没有足够的根据或理由。我认为对这个企业我也有一份权利,我的弟弟们^①无权要求我无缘无故为他们的利益而放弃我的权利。我的要求是绝对合理的,而且我又是非常及时地提了出来,以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被考虑进去。当艾·布兰克在这里的时候,他承认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以后,什么也没有通知我,只是当其余的人把一切都已商量好了,才要求我同意放弃自己的意见,作为说明的一些理由(在艾米尔^②的信中),也许带有非常务实的性质,但是这种理由我是无论如何决不会提出来对付自己的弟弟们的。留给我的唯一慰藉只是艾米尔的**保证**,即他艾米尔**确信**哥特弗利德·欧门决不会破坏他同我订的契约。但是他的这种信念被我们的律师否定了,律师曾不止一次地对艾米尔说过,契约**本身**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合法的保障。弟弟们得到的是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而我得到的却是艾米尔的“信念”。

亲爱的妈妈,为了你,我克制住了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伤。我以为,无论是我在你那里时⁶⁴的表现或是我的信件,都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丝毫没有阻碍达成某种协议的意图,相反我愿意作出牺牲顺着你的愿望来解决一切。因此我也不多说什么,就签署了这个文件。我决不让这样的问题再来烦扰你,惊动你。我不会为此生弟弟们的气,只要他们以后不是逼得我非提不可,我甚至不愿意再对他们提起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我也不打算夸耀

① 海尔曼·恩格斯,艾米尔·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② 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我认为我所作的牺牲。不过我应当坦率地告诉你,我在这件事上主要考虑的是什么;自然,我根本没有设想你能使事情解决得对我更有好处一些。相反,我知道在每次谈判的时候,你也总是想到了我,并且为我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

问题解决了,事情就算结束了。你任何时候也不会再听到我对这件事的意见,自然,要是艾米尔到这里来,我一定象往常那样尽我兄弟之谊。尽管我同他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在这里的时候对我的利益是很关心的。

睡衣已经收到,来得正好,因为天又冷了。但是红色的镶条有些不合这里的风尚。我还有一只会捕鼠的小狗,它现在成了我家里的伙伴。

希望你感冒已经痊愈,并且希望,摆脱与遗产有关的一切忧虑会对你产生良好的作用。而济克^①应当尽可能买下来!

衷心问候海尔曼、鲁道夫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

热爱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2月15日 [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②以后,没有如愿接着再写第二封,因为

① 指济克河岸上的一块地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5—576页。——编者注

在这时发生了**危机**——货币危机。德纳自纽约来信说，他们《《论坛报》》辞退了他们**所有的**驻欧洲通讯员，只留下了我一个，但是：(1)《百科全书》^①暂时停止出版，(2)我撰稿暂停六个星期，最后，(3)此后我每星期少写一篇。

由于这些情况以及妻子治病的花费，我必须到荷兰我表舅菲力浦斯那里去一趟，以便整顿一下我的财务。因为我需要路费，所以在你名下开了一张为期六周的二十英镑(大约三十四塔勒)的期票。我将在**到期以前**从荷兰寄给你这笔钱，**或者我自己把它带往柏林**，因为我也可能去那里。我要是能越过(如果我是卡尔·海因岑——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⁵⁴⁰——我就会说迈过)荷兰国境而进入德国国土的话，那我当然会作为**旅行者**来的。

你的 卡·马克思

65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 门

1861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我本来要立即答复你的亲切的来信，但是由于艾米尔^②一来，日常事务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回信就完全写不成了。昨天早晨他已经走了，想必今晚就可以到达恩格耳斯基尔亨。亲爱的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会由于事务上的问题生弟弟们的气；这我连想都没有想

①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② 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过。被迫自行放弃父亲的企业,使我感到很不愉快,而且,我认为是属于我的那种权利,在与此毫无关系的种种借口下被轻易地剥夺,而要求我同意又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①,这也不能不使我深感不快。我不想说事情现在就不那么好;也许甚至比我的意见得到考虑的情况下还要好些。但是这一点恰好谁也没有设法向我说明,而且你也不能否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我签署文书,对我未免太过分了。不过,现在这事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相信我对无论哪一个弟弟都不会有丝毫的抱怨。我们以后还经常需要互相照顾,况且,你也知道,我根本不是那种一味抱怨人家不识好歹的人。我相信艾米尔不会觉得我有什么不愉快,更不用说对他有什么恼怒,而且他也不可能感觉到,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容忍了这一切,而且只希望恩格斯基尔亨的企业给所有四个人都带来很好的收入。因此,亲爱的妈妈,不要烦恼。对我来说,这事已经完完全全结束了,甚至我签署协议时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也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已经彻底消除和淡忘了。我想过,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有些不愉快而已,而你在谈判期间所经受的不愉快,必定比我多得多,深得多;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大笔一挥就把这一切作个了结。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

我大体生活得不坏。艾米尔在这里过得很好,他会告诉你,我们同哥特弗利德^②的事几乎已经结束,因而连这个问题也终于解决了。好啦,再见吧,祝你健康,多加保重,并请代我衷心问候海尔曼以及鲁道夫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

热爱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① 见本卷第577—579页。——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6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3月7日于荷兰扎耳特博默耳
(来信请寄给莱·菲力浦斯)

亲爱的拉萨尔:

我早先已经写信跟你说过,我打算从这里到柏林去,以便亲自同你谈谈我们在写作和政治方面可以共同进行的事情,尤其是想同你见见面。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非常确切的情况。我除了在1849年被驱逐出境⁵⁴¹时发给我那个法国旧护照以外,没有别的护照。我很讨厌去找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也不愿意改入英国籍(象弗莱里格拉特、布赫尔、威美尔曼等人所做的那样),拿着英国护照旅行。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1845年,普鲁士政府在比利时迫害我的时候⁵⁴²,我通过我的姐夫^①从普鲁士领到了侨居证书。1849年,大家都知道,我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借口是我不再是普鲁士臣民。但是根据法律,凡侨居国外十年的才不再是普鲁士“臣民”。我从未加入过外国籍。其次,根据1848年预备议会的决议,即德国各邦政府在选举法兰克福议会时所遵循的决议⁵⁴³,一切侨民,甚至象福格特等已经入了外国籍的人,都能要求恢复德国公民权,并能在各地当选议员。我根据这一点在1848年曾要求恢

① 威廉·罗伯特·施马尔豪森。——编者注

复我的普鲁士公民权。当时的普鲁士内阁拒绝了我这个要求,但是他们也只是在革命失败以后才敢把我当作外国人来对待。

实际上这个问题目前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在于我能不能顺利地到达柏林。只要能越过国界,在柏林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但是在外省风险就大些。

你知道,我想在这里依靠表舅^①(他管理我母亲的财产,过去他经常从我该继承的遗产份额中支给我大笔的钱)把我的混乱的财务整顿一下。这个人很吝啬,但是他对我的创作活动很引以为荣。因此,你在给我的信里请提一下我最近那本驳斥福格特的著作的成就(lucus a non lucendo^②),以及共同出版报纸的计划等,总之,你要把信写得我能够“可以信赖地”拿给表舅看。同时不要忘了告诉我某些政治方面的情况。就这样说定了,好吗?!

衷心问候你和伯爵夫人^③。

你的 卡·马克思

(扎耳特博默耳在尼姆韦根^④附近。我想你不知道这个地名。的确,它是因为最近的水灾才闻名的。)

所有的德国报刊正象对我以前的一些著作那样,也以沉默的阴谋来对付我最近的这部著作^⑤,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过誉,虽然它很影响书的销路。希望你的健康已见好转。

①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直译是:“森林来源于不亮”。在拉丁文中,《lucus》(“森林”)一词的词根是《luc》(“发亮”)。这个成语说明自相矛盾或不可信的事物。——译者注

③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④ 荷兰称作:奈梅根。——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67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3月24日于柏林贝尔维街13号
(来信请寄:斐·拉萨尔博士)

亲爱的表妹:

对你亲切的来信,不胜感激,它的唯一不足之处是太简短了,自然你是照英国规矩行事,把最好的东西放进了最小的容器。

我于上星期日(3月17日^①)上午七时到达柏林。我这次旅行,除了在奥伯豪森这个极其无聊的小地方耽搁六个半小时以外,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拉萨尔住在柏林一条最繁华的大街上的一所华丽的住宅里,他为了招待我准备得很周到,给了我友好的接待。最初几个小时我们在闲谈中度过,休息了一会,吃了点茶点,使我消除了旅途的疲劳,随后拉萨尔立即领我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住宅去,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位伯爵夫人每天下午四点在他那里用午餐,晚上同他在一起消磨。我发现她的头发还是象从前那样“金黄”,眼睛还是那样蔚蓝,至于脸的其余部分,我看到深深印在那里的字样:二十加二十等于五十七。满脸全是“造物者留下的”皱纹,两腮和下颏所显露的丰满,象煤矿床一样,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等等。至于她的眉毛,一下子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不但没有变坏,反而变得更好,以致人工远远超过了天赋。后来,我作了全面的观察,发现她是非常擅长化装术的,她善于从她的化装盒里

^① 原文为:“3月18日”。——编者注

找出她的血液不再具有的色泽。总之,她使我想起了某些希腊雕像,胸部还很优美,但是头部却因岁月的变迁而受到残酷的“剥蚀”。不过,说句公道话,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是女学究,很有天赋,而且很活泼,对革命运动有强烈的兴趣,而又具有贵族式的落拓作风,远远胜过专事卖弄聪明的女人的忸怩作态。

星期一,我的朋友拉萨尔替我写了给普鲁士警察局长的关于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⁵⁴⁴。星期二,拉萨尔,这个非常勇敢的人,亲自把申请书送给了冯·策德利茨先生(警察总监、容克党徒和国王^①的代理人),他时而威胁,时而奉承——策德利茨把这次越过下属机构直接向他申请,看作是对他本人的尊重——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政府报纸《普鲁士报》报道了我回到“祖国”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接到关于恢复我国籍的正式答复。

星期二晚上,拉萨尔和伯爵夫人领我去柏林剧院,那里在上演一个柏林喜剧^②,充满普鲁士的自我吹嘘。总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星期三晚上,他们一定要我去歌剧院看芭蕾舞演出。我们有自己的包厢,它紧挨着——说来可怕——国王的“包厢”。这种芭蕾舞是柏林所特有的。它不象在巴黎或在伦敦那样是幕间剧或歌剧的结尾,而是演了整整一个晚上,分为好几幕,等等。演员不讲一句话,一切通过面部表情来表现,真是枯燥得要命。但是布景很出色,例如,你看到从利伏诺到那不勒斯的海上旅行;海洋、群山、海岸、城市等等,一切都仿造得象照相一样真实。

星期四,拉萨尔设午宴欢迎我回国,邀请了男女宾客。在知名人士中有冯·普富尔老将军、“战事画家”布莱布特罗伊、宫廷顾问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古·弗莱塔格《新闻界人士》。——编者注

费尔斯特(有名的普鲁士历史编纂学家,以前曾被称为“宫廷蛊惑者”,因为他是已故国王^①的挚友)等等。宫廷顾问费尔斯特为欢迎鄙人致了祝酒词。让我坐在伯爵夫人和柳德米拉·阿辛格小姐之间,后者是万哈根·冯·恩赛的外甥女,又是万哈根和洪堡通讯集^②的出版者。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尖细的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用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今天我勉为其难地去拜访这个小怪物,我对她非常审慎和冷淡,并且通过我的朋友拉萨尔向她示意:吸引力对我总是向离心方向起作用,当我非常赞赏一个人的时候,我往往是竭力躲开他。

这里的事态对执政当局很不妙。普鲁士的财政出现赤字,而一切旧的政党正处于解体的过程。在最近几个月众议院要重新选举,很可能在众议院的改选过程中,国家会发生很大的动荡。我的朋友拉萨尔认为,那时候可能是在普鲁士首都这里出版报纸的适当时机,但是我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决定。由于必须等待当局对我的申请书的正式答复,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可能比原来设想的要长一些。

亲爱的姑娘,你瞧,我在不多几天里看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可以相信,我总是想再去博默耳。

向你、你的父亲和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始终是你的忠诚的崇拜者 卡尔·马克思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编者注

68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 门

1861年3月28日于柏林

来信请寄：贝尔维街13号斐·拉萨尔博士
(给我的信另套信封装入)

亲爱的济贝耳：

我旅行的秘密大概使你有些莫名其妙，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美国的危机，我参加撰稿的《美国百科全书》^①完全停止出版了。我给《论坛报》撰稿(我的主要收入来源)要停止到4月底，而在4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撰稿数量要减少一半(《论坛报》暂时辞退了所有的驻欧洲通讯员，只有我作为例外)。此外，还添上两件倒霉的事：《福格特先生》加上诉讼^②以及其他费用花了我几乎一百英镑，再就是我妻子非常不幸，得了天花(尽管种过两次牛痘)；在她持续两个月的患病期间，由于孩子们不能住在家里，我必须维持两个家的开销。

因此，必须另找收入来源。党内的同志们还在这以前就向我建议，从秋天起在这里办一家报纸。这就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详情下次写信再谈。

然而我在柏林(我不准备在此久留)陷入了很困难的境地。如

①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果你能借给我一百到一百五十塔勒,那就太感谢了。

在我去英国之前,无论如何想同你见见面,顺便谈谈报纸的计划(为此已经筹到两万塔勒)。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给我来信,告诉我最好在爱北斐特哪一家旅馆住一昼夜。

你的 卡·马克思

6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 门

1861年4月2日 [于柏林]

亲爱的济贝耳:

今天收到一封阿姆斯特丹的来信,带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我的主要经济困难(关系到好几百英镑)将得到解决。我的表舅^①(他管理我母亲的财产)基本上已经同意。这样我就消除了主要的忧虑。至于我写信给你说的次要的一点,那就要靠你了。

我在这里无聊得象条哈巴狗。人家象对待沙龙里的狮子那样对待我,我不得不同许多专事卖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面。这是很可怕的。我之所以在这里耽搁(希望不超过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愿在我迫使普鲁士政府承认恢复我的国籍以前就离开。(乍看起来,政府没有对我进行任何阻挠,但是却竭力把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①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我去爱北斐特将只停留一天。请立即写信告诉我,从爱北斐特乘车去亚琛要走多久,因为在亚琛我有约会。

我的《政治经济学》第二部分²⁵决定不给敦克尔出版,而给布罗克豪斯出版(布罗克豪斯还不知道,但是有可靠的办法使他同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70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4月13日于爱北斐特

南尼达小姐

我亲爱的表妹:

我从柏林寄出的一封信^①,料想你已经收到,尽管你是那样残忍,连一句话都不赏给自己的崇拜者。请问我的忍心的小妖精,你怎样能证明这种行为是对的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受到一大群庸人的包围,数不清的迂腐的美女和讨厌的女学究想方设法要把我变成一头驴子?你知道,古代的瑟西把乌利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而这些现代的瑟西们实在文明,竟想把人变成驴子。在这样的情况

^① 见本卷第584—586页。——编者注

下,难道你就没有责任来搭救我吗?你小心我报复,我会同 Waradje^①一起搞阴谋来破坏你那宁静的心境。

“到亲爱的祖国去”^②——是句很好的名言,但是我可以完全信赖地告诉你,德国这个国度美妙得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至于我,要是我完全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以称作“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去这个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土”⁵⁴⁵、“教育”和“最聪明的人”。

在柏林,凡是有点血气,因而可能感到沮丧的人,当然都非常渴望有人同他们共患难。如果把完全笼罩着这个城市的苦闷,分给更多的人来承担,那末每一个人就有希望分担得少一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这个拉萨尔的埃吉丽亚,费尽心机要延长我在愚蠢的军阀制度的首都逗留的时间。昨天她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们之间有这么一段轻佻的谈话:

她:“只要一有可能,您就离开柏林,您是这样来答谢我们对您的友情吗?”

我:“完全相反。我把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延长得超过了预定的期限,正是由于您的殷勤使我舍不得离开这个撒哈拉。”

她:“那我要更加殷勤些。”

我:“那我就别无他法,只好逃跑了。不然我就再也不能回到伦敦,而天职在召唤我回去。”

她:“这是对一个女人的极好的恭维:她的殷勤竟至于把您赶

① 这个废弃不用的荷兰字(waaratje) (“真是如此”),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小说《映画镜》中一个人物的用语。这里大概是指牧师罗德黑岑。——编者注

② 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二场。——编者注

跑!”

我：“您不是柏林。如果您想向我证明您的殷勤是真摯的，那就跟我一起逃跑吧。”

她：“但是我怕您在头一个站就要把我扔下了。”

我：“我不能完全担保不在最近一站‘离别姑娘’^①。您知道，提修斯同希腊的美人^②逃跑后，在一个什么地方把她扔下了，这时巴考士神立即从奥林帕斯山降下，把被抛弃的美人抱在怀里，带到了一个永远欢乐的住处。因此，我不怀疑，有一个神已经在柏林外面的头一个火车站等候着您，如果我使您失去这样一次约会，那我就是一最残酷的人了。”

好了，逗趣得够了。说实在的，我一想到很快又能看到你和在博默耳的全家人，就感到非常幸福。代我向你的“情敌”^③问好，请告诉她，最深厚的感情是最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她正是应该这样来理解我的沉默，理解我直到现在还保持着的尊敬的沉默。

我的小迷人精，再见了，不要完全忘了你的漫游的骑士。

卡尔·马克思

① 套用古爱尔兰歌曲的叠句：“同我离别的姑娘”（《The girl I left behind me》）。——编者注

② 阿莉阿德尼。——编者注

③ 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

71

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曼 彻 斯 特

[草稿]

[1861年5月3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⁵⁴⁶

谨作为附件一寄上前些时候转交给我的图书管理员来信的抄本。我曾冒昧地就该信的措辞向施特塞尔先生提出某些意见,但不出所料,他回答我说,这封信不过是照理事会文学部规定的格式写的。

因此,我现在不得不向理事会提出有关的意见,但首先应当强调指出,这些意见丝毫不涉及信的内容本身。对信的内容,即要求严格遵守规定的图书借阅期限,逾期要“罚款”,总之要求遵守协会的规章制度——当然每个人都会同意。这里说的只是这个文件所用的语气。这种语气同有教养的人们之间通信时通常用的语气截然不同,而我,应当承认,不习惯于收受此类信件。施特塞尔先生也承认,对这种说得轻点是粗暴的方式感到惊奇的,我不是头一个。

的确,当我读完这篇作品的时候,感到好象突然回到了祖国。我觉得好象手里拿着的不是席勒协会图书管理员的信,而是德国某个警官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纠正某种过错,否则严加惩处的绝对命令。向我送达这一要求的职员身上那套通常看来是那么无害的制服,这次也使得我的错觉更加逼真了。

因此,我决定再重读一遍 1859 年 11 月 12 日仿佛是作为正在成立的席勒协会的纲领而发表的宣言。同上述图书管理员的信对照起来看,这个纲领就显得很别致。其中写道,席勒协会应当致力于:

“使年青的德国人……立即感到自己在这里象在家里一样……感到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受到‘较好的关怀和爱护’……而主要的是使他在回到祖国时不感到自己同祖国疏远”。

毫无疑问,这种公文中的官腔完全是用来使收件人立即感到自己是在家乡的土地上,而且不得不相信,他将象在自己的祖国,即在亲爱的宗法式的警察国家、这个保护和收养幼儿的巨大机构里那样好地受到“关怀和爱护”,如果不是“较好”的话。只要这种公文盛行一天,当然就不用担心席勒协会的某个会员会感到自己同祖国疏远。如果协会的某个会员例外地在祖国没有机会领略过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和当局的官腔,那末,席勒协会在这方面显然能使他大受教益。看来必须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包含在纲领里的如下诺言,即席勒协会将促使

“在已经比较成熟的年龄返回祖国的人们,除了德国语言和德国教育之外,同时还保持作为德国人和德国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的的能力,甚至使这种品质得到更大的发展”。

当然,很多会员未必料到过,“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为培养这种精神,席勒协会应当成为统一的中心),除了别的以外,还包含有官僚主义精神,这种官僚主义精神可惜在祖国还几乎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力,但是整个德国正在同它进行斗争,而且恰恰现在正在对它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种直接命令的语气,这种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命令的绝对要求,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如果在这同时威胁你的不是两星期饱尝铁窗风味的拘留,而是半克朗

的可怕罚款,那末它们又是很可笑的。

席勒协会会员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这种语气在他们听起来决不可能“象在祖国一样”。请问,这些会员收到这种命令的时候,他们对“德意志精神”会怎么看呢?

由于偶然的巧合,目前我是这里另外一个协会⁵⁴⁷的文学部的成员,这个部没有图书管理员,因此我本人就不得不经常给协会会员寄类似的通知。附录二⁵⁴⁸是通常写这种通知的式样。我决不妄想使这种格式成为范例,但是它也许能使您们相信,不必损害有教养的人们的互相尊重,也可以取得同样结果。

我再重复一遍,办事严格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协会会员也有权要求对他们态度温和。文学部的铁拳应该落到每个有过错的人头上,但是希望它戴上丝绒手套。所以我请求理事会关心一下,使文学部给协会会员的正式通信不要采取德国行政机构给下属下命令的格式,而要采取有教养的人之间通信的格式。

72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5月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表舅:

首先,应对你再次向我表示极亲切的感情和在你家里给予我殷勤招待,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为了避免阿谀的嫌疑,我只顺便提一下,同你这样有阅历的人交往给我带来了多么异乎寻常的

乐趣,你一方面是那么人道、公允和独特地看待世事,另一方面又完全保持了青年人的热情和火气。

我离开博默耳以后的旅行完全照原计划进行。我在鹿特丹的码头上遇见了雅克^①,同他闲谈了几小时,随后,就在当天,急忙赶到阿姆斯特丹,第二天在那里很快就办完了事情。奥古斯特^②和他的一家(这一次因从鹿特丹来了他的内侄女,他家里的人增多了)都很愉快和健康。奥古斯特还特别委托我回到鹿特丹以后稍稍激励一下雅克先生,他多少有点“厌世”,他之所以有这种毛病,不过是因为他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且在政治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使他自己满意的坚定的观点。我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晚上九点半到达鹿特丹,而且必须在第二天(星期日)早上七点再搭乘开往伦敦的轮船。在我和雅克一起度过的短时间里,当然不可能答复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甚至也不可能简略地分析他所提到的要点。因此雅克决定先同他的雇主们交换意见以后,再继续到伦敦进行讨论。我于星期一到达世界首都,看到全家都很健康愉快。雅克于上星期三突然来到我们这里,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于昨天早晨又离开我们了,尽管我们想留他在这里多住些日子。我们约定互相进行政治性的通信。

亲爱的表舅,你记得吗,我经常和你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培育大大落后于畜牧业。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全家,因此应当宣布你是**培育人的能手**。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家庭。你所有的孩子都有独特的性格,彼此各不相同,每一个都有特别的才智,而且个个都同样受到广泛的教育。

① 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

在伦敦这里,对美国的事变进程表现出极大的惊慌。不仅分离州,而且某些中部州或边界州都采取了暴力行动(人们还担心,所有八个边界州,即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北卡罗莱纳、田纳西、阿肯色、马里兰和德拉韦,都会投向脱离派方面),这些暴力行动使任何妥协都不可能了。毫无疑问,在斗争初期,南部会占优势,那里无产的白人冒险分子阶级成为作战的民军取之不尽的源泉。最后当然将由北部获胜,因为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出最后一张牌——奴隶革命。对北部来说,很大的困难是如何把军队调到南部去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季节,即使毫无阻碍,每天行军十五英里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应当攻击的最近地点查理斯顿距华盛顿 544 英里,距费拉得尔菲亚 681 英里,距纽约 771 英里,距波士顿 994 英里,而后三个城市是对付南部的主要作战基地。蒙哥马利(脱离派国会 194 的开会地点)距离这些地方相应地为 910 英里、1050 英里、1130 英里和 1350 英里。因此,我觉得陆上进军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北军进攻的部队利用铁路,那就只会使铁路遭到破坏。)这样,就只有走海路和进行海战了,但是这很容易引起同外国列强的纠纷。今晚英国政府将在下院发表声明,在这样的形势下它打算采取什么立场。

美国的事件自然使我个人遭到很大损失,因为大西洋彼岸的报纸读者现在除了他们本国的事情以外,对什么都不闻不问。不过我收到了维也纳《新闻报》提出的很有利的建议^①,一等某些还可疑的地方向我解释清楚,我就要接受。我得从伦敦给它写稿。我妻子特别反对迁居柏林,还因为她不愿意把我们的几个女儿弄到哈

^① 见本卷第 161 页。——编者注

茨费尔特的圈子里去,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使她们完全不同这个圈子接触。拉萨尔今天寄来一封非常友好的信。他还没有收到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关于我的恢复国籍问题的任何新的通知。据拉萨尔给我的信说,警察局和公众之间的冲突当前在柏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和我全家向你和你全家热情问好。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克思

7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5月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撒路:

经过种种不幸^①。我在旅行期间没有写信(在伦敦这里,在最初一个星期,我必须对我的鹿特丹的表兄弟^②扮演安斐特里昂的角色),这要怪伯爵夫人^③。她答应过我,在扎耳特博默耳我将得到她的相片和她的信。既然两者都落空,那我就坚决行使报复权,我也不写了。何况我在博默耳根本没有空闲时间。一方面我要同我表舅^④办事情,另一方面又要向我表妹^⑤献殷勤。先生,你明白,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卷。——编者注

② 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

③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④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⑤ 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

这样一来就顾不上写信了。在特利尔逗留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我母亲销毁了一些旧借据。此外,老太婆的机智及其坚定的平稳性格引起了我的兴趣。

现在谈谈钱的问题。暂且寄给你二十英镑;十英镑以后再还。情况是这样:我表舅给了我一百五十英镑现款,用来偿付5月初到期的期票。他答应过几星期以后再给我往伦敦寄一张新的期票。因此附上的二十英镑,以及少量用于家庭开支的钱,还有为了偿付德国一些零星债务所必需的钱,我是暂时向我的表兄弟借的。但是,如果我下欠的十英镑你马上需要的话,那就赶快告诉我。

我未能象最初打算的那样去曼彻斯特,因为我的鹿特丹的表兄弟决定紧跟着我来伦敦。借口是,他对同我进行政治讨论很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他是想同他的许多表姊妹认识一下。前天我写信给恩格斯谈了办报的计划^①,大概过几天就会收到他的回信。由于美国的事件,很可能,即使办报的事毫无结果,我还是要迁居柏林半年,或更久一些。当然,这只有在我争取到恢复国籍时才行。我不能否认,伦敦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虽然我在这个大巢穴里几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

顺便说说。布朗基还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巴黎),在那里**根据侦查员的指令**,他在肉体上遭到宪兵等的残酷折磨。他是利用大赦的机会,以一个商人代办的身分从这里去巴黎的,毫无阴谋计划可言。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下流报刊都企图封锁这整个案件。我已同深知案件始末的西蒙·贝尔纳约定在本星期六会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可能同厄内斯特·琼斯一起,举行

^① 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

公众集会,抗议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我同贝尔纳交换意见并弄清案件的详细情况之后,将立即通知伯爵夫人。但是我请求你不论通过什么途径立即在布勒斯劳的报纸上刊登一则关于这个阴谋的简讯。你知道,德国报纸是互相转载材料的。

现在从悲剧转到悲喜剧:你有没有在报上看到日内瓦工人在大白天打了法济的耳光?

科苏特在诉讼期间在这里表现得极可鄙。起初,他在他的 affidavits^①等中大话连篇,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却变得低声下气和卑躬屈节,怯懦和畏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动机的任何革命性,这样一来,他就由于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使原先对这种传奇剧演员抱有好奇心的公众不再对他表示同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议会就麦克唐纳案件¹⁸⁶进行的辩论?帕麦斯顿针对普鲁士的挑衅性演说,实质上只是为了消除(施莱尼茨提出的)英普同盟的主张。这里追求的是什么目的,甚至向你暗示都是多余的,因为你知道这事的经过。

托比·梅因在汉堡《自由射手》上一篇发自柏林的通讯⁵⁴⁹中写了关于我在柏林逗留的非常奇怪的消息。首先,说什么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向我提供了两万塔勒用来创办一家报纸。其次,似乎我曾妄想利用《福格特先生》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然而大失所望。最后,说我在绝望中把这件事情放弃了,“因为无论哪一个著作家”都不愿“同我打交道”。干得多巧妙,托比!

关于洛贝尔图斯的著作^②,它的倾向是完全值得赞扬的。至于

①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的效力。——编者注

②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编者注

其他方面,则好的地方不新,新的地方不好。然而罗雪尔是教授式学识渊博的真正代表。如傅立叶所说的是假科学。

不要忘了同布罗克豪斯^①商谈一下。将有十到二十印张——我决不能预先估计好篇幅。

而现在,亲爱的,我应当在最后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那么亲切友好地接待我和留我住宿,并且忍受了我的礼貌欠周的行为。你是知道的,我满脑袋是操心事,此外我又有肝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猴子是不笑的,因此,我们就显得是至善至美的佛陀了。

附上两张小相片,一张给伯爵夫人,请代我向她致最美好的祝愿,另一张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7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5月29日 [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已给在德国一个朋友^②写了信,希望他**最迟**过一个星期

① 见本卷第589页。——编者注

② 济贝耳。——编者注

就把下欠的十英镑(六十七塔勒)寄给你。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不愉快,但问题是,我的表舅^①,正象这种老头常有的那样,虽然一般是实践自己的诺言的,但总还是给我制造一些麻烦。

我给美国写的通讯^②,由于那里的情况暂时完全停止刊登了,一直要停到欧洲问题在大洋彼岸重新引起兴趣时为止。

在巴黎,由于美国的危机,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在里昂也一样。

所有的英国官方报刊自然都支持奴隶主。正是这些先生们,曾以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慈善言论使全世界都听得发腻。但是棉花啊,棉花!

恩格斯来这里作客三天¹⁷⁹。他目前还不准备迁居。如果他那么做,他就必须放弃职位,违反合同,损失一大笔钱。他说只有到决定性时刻才会那么做,不然,也许过三个月以后会落入普鲁士司法机关之手,对谁都没有好处。他认为,办报还不是时候。他非常感谢你的军事地图集。

在你转寄给伯爵夫人的那封信⁵⁵⁰里,我已把波拿巴如何无耻地对待布朗基的情况以及这整个案件的情况比较详细、比较确切地告诉了她。^③她大概告诉你了。请代我向她衷心问好。希望她恢复健康。

很想听到你同普鲁士政府谈判的详细情况。感谢你为我热心奔走。

为了排遣我因各方面不安定的情况而引起的恶劣情绪,我正

①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

在阅读修昔的底斯的著作^①。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

祝好。

你的 卡·马·

7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6月11日 [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请你将附上的信转交伯爵夫人。

你的书^②收到了，它是前几天寄到的，谢谢（相应的那几本我已立即转寄给曼彻斯特）。我从末尾，从皮拉斯基人的历史读起，然后再转到开头谈继承权的地方，现已读到第215页。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但是我只有在全书读完以后才能对它评论，提出某种意见等等。这里只顺便提一下：在印度收养子女是继承的]主要方式。英国的法经历了跟法国的法恰恰相反的道路。绝对的遗嘱自由（根据这种自由，没有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佬有义务给自己的家属哪怕遗留下一文钱）是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确立的，是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英国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此，绝对的遗嘱自由以及一般遗嘱——如果撇开它的地道的罗马起源等等不谈——看来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即使在资产阶级社

①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会里也具有不依赖于神话等等的独立的根源。

很遗憾,我接到德国的来信说,十英镑到月底才能转寄给你。那时以前,我要指望你的外交才能。你知道,听说我表舅^①在给即将到期的期票付款之后,对其余约定的款项又要拖延几个月支付,我是多么惊奇而又不愉快。然而对此不禁又感到可笑——这真是地道荷兰式的做法。

即使我不能恢复国籍,也还很难说我不会以“外国人”的身分凭我的护照携带家眷来柏林过冬。

祝好。

你的 卡·马·

76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7月17日 [伦敦]

亲爱的表妹:

希望你对我长久不写信不致发生误解。起初,我弄不准该往哪里寄信——往亚琛还是往博默耳。接着开始大忙,而最近两三个星期又患了极其讨厌的眼炎,这就大大限制了我写东西和看书的时间。因此,亲爱的姑娘,如果我承认有罪的话,那也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我相信你作为仁慈的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会加以考虑。不管怎样,如果你认为在这整个期间哪怕有一天我没有想起我亲爱的小

^①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朋友的话,那你就大大委屈我了。

我在柏林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你记得,当我在普鲁士首都逗留的时候,霍亨索伦当局似乎作了让步,甚至还给我发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护照。但是我刚一转身,拉萨尔就很吃惊地接到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一封信,说由于我“政治上不可靠”,不能给我“恢复国籍”。同时普鲁士政府宣布,所有离开普鲁士十年以上的政治流亡者都已丧失公民权,成了外国人,因而同其他所有外国人一样,只有得到国王恩准才能恢复国籍。换句话说,他们承认了他们的所谓大赦不过是欺骗、伪装和圈套。这是我在柏林逗留期间就竭力迫使他们做的,而这甚至连普鲁士报刊和普鲁士众议院也不能默然容忍。因此,这件事引起了报上的激烈争论和众议院对内阁的质问。这一次,内阁用一些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声明敷衍过去了,但是整个事件大大地促使德国人民对那个被柏林人轻蔑地称作“美男子威廉”的人所宣布的“新纪元”⁵⁵¹感到失望。拉萨尔以他惯常的顽强精神竭力想制服当局。最初他跑到策德利茨那里,大闹一场,男爵完全慌了手脚,把秘书叫来帮忙。几个星期以后,策德利茨由于柏林群众举行反对他的示威而被撤职,于是拉萨尔去拜访了策德利茨的继任者枢密官文特尔,但是这个“继任者”声称,他的“前任”的决定使他受到约束。最后,拉萨尔抓住内务大臣施韦林伯爵,后者为了摆脱我的代表的强烈抗议,答应把全部问题交给柏林市政府解决,然而这个诺言他未必会实践。至于我,那我至少已经取得了迫使柏林政府摘下自由主义假面具的成果。至于我返回柏林的问题,如果我认为在1862年5月以前需要去那里的话,他们不能阻挠,因为护照已经发给我了。要是我推迟返回,那末也许普鲁士的情况将变得我不需要他们批准了。

一个政府竟会由于害怕个别人而这样吵吵嚷嚷,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来,真是可笑。他们必定是可怕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同时,我有幸得到法国政府的特别关注。在巴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已经着手出版我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译本,这时德·培尔西尼先生下令禁止他继续出版这个译本。同时所有的巴黎书商都接到了禁止出售德文版《福格特先生》的一般警告。我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一篇巴黎通讯中才知道这一情况的^①。

我接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封十六页的信。我亲爱的姑娘,学这个榜样吧。她(当然由拉萨尔陪同)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浴场去了。他们将从那里去瑞士,在瑞士住一个月以后去意大利。她感到很烦闷,她认为她很可怜,因为她除了娱乐之外,无所事事。的确,对一个活跃的、精力充沛的、虚荣心又相当重的女人,在卖弄风情的岁月已成过去之后,这种处境是很不妙的。

顺便说一下,我从曼彻斯特给奥古斯特^②寄去了两卷拉萨尔的新的法学著作^③,我想知道邮件是否已经寄到。我没有得到雅克^④的任何消息。

亲爱的姑娘,我想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今年不会有机会到博默耳去看望你们,因为医生认为夏季的海水浴是她能用以消除她去年秋季患的那场可怕疾病^⑤的余毒的最好办法。另一方面,希望你

① 见本卷第171页。——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③ 葱·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④ 雅克·菲利浦斯。——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111—117页。——编者注

不要忘记你来伦敦的诺言,我们全家将很愉快地接待你。至于我,不必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事了。

我亲爱的小迷人精,希望你不要过于严厉,而要象一个好基督教徒那样,不对我的沉默太久进行报复,很快就给我来信。

请代我问候你父亲、我的朋友“小耶特”^①、医生^②、弗里茨表兄弟及全家人。

永远是你的最真诚的崇拜者 卡尔·马克思

谋刺普鲁士陛下——也就是美男子威廉——的消息使我十分惊讶。⁵⁵²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杀一头没有头脑的蠢驴呢?

77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③7月22日 [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应该原谅我很久没有写信,因为有各种“减轻罪过的情节”。第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能把我的财务料理好(尽管在这方面得到了各种许诺),特别使我遗憾的是,下欠的十英镑还没有能偿还你。

① 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

② 阿·范·安罗伊。——编者注

③ 手稿为:“1862年”。——编者注

第二,我患极其讨厌的眼炎已经几个星期了(前几天才好转),这严重妨碍了我书写或阅读任何东西。

首先我要感谢你为我恢复国籍而奔忙。我们至少做到了使普鲁士政府声誉扫地,并且使它的所谓大赦^①失去意义。我认为,奥·贝克尔的可笑的谋刺行为(从报上看不出他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将大大促使“新纪元”以恐怖告终。

你的著作^②的第二卷我已读完(当我要开始读第一卷的时候,眼病妨碍了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我是从第二卷读起的,因为我对这一主题比较熟悉,但这并不妨碍我以后通览全书。

对我上次信^③中匆匆所作的评论,你有些误解,这显然要怪我表达得不好。首先,我理解的“遗嘱自由”不是立遗嘱本身的自由,而是立遗嘱时对家属丝毫不加考虑的自由。这样的遗嘱在英国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毫无疑问,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罗马法学中借用来的。英国人在很久以前就不是把根据血统关系的继承当作准则,而是把根据遗嘱的继承当作准则,这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看出来,即早在中世纪初期,如果家长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那末他的妻子和孩子只能得到法律所规定的那份遗产,而根据情况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交与教会。教士们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要是他立遗嘱,那末他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会把一定数量的遗产留给教会。总之,就这方面来说,在中世纪遗嘱无疑具有宗教的意义,立遗嘱不是为了还活着的人,而是为了死人。但是我要提请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在1688年革命以后曾取消了在那以前在家属继承

① 见本卷第144—145页。——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02—603页。——编者注

权(这里,我当然不是说封建所有制)方面法律加在遗嘱人身上的限制。毫无疑问,这是适合于自由竞争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本质的;同样毫无疑问,多少经过修改的罗马法为当代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里的人关于自己的法的观念是同罗马法中的人的观念相一致的(这里,我完全不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即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

你证明罗马遗嘱的袭用最初是(至于照法学家的科学理解,那末现在也还是)建立在曲解上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形式的遗嘱——不管现代法学家据以构想遗嘱的罗马法被曲解成什么样子——是被曲解了的罗马遗嘱。否则,就可以说,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作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東西,例如所谓的责任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

这样的问题,譬如说,英国人在没有罗马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他们的遗嘱(即使它是直接起源于罗马的遗嘱和适应于罗马的形式,

但终究不是罗马遗嘱),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要是我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又会怎样呢?譬如说:遗赠(而现代所谓的遗嘱无非是使主要的继承人实质上成为全面的遗赠受领人)⁵⁵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不能自动产生出来,而同罗马无关吗?或者说,不是产生出遗赠,而是产生出一种仅仅由死者对财产作出的书面的处置就不可能吗?

说希腊的遗嘱是从罗马输入的,我看这点还没有得到证实,虽然十之八九是这样。

你大概知道,对布朗基的判决(这是所有判决中最可耻的判决之一)在第二审级批准了。¹⁸⁸我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布鲁塞尔朋友^①给我来信。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我在著作完成时,对布罗克豪斯还要考虑一下^②。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把我的手稿拿出去碰过运气。

① 瓦托。——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89、600页。——编者注

78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9月24日 [伦敦]

亲爱的表妹:

你应当原谅我今天只给你写这几行。因为我要为自己保留几天以后给你写封“真正的信”的乐趣。现在我只是想通过你的盛情协助了解一下,奥古斯特^①是否终于收到了拉萨尔的著作^②。拉萨尔为这事又写信来烦扰我——要知道,他自然把“他的著作”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要求我立即复信,所以我不得不又来找你。如果你尽快地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

顺便提一下。书应当是从曼彻斯特,而不是从伦敦寄给奥古斯特的,不过我得到保证,它已经从曼彻斯特寄往阿姆斯特丹了。当然,如果书“遗失”了,我丝毫也不会介意,因为奥古斯特自然不会因为没有“这部著作”而受到什么损失。但是出于礼貌我应当进行这个调查。

在给我写信时,你当然会友好地同时告诉我,你现在在干什么以及其他的情况,因为你知道,有关你的一切情况我是多么感兴趣。

向你的父亲和全家热情问好。

永远是你的最真诚的崇拜者 卡·马·

① 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79

马克思致路易·瓦托⁵⁵⁴

布鲁塞尔

1861年11月10日 [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之所以对您最近几封信答复得这样迟,是因为每天等您认识的那位夫人^①的消息。终于有人通知我说,她在几个月以前去意大利了,但是很快就会回到柏林。

如果给拉^②的第一封信没有寄到,那我想是因为地址弄错了。那里把经过南安普顿写成经过直布罗陀。我发现这个错误以后,在第二封信上就改正了。我不只是贴了邮票,而且寄了挂号信。现附上英国邮局的收据。

我寄给您的五十法郎是由德国工人的俱乐部^③募集的。在下次信里我将给您寄上第二批捐款。您收到后,请通知我一下,并把您的小册子^④寄几本来,作为交换。

如果您给我写封信来(这封信我可以寄往柏林),并且在信中指出为……^⑤所必需的资金,那会有好处。我将把它转寄给有关的人。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拉康布尔。——编者注

③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

⑤ 看来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①的命运。

祝好。

卡·马·

^① 指布朗基。——编者注

1 8 6 2 年

80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
伦 敦

[1862年]1月15日 [于伦敦]

亲爱的维贝尔：

我刚收到乌尔卡尔特邀请参加下星期一举行的群众大会⁵⁵⁵的入场券。

附上的三张入场券中，一张是指定给你的。你也可以凭券带你的朋友去。余下的两张请转交工人协会^①（凭券入场可以不拘人数）。

同时，——因为我手头没有协会的地址，——如果你通知那里一声，我由于要参加群众大会不能在星期一去讲演⁵⁵⁶，那你就帮了我的大忙。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81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2年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唯一原因是我无力帮助您。由于美国内战，我有整整一年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后来（几个月以前）这个“企业”又开张了，但是规模已经“缩小”很多。⁵⁵⁷至于熟人，他们当中哪怕稍微有点钱的人也不多。例如，关于您的情况，我早已写信给济贝耳¹²⁵，但是我从波克罕那里听说，他根本不和人通信。在曼彻斯特，所有能动用的钱不幸都已经被几个“到合众国去为正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冒险家”花光了。

关于推销您的著作⁵⁵⁸一事，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成功的希望很少。那些参加各种协会（根本没有基金的工人教育协会除外）的无耻之徒，全都是立宪派，甚至倾向于普鲁士民族联盟¹⁸。这些家伙宁肯拿出钱来阻止出版您那样的著作。您当然知道，这些德国人，不论是年青的还是年老的，都是绝顶聪明的、稳重的和讲究实际的人，象我和您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至今还没有治好革命幻想病的幼稚的傻瓜。

国内的无耻之徒同国外这里的一样坏。我在柏林等地的时候^①就确信，要想通过文字来影响这群无赖是完全徒劳的。这些家

① 见本卷第160—170页。——编者注

伙把他们的可怜的报刊当作一种长生不老的妙药,他们那副扬扬自得的蠢相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此外,还有那种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大捧**是唤醒德国米歇尔的唯一手段,他们自从丧失了自己的哲学幻想并致力于赚钱和建立“小德意志”⁸⁷及“实际的立宪主义”以来,现在简直成了庸俗无能的小丑。德国实在只不过是……^①收容未老先衰的孩子的幼儿园^②。

《海耳曼》是普鲁士王国前检察官海茵茨曼的财产,它宣扬“上帝保佑国王和祖国”、“小德意志”的某些东西和有节制的自由。那位和您同姓的在该报写文章的莱比锡人贝克尔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并不很有影响,譬如说即使要他帮助我们推销书,也还没有能力。恩格斯好几个月不在家了,前几天才回到曼彻斯特。他和沃尔弗(布勒斯劳人)^③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而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侨民,人虽很多,但除了上面所说的人和另外三四个人外,也是象其他地方那样的庸人。

至于《福格特》^④,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德国,各种报刊对这本抨击性著作几乎完全保持沉默,但如果它即使在瑞士能发生一点影响,那我当然只会感到高兴。法文译本——事先我不知道——在巴黎已经译出,并开始印刷,但是由于皇帝的敕令^⑤,自然也就消失了。因此,实际上并没有法文版。

请您相信,亲爱的朋友,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斗争中对您这样的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套用海涅的诗《安心》中的一句诗。——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171和605页。——编者注

人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时，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了。您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您的旺盛的精力和您的活动使我惊叹不已。古人——好像是埃斯基涅斯——说过：要帮助贫寒的朋友，必须谋取人间的财富！这句话闪烁着多么深刻的人类智慧啊！

就推销书的事我与各方人士接洽的结果，将于最近告诉您。

再见。我妻子要我代向您致最好的祝愿。

您的 卡·马·

8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4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老伙计，你大概很生我的气吧，但是你又对，又非常不对。我一天天拖延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天天期望把我的财务理出一个头绪，至少可以将我欠你的十英镑还给你，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给你写信。然而情况却一天不如一天。我同《论坛报》本来又有了来往，只是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但后来它终于辞退了所有的外国撰稿人。这一来我就完全悬在空中了。我不想向你诉苦而惹你讨厌，但是我毕竟还没有发疯，这倒也是怪事。我提这些糟糕的事情，只是为了不至于在我的其他不幸之外，再加上你的误解。

你上次来信中所说的关于约·菲·贝克尔的情况，是完全不真实的。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只是靠道听途说。他从1830

年起就是德国最高尚的革命家之一,除了说他有一股不顾客观情况的热情以外,对他是无可指摘的。至于他和意大利人的关系,我**这里保存着**奥尔西尼的挚友^①的文件,不管意大利人甚至加里波第本人怎么说,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容置疑的。至于他同图尔的关系——对于这个人,我早在1859年以前就在这里《自由新闻》上揭露过⁵⁵⁹,——情况如下:在巴登战役⁵⁶⁰期间,贝克尔提升图尔为中尉,因此他们就有了一种同志的关系。假如贝克尔愿意利用这种关系,并且接受图尔在巴黎当着我此地一个朋友^②的面向他提出的建议,那末,他就不至于在六十岁时还过着他现在实际上所过的痛苦生活。贝克尔得到的极其少量的资助,其来源我是完全确切知道的。帮助他的人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他同一部分意大利人确实已经断绝往来,因为他的强烈的条顿人的感情使他不同意某些对他**优待**的计划。对贝克尔这样的人如此卑鄙地进行诽谤,真是令人愤慨。

至于**我的书**²⁵,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最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此外,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而且德国读者当前正做着远为重要的事情。

至于你的著作^③,——当然现在我已全部读完,而且有几章还读了两遍,——我注意到,你似乎没有读过**维科的《新科学》**。你在

① 看来是指西蒙·贝尔纳。——编者注

② 席利。——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那里当然找不到与你的直接目的有关的东西,不过这本书还是有意思的,因为与法学市侩对罗马法的精神所作的理解相反,它对此作了哲学的理解。原著你未必能够利用,因为该书甚至不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而是用非常费解的那不勒斯方言写的。我介绍给你一个法文译本:《新科学。论天主教教条的形成一书的作者译》。巴黎,夏邦提埃出版社1844年版。为了引起你的兴趣,我在这里只引如下的一些话:

“古代罗马法是一首庄严的长诗,而古代法学是严肃的诗歌,其中隐藏着法律的形而上学的最早而初具规模的萌芽……古代法学是极富于诗意的,因为它把已完成的看作是未完成的,把未完成的看作是已完成的,它把活人看作是死人,而把死人看作是成为遗产的活人。拉丁人称英雄为 heri,由此产生了 hereditas^①这个词……继承人……在遗产方面代表死去的家长。”

在维科那里,以萌芽状态包含着沃尔弗(《荷马》^②)、尼布尔(《罗马帝王史》^③)、比较语言学基础(虽然是幻想的),以及还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他本人的法学著作,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弄到。

在当前我所处的情况下(我处于这种情况几乎已有一年了),只是现在我才有可能很快就来评论你的著作。而我却非常希望——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妻子——你在我尚未寄给你等价物之前,把关于政治经济学^④第一部分的意见送给布罗克豪斯刊登。

① 遗产。——编者注

② 弗·奥·沃尔弗《荷马绪论》。——编者注

③ 巴·格·尼布尔《罗马史》。——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行径,没有比它在这次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伟大斗争中的行径更可耻的了。相反的,最受内战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却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英勇和高尚过。人们要是象我那样知道在这里和曼彻斯特用来煽动工人去示威的种种手段⁵⁶¹,那就会对此更加感到惊讶。他们还掌握着的唯一的大型机关报——卖身投靠的坏蛋雷诺的《新闻报》^①——被南方佬收买了,他们当中最有威信的指导人也同样被收买了。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

万哈根的著作^②我很感兴趣,而且我懂得,它的出版是多么及时。关于此事,我恳请你向柳德米拉转致我的祝贺。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给万哈根较高的评价。我认为他是个平凡、无聊、浅薄的人。他对大使馆参赞克勒的憎恶,是因为他看到了与他类似的人而惊恐。

谋杀国王的西蒙·贝尔纳的来信附上,阅后请退还给我。你看干这种事有用吗?我看没有用。

请代我向伯爵夫人^③衷心问好。我不久将专门写封信给她。希望不写信这样的小事不致引起她的误解,并且请她相信我对她永远怀着好感并且衷心钦佩。

你的 卡·马·

① 《雷诺新闻》。——编者注

② 万哈根·冯·恩赛《日记》。该书由柳德米拉·阿辛格整理出版。——编者注

③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83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 巴 门

1862年6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济贝耳：

你真行，虽然我对你寄来的各种信件和邮包采取不答复的做法，但你还是把你小女孩出生的消息告诉了我。为此，我向你致最衷心的祝贺。希望她给你带来不少欢乐。你夫人身体好吗？

这里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我渐渐觉得，这种平静的资产者生活会使人道德堕落，失去一切干劲，变得十分懒散——这几天我甚至又看起小说来了。

不客气地说，所谓的席勒协会⁵⁴⁶（也叫耶路撒冷俱乐部）已经变成纯粹犹太人的机构，那里从一点半一直吵到三点钟，简直会把人弄得发狂。这个高贵的机构我几乎不再去了。犹太人往往是这样，起初他们因有了席勒俱乐部而感谢上帝，但是一旦进去了，就说什么他们觉得还不够完美，于是想要建造一座大房子，一座真正的摩西庙宇，一切都应该搬进去。这自然是一条破产的捷径。而你却还得为此写篇开场白，并且担任导演！这就是所谓德意志民族机构！等着瞧吧，过上两年你就会接到通告：“鉴于寿终正寝的席勒协会的破产”云云。

“鉴于”你的几次来信，我想简短地告诉你以下的情况。关于马克思，如果我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的话，他当然不会求助于你。而情

况正是这样,当时我毫无办法。关于红色贝克尔(他的小册子^①我非常感兴趣,一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放弃了他过去的“怪异的”主张,一则是由于普鲁士政府竭尽全力使这个家伙变为当地的名人并借此使他成为议员),实质上我们同这个人没有关系。他从来就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一派,他一向只不过是民主主义者,而他之所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中受牵连,那只是因为他把这件事当作宣传手段。在审判期间,他完全脱离其他的被告,采取了独特的立场。从那时起,他很明显地成了普鲁士皇家民主主义者,主张君主制度等等。⁵⁶²所以,在政治方面我们同这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当然,在我们同他的拥护者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以前,这并不妨碍我个人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目前的普鲁士议院来说,他总是个非常好的人。

好象我在巴门同你谈过一支短小的丹麦民歌⁵⁶³,它是我在一本《英雄诗歌集》中看到的,现在专门为你译成德文诗。随信附上。可惜我没有能充分表达原文那种无拘无束、泼辣欢乐的调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活泼的一支民歌。可是,你只好满足于这个译文了(其实,几乎是逐字逐句译出的)。我想,这篇小东西还没有人译成德文。

向你夫人衷心问好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海·贝克尔《我作为议员候选人》。——编者注

8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6月16日 [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布赫尔确实给我寄来了三本《尤利安·施米特》^①,但是你所提到的其他著作^②连一本也没有寄来。况且“施米特先生啊,施米特先生”(我已把指定给恩格斯和沃尔弗的两本转寄给他们了)来得正是时候,恰好我处于绝不愉快的心情之中。此外,我虽然没有读过施米特的什么著作,而只是翻阅过很少的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是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也是那么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趋炎附势的化身,心里对他很反感。你暗示你的抨击只是间接地针对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庸人,这很对。这次可以说是:打驴子,吓麻袋^③。既然我们暂时还不能打麻袋本身,那末把他的有教养的驴子当中最好叫嚣和最厚颜无耻的那几头的脑袋砍掉,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当然,是用笔去砍,虽然可怜的梅因在《自由射手》上^④认为这种“玩弄断头台的笔墨游戏”既野蛮又幼稚。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士瓦本宝鉴》和希腊的“七贤”——差一点说成《七个士瓦本人》了。⁵⁶⁴

① 斐·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费希特的哲学和德国人民精神的意义》。《论宪法的实质》。——编者注

③ 古谚是:“打麻袋,赶驴子”,这里是把意思反过来用。——编者注

④ 爱·梅因《柏林来信》。——编者注

顺便说说——谈到尤利安·施米特，格拉博夫分子尤利安⁵⁶⁵（不过使用这个名字好象是暗指背教者，至少有些嘲笑另一个尤利安^①的味道，而这是不公正的）我再随便说几句，——以前我曾对 $\alpha\phi\acute{o}\varsigma$ ^②作为希腊哲学的富有特色的面具（在这里面具是从正面意思来说的）很感兴趣。最初是作为先驱者，作为神话中的英雄的七个土瓦本人或七贤；后来在中间的是苏格拉底；最后是作为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及怀疑论派的理想的 $\alpha\phi\acute{o}\varsigma$ 。后来使我感到开心的是，把这种 $\alpha\phi\acute{o}\varsigma$ 同他的摹拟品（在某些方面），即十八世纪的法国“智者”之间作比较。然后是 $\alpha\phi\iota\sigma\tau\eta\varsigma$ ^③作为 $\alpha\phi\acute{o}\varsigma$ 的必要的变种。对于现代，特色是在人民的意识中，只有诡辩论者保存了 $\alpha\phi\acute{o}\varsigma$ 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性格和知识的希腊式的结合。

为了尤利安——不是格拉博夫分子尤利安，而是背教者尤利安——不久以前我同恩格斯发生了争吵，争论刚开始我就看出就实质来说恩格斯是对的。但是我对基督教怀有十分特殊的厌恶心情，所以我有点偏袒背教者，并且不愿把他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或其他什么浪漫主义的反动分子等量齐观，甚至不愿意作相应的修正。不知你是否也有诸如此类的感受？

你就洛贝尔图斯和罗雪尔提出的警告，使我想起还应该从他们的著作中作些摘录，并对摘录下来的东西加点评语。关于洛贝尔图斯，我在给你的第一封信中^④对他所作的评价并不完全公正。他

① 指罗马皇帝背教者尤利安。——编者注

② 智者。——编者注

③ 诡辩论派。——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 599—600 页。——编者注

的书^①中确实有很多好东西。只是他想创立一种新的租的理论的企图,可以说是近乎幼稚的,可笑的。在洛贝尔图斯看来,在农业中是并不计算原料的,因为洛贝尔图斯断言,德国农民自己并不把种子、饲料等等列入开支,并不计算这些生产费用,也就是说**计算得不正确**。按照这种理论,在农场主已经正确计算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就**根本**不应该有地租存在。由此应该得出的并不是洛贝尔图斯所得出的那种结论——租佃者所以缴租是因为他们的利润率高于工业中的利润率,——而是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缴租是由于计算得不对而使他满足于较低的利润率。不过单是这个例子就使我意识到,不太发达的德国经济关系必然要在头脑里产生混乱。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就其目前的表述方式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对它提出的一切异议,要么由于不理解,要么充其量不过是表明,特定的现象乍看起来是同李嘉图的理论不相符的。但是后一种情况决不能推翻这种或那种理论。为反对李嘉图而提出的正面理论却更要错误一千倍。虽然洛贝尔图斯先生正面去解决也是那样幼稚,但是其中包含有正确的倾向,不过要评述这种倾向,这封信就太冗长了。

至于罗雪尔,我要过几个星期才能研究这本书^②,并对它简单地作些评语。我只得把这个好汉保留在附注里。这样的学究是不配放在正文里的。罗雪尔无疑掌握有大量的——往往是完全无用的——文献知识,虽然就在这一方面我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他是哥丁根的门徒,对文献宝藏并不了如指掌,而只知道所谓“正式”文

①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编者注

②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

献,是个可敬的人物……但是姑且撇开这一点不谈,一个博览数学群书但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多么扬扬自得、妄自尊大、老奸巨猾的折衷主义骗子。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从来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①,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末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但愿他不要使用任何虚伪的狡猾手段,而是率直地说:这里有矛盾;一些人是这样说的,另一些人是那样说的,而我对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看法;现在看看诸位自己能不能弄清楚!要是采取这种态度,学生们一方面就会得到一些资料,另一方面也会推动他们独立进行研究。当然,我在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同这个学究的本性相矛盾的。他的根本性的特点是他对问题本身并不理解,所以他的折衷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各处搬用现成的答案,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是不正派的,他总是重视对他有好处的那些人的成见和利益!跟这样的精灵鬼比较,甚至最坏的流氓也是可敬的人。

再说一说托比。如果你认为可以利用一下托比·梅因,那就利用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和蠢货搞在一起,如果不采取许多预防措施,那会大大损害自己的声誉。

我们人数确实很少,但是我们的力量也正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在这里看到你。我自己就不用说了,这对我一家也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为自从我的那些英国的、德国的和法国的熟人迁出伦敦以后,全家几乎完全没有见过什么“人”。**马里奥**我没有见到。“朋友”布林德显然警告过他,叫他不要到“这样可

^①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编者注

怕的人”那里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85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伦 敦

1862年7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我早就该写信给您，感谢您不止一次地惠寄给我东西。我多次想这样做，但最近一年半来，我忙于可爱的商务，以致各方面的私人书信来往受到严重妨碍。得悉您在伦敦以后，我早在上星期六就很有想去那里，但实在无法分身。现在我准备在星期五晚上到那里去，但能否实现这个计划，还说不定。只要稍有可能，我就这样办，并在星期五中午打电报给马克思。要是不能成行，您能否在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早晨到这里来住几天，看一看这个棉纱窝？那时我们还可以参观一下利物浦，那个地方是值得一去的，尤其是因为您是搞政治经济学的。我的住所里有一个房间可供您使用。您乘火车只需五个半小时。

总之，这件事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星期六我不能脱身，那就请您迅速作出决定，于星期六早上九点钟从伦敦出发，两点四十五分您就可以到达这里。其余一切，等到了这里或那里时再面谈。

顺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8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为了使危机哪怕是延缓几个星期，恩格斯通过波克罕在你名下开出一张四百塔勒的期票，为期三个月，从8月12日算起。^①他在到期以前给你寄去兑付的钱。然后期票再延期到1月1日，那时候恩格斯就会寄给你三百塔勒，其余一百塔勒，照你所答应的，就由你自己承担。

现在需要的只是，由你承兑恩格斯开出的期票。这总共是六十英镑，所以还救不了我。但是至少可以暂免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且这段时间也许还可以找到出路。

我真是如坐针毡，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工作受到妨碍。

现在有了重新给美国佬的报纸^②撰稿的一点希望。

你在哪里？

在干什么？

你的老头子^③近来怎么样？

我和全家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78页。——编者注

② 《晚邮报》(见本卷第265和277页)。——编者注

③ 斐迪南·拉萨尔的父亲海伊曼·拉萨尔。——编者注

8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维尔德浴场

1862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短信寄到柏林去了。今天才知道你在维尔德浴场。因此，我把这封你大概接不到的短信的意思用几句话重述一下。

为了延缓我缺钱的灾难，恩格斯8月12日通过波克罕在你名下开出一张六十英镑(四百塔勒)的期票。期限是三个月，从8月12日算起。这张期票波克罕在这里给我贴现。恩格斯在到期以前把兑付的钱寄给你。(然后他把这张期票延期到1863年1月1日，那时候再把该付的四十五英镑寄给你，你则如你所提出的付出十五英镑。)现在重要的只是要由你承兑。波克罕已立即把期票寄往柏林，大概在本周末或下星期初就可以寄回来。那时，马上会把期票寄给你承兑。要是你能给伦敦托钵僧寺大街27号西·路·波克罕打这样一个电报：“同意承兑弗·恩格斯先生六十英镑的期票”，那我将非常高兴。这是为了使波克罕能够顺当地贴现期票。拖延的危险，其严重性对我来说不是信中所能表达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88

马克思致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
威廉·什瓦尔茨
伦 敦

1862年8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本人是维也纳《新闻报》驻伦敦通讯员，特请惠寄一张采访证，以便参观博览会。

一个月以前，《新闻报》编辑部已约请我撰写几篇关于博览会的一般报道，但因其他事务缠身，只有现在才能着手做这件事。⁵⁶⁶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8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苏 黎 世

[1862年]8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认为你虽然在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和意大利旅行，但还是会在苏黎世逗留几天，或者无论如何也可以在那里得到留局待领的信件。为了更可靠起见，我还通知了吕斯托夫先生，说我往苏黎世

给你写了留局待领的信。¹²⁵

不管我的“处境”怎样,如果你名下开出的期票不是已经在柏林“迈耶尔兄弟银号”手里,那我一定会把这桩事整个取消。诚然,这同我们已经说好了的有些矛盾,因为波克罕起初答应我在你返回柏林以前不把期票拿出去。不过我不觉得整个这件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我认为,在这第一张期票上写你的名字,只不过是一种**手续**,根本没有想到同你“个人生存”会有什么关系,或者会导致日常生活上的某种不幸。我认为恩格斯对四百塔勒这个“数目”担保,这本身“无论如何”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付款期限”,我知道在钱的事情上,特别是在票据事情上,恩格斯的特点是**绝对的“准确和认真”**。否则我就不会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了。

但是要在波克罕心目中保全我和恩格斯的面子,现在就不能取消这件事,所以后天我就把恩格斯的书面保证^①寄给你。信从曼彻斯特打个来回要花三天时间。你**一收到这个保证书**,最好就给“迈耶尔兄弟银号”(这是柏林一家商号的名称,恩格斯的汇票就存放在那里)写封信,说你**一回来**就承兑期票。

再说一遍: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我很抱歉,这是太造次了,其原因是你我双方都忽视了许多先决条件。

仍然是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 631 页。——编者注

90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8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按您的愿望,我确认(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您名下开出的四百塔勒期票到期(1862年11月13日)之前八天,我保证把兑付的钱汇到柏林;如果您能够通知我,应向哪个银行家支付这笔款子,那我在11月5日以前就以您的名义把这笔款子汇到那里。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91

马克思致威廉·沃尔弗
曼 彻 斯 特

1862年10月4日 [于伦敦]

亲爱的鲁普斯:

你大概已经收到《巴门日报》及其全部刊录。⁵⁶⁷这里附上的《爱北斐特日报》的摘录,是济贝耳刚刚给我寄来的,并且还提到:《巴门日报》刊载的文章的确已在《下莱茵人民报》及《马尔克区人民报》(该报在哈根出版)上转载。

恩格斯回来没有?²⁶⁸

祝好。

你的 卡·马·

9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11月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弗莱里格拉特今天寄给你六十英镑作为兑付期票的钱。我在这次办理期票的同时向你提到的期票延期这一点,只不过是说,波克罕从我这里收到一张你名下的期票,数目是一百塔勒,即十五英镑,期限是两个月,从开出之日算起(期票签发的日期是11月6日,所以应该在1863年1月9日左右付款)。

从你偶尔给我寄来的几行字中间,我看出你还在生气;就连信的格式本身也说明这一点。

全部问题在于,你在这件事情上又对又不对。你要我把你从巴登的来信抄一份寄给你。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使你能够证实,你的信本身能否成为我那封寄往苏黎世的信^①的原因吗?但即使把你的全部分析能力都考虑进去,你能用你的眼睛发现我的眼睛所

^① 见本卷第629—630页。——编者注

读到的东西吗？特别是你能从信中看出我的眼睛读信时我所处的情况吗？要向我证明我不对，你必须首先使这两个读信的人变得一样，其次还必须使他们所处的条件变得一样，但是你在这样做时，你还是处在拉萨尔地位的拉萨尔，而不是处在马克思地位的马克思。因此，这只能导致新的分歧。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能力是多么无能为力。你把我没有设想的东西强加在我身上。我所设想的东西，无论如何当然是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如果照字面来解释那封信，你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信的字里行间所包含的意思，无论如何我比你清楚。你甚至猜想不到我为什么这样气忿。原因在于，从你的信中我意识到（在比较冷静地重读了这封信以后，我相信这是不正确的），似乎你怀疑我是否真的征得了恩格斯的同意。我承认，我在我的信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承认——撇开我们的私人关系不谈，单就事情的实质来说——这是一种荒谬的推测。然而我在给你写信的时候却觉得就是那样。其次，我承认，我在那封信中没有把我的真正怨气吐露出来，也许甚至连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而这恰恰成了误会的根源。但是对任何激情的诡辩也正是这样。

总之，你对我的信的解释无论如何是不对的；我也不对，因为我写了这封信，从而提供了引起误解的理由。

我们应不应该为这件事而完全决裂呢？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象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象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

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①,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

在那以后,我曾经到大陆——荷兰、特利尔等地——去安排自己的事情。²⁷¹但是一无所获。

我本想把罗雪尔的书^②寄给你,但后来发觉,邮费就得花十先令,就是说即使不同书本身的价值相当,也同它的价格相当。但我希望很快就有寄书的机会。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表兄弟^③写信给我说,在他恳求下,一位最博学的法学家将在阿姆斯特丹的法学杂志上对你的书^④作详细的评论。

祝好。

你的 卡·马·

将近一个半月以来,我完全没有可能写作自己的书^⑤,就是现在工作起来也还是时断时续。但这种情况总算很快就要结束了。

① 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

②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

③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④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617页。——编者注

93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2年12月15日 [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随信“附还”那五英镑，非常感谢。迟了五天，请原谅。由于我姐夫罗·施马尔豪森突然意外地死去，我在特利尔的亲人心情十分沉重，从而给我的钱晚了。

我在棉花贵族统治和亲奴隶制狂暴行为的中心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逗留了几天。²⁸⁸在这些城市的广大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圈子里，可以看到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理性的最大错乱。

日内我要到你的营业所去一会儿，因为有一件著作方面的事情需要和你谈谈。

《一个信徒的话》⁵⁶⁸，我最近就答复。

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9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⁵⁶⁹

汉诺威

1862年12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不久以前，弗莱里格拉特转来了他收到的您的一封信。我本应早些回信，但由于家里一连串不幸事情，我在一段时间无法执笔。

我很高兴地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和您的朋友对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抱有十分强烈的兴趣。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⁵⁷⁰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拖延很久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1860年福格特的丑事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必须对那些本身毫无价值的琐事进行大量调查，打官司等等。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我失去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纽约论坛报》。我给这家报纸撰稿，直到现在还没有恢

复。因此,为了不致使全家真的流落街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从事大量的零星工作。我甚至下决心做一个“务实的人”,并打算明年年初到一个铁路营业所去做事。但是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没有谋得这个差事,我不知道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您可以看到,我时间很少而且也不大能安静下来从事理论工作。很可能就是由于同样这些原因,我的著作付排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将拖延得比我预期的还要久。

至于说到出版,我无论如何不把第二卷交给敦克尔先生了。第一分册手稿,他是1858年12月收到的,可是到1859年7月或8月才出版。我倒是希望布罗克豪斯能印这本书,但这个希望并不太大。整个这伙德国文化流氓赏赐给我的沉默的阴谋——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光靠谩骂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对于我的书的销路将产生不利的影晌,更不用提我的著作的思想的传播了。等手稿修饰好并誉清后(1863年1月就着手),我马上就亲自把它带到德国去,因为当面和出版者交涉,事情好办一些。

我完全有根据希望,等我的著作的德文版一问世,法文版也会在巴黎准备好。我自己是绝对没有工夫去搞法译本的,况且我打算或者用德文写续篇,即结束资本、竞争和信用的阐述,或者为英国读者把头两本著作压缩成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在国外获得承认以前,不能指望它在德国产生什么影响。第一分册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要是风暴更甚的时期一旦到来,就可以再找到相应的色彩

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这些题目。然而,我无论如何曾经期待德国的专家学者们即使纯粹出于礼貌,也不会完全一致地无视我这本书。此外,我是有极不愉快的体验的:德国党内的朋友虽然长期研究这门科学,在私人通信中又过甚其词地赞扬我的第一分册^①,但就是不愿意稍微费点力气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或者哪怕是内容简介。如果这就是党的策略,那末坦白地说,这个秘密我是理解不透的。

您若有便写信告诉我一些祖国的现状,那我一定很高兴。看来,我们正迎向一次革命,我从1850年起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⁵⁷¹第一幕将是绝对不令人愉快地重演1847—1849年间的那些蠢事。

但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1 8 6 3 年

95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
伦 敦

1863年4月22日于 [伦敦] 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维贝尔：

你能不能向贷款社做我的保人(为十五到三十英镑作保)? 我本来不想以此来麻烦你, 但是因为:

(1) 这件事纯粹是办一个手续, 你不必冒任何风险, 因为在 7 月初我就可以从亲戚那里收到二百英镑;

(2) 平常做我第二个保人的普芬德突然必须到曼彻斯特去几个星期。

除了我家里的病人以外, 我自己也有好几个星期受周期性肝病之苦, 弄得简直不能握笔。因而为协会写东西的事也耽误了, 这自然使我比协会本身更加烦恼。⁵⁷²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96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1863年12月15日星期三
于特利尔“威尼斯”旅馆

我亲爱的、热爱的燕妮：

我来这里到今天正好一个星期了。明天我到法兰克福姑母艾丝苔^①那里去(注意：有一位太太原来在特利尔住过，更早以前住在阿尔及尔，而现在同姑母住在一起，——她也是我父亲的妹妹，也是我的姑母，叫巴贝塔^②，平常叫她“小贝尔”；她很有钱)。再从法兰克福去博默耳^③，这我在昨天已通知表舅^④，大概会使他大吃一惊。

这样迟才给你写信，可决不是由于健忘。正好相反。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珍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我没有写信，是因为我天天都指望告诉你一点确讯，但是直到

① 艾丝苔·科泽耳。——编者注

② 巴贝塔·布吕姆。——编者注

③ 扎耳特博默耳。——编者注

④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现在任何确讯也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来到的时候,除日常用的家具外,其他一切当然都加了封。我母亲以她通常的“最高领导狂”对康拉第说过,他对什么也不用操心:她已经把一切都处置妥当,表舅会把“一切”办好的。

她仅交给康拉第一份经过公证的遗嘱副本,这个遗嘱只包括下列安排:(1)除金银物品外,所有家具、衣物和器皿均遗赠给艾米莉^①; (2)留给自己的儿子卡尔一千一百塔勒等等; (3)把父亲的画像留给索菲娅^②。全部遗嘱就是这样。(注意:索菲娅一年有一千塔勒收入,这笔钱大部分从菲利浦斯家领取。你毕竟还是可以看出来,我的亲戚乃是十足的“坏种”。)

除了这个小纸片外,母亲还有一个(现已无效)办过法律手续的遗嘱。立这个遗嘱的日期比较早,并由于后一遗嘱而被废除。第一个遗嘱是在艾米莉出嫁以前立下的。母亲在这个遗嘱中说要把归艾米莉支配的一切财产的使用权交给艾米莉。此外,她指定舅舅马丁^③和菲利浦斯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母亲——确切些说,这个酒鬼公证人采尔(已去世)——忘记了在我前面提到的而现在唯一有效的那个文据中**重申**关于遗嘱执行人的保留条件,因此只是由于我们愿意,表舅现在才成为遗嘱执行人(我对此自然有充分的“考虑”)。关于财产的实际状况,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一切文据都放在加了封的柜子里。而迟迟没有启封,是由于要花很多时间办理在荷兰的委托书(尤塔和索菲娅的)寄来以前必须办完的手续。这对我说来是拖得太久了。所以,我让康拉第做我的全权代表。除

① 艾米莉·康拉第。——编者注

② 索菲娅·施马尔豪森。——编者注

③ 马丁·普勒斯堡。——编者注

了1858年的五桶酒(我母亲在有利时刻不愿出售)和几件金银小物品外,在特利尔这里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格律恩堡早就卖掉了)。这一切将在各继承人之间平分。实际的财产完全掌握在表舅手中。

我母亲于11月30日下午4点钟,即在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 and 时刻去世。她曾预言,她将正好在这个时间亡故。

今天我去办德穆特先生和小丽莎的事。等我到了法兰克福或博默耳再详细告诉你。向全家人致良好的祝愿。代我吻所有的人,特别是多多吻中国皇帝^①。

你的 卡尔

(但愿随下一封信能给你寄些钱去。)

9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3年12月23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因为我妻子把它寄往特利尔,而妹妹^②又把它从特利尔转寄到这里。在你来我家的第二天(星期一),我就离开了伦敦。要不然,为了得到遗嘱执行人的委托书,我势必到西蒂区去一趟,但是按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来说,这是比海上旅行还累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艾米莉·康拉第。——编者注

人的。

“李卜克内西博士”住在柏林已经有一年左右了。他的地址是新堡街 13 号。关于那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⁵⁷³可是同这个书商有关的一个情况却使我感到奇怪。须知在威廉·李卜克内西担任奥格斯堡《总汇报》通讯员期间，他一直替该报给威廉·李卜克内西支付稿费，因此，他随时可以扣下李卜克内西欠他的钱。

从李卜克内西方面来说，滥用你的名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宽恕的。但是你对这个书商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威廉斯自己是能够得到偿还的。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1864年

98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1864年]^①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舅：

我从近到远来谈吧。昨天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我怀着冷冰冰的心情到了这里，因为天气冷得要命。可是这使我更感到见面的温暖，因此我也就体会到苦中之乐。顺便说一下，昨天和今天都是伦敦最冷的日子。所以，我的使命看来就是把冬天不仅带给博默耳，而且也带给伦敦。但愿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普鲁士人充分享受这种“与季节相适应的天气”。如果他们的爱国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们的“忠君热”并不因此而冷下来，那末，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小家伙^②对奥古斯特夫人给她选购的确实好看的玩具娃娃完全着了迷。附上小女孩写的几行字。她一再纠缠我，直到我答应把她认为是用中国象形文字写成的信也寄给你为止；这封信是一个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英国熟人寄给她的。

[在阿姆斯特]^①丹看到全家人都很健康和愉快。[因为奥古斯特]^②很忙,所以[根本]^③没有向他谈钱的事。在保险基金会里我取到了千盾券数张,雅克^④帮我在鹿特丹把大部分换成了票据,其中约四分之一是银行券。

我在鹿特丹逗留的那两天,雅克也很忙。第一天他到附近一个小城市里去办一个案件,第二天他必须去参加一次鉴定。总之,我觉得他自从订婚以来比以前更多更多地“关心业务”了。我相信再过几年他会有相当多的业务,尤其是因为他喜爱法学。雅克自己告诉我,差不多所有疑难案件他都胜诉了。既然他肯劳神谈论这些事情,那对此是可以相信的。我和他曾对一个他所谓的真正“当事人”笑破了肚皮。他告诉我,这个人还年轻,还能打三十年以上官司,弄到不少财产!

顺便说一下:奥古斯特对法院的无谬性也有其十分独特的信念。例如,他认为英国人并不因为他们诉讼费用异常昂贵而受到任何损失。不诉诸法院的人,都享有和打官司的人同样多的机会来求得公道。实际上,他显然是认为费用昂贵的法院,不比费用低廉的差,也许还更好一些;他在这类事情上是有所体会的。

奥古斯特给了我三册《地理学》,另外,雅克还供给我一本来顿教授菲塞林的政治经济学(荷兰文)^④和一本《映画镜》^⑤。可见,给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

③ 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

④ 西·菲塞林《实用国民经济手册》。——编者注

⑤ 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编者注

我供应的荷兰读物很充分。弗里西安语的书在阿姆斯特丹一本也找不到,虽然仅在一家书店里就有八十八种现代语的作品。看来,阿姆斯特丹人对黑人的语言比对弗里西安语更有兴趣,不过人们总是偏偏忽视与他最接近的东西。

在这里,我的几个女儿在钢琴伴奏下唱着在阿姆斯特丹早已轰动一时的《索里埃·奥本海姆》^①,她们希望有一天能在她们的表舅爷面前唱这首歌。

这里已经给我堆积了一大捆来自四面八方的报纸等等,但是我拿定主意,在星期一以前有关政治的东西一眼都不去看。

现在,亲爱的表舅,再见吧!尽管我生了痈和疖子,但是我认为在你家里度过的两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片断,我将永远感激你们对我的一片心意。

你当然会转告小红房子^②,说我向他问好,并就我同他不得已的争吵一事表示歉意。

衷心问候全家,特别是小耶特^③、安罗伊医生和弗里茨。马克思夫人和女孩子们也都向你们问候。所附字条,烦转南尼达。

你的真诚的 卡尔·马·

① 一首流行的歌曲。——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小红房子”的原文是《Rothhäuschen》,“罗德黑岑”这个姓的原文是 Roodhuyzen,两词谐音。——编者注

③ 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

99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亚 琛

[1864年3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我想您已经到了亚琛或者还没有离开，所以把这封信寄到那里。要是您想等好天气，那您直到现在还会留在博默耳。这里的天气至少3月份是很恶劣的，除了一两个好天以外，其余都是寒冷而潮湿的日子，并且天气瞬息即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直到现在我身上这些该死的疖子还没有好。我诅咒这些东西，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小爱琳娜咳嗽得很厉害，差不多有两天了，因此她不能给你写信。但是她要我多多问候你，在丹麦问题上她要我告诉你：“她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她认为争执双方不论哪一方都丝毫不比另一方好，也许甚至更坏”。

普鲁士政策之所以难以理解，纯粹是由于一些人的偏见，他们硬给这种政策加上重要而远大的目标和计划。同样地，例如，摩门教徒的圣经也很难理解，这正是因为它一点意义也没有。首先，普鲁士人曾打算使军队变得深得人心，早在1848年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役⁵⁷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其次，这使德国人志愿队、民主派和各小邦失去立足点。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必定会给同它们

一鼻孔出气的丹麦国王^①提供机会,使他能够借用外来压力迫使丹麦人在内政和外交上作出某些让步。奥地利自然不会答应普鲁士扮演主要角色,并且它已趁机同它结成更紧密的同盟以防其他意外事件。

4月12日将在伦敦召开会议³⁶⁶。在万不得已时会议将通过关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同丹麦合并为君合国的决议,也许这种合并的规模还更小些,而决不是更大些。尽管硝烟弥漫,铅弹呼啸,鲜血流淌,但整个事情之卑劣,单从这么一点就可看出来,即直到现在普奥既没有向丹麦宣战,丹麦也没有向普奥宣战。³⁶⁰要混淆视听,自然再没有比出兵征讨,让战马咆哮、大炮轰鸣更好的手段了。

然而,严重的冲突也许为期不远了。由于不仅在巴黎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在选举⁵⁷⁵中也特别尖锐地表现出这种情绪,波拿巴现在感到几乎不得不又要强使自己的士兵向外贩卖“自由”了。而且这次普鲁士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

加里波第的英国之行³⁶⁸,以及这里各方面对他发出的响亮的欢呼声,只不过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新的反奥起义的序曲。奥地利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是普鲁士的盟国,通过在加里西亚实行戒严⁵⁷⁶而成为俄国人的盟国,自然使自己的对手很容易玩弄把戏。在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当前的形势下,在德国人民现时的情绪下,以及在英国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的情况下,新的神圣同盟甚至会允许小拿破仑^②扮演大拿破仑的角色。现时最好是保持

① 克里斯提安九世。——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小拿破仑》这个抨击性小册子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编者注

和平,因为任何战争都会推迟法国的革命。

真见鬼!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政治棋局更愚蠢的呢!

我本来打算向你再谈两个问题: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和关于宇宙空间的黑暗。但天已经黑下来了,信纸也写完了,邮局马上就要关门,这次只好到此为止,最后向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并向卡尔夫妇、让^①和其他人致最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克思

100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4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但愿咳嗽这种袭击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出现过一个新的疖子,我的医生认为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种坏东西。的确,早就该这样了。太阳似乎终于要穿透云层了。但是从东方还刮来狂风。爱琳娜的咳嗽好了。可是她姐姐燕妮却还是在咳嗽……^②将随着风向的变换而消失。

在收到你的信以前,康拉第已经给我写了信,我给他回信说,他可以把钱直接寄到这里。

① 指卡尔·菲力浦斯和让·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在博物馆^①里，我在博埃齐（他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的著作家）《论算术》一书中读到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他当然不知道任何其他除法）。从这本书以及其他我用来与之相比较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太大的计算，例 [如]^②在家庭开支和商业中，从来不用 [数字]^②而只用石子和其他类似的标记在算盘上进行。在这种算盘上定出几条平行线，同样几个石子或其他显著的标记在第一行表示几个，在第二行表示几十，在第三行表示几百，在第四行表示几千，余类推。这种算盘几乎整个中世纪都曾使用，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使用。至于更大一些的数学计算，则在有这种需要之前古罗马人就已经有了乘法表或毕达哥拉斯表，诚然，这种表还很不方便，还很繁琐，因为这种表一部分是用特殊符号，一部分是用 [希腊]^②字母（后用罗马字母）编制成的。但是，[既然]^②一切除法都是把被除数分解为 [两个] 因数，因为表上列入的数字很大，所以，要分解诸如 MDXL 之类的数是够用的。每一个数，例如 M，单独分解为它用除数得出的因数，于是结果就出来了。例如，M 除 [以]^②2 = D (500)，D 除以 2 = 250，[余类推]^②。在作很大的计算时，旧方法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点从杰出的数学家阿基米得所变的戏法中就可以看出来。

至于“宇宙空间的黑暗”，它是从光学中必然产生的。既然各种颜色只有在光波为物体所反射时才能呈现出来，而星际空间既没有大气，又没有其他物体，那末这些空间一定是漆黑的。它们让一切光线都能通过，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是黑暗的。此外，在行星等的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是极其“寒冷的”，因为只有在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同某种物体相撞击时光才能激发出热，所以我们地球大气的最高几层夏冬两季都是冰冷的严寒，正因为这些大气层都是空气极稀薄，从而相对地是没有什么物体的。但是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①

在没有视力去看光的地方和没有有机物去感受热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有光和热呢？勇敢的伊壁鸠鲁早就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把诸神赶到太空中去（也就是赶到无人居住的宇宙空间中去）⁵⁷⁷。的确，只有在这些无比寒冷、漆黑一团的“没有物体的宇宙空间”，才有罗^②的“真正的狗东西们”的位置。

我已经成了一个很好的荷兰人，这一点你根据以下事实就可以相信：小燕妮已经把《映画镜》^③看了一半；劳拉在我的指导下已经读了《地理学》第一卷的大部分；就连爱琳娜都会背诵《跳舞吧，小修女，跳舞吧！》和《小鞋和它的小妻子》^④。

全家向你、卡尔、将军夫人^⑤和其他人致良好的祝愿。有这样的天气，好事情是会接踵而来的。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尔·马克思

① 歌德《致祖莱卡》。引自《东西诗集》。——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罗德黑岑。——编者注

③ 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编者注

④ 荷兰儿童歌曲。——编者注

⑤ 可能指卡尔·菲力浦斯的岳母；他的岳父是个将军。——译者注

101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9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可怜的鲁普斯今天下午五点十分去世了。我刚从死者那里回来。

从伦敦到达这里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去看他，但是他当时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他认出了我。当时恩格斯和两位医生^①在场。我们离开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叫住我们说：“你们还来吗？”这是他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此后，他很快又陷入衰竭状态。到星期四晚上，甚至到星期五晚上，病情仍然不明朗，结局如何，很难判断。从星期五晚上起一直到死，他都昏迷不醒。与死亡的斗争拖了很久——诚然，这对他是没有痛苦的。他无疑是夸夸其谈的庸医^②的牺牲品。明天给你多写些。

我们为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葬礼定于星期五举行。

你的 卡尔

① 博尔夏特和龚佩尔特。——编者注

② 博尔夏特。——编者注

9. Mai. 1869.

Liebe Frau

Das Lagerplatz für die 10 Mann auf 5 Tage ^{gestern} ist
aber nun der Sache
als ich nun wieder keine Wohnung in demselben Abend auf die
Sache ist nun aber besichtigt. Das nächste Haus erhalten
es auf die Höhe der mit dem 2. und 3. Stockwerk in einem
Mittelpunkt zwischen (mit der Höhe der) der Stadt die
angeht. Aber ein Zeitpunkt hat durch sich er wieder
an sein Augenmerk. Das nächste Abend, 12. gestrichelt hat
Sonderheit über die Sache, dass die Auslegung
gründlichst prüfen durch die Sache Abend hat nun für eine
Wohnung nun so besichtigt. Solange die Sache -
gleich die Wohnung für die - der letzte Kampf für
die Entscheidung der Sache das beste ist für die Sache.
Auf dieser Sache nun.
Mit die ist eine kleine Wohnung für die in der Höhe der
Sache für die Sache. Man eine Wohnung für die Sache
Sache. Das nächste Abend hat durch sich er wieder
an sein Augenmerk. Das nächste Abend, 12. gestrichelt hat
Sonderheit über die Sache, dass die Auslegung
gründlichst prüfen durch die Sache Abend hat nun für eine
Wohnung nun so besichtigt. Solange die Sache -
gleich die Wohnung für die - der letzte Kampf für
die Entscheidung der Sache das beste ist für die Sache.
Auf dieser Sache nun.

马克思 1864 年 5 月 9 日就威廉·沃尔弗逝世一事
给燕妮·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 1864 年 5 月 9 日就威廉·沃尔弗逝世一事
给燕妮·马克思的信

10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10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现在才弄明白——博尔夏特以前就已经知道了——可怜的鲁普斯辛劳终身积蓄了一些钱。

他在遗嘱（1863年12月立下的）中指定恩格斯、博尔夏特和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公证人刚才向我们宣布了他的遗愿。鲁普斯的遗言是：

（1）一百英镑给曼彻斯特席勒协会；

（2）一百英镑给恩格斯，

（3）一百英镑给博尔夏特，

（4）其余约六百到七百英镑以及他的书籍和其他财物都给我（如果我死在他之前，则给你和孩子们——他仔细地考虑到一切意外情况）。

现在我要到他的住所去一趟，以便整理一下文稿。幸而他至少在最后六七个星期是住在非常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那里，受到很好的照料。关于找一个人看护病人的荒唐电报^①，都是自命不凡的博尔夏特胡吹瞎扯和装模作样的结果，龚佩尔特根本不知道这些电报。

^① 见本卷第390—391页。——编者注

千百次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 卡尔

103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13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

今天为我们的好同志^①举行了葬礼。我们有意不邀请任何人，否则半个城市都会惊动起来。参加葬礼的有博尔夏特、龚佩尔特、恩格斯、德朗克、施泰因塔耳、马罗茨基（光明之友⁵⁷⁸的新教牧师，鲁普斯在他家教过书，他是作为生前友好而来的）、贝内克（这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施瓦伯（同上），还有三个商人、几个少年以及大约十五到二十个所谓“下层阶级”的人——鲁普斯在他们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自然，我发表了简短的悼词。这个使命使我如此激动，以致有几次嗓子都哽住了。弗莱里格拉特来信表示歉意。说是他的上司法济目前正在伦敦。恩格斯，特别是德朗克都认为这不成其为理由，德朗克明天在伦敦将要求他作出说明。

我在这里至少还得滞留三四天，以便了结一些事情，缴纳遗产税，宣誓等等。在一切没有办好以前，我自然不会离开曼彻斯特。

起初以为可怜的鲁普斯似乎是患初期脑软化。但是事实并非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如此。龚佩尔特早就说过，他是患脑充血（脑溢血）。这在解剖后已被证实，从而也证明，假如有稍微对症的治疗，他还是能活下去的。博尔夏特丧天害理地完全耽误了他的病。不过为博尔夏特一家着想，这一点就不必声张了，他一家同鲁普斯是很知心的（特别是博尔夏特的大女儿），帮了他不少忙，鲁普斯本人对这一家也很珍视。而我则谢绝了博尔夏特要我今天去吃午饭的邀请（恩格斯等人想必是出席了），我推说，在安葬沃尔弗的日子里，我不能去作客。

德朗克没有回你的信，他请你原谅。可怜的矮子因为他的几个孩子的死亡心里非常悲痛，连信都没有心思写。

鲁普斯把我们孩子们的所有信件都细心地保存下来，并且在最后几个星期里一再向博尔夏特夫人说，小杜西^①的那些来信使他如何地高兴。

前天马罗茨基在教堂（当时在为儿童举行坚信礼，博尔夏特的小女儿也在内）公开赞扬了鲁普斯。我认为在曼彻斯特没有一个人象我们可怜的鲁普斯（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就折断了双腿，为此医治了多年）这样受到普遍的爱戴。在他死后留下的许多人的来信中，我发现男女小学生，特别是他们的母亲，都对他表示极其真挚的友情。

向大家致最美好的祝愿。

请把亲爱的爱琳娜的相片立即寄三张来。

你的 卡尔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10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4年5月17日星期二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孩子，淘气鬼：

我很可能在本星期四（5月19日）离开曼彻斯特，恩格斯可能和我同来。⁵⁷⁹如果有变化，我会及时通知的。

昨天去看了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同他的旧日的友谊。他很亲热地接待了我。艾希霍夫目前也在这里，他向你们大家问好，今天早上他告诉我：罗德博士的女婿马里埃特突然去世了。女儿回到了利物浦她父母处。艾希霍夫好不容易才当上了营业员。

小德朗克今天从伦敦来，谈到几天以前他同弗莱里格拉特见面的一些有趣事情。这次见面的地点是皇家交易所大厦2号，弗莱里格拉特的上司司法济也在场。

我的一个老朋友施特龙从布莱得弗德来看我，不幸，他的身体很不好，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是从艾希霍夫那里知道我在曼彻斯特的。

龚佩尔特有件喜事，得了一个儿子。

我给你写这几句话，是因为恩格斯来时你大概得把你的房间让给他。看来只有你的房间能派这个用场。酒你们不必担心，我们将随身带来，有一打白麦酒就足够我们这位曼彻斯特人喝的了。

我没有能够办完自己的事情⁵⁸⁰，因为本星期这里的法院休假。事情要办好总得在下星期，而那时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从你妈妈的来信中很痛心地知道，玛丽·洛尔米埃不能恢复健康了。这些医生简直是些骗子。

如要写信给我，可以在明天晚上五点钟以前发出，我在曼彻斯特还能够收到。

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已经完全健康了。向你的继任者^①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我的秘书^②使一个含有深意的眼色。

你的忠实的 老头子

我很想在这里给全家买点曼彻斯特的丝织品，但是正碰上假日，商店关门，不能实现我的心愿。

可以告诉你妈妈：乔·朱·哈尼已经第二次结婚，并且离开欧洲到澳大利亚去了。⁵⁸¹

105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4年5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对你7日的信和18日的信，答复稍微迟了一些，请你原谅。

至于那一千英镑，那末这笔款子我最早在7月1日，也许稍微迟一些，才能给你们汇去。我必须等待到今年6月30日为止的平衡表编造出来。在此以前，我只好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我应交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付的一万英镑中只要哪怕差一个便士，哥·欧门就会拒绝履行他的合同。关于这件事，我在4月7日的信⁵⁸²中已经告诉了妈妈，所以付给“维贝耳豪斯和布什”银号的钱就请你们自己筹措。反正我不能弄到为期一周的一千英镑的短期期票。因此，到7月或8月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根本不必着急。

不过我原来想，我也许可能部分地抵补这一千英镑，即说服哥·欧门在到期以前先把原定6月30日支付的三百七十五英镑利息汇给你们；但既然银行主现在付给我们六厘利息，那末他就不会愿意按五厘利息给你们钱。

至于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则应作如下的处理：

6月30日把一万英镑记入我欠你们的债务项内。按照合同，这笔款子应留在这里的平衡表内。这笔款子中应扣除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及其利息；余款我将按五厘的利率向你们付息。我结余中留给母亲个人支配的那部分不给我算利息，所以最好把这部分另记一笔，否则只会使账目混乱不清。

这里要注意的唯一的问題是把英镑折换成塔勒的汇率问题。我看，目前和将来就我这笔账进行的一切计算，最简单的办法是采用平均汇率，即按六塔勒二十银格罗申的汇率，父亲在他的账簿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我应付出的那一万英镑，在你们那里就是66666.20塔勒；而我用英镑来偿付的一切金额也将按这一汇率计算。你们商量一下，把意见告诉我。

关于把一万英镑记在我的账上一事，你们没有必要通知哥·欧门；你们都在合同上签个名就行了。

十分感谢你寄来相片。你的面部修版时修得过多了一些，但总的说来这些相片都照得很好。其余人的相片快点寄来，我好收进

照相簿里，这件事也提醒一下可爱的博林一家，从他们那里我还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布兰克家还缺大玛丽亚、小艾米尔、鲁道夫以及最小的几个孩子的相片。

顺便提一下，如果那里要求“欧门—恩格斯”公司支付在《科伦日报》、《布勒斯劳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由我署名的讣告⁵⁸³的费用，那就请你照付，并把此款记在我的账上。

如果妈妈还在巴门，就代为问候，并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向恩玛^①（看来她的气色还没有象以前那样好，但我们希望这将很快过去）和孩子们以及鲁道夫^②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06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6月25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非常感谢你寄来详尽的信。我知道你由于视力关系，写信是很吃力的，所以我并不是每封信都等你的回信。从你来信中我高兴地看出，你身体健康，心胸开朗，甚至没有因多济教授的发现^③

① 恩玛·恩格斯。——编者注

② 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07页。——编者注

而有所波动。其实，从达尔文证明我们大家都起源于猴子的时候起，未必还有什么打击可以动摇“我们对于祖先的自豪感”。《摩西五经》^①只是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囚禁中返回以后才著成的，这一点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文》中就已经探讨清楚了。

爱琳娜在所附的短信中自己对你寄来的相片表示感谢，这张相片同通常这类黑影画一样好。小家伙在三四天以前就把“自己的信”给我放在桌子上了。

我的疝病又复发了，从我摆脱最后几个疝子到现在总共才不过两个星期。这种讨厌的病很妨碍我工作；此外，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的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主要是**做英国股票投机，英国股票今年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起来（这是些五花八门的股份企业，它们扩充到不可思议的规模，然后又纷纷倒台）。我用这个办法赚了四百多英镑，而现在，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时间不多，而且只要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

我家里一切都很好。医生要小燕妮“换换空气”，如果你或命运都不反对的话，那末在夏末我就带我三个女儿来看望你。

电讯已把会议^②毫无结果的消息传遍了欧洲。在这场外交悲剧中，唯一能够毫无阻碍地追求自己原先的目的和巧妙地玩弄手腕的，就是俄国人。一方面，他们复活神圣同盟，驱使德国蠢人去打仗，从而使欧洲不去注意他们自己在波兰和切尔克西亚的

① 圣经头五篇的总称。——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4、394和401页。——编者注

巨大进展；另一方面，他们唆使丹麦进行抵抗，最后就会在帕麦斯顿先生的帮助下巧妙地让英国为使1852年的条约³⁵²得到遵守而宣战，而现在已经有**有据证明**，这个条约是俄国授命订立的！英国人并没有因为波兰而发动战争，虽然1815年的条约责成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因为切尔克西亚而发动战争，虽然俄国和高加索一起保证自己对**亚洲**的霸权；但是就是这些英国人却必须因为俄国授命签订的条约而宣战——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而同时也正是这个俄国却公然站在这个条约的反对者一边！这简直难以置信！英国人民对丹麦丝毫不同情（虽然他们无疑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十分反感）：有利于丹麦的群众大会连一次也没有开成；一些贵族所组织的救济丹麦伤员的募捐活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英国人民对于本国的对外政策所能谈的，却正如月球上的居民一样多。以《泰晤士报》等为代表的舆论，是帕姆老头子本人自行“规定”的。

6月19—21日哥本哈根曾经处于革命的边缘。国王^①接到了**俄国照会**，要他赞成各公国同丹麦王国组成君合国。成了俄国人傀儡的国王（他们把他的儿子^②安置在雅典，把他的女儿^③安置在英国，把他本人扶上了丹麦王位），赞成俄国人的方案，而大臣蒙腊德却反对。经过两天辩论，蒙腊德辞职以及在哥本哈根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新即位的国王才老实起来，这样，俄国就又暴露了它的阴险的图谋。但是，尽管俄国对这次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它感到最有利的却是使欧洲各国人民（俄国是他们的公敌）互相打得头破血流。普鲁士装出的那副了不起的样

① 克里斯提安九世。——编者注

② 威廉。——编者注

③ 亚历山得拉。——编者注

子——美男子威廉扮演征服者威廉的角色——实在滑稽可笑。这种妄自尊大将带来可悲的结局。

为了对善人帕麦斯顿作一个说明，附上《晨邮报》（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的剪报，上面有关于议会辩论的报告——弗兰德的演说⁵⁸⁴。这里所谈的只是关于委任 charity inspector（慈善事业检查官）的问题。你从我划线的地方可以看出，在议会里人们当面向帕姆谈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他却满不在乎。

在加里波第逗留伦敦期间，我故意不和他见面。^①要是在卡普雷雷岛，我倒要去拜访他，但是在伦敦这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木橛子，每个扬扬得意的糊涂虫都把自己的名片穿在这个木橛子上了。

向全家热情问好。我妻子向你和全家问候。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

10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4年7月12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今天（刚才）接到一封信，我觉得信上的地址好象是你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想知道这封信怎么落到了你的手里？这是坏蛋布拉斯（从柏林）寄来的，他厚着脸皮托我把一个拙劣的

① 见本卷第648页。——编者注

东西转寄给比斯康普。⁵⁸⁵我已经好久不知道比斯康普这个流氓的下落了，因为这个人的住处不明，所以真不知道我现在该怎样摆脱这种无聊的事情。

我是躺在床上给你写这封信的；我由于长了很危险的痲，不得不躺几天。这可恶的病时常复发。

如果在15日以前（包括这一天在内）我不能照我所想的亲自到西蒂区去一趟（因为在那里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那末我就在本月15日打发琳蘅去，以便奉还三十英镑，并表示谢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108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8月1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你的信我昨天晚上从英国博物馆回到家以后才看到。因为时间太晚了，所以没有马上写回信。不用说，来信的内容⁵⁸⁶简直吓坏了我和全家。有一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和南尼达^①没有立即离开家？我劝你哪怕现在也要这样办。在我家里发生这种事情时，我立即就把孩子们弄走了；没有你们也可以同样照料女巨人^②。为什

① 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菲力浦斯家的女仆。——编者注

么要无谓地冒险呢？请原谅我这样直率地说这一点，我是太替你们担心了，所以才直言不讳。真可惜，我自己不在你们那里，——我凭经验知道，这种病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如果你们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家（但是到底为什么？），那末我总可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给你们以支持，因为在这种场合，要消磨时光，熬过一段日子，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三个人又比两个人好。

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最近我已给南尼达去过信，她可以告诉你稍微值得注意一下的很少几件事情。总之，一切都好，全家人都还算健康。

现在这里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是死气沉沉。凡是有条件的人，都溜掉了，不是出国，就是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去。单调的生活，只是由于天天传来关于骇人听闻的铁路事故的消息才有所激荡。资本在这方面并不象在大陆上那样受到警察的严密监督，所以对铁路经理来说，在旅行季节里死多少人，是根本无所谓的一—只要平衡表不出问题就行。这些铁路大王玩忽人命，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但是追究他们所应负的责任的一切尝试，总是因为铁路公司在下院有很大的势力而遭到失败！

这里另一件开心事情，就是由于贴现率提高而使商界充满一片惊恐！毫无疑问，如果贴现率在目前水平上再保持几个星期，那就会造成倒闭，今年象雨后春笋般增长起来的大量搞投机活动的股份公司，将成为这种倒闭的牺牲品。西蒂区一家接着一家发生的重大破产事件，已经证明大风暴即将来临。

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格罗夫著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他证明：机械运动的力、热、光、电、磁及化学性能，其实都不过是同一个力的不同表现，它们互

相演化、替换、转化，等等。他非常巧妙地排除了那些令人厌恶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的胡话，象“潜热”（不亚于“不可见光”）、电的“流质”以及诸如此类为了给思想空虚之处及时找个字眼来填补而采取的非常手段。

希望很快能接到你们的好消息。今天我由于非常惦念你们，想阅读重要的美国新闻也不能安静下来。

全家致衷心问候。代我向小耶特、医生、弗里茨^①等问好。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

10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布 莱 顿

1864年9月2日 [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昨天收到了弗莱里格拉特的来信（照抄一份于后），你从信中可以知道，拉萨尔在日内瓦决斗时受了致命伤。这个消息使我们大为震惊，因为拉萨尔总还不应该落到这样的下场。我收到信以后，就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也就是到他的住处去，因为我知道伊达^②出门去了。看来，我的来到使他惊“喜”不止。他的女儿路易莎和他在一起。其余的一群人将在本周末回来。路易莎在布莱顿弗兰契斯卡·卢格那里呆了两星期。鉴于弗莱里格拉特同卢格等的关系，使用你的印有男爵头衔的名片要慎重。象卢格这样

① 罕丽达·范·安罗伊、阿·范·安罗伊及弗里德里希·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伊达·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的人，是会利用这一点的。弗莱里格拉特远没有象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受到很大的“震动”：他还照常说笑，还拿拉萨尔来说笑。他向我说，他的银行正遭受危机，正是日内瓦的事情和法济在这件事中搞的鬼⁴⁰⁰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害。最后告诉你一句杜西^①的妙语。因为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说，拉萨尔是为了他想要娶的一个女士^②而决斗的，劳拉就想起，他对每个妇女都说过什么“总共只能爱她六个星期”。于是杜西就说，“那他准能活六个星期”。小燕妮象着了魔似地在她的温室里劳动。全家人都很健康，并向你问好。

老头子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③

“刚接到克拉普卡从日内瓦寄来的信。他写道：

‘拉萨尔在这里有一段恋爱史，但完全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准备同这位姑娘，即巴代利亚的公使斐尼盖斯的女儿结婚。父亲反对这件婚事，而姑娘欺骗了可怜的拉萨尔；她原来的未婚夫，即上面提到的伪国君^④从柏林来到这里，事情发展到要求作出解释，写信互相指责，继而提出决斗。拉萨尔的监场人是吕斯托夫上校和我的同乡贝特伦伯爵将军。拉萨尔正象一个具有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人那样——勇敢而自尊。他腹部中弹，现在躺在“维多利亚”旅馆里，生命垂危。对他不幸的是，子弹深入体内，因此伤口很容易发炎。我来了以后就立即去看他，见他在口授遗嘱，但准备从容地迎接死亡。我对他感到无限惋惜：对于一个人，往往是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才能真正认识他。虽然医生们诊断说很凶险，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安然度过危机。’

克拉普卡就是这样写的。我甘愿承认（说得太过分了，好象把他吊在拷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海伦娜·斐尼盖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

④ 腊科维茨。——编者注

问架上似的！)这个消息使我深为不安，我立即给克拉普卡打电报说，如果拉萨尔还活着，要他转致我的同情和慰问。克拉普卡将给我回电报；我如有所知，当即奉告。”

110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1864年9月1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尤其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近来我们彼此没有保持联系。原因不仅仅是他没有写信，——因为终止通信的是他，而不是我——也不仅仅是我生了病，我的病拖了一年多，几天以前才摆脱。这里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我将来可以口头告诉您，信里就不讲了。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那样。

亲爱的伯爵夫人，希望您以崇高而刚强的性格经受住命运的这一打击，并请永远相信我对您的充分而由衷的忠诚。

您的忠实的朋友 卡尔·马克思

附 录

附 录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说，如有可能，请您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以前为他写一篇文章。可惜已经错过几篇文章了，今天的一篇^①我看也靠不住。什么题材都行。也可以写写进攻威尼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什么小事情。

我希望在本星期内就能开始誊抄小册子^②。

这件事拖得太久了。我看，卡尔写得过分认真。

“分析泰霍夫的信”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看来，关键就在这里。除此以外进展得都比较顺利。

席利和贝克尔每天寄来一叠一叠新的文件，这些文件立即被用来充实小册子。遗憾的是，找出版者的事还一点没有着落。本星期内一切都应该搞完。“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要犯错误。”

我和女孩子们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0月5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又来了一印张校样^①。这张校样，摩尔应马上校阅，并发回西蒂区。因此，他要我在邮局关门以前赶紧告诉您，所寄五英镑的支票已收到，来得正是时候。

我们全家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3月16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多年来您对我们的艰难困苦给了全心全意的帮助，我真是感激不尽！当我看到寄来的钱是我所指望的五倍时，我真是高兴极了。不承认这一点，那是虚伪的，而琳蕻^②比我更高兴！当我跑上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楼去对她说“恩格斯为了使你舒适，寄来了五英镑”时，她那双几乎已经失神的眼睛立即放射出了喜悦的光芒。

我想炎症是制止住了，昨天医生也认为垂危的病人已经有所好转。目前问题只是在于：会不会过度虚弱，会不会出现出血或坏疽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还不给她吃任何补品，因为必须忌食所有会刺激发炎的东西。我们经历了忧虑焦急的日日夜夜，而我还感到双重的不安，因为我还不知道卡尔的情况怎样，他是在柏林还是在别的地方¹⁶³。今天又没有收到信。

可怜的鲁普斯，实在使我难过。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那里，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没有人经心照料，完全听任利欲熏心的女房东摆布；不过，他的穷困实际上多半应怪他自己。干吗要这样谨小慎微、拘泥细节呢？您对这位老先生要多加监督，特别是要使他厌弃痛风病的大敌——杜松子酒和白兰地。信写得很仓卒，请您原谅。我心事重重，身边又有很多琐事，甚至今天还要到市区跑一趟，因为有一张当票到期了。但是只要我们的琳蕙能熬过来，我亲爱的卡尔很快有好信息传来，这都算不了什么。

女孩子们和我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4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3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给您写了那么多叫人伤感的信，现在想告诉您一些好消息。首先，大家觉得琳蘅有救了。医生对她的病状十分满意，认为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令人担心的说呓语、唱、哭和不安的动作等等，都已经大大减少，她甚至已经能吃羊肉排了。多亏您的帮助，我才能够给她安排一切舒适的东西——经常保持温暖的房间、葡萄酒、甚至象花露水这样的奢侈品，花露水对于这种病，特别是在时常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很起作用。除了这个好消息外，我还必须告诉您一件也使您高兴的事，就是摩尔终于来信了¹²⁵。从星期日起，他在柏林，住在拉萨尔那里，拉萨尔待他很热情。在一次宴会上，他坐在巴比伦女人^①（已故的维尔特^②的用语）和极丑的柳德米拉^③之间。祝他幸福！别的他没详谈，因为当时他要赶快给我汇五十塔勒。他只写道，前景很好，他将带着肯定的成果回家。我担心的只是，他一时回不了家。

请接受我们全家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② 看来原稿为：“沃尔特”。——编者注

③ 柳德米拉·阿辛格。——编者注

5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4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不明白为什么摩尔至今没有写信给您。我以为您完全了解他个人的事情，我甚至希望从您那里知道一些细节，因为我那位亲爱的夫君给我的信，这一次“文笔简练”到了极点。尽管我自己一直只是知道最一般的消息和少量的事实，但是我知道的毕竟比您稍微多一些，所以我想马上把我所知道的一点消息告诉您，何况事情总的说来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现在来谈谈第一件事情。表舅^①已经同意外甥的全部建议，打算等卡尔一到博默耳就立即处理钱的事情。至于报纸散布的消息，大概您自己也可以看出这全是捏造的；卡尔根本无意带全家迁居柏林。他唯一想设法在那里办成的一件事，就是恢复普鲁士国籍。我不完全理解和知道，为什么卡尔这样急于要重新当普鲁士王国的“臣民”。我宁愿今后依旧做“自由的鸟”（红色沃尔弗^②的一个旧相识的用语）。

为了要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涉，他只好逗留在柏林。政府曾打算处理这件事，办法是让他享有柏林市公民权，但卡尔不愿以此为满足，所以事情就一天一天地拖延下来。今天卡尔来信说，他

①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要到12日才能看到最后决定，而目前只好忍受寂寞的痛苦。看来，小伊威希还在继续患流涎症和陷于思辨的空论。不过他对卡尔确实非常友好，他总是跟卡尔在一起。如果不是接到母亲一封邀请他去的信，那他会从柏林径直到博默耳去，而现在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还要顺路去一趟特利尔。要是他到特利尔去，那他回家又得延期，两星期以内未必能回来。看来拉萨尔热衷于办大报；他并且肯定地说，他可以为该报的出版提供两万塔勒。办一个日报，而且以哈茨费尔特为靠山，这对卡尔来说是多么冒险的事情！我个人很少怀念祖国，很少怀念“亲爱的”、可爱的、忠诚的德国，这个诗人们心目中的慈祥的母亲，而女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离开莎士比亚之国的念头，对她们来说是可怕的；她们已经成了道地的英国人，牢牢地扎根在英国的土地上了。关于逮捕您的命令已经撤销⁵⁸⁷，这很好；这样一来您就可以自由上路了……

您的 燕妮·马克思

6

马克思请斐迪南·拉萨尔 代办恢复普鲁士国籍事务的委托书

1861年4月12日于柏林

鉴于本人即将离开此地，兹特委托居于柏林的斐迪南·拉萨尔先生行使本人与如下一事有关的一切权利：本地王室警察总局据今年1月12日王室大赦令，现在正在审理有关承认本人普鲁士国籍一案，并可能准许本人重新入籍以及赋予本人居住柏林的权

利。兹委托他向普鲁士王室内阁及德意志联邦会议代递请求书、申请书和申诉书，并充分行使属于本人的一切权利。

卡尔·马克思博士

7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1月初于伦敦]
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给您寄上“高贵的达乌德—贝伊”^①的《自由新闻》。这会
使您大大开心一番。可惜卡尔不能亲自写信。他病倒在床上已经
有一个星期了。他长了两个血脓疮，一个在面颊上，一个在背上。
面颊上的脓疮，敷了治这种病所用的家常药品很有疗效。另一个
在背上的脓疮，长得比较大，肿得非常厉害，可怜的摩尔痛苦万
分，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您知道，这件事在精神上也使他很苦
恼。这本不幸的书²⁵好象注定永远完不成似的。我们大家就象做着
一个恶梦。只要利维坦游起水来就好了！！

我们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指乌尔卡尔特。——编者注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1月24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关于您的任何信息了，卡尔非常挂念您。看来，脱离危险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喝烈性的好酒和加强营养，都使他有力气忍受疼痛和顶住因大量排脓而引起的衰竭。糟糕的是他还睡不着觉，夜里痛苦难熬。医生对病情十分满意，希望再过四至六天即可停止排脓。有时他起来站一会儿，今天我们把他从病时所住的房间搀扶到了起居室。

他随“主席团”的信给您附去工人协会发的通告。⁵⁸⁸这个小玩意儿将迫使这个“为工人阶级奋斗和受难十五年”（想必是指同1805年生的淡棕色头发美人^①一块喝香槟酒吧）的人从警察道路转向非警察道路。⁵⁸⁹请快些来信。我们全家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9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1863年11月24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上一次给您可爱的夫人写信时，并没有料到我们将要度过多么可怕的日子。三个星期来，我亲爱的卡尔得了一种最可怕最疼痛的病——背痛，一直处在**致命的危险**中。怨我罗唆写了这几行字。您和您可爱的夫人知道，您们对我们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在这三个星期内我们所经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我也不去说它了，今天受我康复中的亲爱的丈夫的委托，把工人协会发出的通告^①转寄给您。关于波兰事件本身的意义就不用说了，决定散发这个呼吁书是为了结束某些人^②的“警察运动”。“主席团”一下子就上了这个钩，请求给它五十份呼吁书，以便分发给它的分会^③。为了使您了解情况，卡尔把它寄给您。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请允许我向您再谈谈这种病在我们家里是怎样发生的。本来卡尔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了难以忍受的重担，为了多少能轻松一些，他加倍抽烟，把各种药丸，如治黄疸病有效的甘汞等的用量增加了两倍。

① 卡·马克思《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编者注

② 指拉萨尔。——编者注

③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大约一个月以前，他面颊上出现了一个脓疮，很痛，但是我们敷了一般的家常药品就收到了疗效。这个脓疮还没有完全消除，背上又出现了一个疖。虽然痛得很厉害，肿得一天比一天大，但我们还冒冒失失地认为用压布等等就可以消肿。依照德国的疗法，可怜的卡尔几乎完全不准吃东西，就连便宜的四度啤酒也从饮食中取消了，光靠柠檬水过活。最后，疖肿得象拳头那样大，背也已经完全弯下来时，我才找了艾伦。我永远不会忘记丈夫在看到自己背的那一瞬间所使的眼色，他示意我和小杜西^①离开房间，琳薇必须扶持卡尔；于是艾伦开一个很深的，又深又大的切口，鲜血从张开的伤口直往外流。卡尔一声不吭，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哆嗦一下。然后开始敷热压布，现在我们在两星期内不分昼夜每隔两小时准时换一次热压布。同时医生嘱咐一天喝波尔图酒三四杯和半瓶波尔多酒，而食物要比平常多三倍。问题是如何恢复他已经很衰弱的体力，使他能够顶得住剧痛和大量排脓所引起的衰竭。最近十四天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不必再向您多说了。琳薇由于操劳太甚和过分紧张也病了，今天才觉得好一些。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会有那样多力量。最初几夜我一个人守在床边，后来一个星期是和琳薇轮流守护，现在我睡在室内地板上，以便随时照应。目前卡尔正在恢复健康，我的心情怎样，您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卡尔和我可怜的女孩子们衷心向您问好。务请您两位多多来信，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要知道来信会使他多么高兴！信写得很乱，请原谅。

您的老友 燕妮·马克思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10

燕妮·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①

[1864年6月中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阁下：

《布勒斯劳报》上刊登的那篇写得很好的悼念我们不能忘怀的亡友威·沃尔夫的文章^②，我们估计是您写的。我丈夫想写他的详细传记，但是缺乏关于我们这位朋友早期生活的材料。³⁹³如蒙您在这方面给他帮助，把您所知道的关于沃尔夫童年和他早期生活的一切事情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他，他将非常感激。从1845年起，我们一直和他保持极密切的关系。所以，需要知道的主要是关于他早年生活的情况。我丈夫得了一种既危险而又很顽固的病，刚好不久，他要我请求您阁下——死者的忠实的老朋友提供这种友好的帮助，望您很快就能把您记得的关于我们永远亲爱的沃尔夫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

我和我丈夫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

注 释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 2 1859年秋,弗莱里格拉特的行为客观上阻碍了对诽谤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揭露。例如,弗莱里格拉特拒绝帮助马克思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承认他布林德就是1859年6月在《人民报》和《总汇报》上转载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这个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

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特别是,弗莱里格拉特在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声明,他同对福格特的责难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批评,见马克思1859年11月19日和26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马克思1859年11月23日和28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88—496、616—620页)。——第6页。

- 3 “德国好男儿联合会”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在伦敦建立的德国流亡者联合会之一。

凯鲁斯奇人是马克思对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讽刺的称呼,暗指金克尔把他办的周报按照古代德国凯鲁斯奇部落的首领阿尔米纽斯的名字(海尔曼)取名为《海尔曼》。——第6、191页。

- 4 马克思指的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准备工作(并见注25)。——第6页。

- 5 指对恩格斯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评论,评论发表在1859年11月26日《军事总汇报》第95—96号。评论对恩格斯的小册子中所阐述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关于德国必须统治北意大利才能维护自己安全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表示特别同意。——第6页。

- 6 1859年10月16日,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约翰·布朗试图在各蓄奴州掀起奴隶起义。他带领一小队伙伴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国家军械库。但是布朗没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者(共二十二名,其中有五个黑人)在向政府军队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都牺牲了。约翰·布朗和他的五个伙伴被绞死。约翰·布朗的起义是美国革命危机增长的一个标志,它加剧了黑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推动了美国废奴派力量的团结。——第7、9页。

- 7 指1859年12月玻利瓦尔城(密苏里州)的黑人居民试图举行起义一事。马克思指的是发表在1859年12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30号上的一篇短文。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

后来则是共和党的机关报。马克思从 1851 年 8 月至 1862 年 3 月曾经为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中很多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欧洲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当时进步的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在美国内战时期,马克思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同《纽约每日论坛报》决裂的主要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变得愈来愈右。——第 7、9 页。

- 8 指在伦敦出版的《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担任工厂视察员职务的霍纳于 1859 年 11 月辞职。他的最后一次报告书上的日期是 1859 年 10 月 31 日。——第 7 页。

- 9 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 1859 年 12 月出版,而在 1860 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 1860 年 1 月 22 日和 25 日第 37 号和第 41 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 437—443 和 454—472 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 1860 年 1 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书写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 年 2 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尔(见本卷第 437—443、446—448 和 454—475 页)。

但是,在 1860 年 4 月至 10 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 年 11 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

- 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397—754 页)。——第 8、11、17、430、438、533、587 页。
- 10 马克思指的是 1859 年 11 月 22 日他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614—616 页),他在信中批评拉萨尔在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所叙述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上的策略(见注 33)。——第 8、430 页。
- 11 马克思每星期两次——星期二和星期五——寄文章给《纽约每日论坛报》;1860 年 1 月 27 日是星期五。——第 8 页。
- 12 指 1860 年 1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3526 号上一篇关于摩洛哥事件的通讯(它是 1860 年 1 月 13 日写的)。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摩洛哥战争时期,1860 年 1 月中在卡博-涅格罗(摩洛哥的一个山岭)发生了西班牙军队和摩洛哥军队之间的会战(见恩格斯的文章《对摩尔人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18—620 页)。——第 9 页。
- 13 1860 年 1 月 27 日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一篇文章《英国的政治》,文章批判了议会关于对女王演词的答词所进行的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9—14 页)。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普鲁士军队改革指的是报刊上关于普鲁士政府打算把延长服役期和增加军事预算的法案提交议会审查的报道。法案于 1860 年 2 月 9 日提交给议会,遭到自由派多数的否决,由此开始了普鲁士的宪制冲突(见注 167)。对于普鲁士军队改革的评述,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备战》和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05—208 页和第 16 卷第 41—87 页)。——第 9 页。
- 14 恩格斯指的是 1860 年 1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39 号“商业问题”专栏里所刊登的莱特公司关于棉花情况的报道。——第 9 页。
- 15 指费舍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作为革命者的暴君》1858 年柏林版(《Des-poten als Revolutionäre》.Berlin, 1859)。小册子被译成英文,书名是《科堡公爵的抨击性小册子》(《The Duke of Coburg's Pamphlet》)。见本卷

第 547、548 页。——第 10 页。

- 16 马克思在寄这封信的时候手中还没有福格特的小册子。显然，他所得到的关于小册子的结构的报道不十分确切。马克思称作序言的东西，实际上是小册子的第二节。第一节是 1859 年 10 月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对《总汇报》起诉的速记报告，福格特控诉该报在 1859 年 6 月转载了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传单《警告》。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01—525 页）。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比作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弥勒—捷列林格的一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诽谤的小册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 年科伦版（《V 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 on M arx und Engels》.Cöln, 1850）。——第 11、14、430、446 页。

-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614—616 页。——第 12 页。
- 18 帝国流氓 是马克思对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时期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的讽刺的称呼。

民族联盟 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 1859 年 9 月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 1849 年 6 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第 12、66、93、254、382、552、614 页。

- 19 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是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于 1849 年 6 月在斯图加特成立的。——第 12 页。
- 20 拉萨尔对马克思反对福格特的斗争采取了不体面的立场。还在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出版之前，拉萨尔就拒绝帮助马克思去揭露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阴谋。例如，1859 年 11 月拉萨尔实际上阻碍了

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一篇反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为此马克思在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拉萨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94页)。在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出版之后,拉萨尔在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埋怨马克思赞同当时民主派中存在的把福格特看成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的观点。拉萨尔在1860年2月初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以各种毫无根据的借口劝阻马克思对转载福格特的诽谤的《国民报》起诉。显然,拉萨尔采取这种立场,部分地是由于在统一德国的问题上他同福格特的观点一致。他们两人实质上都赞成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从上面”统一德国。——第12、155页。

- 21 1859—1860年在柏林用德文出版了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相当于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公文集》(《Portfolio》)。汇编的编者是新闻记者费舍,它是以《新公文集》(《Das Neue Portfolio》)为标题出版的。

马克思的小册子《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的摘要,发表于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第1、2两册。——第13页。

- 22 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于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在英国许多城市建立起来的组织,主要目的是同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第13页。
- 23 马克思指的是《总汇报》的编辑奥尔格斯的一篇刊登在1860年1月12日该报第12号上的声明。奥尔格斯在声明中驳斥了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一些关于他的捏造,并且顺便提到他生平经历的几件事(见恩格斯1860年1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本卷第11—12页)。——第13页。
- 24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协会设在索荷区的大磨坊街。——第13页。
- 25 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

- 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行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 26 指1851年5—10月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第16页。
- 27 显然，马克思指的是1850年在巴黎出版的警探和奸细德拉奥德的著作《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和谢努的著作《密谋家》（《Les Conspira-teurs》. Paris, 1850）。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两本书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330页。——第17、431页。
- 28 关于福格特攻击沃尔弗一事，详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6—457页）。
1860年1月25日《国民报》第41号上说，沃尔弗把通告不是转交给汉诺威的报纸，而是转交给汉诺威的警察当局了。——第17页。
- 29 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

卷第 504 页,以及本卷第 479、480 页)。——第 18、23、449、471、479、534 页。

- 30 1860 年 1 月 28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28 号附刊上刊登了该报编辑之一阿尔坦赫弗尔和新闻工作者海弗纳尔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十分含糊地驳斥了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有关他们的一些事实。——第 19 页。
- 31 指 1795 年 4 月 5 日普鲁士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的巴塞尔和约。这一和约的签订是法军胜利的结果,也是法国外交善于利用第一次反法同盟各成员国之间、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同普鲁士签订的和约引起了同盟的瓦解;1795 年 7 月 22 日西班牙也在巴塞尔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了单独和约。——第 19 页。
- 32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所指的就是这封信)中说,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印数是三千份,并且全部卖光了。——第 20 页。
- 33 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实质上是拥护拿破仑第三借口“解放”意大利而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在这个问题上赞成福格特的观点的。拉萨尔在 1859 年 5 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中以最集中的形式叙述了他对于意大利问题的观点。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坚持让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普鲁士一波拿巴派立场,主张让奥地利遭受失败,以便普鲁士利用这种失败去从上面统一德国。

意大利战争是 1859 年 4 月 29 日至 7 月 8 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借助于顺利的“局部”军事行动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意大

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取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20、432、444、508页。

- 34 指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政论家弗吕贝尔1860年1月20日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60年1月24日《总汇报》第24号上。弗吕贝尔在这篇声明中证明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指出他的行为是“对德国民族的背叛”。恩格斯嘲笑了拉萨尔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于这篇声明表示的明显的否定观点。——第21页。
- 35 指1859年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结束后萨瓦和尼斯并入法国，这暴露了拿破仑第三的侵略计划。——第21页。
- 36 指马克思致《自由新闻》编辑的声明，马克思在这个声明中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共谋者。声明没有被刊登在《自由新闻》上，而是以传单的形式用英文单独发表的，传单上的日期是1860年2月4日，标题是《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传单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2—764页）。马克思在许多信中把自己的这个声明称作“英文通告信”或者“反布林德的通告信”。——第22页。
- 37 指福格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 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0—487页）。

-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 1850 年 6 月 22、23、25 和 26 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吕宁的评论中曲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78—379 页)。——第 24、54、446、453、554 页。
- 38 1860 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25 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中作客,他们在这里同威廉·沃尔弗商讨了在报刊上反击福格特的计划。——第 24、38、435 页。
- 39 马克思指的是他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见注 25)一事。——第 24 页。
- 40 福格特这个姓和中世纪的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理人——的称呼(“福格特”)相同,马克思利用这一点嘲笑福格特。此外,马克思这样称呼福格特是暗指福格特在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曾经是五个帝国摄政之一(见注 19)。——第 24、32 页。
- 41 指 1860 年 2 月 3 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简讯,简讯报道了福格特对法国准备吞并萨瓦和尼斯的亲波拿巴言论。福格特在谈话中把拿破仑第三的真正意图隐瞒起来,说法国政府似乎准备使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等萨瓦的中立地区归属瑞士,以换取对辛普朗的自由使用。恩格斯在自己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中揭穿了这种言论的涵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57—658 页),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也做了揭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00—602 页)。——第 24、26 页。
- 42 指马克思力图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承认,他是那个揭露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刊登在 6 月 18 日的《人民报》和 6 月 22 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马克思这样做很重要,因为福格特在自己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自己,并诽谤马克思把布林德当作自己的党的替罪羊。马克思还力图通过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怯懦行

为，他们不敢同波拿巴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在布林德和排印传单《警告》的印刷厂主霍林格尔的压力下，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维耶于 1859 年 11 月写了个声明，说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总汇报》拒绝刊登这项声明，它发表在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中（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7—518 页）。但是，1860 年 2 月 8 日维耶向治安法庭作了供词，证明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 36、37、436、437 页）。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01—525 页）和马克思 1860 年 2 月 24 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 454—459 页）。——第 24、30、554、561 页。

43 指马克思打算对《国民报》提起诉讼（见注 9）。——第 25 页。

44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于 1847 年 6 月初在伦敦通过改组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而成立的。1847 年 1 月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约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参加根据他们两人的观点改组同盟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示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加下在它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 年 6 月初和 184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上制定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 1848 年 2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页）。

随着法国革命的开始，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 1848 年 2 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后，巴黎于 3 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马克思迁到了那里。恩格斯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848 年 3 月下半月至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开始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3 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5 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

治纲领。这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无视客观规律，无视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在1850年9月15日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上，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支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曾经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第25、442页。

- 45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主要是毕尔格尔斯草拟的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告的作者表示完全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并指出理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意义。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而把分裂的过错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及其在伦敦的战友身上。科伦中央委员会的公告并没有象下面信中所说的落到了汉诺威警察当局手中，而是于1850年5月10日在莱比锡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诺特荣克时落到了萨克森警察当局手中。它于1851年6月被刊登在《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和《科伦日报》上。恩格斯曾在1851年6月27日的信中把这

件事告诉了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292 页)。——第 26 页。

- 46 威廉·沃尔弗的声明驳斥了福格特和《国民报》关于沃尔弗似乎起草了告德国无产者的通告并把它交给了警察当局的诽谤性捏造,这个声明注明的日子是 1860 年 2 月 6 日,发表在《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7 页)。——第 26、445 页。
- 47 1860 年 2 月 6 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 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齷齪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 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04—415 页,以及马克思 1860 年 2 月 24 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 467—468 页)。——第 28、31、47、177、440、490、554 页。
- 48 恩格斯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于 1860 年 4 月在柏林由贝伦兹出版社匿名出版。——第 31 页。
- 49 指马克思为了获得能够驳斥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和揭露他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材料而写的信。马克思需要用这种材料来写一本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和控诉《国民报》。马克思把这些信寄给自己的朋友,也寄给他和恩格斯在工作中接触过的人或者能够告诉他关于福格特的情况的人。——第 32 页。
- 50 关于“硫磺帮”,见注 47。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还把“硫磺帮”叫做“制刷匠帮”（见本卷第 467—469 页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16—426 页）。

席利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67—469 页）。——第 32、440 页。

- 51 伊曼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讲了“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情况，此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20 页）。——第 32 页。
- 52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1860 年 2 月 6 日为纪念协会成立而举行的宴会。马克思出席了宴会，他受到特别邀请，是为了对他发展共产主义原理的功绩表示尊敬。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福格特的诽谤。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80—681 页）。——第 33、475 页。
- 53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马克思不应当同李卜克内西保持党的关系，因为李卜克内西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通讯员。——第 33 页。
- 54 1850 年 6 月中，马克思通过佐林根工人克莱因把接受拉萨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建议转达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区部的领导者。1850 年 6 月 18 日科伦区部的领导者之一勒泽尔写信告诉马克思说，科伦共产主义者不能接受拉萨尔加入同盟，因为他“依然坚持贵族的原则，而且在争取工人的共同福利的斗争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关于杜塞尔多夫工人对拉萨尔的谴责于 1856 年由社会主义者勒维转告马克思一事，见马克思 1856 年 3 月 5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27—29 页）。——第 34 页。
- 55 布林德曾经是祖国之友协会的会员，这是一个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由伦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主义团体；斐·弗莱里格拉特、菲·霍林格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第 34 页。
- 56 排字工人费格勒于 1860 年 2 月 11 日提供了一份证词，实质上证实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 42）。这份证词，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

-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43—744 页)。——第 36、42 页。
- 57 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21 和 745 页)和马克思 1860 年 2 月 8 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见本卷第 436 页)中,不是“六个月”,而是“六个星期”。——第 36 页。
- 58 指《自由新闻》报出版部排印马克思的通告信《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见注 36)的印刷费。——第 41 页。
- 59 马克思显然还没有得知他的这篇《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已经刊登在 1860 年 2 月 10 日《科伦日报》第 41 号上。——第 41 页。
- 60 马克思这样开玩笑地称呼波克罕 1860 年 2 月 12 日给他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06—409 页),波克罕在这封信中叙述了所谓的“硫磺帮”(见注 47)的历史。——第 42 页。
- 61 尤斯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街旁是尤斯顿车站。——第 43 页。
- 62 在 1860 年 2 月 15 日《每日电讯》上登载了布林德的朋友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断言,传单《警告》(见注 42)的作者是他本人。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证明,传单的真正作者是布林德,而沙伊伯勒是个冒名顶替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23—525 页)。——第 43、44 页。
- 63 指布林德 1859 年 11 月 3 日发表的声明,声明刊登在 1859 年 11 月 9 日《总汇报》第 313 号上。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第 44 页。
- 64 恩格斯由于父亲去世,从 1860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6 日在巴门。——第 44、578 页。
- 65 1860 年春济贝耳到巴黎和日内瓦,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他在那里靠约·菲·贝克尔和洛美尔的帮助弄到了马克思写反对福格特的书所需要的材料和消息。——第 46 页。

- 66 马克思在 1861 年 2 月 28 日曾到荷兰他表舅莱昂·菲力浦斯那里去过。——第 46 页。
- 67 指李卜克内西 1860 年 3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他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不要他做该报的通讯员，他请马克思介绍他担任任何一家美国报纸的通讯员。——第 46 页。
- 68 卡·济贝耳《宗教和爱情。匿名日记形式的小说》1860 年汉堡版 (K. Siebel. 《Religion und Liebe. Roman aus dem Tagebuche eines Anonymen》. Hamburg, 1860)。该书出版时没有注明作者。——第 48 页。
- 69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洛美尔侨居日内瓦，他应马克思的请求，从日内瓦给马克思寄去一些新的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福格特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诽谤。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6 页)。——第 48 页。
- 70 指斐·拉萨尔的《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F. Lassalle. 《Fichte's politisches Vermächtniß und die neueste Gegenwart》)一文。文章载于《民主研究》(《Demokratische Studien》)文集，1860 年汉堡版第 59—96 页。文集的出版者是瓦勒斯罗德。——第 49 页。
- 71 《关于计划由法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文件以及关于瑞士和中立地区萨瓦之间关系的备忘录》1860 年伦敦版，共三卷(《Papers relating to proposed Annexation of Savoy and Nice to France and Memorial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Savoy as a Neutral》. 3 parts. London, 1860)。
-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 50、262 页。
- 72 指斯图加特的法兰克福“残阙”国民议会。——第 50 页。
- 73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84—686 页)。——第 52 页。
- 74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

- 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04—606 页)。——第 53 页。
- 75 关于上述报刊的言论,见马克思的《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6—68 页)。——第 53 页。
- 76 指费舍 1860 年 5 月 2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建议马克思为“新筹办的报纸”撰稿。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 1860 年 5 月 8 日和 6 月 1 日给费舍的信(本卷第 532—533、536—537 页和注 506)。——第 53 页。
- 77 指瑟美列 1860 年 5 月 5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他向马克思谈到报刊对他的小册子的评论,小册子就是 1860 年巴黎出版的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B.Szemere.《La Question hongroise (1848—1860)》.Paris, 1860)。并见注 412。——第 53 页。
- 78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他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是因为他曾在 1846 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第 53、64、76、226 页。
- 79 指埃梅尔曼 1860 年 4 月 29 日给席利的信和博伊斯特 1860 年 5 月 1 日给席利的信。他们在信中对马克思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特别是在博伊斯特的信中,竟说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善于“压服”人。——第 54 页。
- 80 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2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引用了贝尔姆巴赫的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88—89 页)。——第 56 页。
- 81 那不勒斯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及其走卒看到人民痛恨波旁王朝压迫的情绪日益增长,于 1860 年春在西西里各地挑起了流血冲突。为了回答这种行为,1860 年 4 月西西里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是在统一意大利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巴勒摩和墨西拿,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是大部分起义者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很快就加入了 1860 年 5 月在西西里登陆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兵。关于西西里事件,见马克思的文章《西西里和西西里人》和《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9—52 页和第 63—68 页)。——第 57 页。

- 82 5月下旬,恩格斯在去巴门探望重病的母亲之后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第59、533、550页。
- 83 指拉萨尔1860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在这封信中,拉萨尔对费舍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并向马克思,他是否真的同费舍保持关系。此外,拉萨尔建议马克思到柏林去,以便在对艾希霍夫的诉讼案(见注29)的第二级审讯中充当证人去揭露施梯伯。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这封信的答复,见本卷第538—549页。——第59、60页。
- 84 指洛美尔1860年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说已把包裹寄给马克思,这包裹中显然放有揭露福格特的材料。——第62页。
- 85 1860年6月16日和17日,拿破仑第三同普鲁士的摄政王威廉及其他德意志各邦君主在巴登—巴登举行了会晤。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新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74—79页)。——第64页。
- 86 1860年5月12日在普鲁士众议院会议上,波兹南的议员涅果累夫斯基揭露了普鲁士当局驻波兹南代表的挑衅性活动。——第65页。
- 87 小德意志派主张建立小德意志,即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66、149、264、300、615页。
- 88 这篇叫做《森林之王的女儿》的叙事诗,是由诗人海德翻译的。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是用丹麦文援引这首叙事诗的。——第66页。
- 89 恩格斯在相当久以后才履行马克思的这个请求。1860年7月24日左右,他写了《不列颠的国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05—109页)。8月8日,恩格斯写了《加里波第的运动》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2—135页)。

从恩格斯1860年6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72页)中可以看出,关于印度的贸易的文章他显然没有写。马克思自己在《不列颠的贸易》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83—87页)中扼要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第70页。

- 90 马克思需要用这个材料来写他的反击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特别是要用它来揭露福格特的亲波拿巴的观点，福格特曾在 1859 年日内瓦和伯尔尼出版的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Genf und Bern, 1859）中鼓吹过这种观点。
关于波希米亚战略意义的问题，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本抨击性著作中看来是根据恩格斯供给他的意见阐述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46—550 页）。——第 70 页。
- 91 指法律顾问维贝尔 1860 年 6 月 22 日给马克思的信，他在信中通知说，1860 年 6 月 8 日王国柏林市法院不受理马克思对《国民报》的诉讼（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88 页）。——第 71、74 页。
- 92 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诉讼案在巴伐利亚的城市奥格斯堡进行审理（见注 16）。——第 72 页。
- 93 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同福格特一起为 1860 年由迈斯纳的出版社出版的《民主研究》文集撰写文章一事。在这一文集中，登载了拉萨尔的文章《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和福格特的文章《现今的日内瓦一瞥》（《Ein Blick auf das jetzige Genf》）。
马克思最初打算把自己的反对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交给汉堡的出版商迈斯纳出版。——第 73、74 页。
- 94 在柏林还有法官——这是套用关于桑苏西一个磨坊主的传说中的一句话：“是的，要是在柏林没有上诉法院的话”。根据传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要求拆掉这个磨坊主的磨坊来建造桑苏西宫殿，他就用这句话来回答国王的要求。这句话在德国成了成语。这个传说的题材曾被许多作家利用过。——第 75、82 页。
- 95 马克思指的是福格特在其亲波拿巴的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1859 年日内瓦版第 64 页和第 33 页上所说的话。马克思对福格特的这些论点的批评，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37 页和第 560—561 页）。
马克思所说的“力和物质”，是讽刺地暗指 1855 年出版的德国生理

学家毕希纳的一本书的书名《力和物质》。毕希纳和福格特一样是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76 页。

- 96 指加里波第 1860 年夏写给马克思一个熟人英国人格林的信。信中谈到加里波第力图使意大利人民争取国家的民族统一和国家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不依赖于拿破仑第三的政策而独立地进行。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文章《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00—104 页）。——第 77 页。
- 97 7 月 23 日马克思自己写了关于西西里事件的文章：《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00—104 页）。
关于普鲁士军队改革，见注 13。显然，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恩格斯当时没有写。——第 78 页。
- 98 指 1860 年 7 月卡富尔的特使朱泽培·拉法里纳被驱逐出西西里一事。关于这件事的详情，见马克思的文章《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00—104 页）。——第 78 页。
- 99 指英国议会议员自由党人金累克 1860 年 7 月 12 日在下院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列举了许多事实揭露法国波拿巴政府的政策的真实意图，这个政府把自己说成是意大利的保卫者。演说中他还谈到，在 1859 年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见注 33）以后，1859 年 7 月在维拉费兰卡举行签订和约的谈判时期，拿破仑第三向奥地利代表提出把伦巴第留给奥地利，以换取一当法国试图侵占莱茵河左岸德国领土时承担保持中立的义务。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73 页）。——第 79、325 页。
- 100 指 1860 年 7 月提交给英国议会审查的《调查联合王国国防御工事的特派员的报告；附证词记录和附录》1860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Defenc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London,

- 1860)。——第 80 页。
- 101 关于英国的国防,恩格斯除《不列颠的国防》(见注 89)一文外,1860 年 7 月底还写了《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这篇文章曾刊登在 1860 年 8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21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15—120 页)。——第 80 页。
- 102 1860 年 7 月 15 日《总汇通报》第 197 号在“外国新闻。——英国”栏内关于英国下院会议的报道中,就金累克在下院的演说只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丝毫未提及金累克揭露波拿巴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问题。关于金累克的演说,见注 99。——第 81 页。
- 103 马克思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在王国柏林市法院 1860 年 6 月 8 日不受理对《国民报》的控诉(见注 91)后,对这个法院的决定向上诉法院提出了控诉,1860 年 7 月 11 日接到了驳回的决定。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01—702 页)。——第 81 页。
- 104 1860 年 10 月底至 1861 年 1 月上半月,恩格斯写了《步枪史》一文,其中深入考察了小型火器的发展。这篇文章发表在 1860 年 11 月 3 日至 1861 年 1 月 19 日的八期《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09—241 页)。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是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1860 年至 1862 年在曼彻斯特出版。恩格斯从 1860 年 8 月至 1862 年 3 月为这个杂志撰稿。——第 83 页。
- 105 指加里波第 1860 年夏天在南意大利进行的旨在使其从那不勒斯波旁王朝政权下解放出来的军事行动。——第 84 页。
- 106 1860 年 9 月 1 日左右,恩格斯写了《加里波第的进军》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63—167 页),而在 9 月初写了《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68—171 页)。马克思本人在自己的文章《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96—200

页)中谈到图尔,并且还谈到法国人企图通过图尔影响加里波第。——第 84 页。

- 107 8 月底至 9 月初,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文章,阐述了这两个问题,文章标题为:《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和《不列颠的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57—162 页和第 172—176 页)。——第 87 页。
- 108 1860 年 9 月在报刊上出现了关于俄国皇帝、奥地利皇帝与普鲁士摄政王即将会见的报道。会晤于 1860 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由于要阻挠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抗为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撑腰的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企图互相拉拢。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文章《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92—195 页)。——第 89、147 页。
- 109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第 92、178 页。
- 110 指恩格斯的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49—156 页),这篇文章于 1860 年 8 月 24 日左右写成,最初发表于《军事总汇报》,该报后来登载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略加改动后发表于《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以及《志愿兵读物》文集。恩格斯从这篇著作开始,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志愿兵的文章。——第 92 页。
- 111 1849 年 6—7 月,恩格斯参加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展开的革命斗争。关于这件事,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页)。——第 92 页。
- 112 指德纳 1860 年 9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请求立即把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海军这个条目寄来。

《美国新百科全书》(《New American Cyclopaedia》)是一部科学参考书,它是由《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一些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查·德纳、里普利和其他一些人)出版的。《百科全

书》于 1858—1863 年出版，共十六卷，1868—1869 年按原版重印。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知名学者都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虽然《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部书也和其他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一样具有折衷主义色彩，但是《美国新百科全书》仍然收进了许多反映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士的观点的条目。

在《百科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在写这些条目时，不顾编辑部向作者提出的不得阐明党派观点的条件，而采取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工作从 1857 年 7 月开始继续到 1860 年 10 月。他们给《百科全书》写的条目都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中。——第 94 页。

- 113 详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96—200 页）。——第 95 页。
- 114 克维里纳尔山是罗马位于其上的七座小山之一。——第 99 页。
- 115 1849 年罗马共和国由于遭到法国干涉而崩溃，从这时起法国军队在罗马一直驻扎到 1870 年。——第 99 页。
- 116 显然是指莱比锡出版商维干德 1852 年 3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维干德在信中表示拒绝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因为有遭到国家迫害的危险”。——第 101 页。
- 117 指 1860 年 10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3739 号上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那篇社论。——第 102 页。
- 118 科苏特给加里波第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99—200 页。——第 102 页。
- 119 1860 年 10 月 1 日加里波第的军队在沃耳土诺击败那不勒斯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的军队。南意大利的解放基本上由于这次胜利而完成。——第 104、105 页。
- 120 1860 年 9 月 24 日《泰晤士报》第 23733 号上用《德国人对志愿兵的一种评价》（《A German Account of the Volunteer》）作为标题刊登了恩格

- 斯的《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一文的摘要。——第 104 页。
- 121 关于加里波第出身的这个材料是不确切的。——第 105 页。
- 122 显然是指科拉切克的《欢呼者》(《Die Juchheisten》)一文,该文载于 1860 年《时代呼声》杂志 10 月号。这篇文章中揭露福格特的那一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51—752 页)。——第 105、109 页。
- 123 1860 年 10 月 5 日,柏林最高法院驳回了马克思的律师法律顾问维尔对王国上诉法院关于控诉《国民报》的诽谤案的决定的上诉书(见注 9 以及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15 页)。——第 106 页。
- 124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75—716 页)。——第 107 页。
- 125 信没有找到。——第 108、211、229、335、363、614、630、676 页。
- 126 指洛美尔 1860 年 4 月 5 日反对福格特的声明;声明特别揭露了福格特亲波拿巴的活动。这篇声明原来是准备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但是,自洛美尔知道他很少有可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这篇声明以后,他就把它连同 1860 年 4 月 13 日他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一并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洛美尔这封信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6 页)。——第 109 页。
- 127 德国政论家班贝尔格尔是 1859 年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去意大利,好啊!》(《Juchhe nach Italia!》)的作者。
马克思引的这句话,出自刊登在 1860 年《民主研究》上的班贝尔格尔的《米哈埃尔“赞成”和托马斯“反对”在 1859 年的通讯》(《Des Michael Pro Schriftenwechsel mit Thomas Contra, aus dem Jahr 1859》)一文。——第 110 页。
- 128 指 1860 年 11 月 12 日《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一则简讯,即说路易·拿破仑支持象《国民报》这样的报纸是枉费金钱(简讯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51 页)。——第 111 页。

-
- 129 看来是指《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6—200页)。——第113页。
- 130 这篇声明马克思还寄给了《人民报》和《总汇报》，并刊登在1860年12月1日《总汇报》第336号附刊上(见马克思《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71—772页)。——第114页。
- 131 黑格尔关于纯思维，或者纯存在和无是同一的这个论点在他的《逻辑学》中有发挥(见《逻辑学》第1册第1篇第1章和《哲学全书》第1部第87—88节)。——第116页。
- 132 这篇文章没有找到。——第120、124页。
- 133 1861年1月底恩格斯写了《法国的武装力量》一文。这篇文章最初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后来经恩格斯修改寄给了《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刊登在1861年2月2日该杂志第22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57—261页)。——第120页。
- 134 指爱·西蒙的《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一文，该文刊登在1860年2月15日《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杂志上。西蒙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利用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一些话(见注37)。——第122页。
- 135 在这封信的这一段和以下几段中谈的是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24页。
- 136 马克思在1849年离开科伦时不得不把他早在1848年革命以前所收集的藏书留在那里。马克思走后，藏书暂时留在丹尼尔那里。丹尼尔开列的这批藏书的书单保存下来了，上面有马克思亲笔作的记号。1851年丹尼尔被捕后，藏书曾遭到抢劫。1860年底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藏书靠济贝耳的帮助转寄到伦敦马克思处。——第126、152、159页。
- 137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3—754页)和本卷第133、134页。——第126页。

- 138 布拉斯主编的《日内瓦国境通报》1860年12月22日第12号上刊登了刚刚出版的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广告,并列出各章的标题。——第132页。
- 139 《改革报》1860年12月10日第148号和12月19日第152号,刊登了两篇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短评。1860年12月15日第150号附刊和12月19日第152号刊登了广告,说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刚刚在伦敦出版,并列出各章的标题。——第133页。
- 140 指通过佩奇的出版社在伦敦销售1853年波士顿出版的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尚未售出的那部分书。同时有若干本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转寄给佩奇去销售。——第138页。
- 141 指梅因的诽谤性文章《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揭露》(《Die neue Denunciation Karl Vogt's durch K. Marx》)该文载于1860年12月27日和29日《自由射手》报第155号和第156号以及该报1861年1月1日第1号。梅因在这篇文章中试图毫无证据地否定马克思关于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论断。——第138页。
- 142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奥地利帝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剧和由此引起的内政危机。弗兰茨-约瑟夫政府力图缓和国内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于1860年底对民族解放运动作了一些不彻底的让步。关于这个问题,见恩格斯的《奥地利革命的发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49—252页)。——第140页。
- 143 1860年11月选举主张限制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为美国总统,这成了南部奴隶主脱离联邦和对北部各州公开叛乱的借口。1861年4月12日,叛乱者以炮轰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发动了这场延续到1865年的美国内战。关于内战的详细情况,见本卷第173—190页,并见马克思《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两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6—366页)。——第141、173页。
- 144 信的下面是马克思手抄的关于《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短评,这篇短评载

于 1861 年 1 月 9 日《外国文学杂志》(Magazin für die Literatur des Auslandes) 周刊第 2 期。短评的作者是贝塔(贝特齐希),它对马克思进行了一系列诽谤性的攻击。在手抄稿的一个地方,即短评作者试图为 1851—1852 年金克尔的冒险行动辩解的地方,马克思写了这样的批语:“这就是哥特弗利德”。

对金克尔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在这个时期的活动,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和《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页和第 14 卷第 397—754 页)中作了揭露。——第 143 页。

- 145 1859 年《凉亭》画报第 43 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 1859 年 11 月 19 日、26 日和 12 月 11 日 [或 12 日] 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488、491、493、502—503 页)。——第 143 页。
- 146 1861 年 1 月 12 日,在普鲁士由于威廉一世即位颁布了对政治流亡者的大赦。恩格斯就这个题目所写的一篇文章没有刊登出来。——第 144、573 页。
- 147 后备军是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包括年龄较大的常备军和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按照普鲁士法律,只有战时才能征集后备军。1849 年 5 月初,普鲁士政府颁布的关于征集莱茵省后备军员额的命令,是普鲁士莱茵地区人民起义的信号。在许多城市(爱北斐特、伊塞隆、佐林根等),后备军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起义者失败后,运动的大部分参加者不得不流亡国外。按照普鲁士后备军条例的规定,凡是破坏军纪的人员应受军事法庭审判。这个条例同样适用于返回普鲁士的流亡者——过去的后备军战士。——第 145、179 页。
- 148 马克思指的是威廉一世(当时是普鲁士亲王)参加镇压 1849 年在德国爆发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 145 页。
- 149 马克思指的是 1861 年 1 月中在德国报刊上发表的洛贝尔图斯、贝尔格、布赫尔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声明。声明的作者要求什列斯维希—

- 霍尔施坦和奥地利与普鲁士一起同时加入未来的德国，以便取得通往北海和地中海的出口。声明的作者作为建立“大德意志”的拥护者，号召通过进一步巩固德意志联邦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第 146、149 页。
- 150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就这个题目于 1861 年 1 月底写了一篇文章《德国的运动》，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刊登在 1861 年 2 月 12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53—256 页）。——第 147 页。
- 151 马克思指的是 1857 年 10 月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签订的合同，当时该报编辑部由于经济危机而辞退了除了马克思和泰勒以外的所有欧洲通讯员，但是马克思的通讯的数量被缩减到每周一篇。马克思由于自己家庭的物质状况极端困难，而不得不同意了这些条件。——第 148 页。
- 152 马克思大概是指拉萨尔寄给他的那份备忘录，这是拉萨尔由于在 1856 年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案而写的，并于 1861 年初以《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对非法侵占财产的控诉书》为题呈交普鲁士众议院。控诉书还附有一件致内阁的便函，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制度。——第 149、576 页。
- 153 评价员是英国的官吏，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 150、219、271、312 页。
- 154 指出版一本名为《志愿兵读物》的文集，该文集收入恩格斯于 1860 年和 1861 年初在《志愿兵杂志》上发表的五篇军事论文：《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法国轻步兵》、《志愿兵炮兵》、《步枪史》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文集于 1861 年 3 月 16 日左右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73、149—156 页及其他各页）。——第 155 页。
- 155 金克尔是作为牧师助手开始其生涯的。——第 157 页。
- 156 由于 1860 年在意大利南部展开了推翻那不勒斯王国波旁王朝的统治和统一国家的斗争，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

- 反对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1860年9月,拿破仑第三派遣军舰到加埃塔要塞,那里躲藏着那不勒斯的最后一个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见注81)。法国军舰阻碍了对加埃塔建立海上封锁,但是拿破仑第三于1861年1月在英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召回法国分舰队。——第157、574页。
- 157 关于法国干涉叙利亚这件事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10—114页)。——第157页。
- 158 马志尼给布林德的信是在1861年2月23日《海尔曼》报上以《意大利和德国》(《Italien und Deutschland》)为题发表的。——第158页。
- 159 指伦敦的流亡者协会“德意志统一和自由”。——第159页。
- 160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奥格斯堡战役》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第159页。
- 161 指《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1843年巴黎版(《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e siècle》,Paris,1843)。——第159页。
- 162 指公元前一世纪凯撒和庞培的拥护者之间进行的古罗马内战的最后阶段。从公元前49年的秋天起,凯撒在伊皮罗斯(希腊)进行反庞培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庞培军队于公元前48年6月6日在法尔萨拉(特萨利亚)战役中被歼而告终。——第160页。
- 163 马克思从1861年2月28日至3月16日住在扎耳特博默耳的莱昂·菲利浦斯家里。马克思从荷兰去柏林,在那里一直逗留到4月12日。马克思在德国逗留期间还到过爱北斐特、巴门、科伦和特利尔,于4月29日返回伦敦。——第160、675页。
- 164 《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报是1848年7月作为温和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创办的,1848—1849年奥地利革命失败后曾暂时被封,这就使它得到了某种“反对派立场”的名声。该报在六十年代初很受欢迎,原因是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持反波拿巴立场以及发表了反对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对内政策的言论。《新闻报》的编辑部一再想使马克思为该

报撰稿,但是马克思一直到 1861 年 10 月,才表示了同意。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的文章,涉及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向奥地利和德国的读者介绍了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民主运动。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持续一年多。在这期间,该报共登载了马克思五十二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他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一篇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章和通讯有相当多一部分未被该报编辑部刊载。这是马克思在 1862 年底停止为该报撰稿的主要原因。——第 161 页。

- 165 大概是指卡·亨·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1 卷:《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1860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第 6 版(增订版)(K. H. Rau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and 1: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Sechs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sgabe.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60)。——第 162 页。
- 166 《新莱茵报》给普富尔以“硝酸银”(《von Höllestein》)的绰号,是由于他残酷镇压 1848 年波兹南起义的参加者。根据普富尔的命令,给被俘的波兹南的起义者剃光头发,并用硝酸银在他们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第 162 页。
- 167 指 1860 年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见注 13)和关于取消贵族征税特权的法案,该法案同年提交给普鲁士议会,但遭到贵族院的否决。
普鲁士军队改组问题成了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在六十年代初发生的所谓宪制冲突的导火线。1860 年 2 月,普鲁士议会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草案。但是政府很快就使资产阶级批准了对“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这实际上是开始实现拟议中的改组。宪制冲突到 1866 年才得到解决,这时在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向政府投降,批准了政府在以前进行的全部活动。——第 162 页。
- 168 普鲁士国民(协商)议会是 1848 年 5 月在柏林召开的,旨在“和王权协商”制定宪法;1848 年 12 月普鲁士政变时被解散。——第 163 页。
- 169 指匿名的论文《关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二日大赦令的解释》(《Zur Auslegung des Amnestie-Erlasses von 12. Januar 1861》),载于 1861 年

- 5月1日《普鲁士司法报》第26号上。该文的续篇载于1861年5月15日该报第30号上。——第165页。
- 170 马克思1861年春在柏林时,为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采取了一些措施。柏林警察总局拒绝了马克思根据王室大赦令要求给他以普鲁士公民权的申请,而建议按通常手续申请入普鲁士国籍。但是马克思关于入籍的申请在1861年6月被柏林警察总监策德利茨拒绝,同年11月又遭普鲁士内务大臣施韦林拒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67—685页)。——第165、186页。
- 171 指1861年3月由于邓洛普的建议而引起的议会辩论一事,邓洛普建议对帕麦斯顿领导的英国外交部1839年伪造外交文件问题成立调查委员会。这种伪造的目的在于掩盖1838—1841年英国发动对阿富汗战争的挑衅作用。邓洛普提出这个建议,是由于1859年再版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外交来往公文,其中包括了以前被取消的全部文件,完全揭露了英国政府所进行的伪造。帕麦斯顿于1861年3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中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借口这个问题年代过久,没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第166、384页。
- 172 达尔马(Dharma)是古印度的宗教教义,规定了生活和行为的一些基本规则。马克思讽刺地这样称呼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第167页。
- 173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见注168)的左翼,它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左翼自由派组成的。——第167页。
- 174 马克思指的是1848年11月至12月初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由于这次由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的反动内阁所策划的政变,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建立起极端反动的制度。——第167页。
- 175 普鲁士协商派议会,即普鲁士国民(协商)议会(见注168)。马克思为加强同民主派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于1848年9月上半月(9月7日和10日之间)去柏林的时候,曾参加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第168页。
- 176 指贵族院和众议院,即普鲁士议会的上院和下院。——第168页。

- 177 1848年11月,西姆桑和海尔根汉一同作为帝国专员被派到柏林去调解普鲁士国王和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之间的冲突。11月23日,曼托伊费尔向专员们宣布,普鲁士政府不服从法兰克福议会关于在普鲁士成立一个有声望的内阁的决议。西姆桑和海尔根汉在他们的使命遭到失败以后,于1848年12月返回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讽刺地把西姆桑比作参孙,据圣经传说,参孙用驴腮骨杀死了一千名非利士人。——第169页。
- 178 马克思指的是他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芬克的描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65—674页)。——第169页。
- 179 恩格斯是1861年5月20日左右到伦敦的,在马克思那里住到5月23日。马克思把他去德国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恩格斯。——第171、601页。
- 180 恩格斯于1849年5月参加了爱北斐特的起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96—599页),因此普鲁士政府对他下了逮捕令。1849年6月至7月,恩格斯又在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进行战斗(见注111)。——第171页。
- 181 马克思指德意志民族联盟(见注18)伦敦分部。——第173、181页。
- 182 1861年5月,由于美国内战爆发,联邦政府曾向加里波第建议,要他担任北军的指挥职务。为此美国驻布鲁塞尔公使被派往加里波第所在的卡普雷腊岛。加里波第在他的信里对北美人士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拒绝了要他担任的职务,他认为美国的战争没有涉及黑人奴隶制度问题,而是一般的内乱。他声称,一旦战争具有反奴隶制度的解放斗争的性质,他就准备站在北军方面进行战斗。——第173页。
- 183 根据美国宪法,新总统应当在1861年3月4日就职。——第173页。
- 184 1861年6月,圣路易斯市(密苏里州)德国侨民区的居民建成四个志愿兵团,用武力抗拒叛乱者强使密苏里州脱离联邦并使其加入蓄奴州的同盟的企图。——第175页。
- 185 指那些拒绝加入南部同盟的边界蓄奴州:德拉韦、密苏里、马思兰以及

与其毗连的、划作独立行政区的华盛顿。肯塔基州宣布中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详见马克思《美国内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7—366页)。——第175页。

- 186 马克思指的是泽尔菲在金克尔策动下在英国报纸上为1860年9月在波恩被捕、并以不服从地方政权的罪名送交法庭审判的英军上尉麦克唐纳辩护。英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1861年5月才得到解决),作为加强反普鲁士宣传的借口。泽尔菲的言论在民族联盟(见注18)中引起强烈不满,并在它的伦敦分部中引起冲突。——第177、182、231、599页。
- 187 指在《人民报》上发表的、针对金克尔所出版的报纸《海尔曼》而写的《报刊述评》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4—695页)。——第177页。
- 188 1859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的布朗基,于1861年3月在巴黎再次被捕,罪名是组织秘密团体。布朗基在判决前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在那里遭到监狱当局的残酷对待。尽管没有罪证,布朗基于1861年夏天被判四年徒刑,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服刑。1864年布朗基患病,因而转到奈克尔医院,在那里被软禁在单人病房里。1865年他逃跑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住在他朋友瓦托博士那里。一直到1869年大赦以后,布朗基才回到法国。
- 信里是指瓦托(德农维耳)准备为布朗基案件出版的小册子。该小册子载有揭露波拿巴的警察和司法机关的材料。瓦托请求马克思帮助他编辑和印刷这本小册子。1861年11月,马克思把在德国侨民工人当中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募集来的钱转寄给了瓦托(见本卷第611页)。——第178、609页。
- 189 墨西哥战争是1846—1848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它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而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几乎占领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其中包括得克萨斯、上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第178页。
- 190 1850年关于丹麦王位继承的议定书,是1850年8月2日在奥地利、英国、俄国、法国、瑞典和丹麦的代表参加的伦敦会议上签订的。这个议定

书规定了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的丹麦王国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成了1852年5月8日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的基础(见注352和353)。——第179页。

- 191 马克思指的是那些认为利润是由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的简单增加额的庸俗经济学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这种观点作了批判。——第180页。
- 192 指北部的民军在皮尔斯将军指挥下于1861年6月10日企图占领离门罗要塞(弗吉尼亚州)不远的大贝瑟耳附近的南军筑垒阵地的没有成功的尝试。皮尔斯将军的部队在夜战中把自己的一支部队当做敌军进行射击。马克思把皮尔斯讽刺地比作格林兄弟的一篇著名童话中的主人公“勇敢的小裁缝”。——第180页。
- 193 指力图把堪萨斯变为蓄奴州的奴隶制拥护派与奴隶制反对派(主要是农民)之间于1854—1856年在堪萨斯进行的武装斗争。尽管奴隶制反对派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堪萨斯还是落在得到联邦政府武装援助的奴隶制拥护派手里。但是该州大多数居民继续进行斗争,要求把堪萨斯作为自由州接纳加入联邦。堪萨斯的斗争实际上是美国内战的开始。——第181页。
- 194 指六个分离出去的蓄奴州(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西安纳)于1861年2月4日至3月16日在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举行的国会。国会宣布成立奴隶制国家即美利坚同盟,并通过临时宪法。——第181、187、596页。
- 195 马克思称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为德国共产主义者协会(见注1)。
各法国人协会是指伦敦的很多法侨协会。1864年由这些协会建成第一国际的伦敦法国支部。马克思说的六月起义是指1848年8月23日至26日巴黎的无产阶级起义。——第183页。
- 196 指1861年6月华盛顿国会的补选。——第187页。
- 197 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改变。——第188页。
- 198 “白种贫民”是南部蓄奴州的自由的、但依附于奴隶主的无地居民;关于

- 这方面情况，见马克思《北美内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4—355页）。——第188页。
- 199 第二届世界工业博览会于1862年5月至11月在伦敦举行。——第191、229、284页。
- 200 指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831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年度报告形式发表。1861年9月4—11日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协会的第三十一次年会例会。马克思在逗留曼彻斯特期间（见注203），出席了经济学和统计学小组的会议。——第197、254页。
- 201 大概是指金克尔募集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钱。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实现革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辛辣地嘲笑了金克尔这种想法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197、441、501页。
- 202 恩格斯为了在巴门的亲戚那里度假，于10月3日左右去德国，在那里逗留到月底。——第198页。
- 203 马克思于1861年8月底至9月中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作客。——第198、208页。
- 204 指马克思的文章《美国问题在英国》、《不列颠的棉花贸易》、《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和《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21—330、331—334、335—340、341—345页）。其他的文章大概没有在报上发表。——第198页。
- 205 马克思在信中询问《新闻报》编辑部关于该报对1861年秋天奥地利政府危机所采取的政治立场。——第199页。
- 206 马克思指的是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制刷匠帮》一章（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16—426 页)。

关于制刷匠帮,并见注 50。——第 200 页。

- 207 由于华沙居民在 1861 年 10 月间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波兰王国总督兰伯特伯爵在 10 月 14 日颁布了戒严令,禁止集会和唱爱国歌曲等。同时华沙城内各街道上的一切重要地点都由军队占领。尽管如此,10 月 15 日,在华沙的三个主要的天主教堂里,当着大批群众演唱了爱国主义的颂歌。按照总督兰伯特和军事长官格尔施滕茨魏克的命令,10 月 15 日夜间进行了大逮捕,同时在居民和沙皇军队之间发生了冲突,接着关闭了华沙的所有教堂。

马克思提到“美男子威廉的功绩”,是指威廉一世 1861 年 10 月 18 日在科尼斯堡的加冕,按照这次加冕的筹划者的意图,它应该显示普鲁士君主国的坚不可摧。——第 201 页。

- 208 暗指波拿巴法国 1861 年秋季的财政危机,当时国库的赤字达十亿法郎。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富尔德先生》和《法国的财政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94—400 页)。——第 203 页。

- 209 郡法院 (County court) 是英国审理民事案件的初级法院。

最高法院 (Superior court) 是英国 1875 年以前对郡法院管辖权达不到的民事案件的最高一级审理机关。最高法院由几个审判机关组成,其中有民事法院。——第 203 页。

- 210 指威廉一世 1861 年 11 月在普鲁士议会选举前夕在布勒斯劳 (弗罗茨拉夫) 发表的演说。

“只有士兵有助于反对民主派”(《Gegen Demokraten helfen nur Soldaten》)——这是 1848 年一首对君主表示忠诚的诗篇中的一句话,这首诗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见注 174)期间被单独印成传单。普鲁士的反动分子格里斯海姆曾用这句话作为他 1848 年 11 月底在柏林匿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第 204 页。

- 211 恩格斯指的是 1861 年 11 月 8 日北美军舰“圣贾辛托号”截获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和逮捕在该邮船上去欧洲执行外交使命的蓄奴州同盟两个

使者——梅森和斯莱德耳一事。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特伦特号”事件》、《英美的冲突》、《“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和其他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08—411、412—415、416—421页及其他各页）。——第205、237、331页。

212 1857年4月巴枯宁被沙皇政府终生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从那里不止一次地向亚历山大二世请求赦免。巴枯宁1861年4月遭到沙皇最后拒绝以后，便逃到英国（经过日本和美国），于1861年12月到达伦敦。——第205页。

213 指1861年11月19日和12月6日举行的普鲁士议会的下院（众议院）的选举。普鲁士实行两级选举制。——第205页。

214 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是调整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它是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的。——第207页。

215 恩格斯指进步党人在1861年11—12月举行的普鲁士众议院选举中的胜利。

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进步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集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人民革命，进步党没有支持基本的民主要求：普选权、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第207、300页。

216 指英国最高的司法代表——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关于皇家法官对“特伦特号”事件的决定，见马克思的文章《英美的冲突》、《“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12—421、431—436页）。——第212页。

217 “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的称呼，因为帕麦斯顿宣称，正如表示罗马公民身分的惯用语句“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罗马公民的威

- 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第 213 页。
- 218 指 1856 年 4 月 16 日巴黎会议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言禁止海上私掠,保证维护中立国的商船不受交战国的侵犯。——第 213 页。
- 219 指俄国、英国和尼德兰的代表 1815 年 5 月 19 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赔偿俄国把拿破仑军队驱逐出荷兰和比利时各省所花的军事费用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英国和尼德兰政府必须以赔偿的形式向霍普公司的荷兰银行家付清俄国的部分债款以及 1816 年 1 月 1 日以前尚未偿还的这笔债款的利息。协定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一旦比利时的一些省脱离尼德兰,就将停止偿还债款。在 1830 年革命和独立的比利时国家成立之后,尼德兰政府便停止了付款。但是帕麦斯顿代表英国政府在 1831 年 11 月 16 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承认英国过去所担负的财政债务的新协定。——第 214 页。
- 220 看来,马克思是指科勒特的文章《巴枯宁》(《Bakunin》),文章没有署名,载于 1862 年 3 月 5 日《自由新闻》第 10 卷第 3 号第 31—32 页。——第 217 页。
- 221 指棉业危机,危机是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了南部各个蓄奴州,使得来自美洲的棉花供应中断而引起的。英国“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并同它交织在一起。——第 218 页。
- 222 指弗里芒特由于发表文告,宣布解放叛乱分子的黑奴,在 1861 年 10 月被免去密苏里军团司令之职。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弗里芒特的免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01—403 页)。——第 219 页。
- 223 指 1861 年贸易部的报告,报告以附录的形式载于 1862 年 3 月 1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20 卷第 966 期,题为:《关于一八六一年一年内(到 12 月 31 日止)贸易和通航的报告》(《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1861》)。马克思引用的是《英国和爱尔兰农业和工业的商品出口》(《Exports of British and Irish Pro-

duce and Manufactures》)一节中的数字。——第 220 页。

- 224 指 1862 年 2 月北军在格兰特指挥下攻克田纳西河和康伯兰河上的亨利堡垒和唐纳尔逊堡垒的军事行动。随着唐纳尔逊堡垒的陷落,南军约有一万四千人投降。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美国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17—519 页)。

1861 年 7 月 21 日在马纳萨斯城(华盛顿西南)附近的布尔河上进行了美国内战期间的第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南军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但训练很差的北军。——第 221 页。

- 225 指 1848 年和 1851 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黄金热”——从欧洲和美洲向这些地方大批移民。“黄金热”引起了商品价格的猛涨,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者趁机进行投机而发财。——第 223 页。

- 226 马克思指的是《墨西哥问题信件汇编》1862 年伦敦版,共三册(《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Mexico》. 3 Parts. London, 1862)。——第 224 页。

- 227 指墨西哥议会 1861 年 7 月 17 日关于两年内暂停支付外债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干涉墨西哥的借口。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哥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于 1861 年 11 月取消了 7 月 17 日的决定,并表示同意满足三国的要求。

干涉墨西哥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所进行的武装干涉,于 1861 年 12 月开始,目的在于推翻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并把墨西哥共和国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干涉者还打算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干预美国内战援助蓄奴州的基地。在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于 1862 年春天不再继续参加干涉以后,法军继续对墨西哥进行侵略活动。虽然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于 1863 年被占领,墨西哥人民在反对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使殖民者遭到毁灭性的失败。1867 年 3 月法军被迫撤离墨西哥。拿破仑第三的墨西哥冒险之所以失败,还因为这在法国极不得人心,而且国际局势由于美国北部在 1861—1865 年内战中获胜而起了

变化。——第 225 页。

- 228 指恩格斯原定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写的《美国内战》一文。恩格斯同时把该文压缩后寄给《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于 1862 年 3 月 14 日在该杂志上发表。由于《论坛报》编辑部拒绝发表该文，马克思把它译成德文，作了一些补充，寄给了《新闻报》，于 1862 年 3 月 26 日和 27 日在该报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13—523 页）。——第 227 页。
- 229 马克思提到的这次会战是 1862 年 4 月 6—7 日在通往科林斯的要冲上发生的。南军由博雷加德指挥于 4 月 6 日在匹兹堡—兰丁（科林斯的东北部）近郊击败了格兰特的军队，但是翌日，由于布埃耳将军的军队到达，北军转入反攻，南军向科林斯败退。——第 229 页。
- 230 马克思指的是 1862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5 日他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的逗留。——第 230 页。
- 231 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 年柏林第 5 版，表 2：《小行星轨道的基础》（J.H.Mädler.《Der W underbau des Welalls, oder Populäre Astronomie》. 5. Aufl., Berlin, 1861, Tafel II:《Bahnelementen der kleinen Planeten》）。第一版于 1841 年在柏林出版。——第 230 页。
- 232 马克思指的是贝塔（贝特齐希）称颂金克尔的文章，该文以《一个未被赦免者》（《Ein Nichtamnestirter》）为题载于 1862 年《凉亭》第 2 期第 21—24 页和第 3 期第 38—41 页。该文有传记资料。——第 231 页。
- 233 指由于在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马克思于 1862 年 3 月完全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第 232 页。
- 234 指《印度军队组织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59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Indian Army》. London, 1859）。——第 233 页。
- 235 卡·克劳塞维茨《论战争》，1832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4 册：《战斗》第 283

页及其他各页(K. Clausewitz. 《Vom Kriege》. Bd. I, Berlin, 1832, viertes Buch: 《Das Gefecht》, S. 283 und andere)。——第 233 页。

- 236 马克思在《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一文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的《美国战场的形势》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27—530、533—537 页)中,使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所提供的对军事行动的报道和分析。——第 234 页。
- 237 1862 年 3 月普鲁士众议院的自由主义多数派拒绝批准用于军队改组的军事开支(见注 13 和 167),并要求成立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政府的回答是解散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选举于 1862 年 4 月 28 日和 5 月 5 日举行。这次选举象 1861 年一样进步党获胜。——第 235 页。
- 238 指 1862 年 4 月在许多法国报纸上以匈牙利革命的流亡者代表的名义就匈牙利流亡者领导中的意见分歧问题所登载的声明。这些材料是由席利附在 1862 年 4 月 15 日的信中从巴黎寄给马克思的。——第 236 页。
- 239 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干涉墨西哥(见注 227)开始后不久,干涉参加国之间暴露出严重的矛盾,结果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于 1862 年 4 月召回了自己的军队。法国统帅部拒绝同墨西哥政府进行谈判,于 4 月 19 日在墨西哥开始军事行动。1862 年下半年从法国派遣了后备的军队去墨西哥。
关于波拿巴统治集团的墨西哥债款案见马克思《国际性的米勒斯案》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24—526 页)。——第 237 页。
- 240 边疆居民(来自德文《Hinterwäldler》——林区居民)是北美移民时期对住在森林密布的处女地的第一批移民的称呼;转意是指偏僻的、闭塞的外省人。——第 239 页。
- 241 暗指 1848 年鲁·施拉姆当选为代表施特里高(斯特舍哥姆)的柏林国民议会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01—302 页)中对他在议会中的活动作了评述。——第 241 页。

- 242 在扼守密西西比河上通往新奥尔良要道的两炮台陷落后,该城南军于1862年4月29日投降。5月1日北军入城。新奥尔良是蓄奴州同盟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该城被攻占是北军的巨大军事胜利。
- 马克思在《美国战场的形势》一文中,利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所提供的对军事行动的分析,该文发表在1862年5月30日的《新闻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33—537页)。——第241页。
- 243 “梅里马克号”是叛乱分子的第一艘装甲舰。这艘装甲舰于1862年3月击毁了北军的几艘军舰,并在放弃诺福克(弗吉尼亚州)海军基地以后,为了不让北军舰捕获,于1862年5月11日由南军自己炸毁。——第244页。
- 244 指《美国内战》(《The Civil War in America》)一文,该文刊登在1862年5月27日《泰晤士报》上。
- “高压法案”(《Coercion bills》)是为了镇压爱尔兰革命运动于1833年和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几项特别法律。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范围内实行了戒严,并且授予英格兰当局以各种特别全权。——第245页。
- 245 指《联邦派胜利的性质和原因》(《Extent and Bearing of Federal Successes》)一文,该文刊登在1862年5月24日《经济学家》杂志第20卷第978期第562页。——第245页。
- 246 摩里耳税则是共和党人摩里耳在国会提出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该税则于1860年5月由众议院通过,并于1861年3月2日经参议院批准后成为法律。摩里耳税则规定大大增加美国关税。——第245页。
- 247 指英军和西班牙军由于帕麦斯顿政府不再与法国共同干涉墨西哥,于1862年4月撤出墨西哥。并见注239。——第246页。
- 248 斯宾斯关于美国内战进程的简讯,载于1862年5月29日《泰晤士报》“美国情况”(《American Affairs》)栏,文中谈到哈勒克军队的困境,似乎由于炎热和疾病不得不停止进攻数周。——第246页。

- 249 恩格斯指的是 1862 年 6 月 4 日斯宾斯发表在《泰晤士报》“美国情况”栏内的文章中的数字。——第 248 页。
- 250 “接吻吧——从此结束纷争!”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 年 7 月 7 日立法会议员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于是各敌对政党代表响应这个呼吁热烈地彼此拥抱了。但是,不出人们所料,勉强的调和尝试是不会成功的,这些虚伪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记了。
恩格斯用这句流行的成语来讽刺 1862 年 4 月 28 日和 5 月 5 日新选出的、于 1862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普鲁士众议院(见注 237)。——第 249 页。
- 251 黑森选帝侯国事件——指 1850 年至 1862 年在黑森选帝侯国发生的选帝侯反动政府同要求恢复 1831 年温和自由主义宪法的众议院之间的立宪冲突。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普鲁士由于害怕奥地利加强,就支持黑森选帝侯国的自由派。但是普鲁士干预这场冲突,促使黑森选帝侯国政府恢复 1831 年宪法的尝试却遭到选帝侯方面的反击;奉派携带威廉一世信件前往黑森选帝侯国的普鲁士将军维利森受到侮辱。只是在 1862 年 6 月底,普鲁士提出最后通牒并动员了两个军以后,黑森选帝侯国才恢复了 1831 年宪法。——第 249 页。
- 252 指 1862 年 6 月 18 日《泰晤士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约翰·斯图亚特·格伦尼的悼念布克尔的文章。——第 252 页。
- 253 魁奈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于 1758 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第一次发表。马克思用的是魁奈的著作《经济表的分析》(1766 年)(Quesnay.《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该著作载于欧·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1846 年巴黎版第 1 部(《Physiocrates》.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46)。——第 252 页。
- 254 指 1862 年在柏林出版的拉萨尔的两本小册子:1862 年 4 月 16 日在柏林的区公民协会所作的报告《论宪法的实质》(《Ueber Verfassungswesen》)和 1862 年 5 月 19 日在费希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演说《费希特的哲学和德国人民精神的意义》(《Die Philosophie Fichte`

- sund die Bedeutung des Deutschen Volksgeistes》)。——第 254 页。
- 255 马克思在《评美国局势》一文中发挥了恩格斯在这段信中所阐述的见解,该文载于 1862 年 8 月 9 日《新闻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56—559 页)。——第 257 页。
- 256 美国俄亥俄河西北没有实行奴隶制的地区叫做领地,这些地区的居民尚未达到美国宪法规定的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六万人。——第 258、291 页。
- 257 四边形要塞区是由北意大利的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科拉——所组成的极其强大的筑垒阵地。——第 260 页。
- 258 在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对施米特《德国文学史》一书的评论是借排字工人及其妻子之口以评论和解说的方式出现的。——第 262 页。
- 259 指吕斯托夫的《米兰旅》(《Die Brigade Milano》)一文,该文载于《民主研究》文集 1861 年汉堡版第 93—137 页。——第 264 页。
- 260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他在《俄国和德国》(1853 年)、《俄国和英国》(1854 年)等许多小册子中实质上发展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第 264 页。
- 261 指《资本论》第一卷最初的写作方案(见注 25)。后来,马克思放弃了这个意图,而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分中阐述了他的地租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265 页。
- 262 “费用价格”(《K ostpreis》,《K ostenpreis》和《cost price》)这一术语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是在生产价格($c+v$ +平均利润)的意义上使用的。——第 268 页。
- 263 新英格兰即美国东北部工业高度发达的六个州(缅因、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佛蒙特、新罕普什尔),这是废奴运动的中心。——第 272 页。
- 264 马克思指的是小皮特的政府于 1786 年设立的所谓抵偿基金,目的是获

得资金来偿还已经增加的英国国债。为设立这种基金而采取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旧的间接税和实行新的间接税。——第 273、291 页。

- 265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提出的原理成了他于 1862 年 8 月 9 日发表在《新闻报》上的《评美国局势》一文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56—559 页）。——第 273 页。
- 266 指的是波克罕 1862 年 8 月 12 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复信写在这封信的背面。在波克罕的信中说，拉萨尔不在柏林，因此不能承兑恩格斯开出的期票。——第 278 页。
- 267 马克思指的是工程师奈斯密斯 1852 年 11 月给工厂视察员霍纳的信。该信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报告》1857 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第 282 页。
- 268 1862 年 9 月 12—29 日，恩格斯为了休息在德国作了一次旅行。在摩塞尔河、莱茵河沿岸及绍林吉亚旅行后，他曾在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戚家作客。——第 284、632 页。
- 269 指的是 1862 年 8 月 29—30 日在马纳萨斯附近（华盛顿西南）发生的第二次布尔河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波普将军率领的北军大败，并退向华盛顿。为了使联邦首都不致陷落，北军司令部不得不增调援军。——第 285 页。
- 270 指 1862 年 8 月在华盛顿发布的陆军部命令，命令规定准将或少将军衔以后只授予正规军军官中那些有卓越贡献的人。志愿兵军官只有在立下卓越战功而同时表现出具有相当的军事素养时，才可以被授予这一军衔。——第 285 页。
- 271 指马克思为筹措钱款的事于 186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7 日前往扎耳特博默耳和特利尔。——第 286、634 页。
- 272 恩格斯指的是 1862 年 9 月 22 日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一事。正

当宪制冲突(见注 167)激烈的时候,组成了俾斯麦的保守派容克内阁,表明政府打算不顾议会的预算法案而实行军队改组。10月13日俾斯麦再度解散议会,并开始实行军事改革,竟不经议会批准就为此开支经费。——第 288 页。

- 273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 1849 年 3 月 28 日前制定的德国宪法,但宪法却被普鲁士国王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君主拒绝。1862 年 9 月 28 日在魏玛举行的约有二百名德意志邦议会议员参加的会议,主张成立一个全德统一的联邦国家,联邦成员国根据 1849 年的帝国宪法在内政方面具有独立性,并主张为此目的召开全德议会。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Preußische 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8 年 3 月 20 日的演说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 der Spitze)”。在争取德国统一时期,这个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第 289 页。

- 274 斐·拉萨尔《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2 年柏林版(F.Lassalle.《Ueber den besondere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Berlin, 1862)。拉萨尔于 1862 年 4 月 12 日在柏林近郊奥兰尼印堡手工业工人协会的大会上用这个题目做了报告。拉萨尔因发表这一报告而受法院审讯。——第 290 页。

- 275 马里兰战役——1862 年 9 月 4 日南军在马里兰州发动进攻,这次进攻以他们 9 月 17 日在安提塔姆河的失败而告终。关于马里兰战役,详见马克思《北美事件》和《北美形势》两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84—587 页和第 592—595 页)。——第 290 页。

- 276 解放法案是林肯于 1862 年 9 月 22 日颁布的初步的解放宣言。宣言宣布属于南部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黑奴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为自由人。同时所有黑人都被赋予在陆军和舰队服役的权利。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解放黑人,标志着北部转向用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然而,在保持种植场主在南部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分

配土地的解放,并没有使黑人免于原来的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的种族歧视。

1862年9月12日入侵肯塔基州的南军在10月8日的佩里维耳一战中被北军击溃。——第290、306页。

- 277 马克思所说的“奥地利的经验”,是指1848年在奥地利发生的持续性的财政危机。危机表现为国债大量增加、通货贬值以及大量发行纸币。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维也纳要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71—377页)。——第291页。
- 278 北美政府为了获得战争所需的货币资金,对于贷给政府黄金的银行家支付极高的利息。据《泰晤士报》报道,1862年10月间利率竟达二分九厘,比通常的利率高好几倍。——第291页。
- 279 马克思把林肯政府从1862年年中开始实行的一系列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措施称为林肯法案。除解放宣言(见注276)外,其中最重要的是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宅地法(关于无偿份地的法律),它表明将用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问题。此外,如清除军队和国家机关中的叛变分子,通过关于没收叛乱分子的财产的法律等等措施,也都有重要意义,这些都保证了北部在内战中的胜利。对这些措施的详细评述,见马克思《评美国局势》和《北美事件》两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56—559页和第584—587页)。——第292页。
- 280 指北部各州1862年11月4日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以及同时举行的纽约州州长选举的选举运动情况。在选举国会时,西北各州的居民由于对共和党领导军事行动不力感到不满,投票选举民主党人。纽约州州长也由民主党首领之一西摩尔当选。然而共和党人却在大多数北部州中取得选举的胜利。关于选举结果,详见马克思《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00—602页)。——第294页。
- 281 在西点(纽约附近)有一所军事学院,创办于1802年,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唯一的高等军事学校。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培养军官的制度,促进了学院学员的派系习气的发展。麦克累伦原来也是西点军校的学

- 员。——第 297 页。
- 282 指普鲁士国王和众议院之间的分歧,引起分歧的是因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而增加对军队拨款的问题。分歧的尖锐化使普鲁士宪制冲突(见注 167)进一步发展。——第 298 页。
- 283 1862 年 10 月 3 日,南军在普莱斯将军和范多恩将军的指挥下攻击北军在科林斯附近的阵地。经过两天的鏖战,同盟军被击溃并被迫退却。——第 298 页。
- 284 马克思把南部同盟讽刺地比作瑞士的宗得崩德——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 1843 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 1847 年 11 月向其他的州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在作战过程中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
- 信中所谈的情况,马克思在 1862 年 11 月 14 日《新闻报》上发表的《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96—599 页)中详细地加以阐述。——第 299 页。
- 285 指波拿巴镇压 1795 年 10 月 4—5 日(葡月 12—13 日)在巴黎对热月国民公会发动的保皇党人叛乱。——第 299 页。
- 286 在 1860 年 11 月选出的、主要由共和党组成的华盛顿国会的众议院于 1863 年 12 月 4 日任期届满。——第 299 页。
- 287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政府于 1862 年 10 月 31 日向英国和俄国的外交代表提议由三国共同采取措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撤销封锁和使美国的南部港口为欧洲贸易而开放。拿破仑第三关于干涉美国内政的提议,于 1862 年 11 月 8 日被俄国拒绝,后来又被英国政府拒绝。——第 299 页。
- 288 马克思大概是从 1862 年 12 月 5 日至 13 日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还去利物浦看望艾希霍夫。——第 301、635 页。
- 289 摩尼教徒是三世纪在近东产生的宣传禁欲主义和不结婚的宗教学说的

信徒。在德国大学生的行话中“摩尼教徒”一词意味着残酷无情的债主，因为它和德文《mahnender Gläubiger》（“逼债的债主”）的发音很相近。——第 301 页。

- 290 指 1862 年 12 月北军在伯恩赛德率领下向腊帕哈诺克河（弗吉尼亚州）南岸弗雷德里克斯伯格地区南军坚固的筑垒阵地发动的一次不成功的进攻。虽然北军还在 11 月 17 日就已逼近弗雷德里克斯伯格，但由于缺少必要的装备，直到 12 月中才开始渡河并为夺取城区的工事采取直接的行动。当时南军已经大大加固了自己的阵地。伯恩赛德的军队攻取南军阵地的多次尝试均告失利，于 12 月 14 日夜间退却到腊帕哈诺克河北岸。——第 303 页。
- 291 1862 年 12 月底，在伦敦、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举行了英国工人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群众大会，以声援北美各州反对黑人奴隶制度的斗争。——第 306 页。
- 292 马克思指的是他在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第 V 本中关于机器的论述。马克思在这个手稿的第 X I X 本和第 X X 本中写下了关于机器的补充材料。在上述几本手稿中的论述，成了后来所写的《资本论》第 1 卷第 13 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408—553 页）的基础。——第 313 页。
- 293 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是许多作者的著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括：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工艺学的历史》1807—1811 年哥丁根版第 1—3 卷（J.H.M. Poppe.《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en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Bd. I—3, Göttingen, 1807—1811）；安·尤尔《技术词典》，克腊马尔什和黑伦整理，1843—1844 年布拉格版，共三卷。第 1 卷（A. Ure.《Technisches Wörterbuch》.Bearbeitet von Kramarsch und Heeren. 3 vol., Prag, 1843—1844. Erster Band）；约·贝克曼《论发明史》1782—1805 年哥丁根版第 1—5 卷（J. Beckmann.《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Bd. I—V, Göttingen, 1782—1805）。——第 317 页。

- 294 “珍妮机”是詹姆斯·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第318页。
- 295 指拉萨尔1863年1月16日在柏林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这个辩护词后来印成了小册子，标题是：《科学和工人。在柏林刑事法庭上的辩护词》1863年苏黎世版（《Die Wissenschaft und die Arbeiter. Eine Vertheidigungsrede vor dem Berliner Criminalgericht》.Zürich, 1863）。下面援引的拉萨尔辩护词中的一段话，见这本小册子的第16—17页。——第320页。
- 296 指斐·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3年苏黎世版（F. Lassalle. 《Arbeiterprogramm. Ueber den besondere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e — a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Zürich, 1863）。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862年出版（见注274）。——第320页。
- 297 看来，马克思是指《美国叛乱的起因和目的》（《Origin and Objects of the Treason in the United States》）这篇匿名文章的第一部分，该文发表在1863年2月4日《自由新闻》报第11卷第2号第9—12页上。——第321页。
- 298 指1863年1月在被沙皇俄国并吞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旨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1863—1864年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危机以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造成的。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城市的劳动群众——手工业者、工人和青年学生；从1863年夏天起，参加起义队伍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农民。领导起义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具有民主性质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和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农民群众就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沙皇政府利用还在1862年就开始的俄国革命运动的低落，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具有保守思想的起义领导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欧列强政府的干涉上，但是西欧列强政府只在外交上作些表示，实际上出卖了起义者。

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不仅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阶段,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欧洲各国最进步的力量都支援了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国际无产阶级抗议沙皇政府残酷压迫波兰,抗议各国政府对此抱旁观态度,这种抗议行动对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起了重要的作用。——第322页。

- 299 指1861—1867年法国在墨西哥进行的干涉,干涉最初是同英国和西班牙共同进行的(见注227、239和247)。

没落帝国(Lower Empire)——在历史文献上是指拜占庭帝国;现在已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第322、332页。

- 300 马克思说“赫尔岑的”士兵们,是暗指赫尔岑希望俄国军队跟起义的波兰人一起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活动。——第322页。

- 301 “有思想的军队”(《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一语,被认为是法国保皇党将军尚加尔涅的说法。1849年,法国制宪议会主席、资产阶级共和派马拉斯特感到来自波拿巴分子的威胁,请求尚加尔涅派兵保护议会。尚加尔涅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喜欢有思想的军队,也就是说根据政治动机来行动的军队。——第322页。

- 302 1863年1月伯恩赛德由于在腊帕哈诺克遭到失败而离开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的职务(见注290),此后胡克被任命为他的后继者。在任命胡克的命令中希望他努力争取胜利。——第323页。

- 303 1855年4月6日,马克思的八岁的儿子埃德加尔死于索荷广场的住所里。——第323页。

- 304 在1863—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普鲁士政府为了防止起义扩散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土地,以及希望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问题上预先获得俄国的支持,表示愿意给沙皇政府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根据俾斯麦的提议,1863年2月8日在俄、普之间签订了关于一致行动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323、401页。

- 305 指布林德的《德国和波兰》(《Deutschland und Polen》)一文,该文最初刊载在斯图加特的《观察家报》上,后来刊载在1863年4月8日波士顿的《先驱者》报第15号上。——第323页。

- 306 看来,恩格斯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寄予希望,是鉴于1861年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所规定的草拟规约的两年期限行将结束,那时农民该最终看清沙皇的“自由”的掠夺性质,看清除此以外他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自由”。俄国革命的各界人士当中当时都深信,农民群众对1861年改革的不满以及在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刚爆发的起义必将导致普遍的起义,这种起义预料于1863年春天到来。——第324页。
- 307 恩格斯指的是波兰青年协会,这个协会是1861年由一部分波兰流亡者——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建立的。在1861年10月,协会为了培养未来波兰起义的军官骨干,在热那亚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学校,后来学校迁到库内奥(意大利)。这个学校的教员们在巴黎起草和发布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和守则,其中包括《起义守则》,这个守则的作者是梅洛斯拉夫斯基。——第324页。
- 308 1862年底巴枯宁出版了《华沙中央委员会和俄国军事委员会》(《Le comité central de V arsovie et comité militaire russe》)。这本小册子除了收入巴枯宁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通讯外,还对梅洛斯拉夫斯基对未来的俄波边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本小册子引起了波兰流亡者的极大注意。梅洛斯拉夫斯基在《给米哈伊尔·巴枯宁先生的最后答复》(《La Dernière réponse à M .M ichel Bacounine》)这本小册子中作了反驳。马克思说的大概是这次争论。——第324页。
- 309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 310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马克思于1863年10月底受该协会委托,写了《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第327页。
- 311 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对波兰(波兰贵族共和国)进行了三次瓜分。这三次瓜分是这些国家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行

侵略政策的结果,也是镇压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瓜分的结果俄国得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鲁士得到了波兰本土的大部分(滨海、大波兰区、马索维亚的一部及华沙等),奥地利得到了乌克兰西部和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及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经过第三次瓜分,波兰已经不再成为独立国家。——第 328 页。

- 3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联系波兰 1863—1864 年民族解放起义来阐述自己对波兰问题的观点。小册子预定的书名在信中提到了。在小册子中,马克思由自己来阐明问题的政治历史方面,而由恩格斯来阐明问题的军事方面。在 1863 年 2—5 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小册子搜集材料,从报上以及从有关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历史文献中作大量的摘录。马克思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拟定了几种写小册子的比较成熟的草稿,其中详细地探讨了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的侵略意图,以及霍亨索伦王朝上升的历史。但是这一著作的写作和出版计划没有能够实现。——第 328 页。
- 313 在 1863 年 2 月 18 日普鲁士众议院的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普、俄之间签订的反对波兰起义者的协定(见注 304)的问题。众议院的自由派多数对协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通过了谴责普鲁士政府干涉波兰事务的决议。——第 330 页。
- 314 在波兰起义初期,梁格维奇在波兰南部散多梅希省率领起义者的最大的部队,与沙皇军队多次成功地作战。1863 年 3 月 11 日,梁格维奇在波兹南和加里西亚地主集团以及保守的地主资产阶级“白党”的领导上层的发起和支持下,宣布自己为独裁者。依靠幕后的阴谋而确立的这种专政,同小贵族小资产阶级“红党”的中央民族委员会(起临时国民政府的作用)所体现的对起义实行的革命领导相对抗。然而 3 月 19 日,梁格维奇在沙皇军队优势兵力的逼迫下抛弃自己的部队,逃往奥地利;他在那里被扣留;他的部队瓦解了。——第 331 页。
- 315 马克思所引的是普鲁士内务大臣罗霍夫 1838 年 1 月 15 日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中的话,该城居民对七个怀有反对派情绪的教授被赶出汉诺威议会一事表示不满。罗霍夫写道:“忠良的臣民要对自己的国王和君主表现出应有的服从,但是不应当在自己的有限理智的范围内试图干

- 预国君的事务。”——第 331 页。
- 316 看来,是指西华德呈交华盛顿国会的外交公文。关于这件事,详见马克思《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51—453 页)。——第 331 页。
- 317 暗指帕麦斯顿政府对 1830—1831 年的波兰起义所采取的叛卖政策。英国官方集团在 1863 年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当时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情波兰人民,一方面却声明不给波兰起义以任何援助。——第 332 页。
- 318 指的是 1863 年 3 月底郎卡郡工业城市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失业纺织工人因饥饿而发生的暴动,暴动与英国在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期间发生棉业危机(见注 221)有关。为了镇压失业者当时投入了大批警察以及正规的骑兵和步兵。——第 333 页。
- 319 1863 年 2—3 月,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农民在波兰起义的影响下,反对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发动加强了。领导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运动立陶宛省委员会,声明拥护华沙临时民族委员会所宣布的起义纲领。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活动的武装的起义部队,主要是由农民以及手工业者、青年学生和没有地产的小贵族组成的。革命的民主派——康斯坦丁·卡利诺夫斯基、西格蒙特·谢拉科夫斯基、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等人是起义的杰出领导者。立陶宛起义有民主主义的性质,而且它使运动有可能深入到俄国内地去,这就使它具有特殊的意义。——第 334 页。
- 320 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 334 页。
- 321 指在 1863 年 4 月《爱丁堡评论》杂志第 240 期第 541—569 页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赫胥黎教授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Professor Huxley on Man's Place in Nature》)。在这篇文章中评论了赫胥黎、欧文等人关于人类和猴子的区别问题的著作。该文的作者是以欧文观点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的。——第 335 页。
- 322 指 1856 年巴黎出版的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L. Mieroslawski. 《De la nationalite polonaise dans l'équili- bre

européen》.Paris, 1856)。马克思在 1856 年 10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本书作了更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76 页)。——第 336 页。

- 323 马克思指的是拉萨尔的以下两本小册子:《拉萨尔的刑事诉讼》1863 年苏黎世版(《Der Lassallesche Criminalprozeß》.Zürich, 1863)和《法院对我的判决和我为上诉而提出的批判性意见》[1863 年莱比锡版](《Das Griminal- Urtheil wider mich mit kritischen Randnoten zum Zweck der Appellationsrechtfertigung》. [Leipzig, 1863])。——第 336 页。

- 324 指拉萨尔的一本小册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 年苏黎世版(《Off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 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Zürich, 1863)。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这本小册子的第 11、23、36 页及其他各页。

1863 年 2 月 10 日,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建议拉萨尔就工人运动的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拉萨尔把《公开答复》转寄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提议把它作为“运动的正式宣言”。——第 336 页。

- 325 1863 年 3 月 26 日,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由工联伦敦理事会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在北美各州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同它们团结一致。主持大会的是布莱特,他反对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第 338 页。

- 326 指的是《柏林改革报》,该报于 1863 年 4 月 10 日登了一则消息,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 1861 年春在柏林期间同拉萨尔进行的关于合办一个报纸的谈判。4 月 13 日马克思写了辟谣启事,该启事刊登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柏林改革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13 页)。——第 339 页。

- 327 舒尔采—德里奇在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建立合作社和储蓄贷款银行,这是企图引诱他们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

- 舒尔采—德里奇断言,通过建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挽救小手工业生产者的破产,这也就是鼓吹资本家和工人利益协调一致。拉萨尔在小册子《公开答复》(见注 324)中批判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计划,然而代之以工人靠容克资产阶级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以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改良主义思想。——第 340 页。
- 328 指 1863 年 5 月 15 日普鲁士众议院关于议长在议会开会期间有权打断发言(其中包括大臣的发言)的决议。——第 342 页。
- 329 看来,恩格斯是指拉萨尔 1863 年 5 月 17 日和 19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说(见注 341),演说中对资产阶级进步党作了尖锐的抨击。进步党报刊为了回报,开始攻击拉萨尔,说拉萨尔是俾斯麦的代理人。——第 345 页。
- 330 马克思在开始写信中提到的政治经济学历史部分的摘要之前,已经写完了他 1861—1863 年的经济学手稿(见注 25)的大部分(第 I—X X I 本)。留传下来的马克思的摘要包括八本单独的“补充本”(Beihefte),以字母 A .B .C .D .E .F .G .H 标示。在 1863 年 5—7 月所写的最后两本 1861—1863 年手稿(第 X X II 本和第 X X III 本)中,马克思已经部分地利用了他的“补充本”中的材料。——第 346 页。
- 331 指 18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举行的法国立法团的选举,以及 1862 年 5 月 5 日普鲁士议会众议院的选举。——第 350 页。
- 332 指 1863 年 5 月 2—4 日人数上占优势的北军在胡克的指挥下于钱塞勒斯维耳(弗吉尼亚州)会战中遭到的失败。虽然失败了,但在战斗时受了伤的胡克于 5 月 6 日发出命令,向自己的军队祝贺“在最后七天中的成功行动”。——第 350 页。
- 333 指民法典(Code civil),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通过,曾在法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1815 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后,这个法典在莱茵省继续有效。
关于拉萨尔在福格特问题上的态度,见注 20。——第 351 页。
- 334 讽刺地暗指“硫磺帮”(见注 47)。——第 352 页。

- 335 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慈善家罗伯特·格莱斯顿及其在利物浦的拥护者。马克思在《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6页)一文中对格莱斯顿的观点作了批判。——第352页。
- 336 指拉萨尔于1862年4月12日作的报告《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见注274),以及恩格尔于1862年2月15日在柏林音乐学院作的报告《人口调查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和历史中的作用》(《Die Volkszählungen, ihre Stellung zur Wissenschaft und ihre Aufgabe in der Geschichte》)。——第353页。
- 337 恩格斯在《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27—643页)一文中对这本书作了详细的批判。——第355页。
- 338 由于对1863年4—5月夺取起义领导权的地主资产阶级“白党”的政策不满,华沙起义组织中的革命分子于5月底实行政变。由“红党”温和派代表组成的新的国民政府的口号之一,就是广泛吸收农民组织全民义勇军,以加强游击战。但是十天以后,国民政府再次受“白党”控制,他们不冒险否决深得人心的全民义勇军的口号,而是“延缓”实行,并且回到原先进行军事行动的办法,以此破坏群众起义计划。——第356页。
- 339 马克思指的是刊登在1863年7月1日《自由新闻》第11卷第7号上不署名的文章《对波兰的干涉》(《The Intervention in Poland》)。——第357页。
- 340 指南军于1863年夏季再次进攻北军而遭到失败的尝试。在李将军指挥下的侵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叛军于1863年7月1—3日在格提斯伯格会战中被北军击溃,向南退却,进入弗吉尼亚。——第357页。
- 341 马克思指的是小册子《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日和19日拉萨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Arbeiterlesebuch. Rede Lasselle's zu Frankfurt am Main am 17. und 19. Mai 1863, nach de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小册子于186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57页。

- 342 下面马克思所引用的《经济表》是与马克思的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第 X X II 本第 1394 页的《全部再生产过程经济表》一致的(见注 25)。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对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周转作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389—592 页)。

魁奈的表是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中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周转的图解(德版第 65 页——见注 253)。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 册第 323—366、405—407 页)以及恩格斯《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写的第二编第十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249—280 页),对魁奈的《经济表》作了详细的分析。——第 358 页。

- 343 1861—1863 年马克思写完了经济学手稿以后,就直接着手准备写《资本论》各卷。1863—1867 年期间他重写《资本论》第一卷,并且为付印作准备(该书于 1867 年 9 月问世)。同时,确定了比较完整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正文。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后来未能完成这些初稿的付印准备工作。马克思去世后,《资本论》第二、三卷由恩格斯作了付印的准备工作,并且发表了。——第 364 页。

- 344 指科贝特《波旁王朝的战争和伦敦的报纸》(《Bourbon War and the London Newspaper Press》)一文,该文刊登在 1823 年 2 月 8 日《科贝特氏纪事周报》第 45 卷第 6 期第 354—381 页。科贝特在这篇文章里(第 375 页)对《泰昭士报》的性质作了如下的描述:“它纯粹是一个康采恩!……它是做生意的康采恩;是为了赚钱的康采恩;是不管真理还是谎言的康采恩”。——第 365 页。

- 345 法国干涉者于 1863 年占领了墨西哥城以后,根据拿破仑第三关于“墨西哥民意”的法令于 6 月 18 日召开了由三十五人组成的最高政府洪达。洪达成员都属保守党,由法国总司令任命,并由驻墨西哥的法国公使批准。洪达也召开了由二百一十五个保守党人组成的名流大会,于 1863 年 7 月 10 日对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一事进行表决。马克思称这次墨西哥名流的决议为“全民投票”,讽刺地把它比作 1848 年 12 月 10 日在法国举行的使路易·波拿巴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以及 1860 年拿破

仓第三为了掩饰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以后兼并萨瓦和尼斯的行为而在当地举行的全民投票。——第 365 页。

- 346 指的是为了参加起义于 1863 年 3 月由在英国的波兰侨民装备的,拉普斯基率领的二百名左右的波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组成的队伍的远征。远征的目的是在立陶宛登陆,但是由于组织不良和不注意保守必要的秘密,远征遭受失败。远征参加者的轮船于 4 月到达马尔摩港口以后,被瑞典当局扣留。6 月 18 日远征又继续进行,但在船只遇险和队伍部分人员死亡以后,拉普斯基同远征队就回到伦敦。在瑞典赫尔辛堡港口参加远征队的巴枯宁在马尔摩轮船被扣留以后,就前往斯德哥尔摩,他试图同瑞典和芬兰的革命者建立联系,在那里一直呆到 1863 年 10 月。——第 365 页。
- 347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 年)。委员会委员的第一号报告书》1863 年伦敦版(《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London, 1863)。以后,到 1867 年前又出版了这套书的五号报告。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利用的一系列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475 页)。——第 366 页。
- 348 罗曾克雷茨派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中的一个秘密的宗教神秘主义团体的成员。它的名称传说是取自十四世纪末该团体的创建人——罗曾克雷茨。——第 366 页。
- 349 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小贵族的政党“红党”实行的第二次(九月)政变,该党于 1863 年 9 月 17 日建立新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存在了一个月左右。——第 368 页。
- 350 1863 年 8 月,由奥地利倡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讨论德意志联邦改革草案。由于威廉一世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毫无结果,这表明奥地利在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的新的失败。
- 罗马教廷指责波兰解放起义为“反宗教暴乱”,同时为了自己的私利试图把这次起义说成为争夺天主教会权利的斗争。因此罗马副红衣

主教颁布了关于 9 月初为保卫波兰而举行游行示威和祷告的敕令。——第 369 页。

- 351 黑、红、黄这三种颜色是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象征。——第 369 页。
- 352 1863 年 11 月 13 日丹麦议会通过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于丹麦的新宪法。根据 1852 年 5 月 8 日俄、奥、英、法、普、瑞典同丹麦代表一起签订的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霍尔施坦公国仍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列为丹麦的组成部分;什列斯维希公国列入丹麦王国,并保留某些特别权利,但是丹麦的统治阶级没有尊重这些权利。他们仍然试图把两个公国全部归自己;1855 年公布了丹麦王国各地区的统一宪法,这两个公国也包括在内;只是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丹麦政府才于 1858 年同意宪法不施行于霍尔施坦,但以该公国参与国民开支为条件;什列斯维希仍然全部留在丹麦王国内。接着,1863 年 11 月 15 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去世,两公国与丹麦联合的君合国也就告终,因此,什列斯维希脱离丹麦而参加德意志联邦的运动加强了。——第 370、663 页。
- 353 指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见注 190 和 352),在议定书中,俄国的皇帝被提到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他们为了被宣布为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以后在格吕克斯堡王朝终结时俄国沙皇要求丹麦王位的先例。——第 370、373 页。
- 354 在 1863 年 10 月普鲁士议会选举中进步党再次获胜。11 月 21 日新组成的众议院废除了旨在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的 1863 年 6 月 1 日的出版法,因出版法取消了出版自由。——第 370 页。
- 355 指保守派瓦盖纳在 1863 年 11 月 19 日普鲁士众议院讨论反动的出版法(见注 354)时的发言。当时瓦盖纳援引了拉萨尔 1863 年于杜塞尔多夫出版的小册子《庆祝会、报刊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社会精神的三个征候》(《Die Feste, die Presse und der Frankfurter Abgeord- nentag. Drei Symptome des öffentlichen Geistes》),其中对自由派报刊

持否定态度。——第 370 页。

- 356 恩格斯写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小册子的意图没有实现。——第 372 页。
- 357 1863 年 12 月 7 日马克思因母亲去世前往特利尔,然后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探望亲戚,接着因遗产问题前往荷兰去母亲的遗嘱执行人莱昂·菲利浦斯处。由于马克思在扎耳特博默耳患疟病,直到 1864 年 2 月 19 日才返回伦敦。——第 374、382 页。
- 358 马克思是对出现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君”一事加以讽刺。1863 年 11 月 16 日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滕堡亲王宣布自己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号称弗里德里希八世。马克思称他为第三十六个国君,是因为德意志联邦包括三十五个(有的资料说三十四个)君主国和四个自由市。——第 377、381 页。
- 359 1863 年 12 月底,为解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问题而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联邦议会的会议,普、奥代表受命不参加波兰问题的讨论。——第 377 页。
- 360 1863 年 11 月 13 日丹麦议会通过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归并于丹麦,普、奥以此为借口,企图占领两个公国——先占领霍尔施坦,然后占领什列斯维希。丹麦的新宪法破坏了 1852 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 352),议定书规定,丹麦和两个公国只能以君合国的形式联合。因此,联邦议会根据普、奥的提议于 1863 年 12 月 24 日派汉诺威和萨克森的部队占领霍尔施坦及其邻近的劳恩堡;12 月 31 日位于什列斯维希境内的基尔被占领。1864 年 1 月 16 日,普、奥向丹麦提出关于废除 1863 年宪法的最后通牒。1864 年 2 月 1 日,六万名普、奥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统率下侵入什列斯维希境内,在什列斯维希的军事行动就此开始。

普、奥对丹麦的战争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政府力求把在丹麦统治下的但主要居民是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于普鲁士以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并镇压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也参加了战争,企图阻挠普鲁士的太过

分的计划。根据 1864 年 10 月 30 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普共同占有。在 1866 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都归并于普鲁士。——第 379、402、648 页。

- 361 指威廉对普鲁士众议院 1863 年 12 月 18 日奏折的答复,在奏折中众议院拒绝批准当前同丹麦作战有关的非常贷款。威廉在他 12 月 27 日的答复中批驳了议院的奏折。——第 379 页。
- 362 根据俄国和丹麦代表签署的 1851 年 6 月 5 日华沙议定书,确定了丹麦王位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不可分割的原则。——第 381 页。
- 363 1864 年 3 月 12 日以后的几天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同他谈了自己去德国和荷兰的结果。——第 383 页。
- 364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 1851 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1864 年 4 月,在水晶宫举行了庆祝会,欢迎加里波第到英国。

1844 年詹姆斯·格莱安当大不列颠内务大臣时,为讨好奥地利政府,下令英国邮政管理局容许警察暗中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其中有从 1837 年起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邦迪埃拉兄弟给马志尼的信,他们在信中说明了他们计划远征卡拉布里亚,以期在意大利举行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1844 年 6 月,远征的参加者在进行这次远征时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 136、384 页。

- 365 关于布林德参加莎士比亚委员会的报道刊载在 1864 年 4 月 9 日《雅典神殿》第 1902 期第 511 页。

全国莎士比亚委员会于 1863 年在英国成立,其目的是组织庆祝 1864 年 4 月底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第 384 页。

- 366 1864 年 2 月底,普鲁士军队侵入日德兰以后,英国政府担心战场扩大,就提议在伦敦召开 1852 年签订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议定书(见注 352)的列强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调解丹麦、普鲁士、奥地利的冲突和解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的命运问题。会议原定 1864 年 4

月 12 日举行,但由于普奥两国代表竭力拖延会议的召开,拒不出席,会议一再推迟。由于与会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会议从 4 月 25 日起一直开到 6 月 25 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议刚一闭幕,普奥两国就在丹麦领土上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第 384、648 页。

- 367 马克思家在他母亲死后得了一笔不大的遗产,于 1864 年 3 月间迁往伦敦西北的新居,地址是: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 1 号。——第 385 页。
- 368 1864 年 4 月初,加里波第为了募集向意大利进行新的远征的款项,到英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加里波第指望他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也能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加里波第这次英国之行对奥地利施加压力,并考虑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这位意大利民族英雄的情绪,最初对加里波第给以官方的礼遇。但是加里波第同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见面以及他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讲话,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在报刊上发动了反对这位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为了答复拿破仑第三提出的立即把加里波第驱逐出英国的要求,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急忙出来声明说,“他病了,现在已去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驳斥了这种捏造,宣布打算访问英国若干个城市,接着英国大臣格莱斯顿直接发表声明说,加里波第继续呆在英国是不受欢迎的。很快,加里波第于 4 月底离开了英国。英国政府伪善而又怯懦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民主人士的愤慨。——第 386、648 页。
- 369 这里说的是俾斯麦政府对报刊的迫害,见注 354。
由于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预定举行一次全民投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 1864 年 4 月底到那里巡视。他巡视的目的是促使公国的居民投票赞成和普鲁士合并。——第 386 页。
- 370 杜佩尔(丹麦称作: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奥对丹麦作战期间,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见注 360)。——第 386 页。
- 371 马克思于 1864 年 5 月 3 日去曼彻斯特探望生病的威廉·沃尔弗,在那

里一直逗留到 5 月 19 日。——第 388 页。

- 372 指的是威廉·沃尔弗的藏书。在他死后,按照遗嘱,这些书赠送给马克思。马克思 1864 年 11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供了这些书的清单。——第 392 页。
- 373 1864 年 5 月初,在弗吉尼亚的格兰特的军队向南部同盟的首都和主要据点里士满发动新的进攻。格兰特的军队经过 1864 年 5—6 月多次顽强作战,迫使南军退往里士满附近,并且使他们在人员上遭受很大损失。夺取里士满的军事行动直到 1865 年 4 月才结束。
马克思所说的《泰晤士报》对这次战役的评论,是指 1864 年 5 月 25 日和 26 日的社论,社论中赞扬了在格兰特的军队进攻弗吉尼亚期间指挥南军的李将军所采取的战略。——第 392 页。
- 374 厄内斯特·琼斯在 1864 年 5 月 23 日给马克思的便条中,表示因他外出未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面而深感遗憾。原来约定 5 月 19 日在曼彻斯特会面,那时马克思因威廉·沃尔弗生病和逝世曾在那里逗留。——第 393 页。
- 375 1859 年 6 月 24 日,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附近被法、意军队击败。——第 393 页。
- 376 欧洲列强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举行的伦敦会议(见注 366)于 1864 年 5 月 28 日复会以后,普奥代表在会议上提名奥古斯滕堡亲王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因为在这以前俾斯麦已使奥古斯滕堡亲王同意,一旦王位继承问题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亲王将作出一系列有利于普鲁士的让步。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会议的否决。——第 394、402 页。
- 377 暗指 1851 年的华沙议定书和 1852 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 362 和 352)。——第 394 页。
- 378 马克思指的是凯特贝尼打算作为对科苏特的答复而发表的那封《公开信》。凯特贝尼于 3 月 29 日把这个材料寄给了马克思,请他协助把《公开信》发表在德国和英国报纸上。——第 395 页。

- 379 埃尔斯纳的《囚室中的沃尔弗》(《Kasematten—W olff》)一文刊载于1864年5月24日《布勒斯劳报》，并转载在1864年5月26日《莱茵报》上。

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所写的《封建社会主义》(《Feudaler Sozialismus》)一文刊载于1864年5月30日《莱茵报》；文章报道了普鲁士反动派向工人运动谄媚的丑行。——第395页。

- 380 克林格斯在1864年5月27日写给工人弗·莫尔和尤·梅耳希奥尔的信中，讲了在德国庆祝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和在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时工人们如何热情奋发的情况。克林格斯要自己的朋友使马克思相信，他们力求“不愧为”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捍卫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第396页。

- 381 1864年5月间，拉萨尔到爱北斐特参加庆祝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拉萨尔在他的贺词中称威廉·沃尔弗为“一个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杰出的战士”。——第396页。

- 382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了关于雇

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讲。这些演讲是马克思作为社论而刊载于 1849 年 4 月 5—8 日和 11 日《新莱茵报》第 264—267 号和第 269 号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73—506 页)。马克思在信中所说的想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全部刊载在《资本论》第一卷附录中的意图,后来放弃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引用了他这部著作的个别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634、674、834—835 页);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7、124 页。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在他们中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 397 页。

38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268 页。——第 397 页。

384 马克思套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在一封信里所说的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有时人们认为这句话是达尔朗说的。它是针对那些不能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的。

马克思使用这句成为俗语的名言是指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的弗莱里格拉特于 1859 年底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们的战友这件事。——第 398 页。

385 遗嘱法院是英国的一种高级法院(在 1873 年司法改革以后,是高等法院的一部分)。这种法院的职权范围,除了解决别的问题以外,包括确认遗嘱、发给财产管理证明书。——第 398 页。

386 马克思本想给《自由新闻》写一篇关于 1859 年开始的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简讯,但这个愿望看来没有能实现。——第 401 页。

387 1795 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见注 311),普鲁士占领了包括华沙在内的

波兰本土的大部分。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这些土地的大部分——其正式名称为波兰王国——归属俄罗斯。——第 401 页。

- 388 1864 年 5 月,俄国军队在高加索占领了克巴德地区(现在称作:红波利亚纳),那里是穆里德派的最后根据地。这个山民进行反抗的最后基地的被摧毁,结束了十八世纪末由沙皇政府发动的高加索战争。——第 401 页。
- 389 指威廉·沃尔弗在 1849 年 5 月 26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发言。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会议速记记录》1849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9 卷第 229 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IX, No 229, Frankfurt am Main, 1849)。沃尔弗的发言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96—497 页,第 19 卷第 101—102 页。——第 405 页。
- 390 北军为夺取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即第三次战役,是从 1864 年 5 月 5—7 日在维耳德纳斯(弗吉尼亚州)附近的会战开始的。虽然北军在格兰特的指挥下在这次会战以及后来的 1864 年夏季的几次会战中未能占领里士满,但是北军诱敌方遭受了重大伤亡,并且占领了 1865 年春季向里士满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出发阵地。——第 405 页。
- 391 马克思因为想写威廉·沃尔弗的详细传记,于 1864 年 6 月编写了他的生平和活动的简表。下面是马克思编写的沃尔弗的简历:
- “1809 年 6 月 21 日生于施魏德尼茨区塔尔瑙。1813 年。俄国人。
1834—1838 年。在季尔别尔堡四年半。囚室中的沃尔弗请求探望一下他将要死去的父亲,哪怕是在宪兵的随同下,但竟也遭到拒绝。
1843 年—1846 年 2 月——在布勒斯劳。
1846 年。沃尔弗因违反出版法有被审讯的危险而出亡。论述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的文章。
1846—1848 年。布鲁塞尔。‘通讯社’。在布鲁塞尔被囚于狱中(2 月 26—28 日被捕)。

1848年。4—6月在布勒斯劳。

1848年。9月。科伦。鲁普斯应 [到法院] 受审。逮捕令撤销。

1848年10月22日。黑克尔下逮捕令。1849年3月8日撤销。

1848年。6月—1849年5月10日在科伦。从此处前往法兰克福。

1849年5月26日。在德国议会(法兰克福)里的一个场面。

1849年。鲁普斯到瑞士以后, 因他参加斯图加特特别议会的工作而将他送交法庭审判的命令接踵而来。

1849年7月5日去巴塞尔, 从那里去伯尔尼时被拘留。在苏黎世当教员一年零九个月。1851年3月31日——从苏黎世驱逐出境的书面命令(1850年9月10日。苏黎世。鲁普斯抗议根据联邦委员会关于流亡者必须分别迁居他地的决定而要他迁居琉森州的命令)。

1851年6月4日—1853年。到达伦敦。在伦敦约两年。

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大赦令。1862年1月4日。给普鲁士政府的呈文五个月没有得到答复。1862年6月4日的新呈文。1862年8月1日。施魏德尼茨地方官要求沃尔弗报告他在普鲁士的最近居留地。

1862年9月5日。普鲁士政府答复: 大赦的结果是继续侦查。”——第403页。

- 392 指刊载于1864年上半年《国外消息》杂志第2卷第398—400页上的匿名文章《回忆共产主义者沃尔弗》(《Eine Erinnerung an den Communisten Wolff》)。——第407页。
- 393 由于马克思在写沃尔弗传记时(见注391)缺少他早期生活的某些资料, 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的托付请政论家埃尔斯纳——沃尔弗在布勒斯劳大学时的同学和《布勒斯劳报》上论沃尔弗文章的作者——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沃尔弗的所有传记材料寄来。但是, 埃尔斯纳未能把马克思感兴趣的详细情况告诉他。马克思想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的意图没有能实现。后来, 恩格斯的《威廉·沃尔弗》一组文章中记述了他的生平事迹, 文章刊载于1876年《新世界》杂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106页)。——第408、683页。
- 394 珀·巴·洛德《通俗生理学》1855年伦敦第3版第316页(P.B.Lord.《Popular Physiologie》.3ed., London, 1855, P.316)。——第410页。

- 395 指恩格斯在享有合伙人权利的条件下继续参加“欧门—恩格斯”公司一事（并见注 539）。——第 412 页。
- 396 1864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马克思为《自由新闻》报撰文论述俄国由于 1864 年的丹麦战争而采取的立场。该文没有发表。看来，马克思这里还指科勒特《俄国对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任何要求都是无根据的》（《Groundlessness of any Claim of Russia to Holstein—Gottorp》）一文，该文未署名刊载于 1864 年 5 月 4 日《自由新闻》第 12 卷第 5 号。——第 414 页。
- 397 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各省，这些省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前就是普鲁士王国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最发达的莱茵省只是在 1815 年才并入普鲁士，不属于旧省。——第 417 页。
- 398 由于 1864 年 6 月伦敦会议没有得到结果而收场（见注 366）以及普鲁士在丹麦加紧军事行动，英国政府建议拿破仑第三采取共同措施来与普鲁士的侵略进行斗争。虽然帕麦斯顿政府实际上并不打算与普鲁士作战，但它因担心普奥俄之间接近，表示愿意进行战备。1864 年 6 月 13—15 日普鲁士国王同奥地利皇帝在卡尔斯巴德会见，1864 年 7 月初威廉一世同亚历山大二世在波茨坦和基星根会见，在这之后欧洲就开始谈恢复神圣同盟的问题。但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鉴于第二帝国财政状况困难、国内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败，拒绝与普奥作战。法国的拒绝，促使帕麦斯顿政府出来作消除普英之间冲突的安抚人心的解释。俄国的外交措施也推动了英普关系的改善。——第 417 页。
- 399 恩格斯套用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中的一句有名的话——“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指的是 1864 年八十岁的帕麦斯顿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职务一事。——第 417 页。
- 400 指法济在担任瑞士银行总行行长职务时玩弄的财政诡计被揭露以后，于 1864 年 8 月在日内瓦州委员会的选举上遭到的惨败。选举以后，法济的拥护者武装袭击投票反对法济的一部分选举人，造成混乱。由于瑞

士政府军队开到日内瓦，法济不得不逃往法国。

弗莱里格拉特是瑞士银行总行伦敦分行的理事。——第 418、668 页。

- 401 马克思的电报没有找到；看来电报是通知拉萨尔的死讯。——第 419 页。
- 402 里士满——南部同盟的首都——是叛乱分子的主要据点，在其周围集结了南军的精锐部队。在美国内战进程中，北军为夺取这个据点进行了三次大战役。1861 年 7 月为夺取里士满而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于 1861 年 7 月 21 日在布尔河附近以北军失败而告终。1862 年春季和夏季进行的第二次战役，北军最后也是败退到华盛顿。第三次战役于 1864 年 5 月开始，1865 年 4 月 3 日以占领里士满而结束，这次战役对北部在美国内战中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第 420 页。
- 403 北军司令部从 1864 年 5 月起开始实行粉碎南部同盟的新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62 年在报刊上估计的形势相符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21—523 页）。在格兰转向弗吉尼亚中部战线进攻的同时（见注 373 和 390），薛尔曼将军于 1864 年 5 月 7 日开始了著名的通过乔治亚“向海洋进军”。尽管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联邦军的进攻还是不断取得胜利。9 月 2 日薛尔曼的军队占领了亚特兰塔，1854 年 12 月 10 日到达海边。这样，薛尔曼的“向海洋进军”就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为 1865 年春季在弗吉尼亚粉碎南军主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第 420 页。
- 404 指为即将举行 1864 年 11 月 8 日新总统的选举和同时举行美国国会选举而掀起的选举运动。共和党在这次竞选中提出的纲领，比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53—356 页）中所评述的 1860 年的竞选纲领更为激进。1864 年 6 月 7 日在共和党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个纲领具有鲜明的废奴主义特点，并宣布在联邦的全部领土内消灭奴隶制。在 1864 年的选举中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第 421 页。
- 405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以及在兰兹格特休养的母亲那里作了短时间

的逗留以后,从 1864 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中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作了一次旅行,在那里了解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奥、普军队的情况。——第 421 页。

- 406 马克思指从 1863 年 5 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并选举拉萨尔为联合会主席时起拉萨尔进行鼓动的这一年。1864 年 5 月,在莱比锡、佐林根、爱北斐特和德国其他城市都隆重庆祝联合会成立周年纪念。——第 422 页。

- 407 科布伦茨是德国与法国边界上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流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第 422 页。

- 408 马克思指的是《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m Sächsischen Hause》),该书由兰克编辑,由他的门徒于 1837—1840 年在柏林出版,共三卷。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得到了推广。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作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 423 页。

- 409 指的是索尼盖斯的书:《九五一年至九七三年在国王和皇帝奥托一世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1839 年柏林版(《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r Herrschaft König und Kaiser Ottos I. von 951 bis 973》.Berlin, 1839)。这一著作是作为由兰克编辑的那部书的第一卷的第三部分出版的(见注 408)。——第 423 页。

- 410 指成立于 1863 年 1 月、受进步党人影响的柏林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中,舒尔采—德里奇时常作关于合作社运动问题的报告(见注 327)。——第 423 页。

- 411 看来,马克思在 1859 年 12 月 16 日给瑟美列的信(此信没有找到)中,曾请瑟美列为他设法弄钱。瑟美列在 1859 年 12 月 29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的奔走没有结果。——第 429 页。

- 412 瑟美列在 1859 年 12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想出版一本关于匈牙利的小册子,请马克思帮助他小册子译成英文,并在英国出版。瑟美列的这本小册子于 1860 年在巴黎出版,书名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同年在伦敦的本特利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Hungary, from 1848 to 1860》)。——第 429 页。
- 413 由于福格特做过帝国摄政,所以马克思称他是帝国流氓。关于帝国摄政政府,见注 19。——第 430 页。
- 414 关于《国民报》转载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内容,见注 9 和本卷第 438—443,454—474 页。——第 430 页。
- 415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福格特承认他曾从匈牙利革命者那里得到钱。
马克思所说的一家英文报纸,是指《自由新闻》报,该报 1859 年 9 月 28 日第 10 号发表了马克思的短文《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自由新闻》发表的这篇短文,是马克思按照他在 1859 年 9 月 24 日《纽约论坛报》发表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压缩写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0—567 页)。——第 431 页。
- 416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百般为福格特辩白,并且对于福格特曾为路易·波拿巴政府所收买这一事实表示怀疑。
下面是马克思对拉萨尔因李卜克内西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通讯员而攻击李卜克内西的回答(见注 53)。——第 431 页。
- 417 马克思指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最初计划,计划预定写六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7 页)。预定第一册包括四篇:(1)资本一般,(2)资本的竞争,(3)信贷,(4)股份资本。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包括《资本一般》这一篇的两个绪论性章节(一章关于商品,一章关于货币),而马克思打算整个第二分册是写资本一般。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最初写作计划的变动,见注 25。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认为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推迟到马克思的著作出版以后。当时拉萨尔计划写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该书于 1864 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第 431 页。

- 418 瑟美列在 1860 年 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如果马克思很忙,他可以不用马克思帮助,自己找一个译者译他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并见注 412)。——第 432 页。
- 419 指 1848 年 2 月 22 日民主协会为纪念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会。在这次纪念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534—541 页)。民主协会是 1847 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协会的主席是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若特兰。马克思被选为代表德国人的副主席。代表波兰人的副主席是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首领之一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为国际民主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派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和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在 1848 年 3 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对协会中最革命的分进行镇压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够领导劳动群众的反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隘和纯地方性的了,到 1849 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 433、505 页。
- 420 马克思把列列韦尔的回信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47 页)。——第 434 页。
- 421 关于传单《警告》,见注 42 和本卷第 438—440、454—459 页。

布林德的声明刊登在 1859 年 11 月 9 日《总汇报》第 313 号和 1859 年 12 月 11 日《总汇报》第 345 号上,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本卷第 456—457 页)。

1859 年 11 月 2 日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和排字工人维耶的声明也否认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 456 页)。——第 436 页。

- 422 马克思把费格勒的证词同《给〈总汇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55 页)一起寄给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以帮助该报对付福格特对它进行的控诉。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控诉,见注 16。费格勒的证词全文,见本卷第 455—456 页。——第 439 页。
- 423 看来,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1 年 1 月 27 日签发给《威塞尔报》的一篇对卢格的诽谤性文章的答复,卢格的文章登在 1851 年 1 月 17 日《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541—542 页)。卢格的文章内容是对《新莱茵报》的攻击,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攻击。——第 441 页。
- 424 指恩格斯把自己的著作《萨瓦、尼斯与莱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33—680 页)寄给柏林出版商敦克尔。但是由于在对德国各政党的立场的估计上敦克尔同恩格斯有分歧,正如他在 1860 年 2 月 2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如果作者不在扉页上署名,他就不同意出版这部著作。而恩格斯不愿意正式提自己的名字,以免过早地让军界读者知道这两本小册子的作者不是军人,所以认为只要指出这本新出的小册子出于《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之手就够了。这本小册子于 1860 年 4 月在柏林的贝伦兹出版社匿名出版。——第 443 页。
- 425 指由于 1852 年发生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而传布的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流言蜚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揭露了这些流言蜚语,并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活动的真正性质。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 页)、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9 卷第 537—571 页)。——第 445 页。

- 426 1860 年 2 月 15 日《总汇报》第 46 号附刊上刊登的比斯康普 1860 年 2 月 9 日的声明,揭露了 1860 年 2 月 6 日《每日电讯》发表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的诽谤性质,该文转述了《国民报》的两篇有福格特的捏造内容的社论(见注 9)。比斯康普主要是证明福格特对他本人所做的论断不符合事实。

1860 年 2 月 13 日《总汇报》第 44 号附刊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声明,标题是《反对卡尔·福格特》(《Gegen Karl Vogt》),布林德在声明中驳斥了福格特在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对布林德所做的一系列论断。此外,布林德在声明中暗示福格特同波拿巴主义集团有联系。——第 445 页。

- 427 《总汇报》编辑奥尔格斯在 1859 年 10 月 16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把排字工人费格勒揭发福格特的证词寄给他,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6 页和第 741—742 页;并见本卷第 463 页)。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 62。

布林德在 1859 年 9 月 8 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力图证明他同传单《警告》的写作无关,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4 页)。——第 447 页。

- 428 指马克思对柏林报纸《国民报》和伦敦报纸《每日电讯》的诉讼,因为这两家报纸转载了福格特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诽谤性的捏造(见注 9 和 47,以及本卷第 437—443 页和第 454—474 页)。——第 449 页。
- 429 李卜克内西在 1859 年 9 月 12 日给《总汇报》的私人信中说:“如果福格特把自己的诉讼转到伦敦法院——道义上将迫使他这样做——,那末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将同我一样作为证人出面”。——第 449 页。
- 430 马克思指的是 1859 年 11 月 23 日他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616—619 页)。——第 449 页。
- 431 1859 年 11 月 11 日的《晨报》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匿名文章,文章报道了在伦敦的席勒纪念活动,其中谈到弗莱里格拉特的颂诗,说这首诗“在

中等水平以上”。弗莱里格拉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暗示，布林德文章中的这段话似乎是受马克思的怂恿加进去的。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1859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88—493页）。——第450页。

- 432 弗莱里格拉特在1859年11月5日向奥格斯堡《总汇报》作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15日该报第319号附刊上）中声称，他从来没有当过《人民报》的撰稿人，他的名字在福格特的控告者当中出现并非他的意愿。弗莱里格拉特在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附刊上的声明中重述了几乎与此相同的话。这第二个声明同布林德的声明刊登在一起（见注421）。——第450页。
- 433 马克思指的是1859年9月12日李卜克内西给《总汇报》的私人信（见注429）和他11月15日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23日《总汇报》第327号附刊上。李卜克内西在这个声明中答复弗莱里格拉特时指出，他从来没有把弗莱里格拉特称作告发福格特的人（参见马克思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和马克思1859年11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94—495页和第619页）。——第450页。
- 434 看来，马克思在这时还没有得到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而是有人不确切地告诉马克思的。小册子里并没有弗莱里格拉特给福格特的信。——第450页。
- 435 马克思讽刺地暗指布林德的标题为《反对卡尔·福格特》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见注426），开头一句话是：“福格特在他最近出版的小册子中谈到我的‘恐俄症’和我的‘不信任’。”——第453页。
- 436 指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维斯的便函，看来这封便函是写给克鲁斯的，其中特别对拉萨尔作了评论，说他是一个对于任何党派都危险的和贪图名利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甚至能出卖自己的朋友。——第453页。
- 437 马克思指他在1852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信中告诉恩格斯共产

- 主义者同盟解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197 页)。——第 454 页。
- 438 关于这个文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5—517 页)。——第 456 页。
- 439 这些文件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也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7—518 页)。——第 457 页。
- 440 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8—519 页)。——第 457 页。
- 441 指比斯康普的《帝国摄政》(《Der Reichsregent》)一文。文章中有一段的开头一句话是“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关于这一点,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09 页)。——第 460 页。
- 442 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4 页)。——第 461 页。
- 443 见《〈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83 页)。——第 464 页。
- 444 后来马克思收到了德纳在 1860 年 2 月 11 日的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48—749 页)。——第 465、515 页。
- 445 指 1848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在科伦召开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确定科伦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里亚。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到工厂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的决议。——第 468 页。
- 446 1860 年 2 月 12 日波克罕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所谓的“硫磺帮”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06—409 页)。——第 468 页。

- 447 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关于“制刷匠帮”一词的来源写道：“阿布特截取了藻伦海美尔的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截取了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17页）。——第468页。
- 448 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案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在1852年2月，被捕者根据图谋政变的罪名而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都被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节中驳倒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70、541页。
- 449 马克思指的是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该文发表于《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1、8、15和22日各号上。马克思在《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对该文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第472页。
- 450 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可以看出，这个 affidavit 是卡尔·沙佩尔1860年3月1日在伦敦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83页）。——第477页。
- 451 指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该组织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的倡议于1857年成立的。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480页。

- 452 马克思指的是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者古斯塔夫·勒维于1853年12月下半月第一次来伦敦。勒维是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来见马克思的。勒维在拜访马克思时，曾试图说服马克思，要他相信在德国必须举行起义，并且莱茵省的工厂工人对此已有准备。但是马克思向勒维证明，起义以及勒维所建议的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都还不是时候。
- 马克思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反动的政治势力统治着德国，在法国和英国还没有革命的高潮，经济情况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此根本谈不上在德国举行成功的起义。——第481页。
- 453 四季社(Société des Saisons)是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下于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性组织。——第481页。
- 454 马克思指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该著作于1853年1月在巴塞尔出版(3月间几乎全部被警察没收)，后来，同年在波士顿出版。此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4—505页。——第482页。
- 455 指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马克思把呼吁书寄给克罗斯，让他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1853年1月呼吁书发表在《加利福尼亚州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2—646页)。——第482页。
- 456 该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97—198页。——第483页。
- 457 魏德迈在1852年2月6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德纳打算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西蒙的一篇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从魏德迈1852年3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判断，该文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显然是指这篇文章。——第483页。

- 458 《一八五四年防止贿选法施行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词、附件和索引》1860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 1854.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London, 1860)。并见马克思《英国的贿选活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86—591页)。
关于蓝皮书,见注71。——第484页。
- 459 关于费格勒的声明,见注56。维耶的声明,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布林德的声明《反对卡尔·福格特》,见注426。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第485页。
- 460 指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对资产阶级激进派采取的妥协立场。1857年4月琼斯建议召开代表会议,让布莱特、吉耳平等这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同宪章派组织的代表一道出席。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定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条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琼斯只保留了其中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的这种背离革命立场的做法,引起了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大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会议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滚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于1860年在琼斯重新开始以革命无产阶级精神出现以后,才得以恢复。——第485页。
- 461 琼斯1860年2月11日给马克思写的这封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被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页)。——第485页。
- 462 马克思是回答拉萨尔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拉萨尔在

这封信的附言中对马克思说：“你在你信的末尾，以庄严的姿态把从巴尔的摩收到的便函转给了我，来表明我至少没有根据埋怨你的不信任。”这是指马克思在 1860 年 2 月 23 日的信中转给拉萨尔的维斯的便函（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 453 页和注 436）。——第 489 页。

- 463 马克思指的是他 1859 年 10 月 2 日和 11 月 6 日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597—599 页和第 603—608 页）。——第 490 页。
- 464 马克思指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 1853 年 11 月 25 日《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35 页）。发表这篇声明是为了答复刊登在 1853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4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维利希在他的文章中歪曲事实，竭力使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的批判的正确性。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谰言，这一著作是 1853 年 11 月写成的，1854 年 1 月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37—571 页）。
关于泰霍夫的信，见注 37。——第 490、501 页。
- 465 拉萨尔在 1860 年 2 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搜集他的材料（编写他的记过簿），说维斯的便函是由于他们探询情况才写的。——第 491 页。
- 466 拉萨尔在 1860 年 2 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在致马克思的附言里，问马克思，1856 年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是不是通过勒维对他拉萨尔的指责转告马克思的（见注 54 和本卷第 34 页），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和乌伦多夫等人是不是与提出这种指责有关系。——第 491 页。
- 46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322 页和第 8 卷第 107—108 页。——第 492 页。
- 468 马克思大概指伦敦《每日电讯》报上一篇关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

子约翰娜·莫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德国女作家芬尼·列伐尔特(丈夫姓施塔尔)写的。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59页。——第493页。

46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8页。——第496页。

470 这项声明(affidavit)是马克思1860年2月29日向曼彻斯特的法官提出的。——第496页。

471 这里所提到的许多文件发表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弗洛孔给马克思的信(第746页);列列维尔给马克思的信(第747页);若特兰1848年5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第746—747页);厄内斯特·琼斯给马克思的信(第748页);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第739页)。

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版(《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 Assisen in Köln》.Köln, 1849),是《新莱茵报》发行科出版的,内有1849年2月7日对《新莱茵报》审判的记录和1849年2月8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的记录。

1849年2月7日审判时,马克思、恩格斯和报纸发行负责人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发表的一篇文章《逮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中,似乎侮辱了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次审判时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85页。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1849年2月8日举行的。马克思、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这个委员会曾于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在这次审判时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6—306页)。——第498页。

472 《纽约每日论坛报》责任编辑德纳1860年3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

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48—749 页）。——第 498 页。

- 473 指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所组织的命名为“革命集中”的秘密组织。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其领导人是 1849 年 5 月德勒斯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契尔奈尔；在这个组织里起重要作用的有弗里兹、格莱纳、济格尔、泰霍夫、叔尔茨、约·菲·贝克尔、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参加该组织的有德斯特尔、布龙等人，另外还有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派进行活动的威廉·沃尔弗。1850 年 7 月—8 月间，“革命集中”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两个组织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1850 年年底，由于德国政治流亡者被大批驱逐出瑞士，“革命集中”组织便解散了。——第 500 页。
- 47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44—546 页。——第 500 页。
- 475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48—558 页）。——第 501 页。
- 476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37 页）。——第 501 页。
- 477 显然是指《新莱茵报》的以下几篇文章：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御前演说》，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234—246、375—381、518—530 页）。——第 502 页。
- 478 关于魏德迈、雅科比和克鲁斯的声明，见注 464。
魏德迈当时是在威斯康星州工作（参看本卷第 518、520 页）。——第 503 页。
- 479 指马克思《三月同盟》一文，该文发表于 1849 年 3 月 11 日《新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94—396 页）。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摘引了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93—494 页）。

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 1848 年 11 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保卫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的成果是它的宗旨。同盟是由象弗吕吕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8 年 12 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 504 页。

- 480 普鲁士驻巴黎公使阿尔宁与法国大臣基佐于 1844 年 12 月就驱逐马克思以及革命民主派报纸《前进报》的其他许多撰稿人(因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法国政府于 1845 年 1 月发布了驱逐令。马克思于 1845 年 2 月 3 日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第 505 页。
- 48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9—10 页。——第 505 页。
- 482 大概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那些通告。其中只有一篇保存下来,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20 页)。——第 505 页。
- 483 马克思在他 1847 年 12 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所作讲演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著作(见注 382),1849 年才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在《新莱茵报》上第一次发表。后来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的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的预备提纲,手稿的标题为《工资》,而且封面上注有:“1847 年 12 月于布鲁塞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635—660 页)。——第 505 页。
- 484 指比利时 1830 年革命时期选出的比利时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比利时的独立,并制定了带有资产阶级—贵族性质的宪法。若特兰曾是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 506 页。
- 485 1848 年 2 月 22 日,在民主协会为纪念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庆祝会上,马克思和若特兰之间发生了分歧,结果马克思声明退出协会。但是在若特兰 1848 年 2 月 25 日写信请求马克思收回声明以后,马克思仍担任民主协会副主席的职务。——第 506 页。

- 486 1848年4月6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去德国,以便直接参加革命。——第506页。
- 487 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成员。——第506页。
- 488 马克思在1849年8月26日左右从巴黎到达伦敦。——第506页。
- 48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6—567页。——第508页。
- 490 这里说的印刷费账单,马克思显然是指《自由新闻》出版社为印刷他的传单《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的账单。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以及本卷第458—459页。——第509页。
- 491 指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16)。——第509页。
- 492 大概是指马克思1859年11月15日《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这一文件。这项声明没有在《改革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
关于《新瑞士报》上发表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91—592页。——第510页。
- 493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见本卷第434页和注415)。——第511页。
- 494 关于若特兰1848年2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布鲁塞尔的插曲,见注485。若特兰1848年5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6—747页)。——第512页。
- 495 马克思以讽刺口吻称拿破仑第三时期的法国为小帝国,以与拿破仑第一时期的法国相对照。——第512页。
- 496 拉萨尔在1860年3月11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同斐迪南·沃尔弗联系,建议他把《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的书信集》译成法文(见注499)。

恩格斯提到的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给斐迪南·沃尔弗的那封信，没有找到。——第 514 页。

- 497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1860 年 3 月 20 日给莱茵兰德尔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43—447 页）。——第 516 页。
- 498 马克思从佩尔采尔将军那里得到说明，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意大利战役时脱离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匈牙利军官们。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45 页）。——第 517 页。
- 499 指《1827—1858 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的书信集》1860 年莱比锡版（《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 Leipzig, 1860），此书是在拉萨尔协助下由德国自由派作家万哈根·冯·恩赛的侄女柳德米拉·阿辛格出版的。拉萨尔在 1860 年 3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马上就这本书寄给他。——第 518 页。
- 500 美国工人同盟是美国工人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1853 年 3 月 21 日于纽约创立。魏德迈为美国工人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德国的工人流亡者在美国工人同盟中占居大多数。同盟认为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建立工会、提高工资，以及争取缩短工作日、进行工人的独立的政治活动。1855 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但是 1857 年同盟在纽约又以工人总同盟的名称恢复活动。芝加哥工人协会是同盟的一个分会，是德国工人流亡者于 1857 年成立的。1860 年，美国工人组织的领导转到芝加哥工人协会，工人总同盟便不复存在。——第 518 页。
- 501 指魏德迈 1860 年 3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请求他为芝加哥工人协会创办的报纸《人民呼声》物色在欧洲的通讯员，该报的编辑工作由魏德迈担任。——第 518 页。
- 502 马克思这封信的草稿中没有引用从福格特的小册子中摘出的引文。草稿中省去的引文，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4 页）。洛美尔 1860 年 4 月 13

- 日回信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6页。——第521页。
- 503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7—469页)。——第523页。
- 504 拉萨尔在1860年4月16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把他的还没有发表的文章《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的清样寄给了马克思,该文是为瓦勒斯罗德出版的《民主研究》而写的(见注70)。拉萨尔这篇文章是专论费希特的著作《一八〇七年和一八一三年的政治片断》(《Politische Fragmente aus den Jahren 1807 und 1813》)的。费希特这一著作载于《约·哥·费希特文集》1846年柏林版第7卷第507—613页(J.G. Fichte. Sämtliche Werke. Bd. 7, Berlin, 1846, S. 507—613)。马克思所说的没有读过的著作,是指费希特的这些片断。——第530页。
- 505 指通讯员阿贝尔,他在1860年2月6日的《每日电讯》上发表了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的摘录(见注47和9)。——第530页。
- 506 1860年5月初,政论家费舍建议马克思为《德意志报》撰稿,这家报纸将有费舍参加,预定在柏林出版。关于马克思同费舍的关系,见本卷第546—549页。——第532页。
- 507 指卡·格律恩的匿名小册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宝座上的斯芬克斯》(《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die Sphinx auf dem französischen Kaiserthron》)。——第534页。
- 508 1852年10—11月的《科伦日报》刊载了关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道,标题是:《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控告他们参与叛国性的密谋》(《Assisen- Proce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complottes》)。——第534页。
- 509 1852年10—11月的《福斯报》刊载了关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道,标题是:《科伦陪审法庭的一个共产党人大案件的审理记录》(《Die Verhandlungen des großen Kommunistenprozess vor dem A s-

- sisenhofe zu Köln)》。——第 534 页。
- 510 罗伊特在奥·迪茨那里偷走的文件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文件。1850 年秋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奥·迪茨成为该集团的成员(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67—471 页),这些文件与当时其成员正在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没有任何关系。——第 535 页。
- 511 指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伪造的所谓“真正的记录本”,该记录本作为控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材料被提交到 1852 年审判共产党人的科伦法庭。——第 535 页。
- 512 费舍在 1860 年 5 月 30 日给马克思的信(对马克思 1860 年 5 月 8 日给费舍的信(见本卷第 532—533 页)的回信)中,回答马克思询问的报纸的倾向性时指出,该报的口号之一是“黑、红、黄”(见注 351)。——第 536 页。
- 513 费舍在 1860 年 5 月 3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每日电讯》的驻柏林通讯员是阿贝尔(见注 47)。——第 536 页。
- 514 马克思指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第 537 页。
- 515 马克思在这里是回答拉萨尔要他去柏林为审讯艾希霍夫时作证人的建议(见注 29)。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告诉拉萨尔的关于警察局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施展阴谋的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 4 中也利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26—734 页)。——第 538 页。
- 516 关于马克思同尤赫的会见,并见马克思 1859 年 12 月 13 日和 20 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504、506—507 页)。——第 538 页。
- 5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68 页。——第 539 页。
- 518 马克思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维利希—沙佩尔同盟,这个集团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以后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组织(并见注 44)。——第 540 页。

- 5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9—470页。——第540页。
- 520 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一控告称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的密谋)。
- 1853年，由于投向警察局并为之效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原盟员亨策的告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拉登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维等被捕。1854年根据这种伪造的密谋罪，他们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三年至五年)。关于对警察局这种挑衅行为的揭露，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8—449、451、734页)。——第541页。
- 52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6页。——第542页。
- 5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499页。——第544页。
- 523 帕麦斯顿对费舍的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答复，大概在英国报刊上是以“伊斯马伊耳”的笔名发表的。——第548页。
- 524 唐宁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国外交部和首相官邸的所在地。——第549页。
- 525 指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1859年6月11日给帕麦斯顿的一份《备忘录》。瑟美列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帕麦斯顿的活动大为赞扬，呼吁他协助匈牙利取得独立。备忘录作为单独的一章收入瑟美列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一书中(见注412)。——第550页。
- 526 这件事是流亡巴黎的俄国新闻工作者萨宗诺夫在1860年5月10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的(萨宗诺夫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20—421页)。——第551页。
- 527 拉尼克尔给席利的信的片断，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6页)。——第552页。

- 528 指哥达党。这个党是 1849 年 6 月在哥达(绍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右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 552 页。
- 529 指法律顾问维贝尔给马克思的信,信中维贝尔通知说,上诉法院于 1860 年 7 月 11 日驳回了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见注 9)。上诉法院关于驳回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的决定,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01—702 页)。——第 553 页。
- 530 这封信是对燕妮·马克思 1860 年 8 月 14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 673 页)。——第 554 页。
- 531 拉萨尔在 1860 年 9 月 11 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打听关于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是该行伦敦分行的职员。——第 562 页。
- 532 拉萨尔在 1860 年 9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毕尔格尔斯在科堡民族联盟的会议上所作的公开演说中号召实现普鲁士的领导权。——第 563 页。
- 533 这封信是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 1860 年 9 月 15 日给他的信的第一页上端写的附言。马克思曾根据拉萨尔的请求向弗莱里格拉特打听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是对这一问题的答复(见本卷第 562 页和注 531),马克思把它转寄给了拉萨尔。——第 565 页。
- 534 这个题目的小册子马克思没有写。——第 566 页。
- 535 马克思把瑟美列寄给他的英国议会议员桑福德和科苏特在 1854 年 5 月 30 日谈话的纪要称作科苏特—科布顿备忘录。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瑟美列是从他收到的英国自由贸易派首领科布顿的信中知道的。涉及匈牙利与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相互关系的谈话的摘录,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52—753 页)。——第 569 页。

- 53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0页以及本卷第464页。——第572页。
- 537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第574页。
- 538 马克思在给艾希霍夫的便函中大概是说他有意图把1860年出版的艾希霍夫的抨击性小册子《柏林警察剪影》译成英文，并全文或摘要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同时可能加上他对该小册子的评论。艾希霍夫在1861年2月16日的信中同意小册子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打算没能实现。——第576页。
- 539 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去世以后，兄弟们向恩格斯提出，要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放弃对他父亲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权利。提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之一是，恩格斯从1849年起居住在国外。对恩格斯的补偿则为：拨出一万英镑来巩固他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使恩格斯能够在以后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但是英国法律使公司合伙人的权利在本人死亡以后很难转让给他的继承人，因而兄弟们的建议损害了恩格斯的继承权。恩格斯在1864年才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关于这点，见注395）。——第577页。
- 540 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是德国一首同名歌曲中的人物，这首歌是对十六世纪的所谓粗俗文学的民间讽刺性的草拟作。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把海因岑的政论文章比作这种文学作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2—356页）。——第580页。
- 541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巴黎的行动失败以后，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开始受到镇压。1849年7月19日法国当局通知马克思，要把他从巴黎驱逐到摩尔比安——布列塔尼的一个有害健康的沼泽地。因此，马克思决定侨居英国，住在伦敦。1849年8月24日马克思离开了巴黎。——第582页。
- 542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基佐政府驱逐出法国以后迁往布鲁塞尔。但

是普鲁士政府于 1845 年 12 月要求比利时政府把马克思作为普鲁士臣民从比利时驱逐出境。由于这些迫害,马克思被迫申请退出普鲁士国籍。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一文,以及《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451—454 页;第 15 卷第 672—679 页)。——第 582 页。

- 543 1848 年的预备议会是 184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各邦社会人士的会议。会议组织了一个五十人委员会,它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

法兰克福议会是 1848 年 5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其目的是制定全德宪法。1849 年夏议会停止了活动。——第 582 页。

- 5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67 页。——第 585 页。

- 545 柏林位于沙土壤很多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央。——第 590 页。

- 546 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 1859 年 11 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没有参加协会,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 1864 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 592、620 页。

- 547 看来是指联合文人、学者的俱乐部“雅典神殿”,这样的俱乐部在伦敦、曼彻斯特和英国其他一些城市都有。——第 594 页。

- 548 恩格斯信中所说的附录二没有找到。——第 594 页。

- 549 指梅因登在《自由射手》上的标题为《柏林来信》(《Berliner Briefe》)的一些文章,马克思说的是刊登在 1861 年 4 月 23 日《自由射手》第 49 号上的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第 599 页。

- 550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信没有找到。从哈茨费尔特 1861 年 6 月 14 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请她协助在德国报

刊上发表关于布朗基在监禁中所处的艰苦条件以及关于为出版介绍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而提供资金援助的消息。马克思还曾设想再组织一批关于布朗基案件的文章。在德国女作家阿辛格的帮助下,关于布朗基的材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报纸上发表了。——第 601 页。

551 指普鲁士亲王威廉(从 1861 年起是普鲁士国王)在 1858 年 10 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1858 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政。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巩固普鲁士君主制度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由此产生的六十年代的宪制冲突(见注 167)和 1862 年 9 月俾斯麦的上台,结束了这个“新纪元”。——第 604 页。

552 1861 年 7 月 14 日,大学生奥斯卡尔·贝克尔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逗留巴登-巴登期间对他谋刺,没有得到成功。——第 606 页。

553 罗马法中的所谓遗赠,是指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做出的把遗产中的某种权利或利益给予某人的决定。

遗赠受领人指承受遗赠的人。遗嘱的继承人与遗赠受领人的区别,在于继承人是全面的遗赠受领人,因为他不仅继承死者的财产和权利,而且继承其义务。——第 609 页。

554 这封信看来是对法国政论家瓦托(德农维耳)博士 1861 年 7 月 28 日和 9 月 27 日给马克思的两封信的答复。从瓦托的这两封信中,以及从他 6 月 8 日和 7 月 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通讯中主要的话题是关于 1861 年 3 月以组织秘密团体的罪名被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布朗基的命运问题(见注 188)。在马克思给瓦托博士的信中,找到了第二封。马克思 5 月 18 日写的第一封信的内容,可以从瓦托 1861 年 6 月 8 日的回信中看到。瓦托在信中说,布朗基对于德国无产者对他的同情深为感动。瓦托在这同一封信中请求马克思帮助出版关于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第 611 页。

555 指的是乌尔卡尔特派由于英法有对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威胁而于 1862 年 1 月 27 日在伦敦组织的群众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大

- 会。——第 613 页。
- 556 约·瓦·维贝尔在 1861 年 12 月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马克思写文章批判地分析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维尔特的观点和他所出版的鼓吹劳资利害一致的《雇主报》(《Der Arbeitgeber》)的立场。看来,马克思曾想就这个题目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讲演。——第 613 页。
- 557 指的是马克思在中断了六个月以后,于 1861 年 9 月短时期又恢复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见注 7)。——第 614 页。
- 558 指的是约·菲·贝克尔当时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书。该书于 1862 年出版,标题是《怎样与何时?关于当代的问题和任务的严肃见解》(《Wie und wann? Ein ernstes Wort über die Fragen und Aufgaben der Zeit》)。——第 614 页。
- 559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他的《切尔克西亚的叛徒》一文,该文揭露了秘密警察班迪亚。图尔同班迪亚关系很密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79—180 页;第 14 卷第 628—629 页)。——第 617 页。
- 560 指的是 1849 年 6—7 月在巴登领土上发生的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对普鲁士军队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担任人民自卫团指挥的贝克尔曾掩护起义军主力撤退。巴登战役是德国西部和南部为维护帝国宪法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最后阶段。关于贝克尔参加这一战役,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约翰·菲利浦·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页;第 21 卷第 365—371 页)。——第 617 页。
- 561 指的是英国统治阶级试图挑起有工人阶级参加的群众性的发动,以便制造舆论站在南部蓄奴州方面对美国进行干涉。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英国的舆论》和《伦敦的工人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63—469、480—483 页)。——第 619 页。
- 562 海尔曼·贝克尔根据科伦法庭判决被监禁,于 1857 年被释出狱后,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的拥护者出现。在 1861 年的选举(见注 215)中,他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第 621 页。

- 563 指古代丹麦反封建的民歌《提德曼老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7—39 页)。——第 621 页。
- 564 《士瓦本宝鉴》——十三世纪在士瓦本编制的一部封建习惯法汇编的名称,它反映了封建割据时期德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施米特在其著作中把这本汇编错误地看作士瓦本诗歌作品。
所谓古希腊的“七贤”,都生活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施米特毫无根据地把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以及更晚一些时期以统一的始源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其他古希腊哲学家,都算了进去。
“七个士瓦本人”是德国民间滑稽故事。——第 622 页。
- 565 马克思和拉萨尔一起,就施米特的书博得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特别是博得普鲁士众议院议长格拉博夫的信徒“格拉博夫分子”的好评一事,对他进行讽刺。——第 623 页。
- 566 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会为答复这封信而于 1862 年 8 月 27 日给了马克思一张长期出入证,使他可以以《新闻报》通讯员身分自由采访博览会。——第 629 页。
- 567 指的是布勒斯劳行政当局于 1862 年 9 月在德国报刊上公布对威廉·沃尔弗申请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权所给予的答复,这个申请,沃尔弗是在 1862 年 1 月 4 日和 6 月 4 日根据 1861 年 1 月 12 日的大赦令(见注 146)提出的。布勒斯劳当局在给沃尔弗的答复中通知说,1861 年的大赦并不免除 1845 年控告他违反出版法和 1848 年控告他“图谋危害普鲁士国家安全”所应受的审讯。为了揭露普鲁士大赦的蛊惑性,马克思把这些材料寄给了济贝耳,在济贝耳的帮助下,《巴门日报》及其他德国报纸发表了这些材料。——第 631 页。
- 568 指的是库格曼 1862 年 11 月 21 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信中要求把马克思写作经济学著作的进展情况告诉他。弗莱里格拉特于 12 月 3 日在把这封信转寄给马克思时称之为《一个信徒的话》。——第 635 页。
- 569 马克思同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之间的经常通信开始于这封信。马克思同库格曼之间的通信一直继续到

1874年。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谈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些书信考茨基于1902年第一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1907年用俄文出版了由弗·伊·列宁编辑和作序的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第一版。——第636页。

- 570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手稿称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第636页。
- 571 马克思指的是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两期合刊上的《国际述评(三)》。从5月至10月一文,文中表达了革命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第638页。
- 572 指的是马克思写《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准备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第639页。
- 573 弗莱里格拉特在1863年12月16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伦敦书商威廉斯要求李卜克内西偿还一笔债款,这是李卜克内西在1859年给奥格斯堡《总汇报》撰稿期间,由弗莱里格拉特作保向威廉斯借的。——第643页。
- 574 在普鲁士三月革命的影响下,1848年春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发生了反对丹麦统治、主张与德意志合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各邦的干涉,开始了对丹麦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行动很快就表明,普鲁士政府并不想捍卫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1848年8月26日在马尔摩签订的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化为乌有,实际上仍保存了丹麦的统治。1849年3月底重新开始的普鲁士和丹麦战争,继续到1850年,并以丹麦的胜利而告终。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归属丹麦王国。——第647页。
- 575 指1863年5月31日至6月1日法国立法团的选举。——第648页。

- 576 1864年2月29日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实行戒严,从而使波兰起义者不能得到任何援助。——第648页。
- 577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诸神虽然也存在,但是存在于各世界之外,存在于各世界之间的空间,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都没有任何影响。——第651页。
- 578 “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656页。
- 579 恩格斯于5月19日到伦敦,在马克思处作客四天。——第658页。
- 580 指马克思为领取威廉·沃尔弗给他的一宗遗产办理手续的事。——第658页。
- 581 当时哈尼得到他的朋友们要他迁居澳大利亚的邀请,看来这就是传说他去那里的来由。但实际上哈尼没有应邀去那里,而是在1863年5月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英国到美国去了。——第659页。
- 582 恩格斯给爱利莎·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信中大概是谈恩格斯同哥·欧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海·恩格斯在财务上的清算。——第660页。
- 583 说的是1864年5月23日《总汇报》第144号附刊及其他德国报纸上登载的、由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恩·德朗克、路·博尔夏特及爱·龚佩尔特署名的关于威廉·沃尔弗逝世的讣告:

“讣告

威廉·沃尔弗

今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因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威廉·沃尔弗生于西里西亚施魏德尼茨附近的塔尔瑙,1848年和1849年是科伦《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国民议会议员,从

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任教。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斯特·德朗克
医学博士路易·博尔夏特、医学博士爱德华·龚佩尔特

1864年5月13日于曼彻斯特”。——第661页。

- 584 指弗兰德于1864年6月16日在英国下院的演说。——第664页。
- 585 布拉斯在给比斯康普的信中，请比斯康普为他在柏林出版的《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撰稿。——第665页。
- 586 莱昂·菲利浦斯在信中提到他家的女仆得了天花。因此，马克思没有照预定计划带女儿们到扎耳特博默耳去。——第665页。
- 587 见本卷第16页和第171页，以及注180。——第678页。
- 588 燕妮·马克思所称的通告，就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是马克思于1863年10月底受协会委托而写的，由为援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而组成的捐款委员会委员签署，于1863年11月以传单形式在伦敦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
- “主席团”的信就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瓦耳泰希的那封信，是寄给为援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而组成的捐款委员会委员威廉·沃尔弗的。瓦耳泰希以联合会主席团名义，表示赞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并答应尽全力照这个呼吁书所号召的去做。信中还要求寄五十份印有呼吁书全文的传单，以便分发给联合会的各地方分会。——第680页。
- 589 燕妮·马克思引用的话，出自1863年10月1日《柏林改革报》第229号上一篇关于拉萨尔1863年9月27日在佐林根发表的演说的报道。
- 往下指的是拉萨尔于1863年11月3日、15日和17日就柏林警察的行动向柏林警察总监提出的申诉书。在这些申诉书中，拉萨尔请求普鲁士当局制止对全德工人联合会采取警察暴行，并请求在联合会开会期间由警察维持秩序。同时拉萨尔还强调说，他的宣传鼓动同普鲁士国家的利益并不矛盾。——第680页。

人名索引*

A

- 阿巴伯内尔 (Abarbanel 死于 1863 年)——巴黎的银行家, 马克思的熟人。——第 301、305、314 页。
- 阿贝尔, 卡尔 (Abel, Karl 生于 1837 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每日电讯》的柏林通讯员。——第 31、43、62、453、473、474、497、530、536、538 页。
- 阿庇安 (Appian 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代)——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第 159 页。
- 阿布拉罕公司 (Abraham M. & Co.)——柏林的一家商号。——第 530 页。
- 阿布, 艾德门 (About, Edmond 1828—1885)——法国新闻工作者, 波拿巴主义者。——第 64、66、96、133、134、552 页。
- 阿布特 (Abt)——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日内瓦, 因造谣中伤被开除出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第 87、200、468 页。
- 阿尔伯特 (Alberts)——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第 121、185、186、193、540、542 页。
- 阿尔伯特 (Albert 1819—1861)——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 6 页。
- 阿尔坦赫弗尔, 奥古斯特·约瑟夫 (Altenhöfer, August Joseph 1804—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 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之一。——第 19 页。
- 阿芬格尔, 伯恩哈特 (Afinger, Bernhard 1813—1882)——德国雕塑家。——第 444 页。
- 阿基米得 (Archimedes 公元前 287 左右—212)——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 650 页。
- 阿姆斯特朗, 威廉·乔治 (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国发明家和厂主, 以发明特别的线膛炮而出名。——第 202 页。
- 阿辛格, 柳德米拉 (Assing, Ludmilla 1821—1880)——德国自由派女作家, 著名的德国作家万哈根·冯·恩赛《日记》的出版者, 同拉萨尔很友好。——第 162、423、518、567、570、586、619、676 页。
- 埃尔哈特, 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 (Erhardt, Johann Ludwig Albert 约生于 1820 年)——德国店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 491 页。
- 埃尔曼尼(Ermani)——伦敦的出版者和书商。——第 36、436 页。
-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第 164、395、397、408、414、416、466、467、683 页。
- 埃卡留斯(Eccarius)——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妻子。——第 85、86 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 13、77、78、80、82、85、86、88、295、369、399 页。
- 埃梅尔曼,卡尔(Emmermann, Karl)——莱茵省的林务官,1849 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步兵分队指挥;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第 54 页。
- 埃塞尔(Esser)——普鲁士法官,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1848),后为第二议院议员(1849),属于左派;马克思的父亲的朋友。——第 504 页。
-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 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 545 页。
- 埃斯基涅斯(Aeschines 公元前 389—314)——著名的雅典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616 页。
-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Esterhazy von Galantha)——奥地利外交家。——第 48 页。
-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Esterhazy von Galantha)——前者的堂兄弟。——第 48 页。
- 艾夫斯,马尔康(Ives, Malcolm)——美国新闻记者,属于民主党,自五十年代末起是《纽约先驱报》的撰稿人。——第 220 页。
- 艾伦(Allen)——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和他一家人治过病。——第 69、111—114、116—117、126、128、130、142、144、146、209、217、235、237、272、302、329、338、351、356、371、373、392、393、682 页。
-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耳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脱盟。——第 105、492 页。
-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 Karl-Wilhelm 1833—1895)——德国社会党人,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露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1860 年流亡英国,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第 18、89、91、93、231、236、244、247、249、333、334、449、471、479、534、535、538、539、564、575、576、658 页。
- 安贝尔,雅克(Imbert, Jacques 1793—1851)——法国社会主义者,1834 年里

- 昂起义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第506页。
- 安德斯(Anders)(拉普人)——德国政论家,侨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8年底起为伦敦东头区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6页。
- 安罗伊,阿·范(Anrooy, A. van)——扎耳特博默耳市的医生。——第375、376、606、646、667页。
- 安罗伊,罕丽达(小耶特)·范(Anrooy, Henriette(Jettchen) van)——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力浦斯的女儿,阿·范·安罗伊的妻子。——第591、606、646、667页。
-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和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197、246—249页。
- 奥本海姆(Oppenheim)——伦敦的银行家。——第397页。
-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之一,1849年至1861年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90、110页。
- 奥登堡,奥古斯特·保尔·弗里德里希(Oldenburg, August Paul Friedrich 1783—1853)——奥登堡王朝的大公(1829—1853)。——第413页。
- 奥登堡,彼得·尼古劳斯·弗里德里希(Oldenburg, Peter Nikolaus Friedrich 1827—1900)——奥登堡的大公(1853—1900),1864年被俄国推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王位的追求者;1866年他把自己的王位要求让给普鲁士。——第413页。
- 奥登堡王朝(Oldenburger)——丹麦王国(1448—1863)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公国(1460—1863)的王朝;俄国皇帝彼得三世(1761—1762)属奥登堡王朝。——第407页。
- 奥尔丹,威廉逊·辛普森(Oldham, William Simpson 1813—186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南部同盟国会议员。——第298页。
- 奥尔格斯,海尔曼(Orges, Hermann 1821—1874)——德国新闻工作者,1854年至1864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之一。——第13、15、16、400、401、463页。
- 奥尔良亲王——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
-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不管大臣(1858—1862)。——第480页。
-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244、617页。
- 奥耳索普,托马斯(Allsop, Thomas

- 1795—1880)——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接近宪章派;1858年资助奥尔西尼谋杀拿破仑第三。——第244页。
-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弗雷德里克)(Augustenburg, Friedrich 1829—1880)——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宗德堡—奥古斯滕堡亲王,1852年起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王位追求者;1863年起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大公,称弗里德里希八世。——第370、372、377、382、413、416页。
- 奥普戴克,乔治(Opdyke, George 1805—1880)——美国企业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纽约市长(1862—1863)。——第306页。
- 奥斯本——见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
- 奥斯渥特,恩斯特(Oswald, Ernst)——普鲁士军官,1860年参加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1年末流亡美国。——第197页。
- ### B
- 巴布斯特,伊万·康德拉提也维奇(Бабуш, Иван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1824—1881)——俄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曾先后任喀山大学(1851年起)和莫斯科大学(1857年起)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六十年代初曾举行政治经济学公众讲演会。——第551、563页。
-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ш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205、217、324、365、368、492页。
-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巴罗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第160页。
- 巴斯提安,阿道夫(Bastian, Adolf 1826—1905)——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第131、574页。
- 巴特勒,本杰明·富兰克林(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1818—189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美国内战时期夺取新奥尔良时为远征军的指挥官,新奥尔良的军事长官(1862)。——第392、405页。
-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 Lydia (Lizzy)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第300、304、307、308、385、397、424页。
- 白恩士,玛丽(Burns, Mary 死于1863年)——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第218、300、304、307、308、310、314、317页。
- 班贝尔格,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英国、荷兰,1853年起侨居法国;巴黎的银行家,六十年代末回到德国,追随民族自由党人。——第13、90、110、561页。
-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

- 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 同时也是秘密警探; 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 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进行活动 (1855—1858)。——第 84、305、369、484、546 页。
- 班克斯, 纳萨涅尔·普伦蒂斯 (Banks, Nathaniel Prentiss 1816—1894)——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 马萨诸塞州的州长 (1858—1861), 美国内战时期任弗吉尼亚州 (1862) 和路易西安纳州 (1862—1864) 的北军司令。——第 248、257 页。
- 邦迪埃拉兄弟, 阿提利奥 (1810—1844) 和埃米利奥 (1819—1844) (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奥地利舰队的军官, “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 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 (1844)。——第 384 页。
- 保拉-克雷歇尔 (Paula-Krecher) (保尔夫 Paulaw)——第 485 页。
- 鲍威尔, 埃德加尔 (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1859 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 1861 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 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 201、363 页。
- 鲍威尔, 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168、264 页。
- 贝多芬, 路德维希·万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65 页。
- 贝尔姆巴赫, 阿道夫 (Bermbach, Adolph 1822—1875)——科伦的法学家, 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人, 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 后来成为自由派。——第 56、471、491 页。
- 贝尔纳·奥斯本, 拉尔夫 (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海军部秘书 (1852—1858)。——第 384 页。
- 贝尔纳, 西蒙·弗朗斯瓦 (Bernard, Simon-François 1817—1862)——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派; 1848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1858 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同谋犯, 但被英国法庭宣布无罪。——第 243、244、598、617、619 页。
- 贝克尔 (Becker)——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 543 页。
- 贝克尔 (Becker)——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海耳曼》报驻莱比锡通讯员。——第 615 页。
- 贝克尔, 奥斯卡 (Becker, Oskar 1839—1868)——一个在敖德萨做校长的波罗的海沿岸德国人的儿子; 莱比锡大学的学生; 1861 年因谋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判二十年徒刑, 1866 年被赦免。——第 606、607 页。
- 贝克尔, 海耳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红色贝克尔 der《rote Becker》)——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普鲁

- 士众议院议员(1862—1866),后为国会
 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伦
 市长。——第241、477、491、621页。
- 贝克尔,麦克斯·约瑟夫(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莱茵省
 的工程师,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
 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第468
 页。
- * 贝克尔,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
 业是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
 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1848—
 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失败后逃出德国,六十年
 代是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国际各
 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先驱》杂志的
 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51、53、102、136、194、
 195、336、515、522、551、574、614、616、
 673页。
- 贝克曼(Beckmann)——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科伦日
 报》驻巴黎的通讯员。——第467、541、
 542页。
- 贝伦兹,尤利乌斯(Berends, Julius 生于
 1817年)——德国出版者,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第56、513页。
- 贝内克(Beneke)——曼彻斯特的商
 人。——第656页。
- 贝塞耳(Bessel)——德国律师,1860年是
 科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第89
 页。
- 贝塔,亨利希(Beta, Heinrich)(贝特齐希
 Bettziech的笔名)——德国新闻工
 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6、143、201、
 231、450、484页。
- 贝特伦,格尔格利(Bethlen, Gergely)——
 伯爵,匈牙利军官,匈牙利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拉萨尔决斗时的监场人。——第
 418、668页。
-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
 (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
 1860)——男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
 和神学家,接近普鲁士宫廷,曾任驻伦
 敦大使(1842—1854)。——第539页。
- 本特利,理查(Bentley, Richard 1794—
 1871)——英国出版商,伦敦出版公司
 经理。——第429页。
- 比勒,卡尔·施廷·安德森(Bille, Carl-
 Steen Andersen 1828—1898)——丹
 麦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民族自
 由党,《日报》的编辑和所有者,下院议
 员。——第416页。
- 比朔夫斯海姆,路易(Bischoffsheim, Louis
 1800—1873)——法国银行家,股份银
 行的经理,该银行在伦敦设有分
 行。——第211页。
- 比斯康普,埃拉尔特(Bi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新闻工
 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
 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曾参加伦敦
 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
 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
 版。——第111、125、133、140、439、
 443、445、457、460、462、464、465、568、
 665页。
- 彼得一世(Пётр I 1672—1725)——1682
 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
 帝。——第341页。
- 彼得三世(Пётр III 1728—1762)——俄国
 皇帝(1761—1762)。——第341页。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369页。
- 俾斯麦, 奥托(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 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 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 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的制定者。——第288、297、300、307、325、331、350、351、370、386、394、402、416页。
-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公元前571左右—497)——古希腊数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650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判处六年徒刑, 六十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进步党人。——第26、89、93、159、170、195、205、276、289、482、563、564页。
- 毕林, 卡尔·约翰(Bühning, Karl Johann 生于1820年)——德国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158、171页。
- 毕希纳, 路德维希(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76页。
- 卜尼格先, 鲁道夫(Bennigsen, Rudolph 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 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统一德国; 1859—1867年为民族联盟党主席, 从1867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3和1887—1898)。——第564页。
- 波克罕,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德国政论家,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1851年起是伦敦商人;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32、42、46、57、90、95、96、101、110、111、124、125、130、136、137、147、149—152、197、200、230、232、237、239、253、263、271、274、276—281、283、286、293、397、400、401、405、444、468、568、573、614、627、628、630、632页。
- 波拿巴第一——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eon 1822—1891)——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以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闻名。——第79、97、102、103、332、334、336、514、518页。
- 波普, 约翰(Pope, John 1822—1892)——美国将军, 属于共和党,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1862年先为密西西比后为弗吉尼亚的北军的一个军团的指挥官。——第247、273、285页。
- 波特尔, 艾德蒙(Potter, Edmund)——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六十年代初是曼彻斯特商会会长, 议会议员。——第333页。
-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 1811—

- 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第41、487、509页。
-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第135页。
-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1845—1855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140页。
- 伯恩赛德,安布罗斯·埃弗雷特(Burnside, Ambrose 1824—1881)——美国将军,属于共和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1862年11月—1863年1月)。——第303、304、306页。
- 伯恩施太因,亨利希(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前进报》的编辑(1844),德国军团的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80页。
- 伯恩施托尔夫,阿尔勃莱希特(Bernstorff, Albrecht 1809—1873)——伯爵,普鲁士外交家,曾任驻伦敦公使(1854—1861),外交大臣(1861—1862),驻伦敦大使(1862—1873)。——第185页。
- 博埃齐(阿尼齐·托尔夸特·赛韦林·博埃齐)(Anicius Manlius Torquatus Severinus Boëthius 480—524)——罗马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以翻译和注释古希腊罗马的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而著名。——第650页。
- 博丹,让(Bodin, Jean 1530—1596)——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专制政体的思想家。——第352页。
- 博尔夏特(Borchardt)——路易·博尔夏特的妻子。——第657页。
- 博尔夏特(Borchardt)——路易·博尔夏特的长女。——第657页。
- 博尔夏特(Borchardt)——路易·博尔夏特的小女儿。——第657页。
- 博尔夏特,路易(Borchardt, Louis)——德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第29、108、139、197、366、385、388—391、393、398、409、411、464、572、652、655—657页。
- 博雷加德,比埃尔·古斯塔夫·土坦(Beauregard, Pierre Gustave Toutant 1818—1893)——美国将军,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1861—1862年初)、密西西比州(1862)和查理斯顿(1862年9月—1864年4月)的南军指挥官。——第233、234、241、242、405页。
- 博林,弗里德里希(Boelling, Friedrich 1816—1884)——德国商人,恩格斯的妹妹海德维希的丈夫。——第579、581、661页。
- 博林,海德维希(Boelling, Hedwig 1830—1904)——恩格斯的妹妹,弗里德里希·博林的妻子。——第661页。
- 博特曼(Bortman)。——第246页。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von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1848年是科伦工人联

- 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伦报》编辑之一(1848年9月—1849年2月),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革命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第54页。
-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352页。
- 布埃耳,唐·卡洛斯(Buell, Don Carlos 1818—1898)——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曾任田纳西和肯塔基两州的一个军团指挥官(1862)。——第233、246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员,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柏林《国民报》通讯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124、125、130、133、146、149、152、155、156、262、279、282、327、463、547、548、573、582、622页。
- 布坎南,詹姆斯(Buchanan, James 1791—1868)——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曾任国务卿(1845—1849),驻伦敦公使(1853—1856),美国总统(1857—1861);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173、188页。
- 布克尔,亨利·托马斯(Buckle, Henry-Thomas 1821—1862)——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实证论社会学家。——第252页。
- 布拉斯,奥古斯特(Braß, August 1818—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9—1860年是《新瑞士报》的主编,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50、105、125、132、153、519、664页。
- 布腊尼茨基,克萨佛里(Branicki, Ksavery 1812—1879)——波兰大地主,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接近拿破仑亲王。——第334页。
- 布莱布特罗伊,格奥尔格(Bleibtreu, Georg 1828—1892)——德国战事画家。——第585页。
- 布莱格,布拉克斯顿(Bragg, Braxton 1817—1876)——美国将军,美国内战时为肯塔基州的南军指挥官(1862)。——第392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338、398、485页。
- 布兰克,艾米尔(Blank, Emil)——卡尔·艾米尔·布兰卡家庭成员之一。——第661页。
- 布兰克,卡尔·艾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72、73、126、532、578、579、581、661页。
- 布兰克,鲁道夫(Blank, Rudolf)——卡尔·艾米尔·布兰卡家庭成员之一。——第661页。
- 布兰克,玛丽亚(Blank, Marie 1824—1901)——恩格斯的妹妹,1845年起为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妻子。——第661页。
- 布兰肯堡,摩里茨·卡尔·亨宁(Blanc-

- kenburg, Moritz Karl Henning 1815—1888)——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保守派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1年起)和德意志国会议员(1867年起);1873年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169页。
- 布朗,约翰(Brown, John 1800—1859)——美国农民,废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之一;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1854—1856)的积极参加者;1859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被送交法院,后被处死。——第6—7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曾多次被判徒刑。——第178、306、598、601、609、612页。
- 布朗纳,爱德华(Bronner, Eduard)——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制宪会议成员,后侨居英国。——第29、38、159页。
- 布雷金里季,约翰·卡布耳(Breckinridge, John Cabell 1821—1875)——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的领导人之一;副总统(1857—1861),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内战时是南军的将军,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1865)。——第272页。
- 布林德,弗雷德里卡(Blind, Friederike)——卡尔·布林德的妻子。——第486页。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为狂热的沙文主义者。——第6、24、30、32、34—37、39、41、43、44、86、121、123、130、131、134、135、152、158、182、192、201、294、323、337、338、340、345、364、384、435、436、438—440、445、447、449、450、453—463、485—487、490、509、561、625页。
- 布龙,卡尔(Bruhn, Karl 生于1803年)——德国新闻工作者,流亡者联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开除出同盟;曾担任汉堡拉萨尔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的编辑(1861—1866)。——第364页。
- 布鲁克兄弟(Gebrüder Bruckner)——波克罕的熟人。——第280页。
- 布鲁克,卡尔·路德维希(Bruck, Karl-Ludwig 1798—1860)——男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大企业主;曾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1851),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3—1855),1855年起为财政大臣;1860年4月自杀。——第57页。
- 布罗克豪斯,亨利希(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德国的出版者和书商;先是莱比锡一家大出版发行公司的共同所有者(1823年起),后为所有者(1850年起)。——第101、131、161、194、275、277、302、305、589、600、609、618、637页。
- 布吕姆,巴贝塔(小贝尔)(Blum, Babette (Belchen) 约1791—1865)——马克思的姑母。——第375、640页。
- 布吕宁克,玛丽亚(Brüningk, Maria 死于1853年)——男爵夫人,德国贵族阿·布吕宁克的妻子,1850年曾协助哥·

金克尔逃出监狱; 1851年起住在伦敦, 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第157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布歇·德·克雷佛克尔·德·佩尔特, 雅克 (Boucher de Crèvecœur dePerthes, Jacques 1788—1868)——法国考古学家和作家, 以研究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著作而闻名。——第345页。

C

采尔 (Zel)——特利尔的公证人。——第641页。

采尔宁, 爱德华 (Zernin, Eduard)——德国政论家, 《军事总汇报》的发行人。——第31页。

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 康斯坦丁 (Zedlitz-Neukirch, Konstantin 生于1813年)——男爵, 普鲁士官员, 柏林警察总监。——第162、186、585、597、604页。

察贝尔, 弗里德里希 (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柏林《国民报》的编辑 (1848—1875)。——第34、52、115、149、167、168、443、476、518、567、576页。

查尔纳, 约翰·卡尔 (Tscharner, JohannKarl 1812—1879)——瑞士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激进主义者, 《联邦报》的编辑之一。——第64页。

查尔托雷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Czartoryski, Wladyslaw 1828—1894)——公爵, 波兰大地主, 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 1863年5月起为驻巴黎的临时国民政府的外交代表。——第365、368页。

查普林-霍恩公司 (Chaplin and Horne)——

英国的一家酒公司。——第296页。

车尔尼晓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Черныш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86—1857)——俄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28—1852年领导陆军部。——第242页。

D

达-达 (Dā-dà)——阿拉伯政论家,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受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委托把一些波拿巴派的抨击性小册子译成本国语言。——第96、101、103、109页。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Robert 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人。——第131、251、252、574、662页。

达西埃, 安得列 (Dacier, André 1651—1722)——法国语文学家, 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许多著作的译者和注释者, 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608页。

戴维斯, 杰弗逊 (Davis, Jefferson 1808—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组织者之一; 南部同盟总统 (1861—1865)。——第187、297、298、424页。

丹尼尔斯, 阿马利亚 (Daniels, Amalie 1820—1895)——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妻子。——第170、244页。

丹尼尔斯, 罗兰特 (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该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由于在狱中得

- 的肺病而死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79页。
- 德拉奥德，律西安 (Delahodde, de laHodde, Lucien 1808—1865) (假名为杜普雷 Duprez)——法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第17、431、541、542页。
- 德兰恩，约翰·塔杰乌斯 (Delane, John Thadeus 1817—1879)——英国新闻记者，《泰晤士报》编辑 (1841—1877)。——第321页。
- 德朗克，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 (矮子)——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日内瓦，1851年流亡英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政治活动，从事商业。——第10、22、24、29、38、209—212、214、218、230、329、330、333—335、348、351、354—356、412、469、490、656—658页。
- 德朗克曼 (Drankmann)——普鲁士国家检察官。——第535页。
- 德鲁克尔，路易 (Drucker, Louis)——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伦敦幽默周刊《您好！》的出版者。——第143页。
- 德穆特 (Demuth)——海伦·德穆特的亲戚。——第642页。
- 德穆特，海伦 (琳薏) (Demuth, Helene (Lenchen)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112、116、129、302、313、363、488、665、674—676、682页。
- 德穆特，玛丽安娜 (Demuth, Marianne 死于1862年)——海伦·德穆特的妹妹。——第302页。
- 德纳，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之一。——第94、98、100、116、148、152、154、194、197、229、232、237、465、515、580页。
- 德农维耳——见瓦托，路易。
- 狄奥多洛斯 (西西里的) (Diodorus Siculus of Sicily 公元前80左右—29)——古希腊历史学家。——第230、233页。
- 迪茨，奥斯渥特 (Dietz, Oswald 1824左右—1864)——德国维斯巴登的建筑师，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92、535、539、540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1871年起为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首相 (1868和1874—1880)。——第384页。
- 斐尼盖斯，弗兰茨·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 (Dönniges, Franz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 1814—1872)——德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兰克的学生，著有德国中世纪史的著作；1862—1864年任巴伐利亚驻瑞士公使。——第418、419、422、423、668页。

塞尼盖斯, 海伦娜 (Dönniges, Helene 1845—1911)——弗里德里希·威廉·塞尼盖斯的女儿, 罗马尼亚贵族腊科维茨的未婚妻。——第418、419、422、668页。

杜蒙, 约瑟夫 (Dumont, Joseph 1811—1861)——德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温和的自由派; 1831年起为《科伦日报》发行人。——第140页。

敦克尔 (Duncker)——普鲁士官吏, 1848年任柏林警察厅长。——第479页。

*敦克尔, 弗兰茨 (Duncker, Franz 1822—188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11、14、22、31、56、125、162、327、432、434、443—445、505、507、508、513、514、557、567、570、589、637页。

多济, 莱茵哈特·彼得·安奈 (Dozy, Reinhardt Pieter Anne 1820—1883)——荷兰东方史学家, 来顿大学教授, 写有许多阿拉伯历史著作。——第407、408、661页。

E

厄耳伯曼 (Oelbermann)——德国波恩的出版者。——第101页。

恩格尔, 恩斯特 (Engel, Ernst 1821—1896)——著名德国统计学家, 1860—1882年任柏林普鲁士王国统计局局长。——第353页。

恩格兰德尔, 济格蒙德 (Engländer, Sigmund 1828—1902)——奥地利记者, 1848年流亡英国, 密探。——第47、48、467、537页。

*恩格斯,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 (Engels, Elisabeth Franziska 1797—1873)——

恩格斯的母亲。——第57—59、421、524、577—579、580、581、660、661页。

*恩格斯, 艾米尔 (Engels, 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 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55、57、524、532、578—581页。

恩格斯, 恩玛 (Engels, Emma 生于1834年)——海尔曼·恩格斯的妻子。——第661页。

*恩格斯, 海尔曼 (Engels, Hermann 1822—1905)——恩格斯的弟弟, 巴门的工厂主。——第578—581、659、660页。

恩格斯, 老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senior)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第16、58、517页。

恩格斯, 鲁道夫 (Engels, Rudolf 1831—1903)——恩格斯的弟弟, 巴门的工厂主。——第578—581、661页。

恩斯特第二 (Ernst II 1818—1893)——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 (1844—1893);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哥哥; 六十年代初反对在普鲁士的统治下统一德国的政策, 1866年起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10、195、547页。

F

法济, 让·雅克 (詹姆斯) (Fazy, Jean-Jacques (James) 1794—1878)——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激进派, 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 (1846—1853和1855—1861), 瑞士银行的创办人, 实行亲波拿巴的政策。——第53、109、121、123、236、418、432、459、502、523、561、599、656、658、668页。

法腊格特, 戴维·格拉斯哥 (Farragut,

- David Glasgow 1801—1870)——美国海军军官,1862年7月起为舰队司令,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在夺取谋比耳时(1864年8月)任区舰队司令。——第420、421页。
- 法里尼,鲁伊治·卡洛(Farini, Luigi Carlo 1812—1866)——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意大利,曾任教育大臣(1851—1852);撒丁内政大臣(1860),那不勒斯总督(1860年11月—1861年1月),意大利政府首脑(1862—1863)。——第574页。
- *菲力浦斯,安东尼达(南尼达)(Philips, Antoinette (Nannette) 1837左右—1885)——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力浦斯的女儿。——第198、376、377、380、381、584—586、589—591、597、603—606、610、646、665、666页。
- 菲力浦斯,奥古斯特(Philips, August 死于1895年)——马克思的表兄弟,阿姆斯特丹的律师。——第183、194、198、202、217、220、221、595、605、610、634、645页。
- 菲力浦斯,弗里德里希(弗里茨)(Philips, Friedrich)(Fritz)——马克思的表兄弟,扎耳特博默耳的银行家。——第606、646、667页。
- 菲力浦斯,卡尔(Philips, Karl)——马克思的表兄弟,亚琛的商人。——第649、651页。
- *菲力浦斯,莱昂(Philips, Lion 死于1866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表舅。——第161、286、311、312、374—376、380、381、414、580、582、583、586、588、594、595、597、598、601、603、606、610、640—642、644—647、649、661、662、665—667、677页。
- 菲力浦斯,让(Philips, Jean)——马克思的表兄弟,亚琛的商人。——第649页。
- 菲力浦斯,雅克(Philips, Jacques)——马克思的表兄弟,鹿特丹的律师。——第161、165、595、597、598、605、645页。
- 菲力浦斯家——马克思的母系的荷兰亲戚。——第641页。
- 菲塞林,西蒙(Vissering, Simon 1818—1888)——荷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第645页。
- 菲沙尔特,约翰(Fischart, Johann 1545左右—1590)——德国讽刺作家。——第122页。
-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因1848年炮击墨西拿得绰号“炮弹国王”。——第89、104页。
- 费尔斯特,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Först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91—1868)——普鲁士历史学家、作家和艺术学家。——第586页。
- 费格勒,奥古斯特(Voegele, August)——1859年是伦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字工人。——第36—42、436、437、439、447、456、458—462、485页。
-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党人。——第70、443页。
- *费舍,爱德华(Fischel, Eduard 1826—1863)——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进步党人,1858年起任柏林市法庭陪审官,1859—1860年是柏林乌尔卡尔特派的

- 杂志《公文集》的编辑,曾激烈批评了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第10—14、17、23、29、33、40、45、46、53、54、56、59—62、125、430、437、532、533、536、537、546—548、552页。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Gottlieb 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第49、529页。
- 芬克,格奥尔格(Vincke, Georg 1811—1875)——男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派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右派,五十至六十年代被选入普鲁士议会下院,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第157、163、169、186、331、548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为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131、133、159、338页。
-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1850—1861年侨居英国,《晨星报》的撰稿人,1861年回到德国,进步党人。——第11、158、379、449、478、530、532、574页。
- 福格勒,卡·格·(Vogler, C.G.)——布鲁塞尔的德国出版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05页。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揭露了他。——第8、11—15、17—20、23、24、26—28、31—34、38、40—44、47、52、64、65、70—72、73、76、81、90—92、95—98、101、103、105、108—110、114、115、121、123、126、129—132、148、149、155、157、236、351、352、401、430—433、435、439、440、444—446、448—453、455—467、469—471、473—476、478、481、485—487、489、490、493、497—500、502—504、509—511、514、518—523、530、531、554、559—562、570、582、636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初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至六十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五十年代后半期脱离革命斗争。——第5、6、12、13、17、18、34、35、41、46、50、54、121—123、131、134—136、148、152、154、156、199、211、255、292—294、316、347、364、397、398、409、417、418、430、435、436、441、448—452、464、465、471、479、483、488、497、519、561、562、565、573、575—577、582、632、634—636、642、643、656、658、664、665、667、668页。
- 弗莱里格拉特,路易莎(Freiligrath, Louise)——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第667页。
- 弗莱里格拉特,伊达(Freiligrath, Ida 1817—1899)——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667页。

- 弗莱塔格, 古斯塔夫 (Freitag, Gustav 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第169、585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 (1848—1916)。——第79、140、368页。
- 弗兰德, 威廉 (Ferrand, William)——英国地主, 议会议员, 属于托利党。——第664页。
-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普鲁士将军, 1848年11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参加者; 对丹麦战争 (1864) 时期为普奥军队的总司令。——第379页。
- 弗兰科夫斯基, 莱昂 (Frankowski, Leon 1844左右—1863)——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 属于“红党”, 1863年领导卢布林省的起义部队; 后被俘, 6月4日被处死。——第324页。
- 弗兰克, 阿· (Frank, A.)——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巴黎的出版商。——第505页。
- 弗朗克尔, 路易·本札曼 (Francoeur, Louis Benjamin 1773—1849)——法国数学家, 编有许多数学、天文学、机械学方面的教科书。——第394页。
- 弗雷里克斯,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Frerichs, Friedrich Theodor 1819—1885)——德国临床医师和病理学家, 1859年起是柏林的大学教授和附属济贫医院院长。——第166页。
- 弗里德兰德, 麦克斯 (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工作 (五十至六十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 《新自由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64—1872); 斐迪南·拉萨尔的表弟。——第162、172、199、229、232、246页。
- 弗里德兰德, 尤利乌斯 (Friedländer, Julius)——柏林的陪审员, 前者的兄弟。——第162、164、172、173页。
-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Friedrich-Karl, Prinz 1828—1885)——普鲁士将军, 后为元帅。——第99、100、162、387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 (Friedrich I 1826—1907)——1852年起是巴登的实际上的统治者, 1856年起是巴登大公。——第345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 (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3左右—1190)——1152年起是德国国王, 后为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155—1190)。——第195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 (1740—1786)。——第331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 (公正大王)——普鲁士国王 (1797—1840)。——第329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24、138、401、586、623页。
- 弗里芒特, 约翰·查理 (Frémont, John-Charles 1813—1890)——美国旅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左翼; 1856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美国内战时为密苏里州 (1861年11月以前) 和弗吉尼亚州 (1862) 的北军指挥官。——第219、

235、237、248、257页。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498、505页。

弗洛伊德,约翰·布坎南(Floyd, John Buchanan 1807—1863)——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弗吉尼亚州州长(1850—1853),曾任陆军部长(1857—1860),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88、298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自由党人。——第20、456、505页。

弗略里,查理(Fleury, Charles 生于1824年)(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伦敦商人,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第484、535、539—545页。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1867年曾屡任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年—1860年11月)。——第205页。

富兰克林,威廉·布埃尔(Franklin, William Buel 1823—1903)——美国将军,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2年在弗雷德里克斯伯格的会战中是两个军的指挥官。——第303页。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

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59、600页。

G

哥贝尔(Göbel)——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法庭庭长。——第535、545页。

戈德海姆(Goldheim)——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之一。——第145、534、535、539、541、543—545页。

戈德曼(Goldmann 约死于1863年)——德国政论家,沙皇政府的密探。——第264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0—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65、150、281、380、625、651页。

革拉苏(马可·李奇尼乌斯·革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公元前115左右—53)——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公元前71年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曾两次任执政官。——第160页。

格尔斯滕堡,伊西多尔(Gerstenberg, Isidor)——伦敦银行家,哥·金克勒的政治信徒之一。——第259、480页。

格拉博夫,威廉(Grabow, Wilhelm 1802—1874)——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主席,属于右派;普鲁士众议院副议长(1850—1861)和议长(1862—1866)。——第623页。

格莱夫(Greif)——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谍报机关领导人之一。——第140、145、534、535、539—545页。

格莱斯顿,罗伯特(Gladstone, Robert

- 1811—1872)——英国商人,资产阶级慈善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堂弟。——第352页。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第212页。
- 格兰特,乌利斯·辛普森(Grant, Ulysses Simpson 1822—1885)——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属于共和党;1861—1862年为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北军指挥官,1864年3月起任陆军总司令;陆军部长(1867—1868),美国总统(1869—1877)。——第233、350、392、394、402、405、420、423页。
- 格里利,霍拉斯(Greeley, Horace 1811—1872)——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第232、237页。
- 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塔夫(Griesheim, Karl Gustav 1798—1854)——普鲁士将军和作家,反动分子,1848年是陆军部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代表。——第204页。
- 格林(Green)——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77、562页。
- 格伦尼,约翰·斯图亚特(Glennie, John Stuart)——英国文学家,1862年陪同布克到巴勒斯坦旅行。——第252页。
-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 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第415、666页。
- 格吕克斯堡——见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
-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第58、90、534、561页。
- 格奈斯特,亨利希·鲁道夫·海耳曼·弗里德里希(Gneist, Heinrich Rudolf Hermann Friedrich 1816—1895)——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柏林大学教授,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8年起)和德意志国会议员(1868年起);六十年代初是自由党反对派的代表,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第370页。
-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 Eduard 死于1893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5、46、53、58、87、91、103、108、118、142、146、153、154、165、171、198、253、294、315、329、356、366、386、388—393、402、464、533、573、652、655—658页。
- 龚佩尔特(Gumpert)——爱德华·龚佩尔特的妻子。——第402页。
- 古德肖,米歇尔(Gouchaux, Michel 1797—1862)——法国银行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五十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305—306页。

H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r)——1273年起至1806年(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奥地利皇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第127、

- 128页。
- 哈茨费尔特—维耳登堡,艾德蒙(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生于1798年)——伯爵,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丈夫。——第540页。
-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33、49、149、155、162、164、169、173、178、179、194、259、570、576、583—586、590、591、597、599—602、605、611、619、669、676、678、680页。
- 哈尔父子公司(B. ter Haar und Sohn)——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商行。——第221页。
- 哈勒克,亨利·韦哲(Halleck, Henry Wager 1815—1872)——美国将军,温和的共和党人;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州军区司令(1861年11月—1862年3月)和密西西比军团司令(1862年3—7月),北军总司令(1862年7月—1864年3月)。——第234、246—248、257、291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红色共和党人》周报以及宪章派其他定期刊物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397、659页。
- 哈特曼,摩里茨(Hartmann, Moritz 1821—1872)——奥地利作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极左派。——第110页。
- 海德,约翰·哥特弗利德(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进步的文学派别“狂飙”的形成起过作用。——第159页。
- 海尔布隆纳尔,卡尔(Hailbronner, Karl 1789—1864)——巴伐利亚作家和旅行家,奥地利统治集团的侵略意图的表达者之一,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过文章。——第16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1848年为参加过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六十年代是拉萨尔的拥护者。——第260、364、365、423、504页。
- 海弗纳尔,列奥波特(Häfner, Leopold 生于1820年)——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19、32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31、65、331、504、615页。
-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12月—1862年),财政大臣(1862年5月—9月,1866—1869)。——第379页。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第12、51、580页。
- 海茵茨曼,阿列克西斯(Heintzmann, Alexis 约生于1812年)——普鲁士法学家,自由党人,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

- 时期为安全委员会的会员,后来侨居伦敦,1861年为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主席。——第177、181、182、191、192、195、615页。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死于1860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18、22、464页。
- 汉泽曼,大卫(Hansema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实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167页。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贩卖性的供述,审判前由警察局释放,逃往巴西。——第472、542页。
- 赫伯特,悉尼(Herbert, Sidney)——英国法学家。——第210、215、217页。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Церк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52年起侨居英国,在英国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217、322、368页。
- 赫尔弗,古斯塔夫(Hörfel, Gustav)——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0年起侨居巴黎,法国警察。——第48、467页。
- 赫拉克利特(Heraklit 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60、163页。
-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63、87、364、365页。
- 赫斯,西比拉(Heß, Sibylle 1820—1903)(父姓佩什 Pesch)——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87页。
- 赫希斯特(Höchster)——恩斯特·海尔曼·赫希斯特的儿子,1860年以前是巴黎克尼格斯特瓦特银行的职员,后来是伦敦一家私人企业的营业所的职员。——第133页。
- 赫希斯特,恩斯特·海尔曼(Höchster, Ernst Hermann 约生于1811年)——爱北斐特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六十年代侨居巴黎,脱离了政治活动。——第130、133页。
-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著名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他的学说的热心普及者。——第317、334、335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230、321、493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

- 时期为安全委员会的会员,后来侨居伦敦,1861年为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主席。——第177、181、182、191、192、195、615页。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死于1860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18、22、464页。
- 汉泽曼,大卫(Hansema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实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167页。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贩卖性的供述,审判前由警察局释放,逃往巴西。——第472、542页。
- 赫伯特,悉尼(Herbert, Sidney)——英国法学家。——第210、215、217页。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Церк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52年起侨居英国,在英国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217、322、368页。
- 赫尔弗,古斯塔夫(Hörfel, Gustav)——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0年起侨居巴黎,法国警察。——第48、467页。
- 赫拉克利特(Heraklit 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60、163页。
-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63、87、364、365页。
- 赫斯,西比拉(Heß, Sibylle 1820—1903)(父姓佩什 Pesch)——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87页。
- 赫希斯特(Höchster)——恩斯特·海尔曼·赫希斯特的儿子,1860年以前是巴黎克尼格斯特瓦特银行的职员,后来是伦敦一家私人企业的营业所的职员。——第133页。
- 赫希斯特,恩斯特·海尔曼(Höchster, Ernst Hermann 约生于1811年)——爱北斐特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六十年代侨居巴黎,脱离了政治活动。——第130、133页。
-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著名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他的学说的热心普及者。——第317、334、335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230、321、493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

- 家, 自由贸易派的领袖之一, 后来是自由党人; 曾任贸易大臣 (1859—1865 和 1865—1866)。——第212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505页。
- 吉耳平, 查理 (Gilpin, Charles)——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行长, 《人民报》的债权人, 议会议员。——第485页。
- 吉佩里希, 约瑟夫 (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巴黎一个支部的成员, 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 后来流亡英国。——第541页。
- 济贝耳 (Siebel)——巴门商人, 卡尔·济贝耳的父亲。——第170页。
- 济贝耳 (Siebel)——卡尔·济贝耳的妻子。——第104、169、571、620、621页。
- * 济贝耳, 卡尔 (Siebel, Karl 1836—1868)——德国诗人; 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 是恩格斯的远亲。——第26、28、29、45、46、48、49、51、52、55、56、58、61、63、70、73、84、88、90、91、95、97、98、100、104—107、109、125、138、140、141、144、153、170、214、246、351、519、522、523、530、533—535、554、555、571、572、587、588、600、614、620、631页。
- 济格尔, 弗兰茨 (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2年迁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积极参加美国内战。——第247、248页。
- 济佩尔 (Sippl)——在英国的普鲁士流亡者。——第227页。
- 济歇尔公司 (Sichel)——曼彻斯特的一家酒业商行。——第151页。
- 加布里埃尔 (Gabriel)——伦敦的牙科医生。——第116页。
- 加尔涅—帕热斯, 路易·安都昂 (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临时政府成员 (1848); 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成员 (1864年起), 国防政府成员 (1870—1871)。——第10页。
-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 七十年代曾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第62、70、72、73、77—80、82—84、86、87、89、91、92、95、98、99、102、104、105、136、159、173、197、209、260、287、384—386、556、562、566、574、617、648、664页。
- 加内斯科, 格莱哥里 (GanESCO, Gregory 1830左右—1877)——法国新闻工作者, 罗马尼亚人, 第二帝国时期是波拿巴主义者, 后为梯也尔政府的拥护者, 《星期日邮报》的编辑 (1860—1861)。——第569页。
- 加思里, 詹姆斯 (Guthrie, James 1792—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 大企业主, 属于民主党, 皮尔斯政府的财政部长

- (1853—1857), 主张同南方奴隶主妥协。——第190页。
- 贾丁, 戴维 (Jardine, David 1794—1860)——英国法学家, 1839年起任伦敦的治安法官。——第545页。
- 杰克逊, 托马斯·卓纳森 (Jackson, Thomas Jonathan 1824—1863)——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 (1861—1863), 布尔河会战 (1861年7月) 后获绰号“石壁”。——第257、285、287页。
- 捷列林格——见弥勒·捷列林格, 爱德华。
-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850年越狱逃跑, 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海尔曼》周报编辑 (1859),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17、28、29、42、135、136、143、146、149、157、173、176、177、181、182、185、190—193、195、197、231、244、289、430、441、483、501、573页。
- 金克尔, 约翰娜 (Kinkel, Johanna 1810—1858) (父姓莫克尔 M ockel)——德国女作家,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156、157、493页。
- 金累克, 亚历山大·威廉 (K inglake, Alexander W illiam 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1857—1865), 自由党人。——第79、80、325、351、384页。
- 居佩尔 (K üpper)——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客栈老板。——第105页。
- 居斯—奥本海默, 约瑟夫 (Süß—Oppenheimer, Joseph 1698—1738)——德国金融家, 犹太人, 三十年代当维尔腾堡公爵的枢密官时, 曾进行一系列的财政阴谋。——第397页。

K

- 卡本特尔, 威廉·本杰明 (Carpenter, W illiam Benjamin 1813—1885)——英国自然科学家和生理学家。——第410页。
- 卡登, 罗伯特·瓦尔特 (Carden, Robert W alter 生于1801年)——英国官吏, 议会议员, 托利党人; 1859年揭发他在选举中贿选。——第484页。
- 卡尔达诺, 耶罗尼莫 (Cardano, Gero-nimo 1501—1576)——意大利数学家, 医生和哲学家。——第319页。
- 卡范讷 (Cavanagh)——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432页。
- 卡富尔, 卡米洛·本佐 (Cavour, Gamillo Benso 1810—1881)——伯爵,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和领袖; 撒丁政府首脑 (1852—1859和1860—1861), 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 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仑第三的支持, 1861年领导第一届意大利政府。——第91、99、173、566、574页。
- 卡腊季奇, 武克·斯蒂凡诺维奇 (Kara-dzi c, Vuk Stefanovic 1787—1864)——著名的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 现代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第一部塞尔维亚语的语法和辞典的编纂者, 写有许多塞尔维亚民族志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第345页。
- 卡诺, 拉查尔·伊波利特 (Garnot, Lazare 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

- 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51年以后成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305页。
- 卡普,弗里德里希(Kapp, Friedrich 1824—1884)——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美国。——第287页。
- 凯尔,恩斯特(Keil, Ernst 1816—1878)——德国政论家,出版商和书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凉亭》周报的创办人。——第132、231页。
-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160、319页。
- *凯特贝尼,卡尔·马利阿(Kertbény, Karl Maria 1824—1882)(真姓邦凯特 Benkert)——匈牙利文学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同1848—1849年革命的活动家们有联系。——第395页。
- 坎特伯雷大主教——见萨姆纳,约翰。
- 康海姆,麦克斯(Cohnheim, Max)——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第468页。
- 康拉第,艾米莉(Conradi, Emilie 1822—1888)——马克思的妹妹,约翰·雅科布·康拉第的妻子。——第461、462页。
- 康拉第,约翰·雅科布(Conradi, Johann Jakob 1821—1892)——特利尔的工程师,马克思的妹妹艾米莉的丈夫。——第116—117、375、461、649页。
-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汉堡大出版公司老板;曾出版德国进步作家的著作。——第31、101页。
- 康普,阿尔勃莱希特(Komp, Albrecht)——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1857年为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组织者之一;约瑟夫·魏德迈的朋友。——第481页。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实施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504、506页。
-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之次子,海军元帅,领导海军部门(1853—1881)和舰队(1855—1881);波兰王国总督(1862—1863)。——第368页。
- 柯蒂斯,赛米尔·赖安(Curtis, Samuel Ryan 1807—1866)——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议员(1857—1861),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和阿肯色州的北军指挥官(1861—1862)。——第247、248、257页。
- 科堡家族(Coburg)——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548页。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了《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213、365、522页。
-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后来是佛教史专家。——第167页。
- 科布,豪厄尔(Cobb, Howell 1815—1868)——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乔治亚州州长(1852—1853),布坎南政府的财政部长(1857—1860),南方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第188页。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127、398、569、574页。
- 科尔恩,阿道夫(Korn, Adolf 1822—1904)——普鲁士军官(1845年以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7年迁居阿根廷。——第468页。
- 科拉切克,阿道夫(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德国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1862年创办《信使报》。——第105、106、109、110、113、149、156、196、200页。
- 科勒尔(Koller)——伦敦佩奇出版公司的股东。——第203、210、216—218、222、236页。
-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Collet, Charles Dobson)——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编辑。——第22、28、32、41、217、222、384、399、414、461、508、537页。
- 科隆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Co-lomb, Friedrich August 1775—1854)——普鲁士军官,后为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242页。
- 科散兹,恩利科(Cosenz, Enrico 1820—1898)——意大利将军,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1860年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革命进军时期为师长;意军总参谋长(1882—1893)。——第198页。
-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Kosciel-ski, Wladyslaw 生于1820年)——波兰民主主义者,波兹南1848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后流亡柏林;和《新莱茵报》编辑部有联系,五十年代为土耳其军队的将军。——第334、336、433、492页。
-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95、102、236、338、369、378、431、432、434、484、511、526、541、550、556、557、569、599页。
-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冯·科滕多夫(Cotta, Johann Georg,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出版商,1832—1863年为大出版公司的经理;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01、125、157页。
- 科泽耳,艾丝苔(Kosel, Esther 1786左右—1865)——马克思的姑母。——第375、640页。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

- 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 (1847—1852), 残酷地镇压了 1848 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 (1853—1858, 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213 页。
- 克拉普卡, 迪约尔吉 (格奥尔格) (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将军,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 1849 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7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236、369、418、432、478、484、514、575、668、669 页。
- 克拉森, 亨利希·约瑟夫 (Claessen, Heinrich Josef)——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股份公司的领导人之一和《莱茵报》撰稿人, 康普豪森的代理人。——第 505 页。
-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 1818 年)——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六十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第 170、244、247 页。
- 克兰里卡德侯爵, 乌利克·约翰·德·巴勒 (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Marquess of 1802—1874)——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辉格党人;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38—1841), 掌玺大臣 (1857—1858)。——第 384 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 1812—1814 年在俄军中供职。——第 233 页。
- 克劳泽,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Krause, Friedrich August 死于 1834 年)——皮鞋匠, 弗略里—克劳泽的父亲。——第 541 页。
- 克劳泽,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见弗略里, 查理。
- 克勒, 克利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卡尔 (Kölle, Christoph Friedrich Karl 1781—1848)——德国外交家和作家, 1806—1814 年是维尔腾堡驻巴黎、海牙、慕尼黑、卡尔斯卢厄和德勒斯顿的大使馆的秘书, 1817—1833 年是维尔腾堡驻罗马的代办。——第 619 页。
- 克里斯提安, 格吕克斯堡公爵 (Christian, Herzog von Glücksburg 1818—1906)——1852 年起为丹麦王位继承人, 1863—1906 年为丹麦国王, 称克里斯提安九世。——第 214、648、663 页。
- 克利克尔, 鲁道夫·阿尔伯特 (Kölliker, Rudolf Albert 1817—1905)——德国组织学家和胚胎学家, 维尔茨堡大学的教授。——第 410 页。
- 克林格斯, 卡尔 (Klings, Karl)——德国五金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65 年侨居美国, 积极参加第一国际芝加哥支部的活动。——第 359—360 页。
- 克鲁斯, 阿道夫 (Cluß, Adolph 死于 1889 年以后)——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 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 1849 年流亡美国; 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报纸撰稿; 六十年代在华盛顿海军部供职。——第 490、491 页。
- 克伦佐, 约翰·威廉 (Colenso, John

- William 1814—1883)——英国牧师和神学家,在其著作中批判了许多圣经的经文;因此,受到教士们的迫害。——第408页。
- 克尼格斯瓦特,马克西米利安 (Königs-warter, Maximilien 1815—1878)——法国银行家,立法团议员 (1852—1863)。——第133页。
- 克诺尔什 (Knorsch)——德国律师,1860年是杜塞尔多夫工人教育协会的主席。——第89页。
- 肯宁格姆,威廉 (Coningham, William 生于1815年)——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家,布莱顿干涉大会 (1861年12月)的参加者。——第214页。
- 库尔曼,格奥尔格 (Kuhlmann, Georg)——奥地利政府的密探;骗子手,自命是“预言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利用宗教词句在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中间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第11页。
- *库格曼,路德维希 (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德国医生,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1862年到1874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把德国的情况告诉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30、334、636—638页。
- 魁奈,弗朗斯瓦 (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的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第252、358、363页。
- L
- 拉布累,爱德华·勒奈·勒弗夫尔·德 (Laboulaye, Edouard Rene Lefebvre de 1811—1883)——法国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第376页。
- 拉登多夫 (Ladendorff)——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哲学家,1854年曾被诬控犯有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而被判五年徒刑。——第541页。
- 拉法里纳,朱泽培 (La Farina, Giuseppe 1815—1863)——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1848—1849年西西里岛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60年(7月以前)为卡富尔驻西西里岛特使,1860年10月—1861年1月为西西里岛总督顾问。——第78、574页。
- 拉克布尔,西里耳 (Lacambre, Cyrill)——法国医生,六十年代侨居西班牙;布朗基的近友。——第611页。
-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 Léon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第93、94、98页。
- 拉尼克尔 (Ranickel)——德国手工业者,职业是装订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第502、551页。
- 拉品斯基,泰奥菲尔 (Lapinski, Theophile 1827—1886)——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流亡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和克里木战争 (站在土耳其方面)的参加者,在切尔克斯亚同俄国作战 (1857—1858),1863年率领远征军

- 支援波兰起义。——第365、367—369页。
- 拉普公司(约翰·拉普公司)——英国的一家银行。——第315页。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8、11、12、14、17—22、24、27—29、31—34、37、42、45、49、59、60、62、66、69、71、73、74、89—93、95、106、109、131、148—150、154—156、161、163—166、172、178、183、186、194、195、198、202、206、207、209、217、220、250、252、254、255、259—262、264、269—272、274—284、286、290、292、293、295、307、312、320、321、336、339、340、342、345、347、351—354、356、357、364、370、381、395—397、400、405、417—420、422、423、430、434、435、444、452、489、513、517、529、538、559、562、565—567、570、573、575、577、579、582、584—587、590、597、600、602、604—606、610、616、617、622、626、627—629、631—634、667—669、676、678页。
- 拉萨尔,海伊曼(Lassal, Heimann 死于1862年)——德国商人,斐迪南·拉萨尔的父亲。——第279、307、627页。
- 拉斯佩,昂利·德(L'Aspée, Henry de)——维斯巴登的警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曾帮助揭露普鲁士当局制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挑衅手法。——第539、540页。
- 腊科维茨,扬科(Racowit, Janko 死于1865年)——罗马尼亚贵族,1864年在决斗中使拉萨尔受致命伤。——第418—420、668页。
-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523页。
- 莱纳赫,阿尔诺德(Reinach, Arnold 1820左右—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第32页。
- 莱特公司——美国一家商号。——第9页。
-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第256页。
- °莱茵兰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heinländer, Georg Friedrich)——巴黎流亡者联盟盟员,后侨居伦敦,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成员。——第62、130、133、134、177、226、516、529页。
- 赖尔,查理(Lyell, Charles 1797—1875)——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家。——第334、335、345页。
-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 Wilhelm Joseph 生于1824年)——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开除出同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第5、6、55、56、485页。
- 兰克,列奥波特(Ranke, Leopold 1795—1886)——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第423页。
-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第162页。
- 勒克律,米歇尔·埃利(Reclus, Michel—

- Elie 1827—1904)——法国民族志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5年返回法国;巴黎公社时期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第305页。
- 勒南,厄内斯特 (Renan, Ernest 1823—1892)——法国语文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381、408页。
- 勒宁 (Loening)——德国出版者。——第460页。
- 勒瓦瑟尔,勒奈 (Levasseur, René 1747—183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会议员,雅各宾党人,著名的法国革命回忆录的作者。——第522页。
- 勒维,古斯塔夫 (Levy, Gustav)——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1856年被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派到伦敦拜访马克思。——第481、491页。
- 勒维,约瑟夫·莫泽斯 (Levy, Joseph Moses 1812—1888)——《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31页。
-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特 (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卷烟工人;1848—1849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追随拉萨尔派。——第482页。
- 勒兹根,查理 (Roessen, Charles)——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第22、44、55、108、263、315、524页。
- 雷缪扎伯爵,沙尔·弗朗斯瓦·玛丽 (Rémusat, Charles-François-Marie 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曾任内务大臣 (1840);第二帝国时期采取反对拿破仑第三政体的立场。——第496页。
-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 (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闻》的出版者。——第32、619页。
- 累普济乌斯,卡尔·理查 (Lepsius, Karl Richard 1810—1884)——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古埃及学者。——第166页。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 (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260页。
- 李,罗伯特·爱德华 (Lee, Robert Edward 1807—1870)——美国将军,美国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参加者,1859年参加镇压约翰·布朗的起义,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 (1862—1865),南军总司令 (1865年2—4月)。——第326、357、392、393、394、405、420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65页。
-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 (Liebknecht, Ernestine 死于186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第113、476、681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6、33、37、46、47、53、55、113、117、121、125、130、157、400、402、407、408、414、415、423、431、437、439、442、447、449、450、455—457、460—463、475、476、509、543—545、643、681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第251、268、269、276、277、352、358、624页。
- 李希特尔, 雅科布·斐迪南 (Richter, Jakob Ferdinand 1814—1875)——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改革报》的发行人。——第132页。
- 里普利, 罗斯韦耳·萨宾 (Ripley, Roswell Sabine 1823—1837)——美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1861年起为将军, 参加对墨西哥的战争 (1846—1848), 写有关于这次战争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第178页。
- 利佩, 列奥波特 (Lippe, Leopold 1815—1889)——伯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1860年为柏林检察官, 后任司法大臣 (1862—1867)。——第530页。
- 梁格维奇 (兰格维奇), 马尔扬 (Langiewicz, Marian 1827—1887)——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为散多梅希省起义部队的指挥官, 3月11日被“白党”宣布为“总裁”, 3月19日逃亡奥地利, 在奥地利被捕, 一直被监禁到1865年。——第324、331、334页。
- 列伐尔特, 奥托 (Lehwald, Otto 1813—1874)——德国律师; 芬尼·列伐尔特的弟弟。——第480页。
- 列伐尔特, 芬尼——见施塔尔, 芬尼。
- 列列韦尔, 约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起义失败后曾领导波兰流亡者民主派。——第433、498、505、522页。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f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告之一, 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页。
- 林格斯 (Rings, L.W.)——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伦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543、544页。
- 林肯, 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领袖之一, 美国总统 (1861—1865); 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实现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这些改革意味着转而为革命的方法来进行战争; 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174、181、187、212、257、272、290、292、297、331、421、424页。
- 琳蓓 (Lenchen)——见德穆特, 海伦。
- 琉善 (Lucianus 约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 无神论者。——第242页。
- 隆格, 约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

- 1887)——德国教士,“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28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52、467、482、504、577、667页。
- 卢格,弗兰契斯卡(Ruge, Franziska)——前者的女儿。——第667页。
- 鲁库鲁斯(鲁齐乌斯·李奇尼乌斯·鲁库鲁斯)(Lucius Licinius Luculus 约公元前106—57)——罗马统帅,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以家产富有和举行豪华宴会而闻名。——第160页。
- 鲁普斯——见沃尔弗,威廉。
- 鲁滕堡,阿道夫(Rutenberg, Adolf 1808—1869)——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8年曾任《国民报》编辑;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67、168、422页。
-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伦敦一家通讯社的创办人(1851)。——第47、48、209、306、537页。
-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332、496页。
-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96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608页。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299页。
- 路易斯,乔治·康瓦尔(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1855—1858年任财政大臣,内务大臣(1859—1861),陆军大臣(1861—1863)。——第212页。
- 罗昂,阿尔勃莱希特(Roon, Albrecht 1803—1879)——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3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阀代表人物之一,曾任陆军大臣(1859—1873)和海军大臣(1861—1871),曾改编普鲁士军队。——第307页。
-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学家,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第41页。
- 罗德(Rode)——在利物浦的德国流亡者。——第658页。
- 罗德黑岑(Roodhuizen)——扎耳特博默耳的牧师,后为马克思的表妹安东尼达·菲力浦斯的丈夫。——第590、646、651页。
-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约生于1824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

- 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5页。
- 罗森勃鲁姆, 爱德华 (Rosenblum, Eduard)——德国大学生,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第468页。
- 罗斯克兰斯, 威廉·斯塔克 (Rosecrans, William Starke 1819—1898)——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北军指挥官 (1862—1863)。——第350页。
- 罗斯利埃斯, 克里斯提安 (Roselius, Christian 1803—1873)——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美国辉格党, 路易西安纳大学教授, 主张保存联邦。——第189页。
- 罗素, 威廉·霍华德 (Russell, William Howard 1820—1907)——英国新闻记者, 1861—1862年为《泰晤士报》的军事通讯员。——第237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和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和1859—1865)。——第212页。
- 罗雪尔,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 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307、600、623、624、634页。
- 罗伊斯—克林公司 (Reuß, Kling & Co.)——曼彻斯特的一家酒业商行。——第151页。
- 罗伊特, 麦克斯 (Reuter, Max)——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第535、540页。
- 洛贝尔图斯, 约翰·卡尔 (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 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149、599、623、624页。
- 洛德, 珀西瓦尔·巴顿 (Lord, Percival Barton 1808—1840)——英国医生和外交家。——第410页。
- 洛尔米埃, 玛丽 (Lormier, Marie)——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659页。
- *洛美尔, 格奥尔格 (Lommel, Geor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瑞士; 曾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搜集材料。——第48、49、51、59、62、64、65、76、77、108、109、125、203、519、523、536、551、552页。
- 吕措夫, 阿道夫 (Lützwow, Adolf 1782—1834)——男爵, 普鲁士军官, 后为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242页。
- 吕宁, 奥托 (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新德意志报》编辑;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3页。
- 吕斯托夫, 采萨尔 (Rüstow, Cäsar 1826—1866)——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夫的弟弟。——第254页。
- 吕斯托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 (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民主主义者, 侨居瑞士; 1860年以参谋长的身分参加加里波第对南意大利的远征, 拉萨尔的朋友。——第104、197、254、260、261、264、

270、282、418、629、668页。

吕斯托夫, 亚历山大 (Rüstow, Alexander 1824—1866)——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夫的弟弟。——第254页。

吕滕, 约瑟夫·雅科布 (Rütten, Josef Jakob 1805—1878)——德国出版者,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公司的老板。——第505页。

M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251、252页。

马基雅弗利, 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 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182页。

马克思, 爱琳娜(杜西) (Marx, Eleanor (Tussy) 1855—1898)——马克思的小女儿, 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84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10、45、56、61、93、112、113、117、120、121、126—128、136、142、155、158、196、207、219、231、237、239、243、244、249、251、258、259、272、275、281、289、298、302、309、312、313、316、336、338、342、363、370、373、392、395、397、400、408、410、412、413、414、417、421、555、572、587、596—598、603、605、635、642、644、646、647、649、651、655—657、659、662、665、668、673、675、676、678、679、682页。

马克思, 罕丽达 (Marx, Henriette 1787—

1863)——马克思的母亲。——第116、161、199、201、214、286、309、371、374、583、588、598、641、642页。

马克思, 亨利希 (Marx, Heinrich 1782—1838)——马克思的父亲; 律师, 后为特利尔司法参事。——第499、504、641页。

马克思, 劳拉 (Marx,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 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10、45、56、61、93、112、113、117、120、126—128、136、142、155、158、207、219、222、237、239、243、244、249、251、258、259、275、281、289、298、302、309、312、313、316、338、363、370、395、397、400、408、410、412、414、417、421、424、555、572、587、596—598、603、605、635、642、646、651、655—657、659、662、665、668、673、675、676、678、679、682页。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10、38、45、48、56、61、81、93、101、109、111—113、116、117、119—122、126—128、130、132、139、142、155—158、199、200、204、207、209、210、212、219、222、229、230、243、244、249—251、258、260、261、271、275、281、289、298、301、302、305、309、312、313、316、317、338、369、370、375、378、395、397、408、410、413—415、417、434、450、474、486、488、489、496、504、509、554、557、561、568—570、572、573、575—577、580、587、596、597、603、605、609、616、618、635、640、642、646、652、655、656、659、664、667、673—677、679、680、681、683

- 页。
-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 —— 马克思的大女儿, 后为新闻工作者,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10、45、56、61、93、112、113、117、120、121、126—128、136、142、155、158、207、217—219、222、228、231、235、237、239、240、243、244、249、251、253、254、258、259、272、274、275、281、284、286、289、290、296、298、302、309、312、313、316、338、347、349、351、356、363、367、370、385、393、395、397、400、408、410、412—414、417、421、425、555、572、587、596—598、603、605、635、642、646、649、651、655—659、662、665、668、673、675、676、678、679、682页。
- 马里埃特 (Marriet 死于1864年) —— 罗德的女婿。—— 第658页。
- 马里埃特, 特克拉 (Marriet, Thekla) —— 罗德的女儿, 前者的妻子。—— 第658页。
- 马里奥, 阿尔伯托 (Mario, Alberto 1825—1883) ——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第625页。
- 马利耶, 埃蒂耶纳 (Marilley, Étienne 1804—1889) —— 夫赖堡主教 (1846—1879), 夫赖堡 (弗里布勒) 1848年10月24日反民主暴乱的煽动者。—— 第468页。
- 马罗茨基 (Marotzk) —— 曼彻斯特的新教牧师。—— 第656、657页。
- 马斯特曼, 约翰 (Masterman, John 1782左右—1862) —— 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第302、303页。
- 马索耳, 玛丽·亚历山大 (Massol, Marie-Alexandre 1805—1875) —— 法国新闻工作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 1833—1834年曾访问埃及和叙利亚; 1848—1850年为《改革报》和《人民之声报》撰稿; 蒲鲁东的朋友。—— 第248、305页。
- 马耶夫斯基, 卡罗耳 (Majewsky, Karol 约生于1833年) ——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 接近“白党”, 1863年6—9月领导国民政府。—— 第368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88、95、152、158、201—202、261、338、562、574页。
- 玛丽—安东尼达 (Marie-Antoinette 1755—1793) —— 法国王后 (1774—1793), 路易十六之妻,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第104、105页。
- 迈尔, 米哈埃尔 (Mayer, Michael 死于1622年) —— 德国炼丹术士, 鲁道夫二世皇帝的御医和顾问, 写有许多关于化学、医学和哲学的著作。—— 第366页。
- 迈斯纳, 奥托·卡尔 (Meissner, Otto Karl 1819—1902) —— 汉堡出版商, 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 第73、74、76、100、103、561页。
- 迈耶尔兄弟银号 —— 柏林的一家银

- 号。——第281、286、630页。
- 麦凯, 查理 (Mackay, Charles 1814—1889)——英国资产阶级诗人和新闻工作者, 1862—1865年为《泰晤士报》的驻纽约特派记者。——第306、325页。
- 麦克道厄耳, 欧文 (McDowell, Irvin 1818—1885)——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北军指挥官。——第234、248、257页。
- 麦克耳腊思, 托马斯 (McElrath, Thomas 1807—1888)——美国法学家, 出版者和政治活动家, 废奴派的拥护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办人之一和营业部经理 (1841—1857)。——第237页。
- 麦克累伦, 乔治·布林顿 (McClellan, George Brinton 1826—1885)——美国将军和大铁路实业家, 追随民主党,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总司令 (1861年11月—1862年3月) 和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 (1862年3月—11月), 1864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219、220、234、237、240、242、248、256、257、272、285、291、297、299、301、306页。
- 麦克唐纳 (McDonald)——英国军官, 1860年9月在波恩被捕送交法院, 被指控有不服从地方当局的行为。——第177、182、231、599页。
- 麦克亚当 (MacAdam)——第337、432页。
- 曼哈顿——见斯科维尔, 约瑟夫·阿尔弗勒德。
- 曼涅托 (Manetho 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 奥尔维奥波尔城的古埃及的僧侣和历史学家, 利用埃及文献资料用古希腊文著有埃及史方面的著作。——第166页。
-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 (1848年—1850年11月), 首相和外交大臣 (1850—1858); 1859年和1860年为普鲁士议会下院议员, 1864年选入贵族院。——第145、167—169页。
- 梅迪契, 扎科莫 (Medici, Giacomo 1817—1882)——意大利将军, 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和1849年4—7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97、198页。
- 梅耳希奥尔, 尤利乌斯 (Melchior, Julius)——佐林根的工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 1864年流亡美国。——第395、396、406、407页。
- 梅利奈, 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 法国人, 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布鲁塞爾民主协会名誉主席。——第522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维克 (Mierosl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曾领导1848年波兹南起义;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 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执政;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324、334、336、575页。
- 梅纳德 (Maynard)——美国军官, 美国内战时期为南部密探。——第219页。
- 梅森, 詹姆斯·默里 (Mason, James Murray 1798—1871)——美国政治活动家, 大种植场主—奴隶占有者, 参议院外交事

- 务委员会主席, 1861年秋带着外交使命被南部同盟派往英国, 1862—1865年为同盟驻伦敦代表。——第213页。
- 梅特勒, 约翰奈斯·亨利希 (Mädler, Johannes Heinrich 1794—1874)——德国天文学家。——第230页。
- 梅因, 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柏林改革报》的编辑 (1861—1863);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38、141、149、198、339、340、572、599、622、625页。
- 蒙蒂霍, 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104页。
- 蒙哥马利 (Montgomery)——第227页。
- 蒙克, 乔治 (Monk, George 1608—1670)——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1660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第306页。
- 蒙腊德, 迪特列夫·哥特哈德 (Monrad, Ditlev Gothard 1811—1887)——丹麦主教和政治活动家, 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 (1863—1864), 教育和宗教大臣 (1848和1859—1863); 在五十年代为民族自由党领袖。——第663页。
- 蒙台居, 罗伯特 (Montagu, Robert 1825—1902)——勋爵, 英国政治活动家, 保守党人, 议会议员。——第179页。
- 弥勒, 格奥尔格 (Müller, Georg)——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主席。——第475、497页。
- 弥勒—捷列林格, 爱德华 (Müller—Telering, Eduard von 约生于1808年)——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在刊物上恶毒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2年侨居美国。——第11、12、430、481、484页。
- 弥勒, 威廉 (Müller, Wilhelm 1816—1873) (笔名科尼斯文特尔的沃尔弗干格·弥勒 Wolfgang Müller von Königswinter)——德国诗人, 四十年代是杜塞尔多夫的医生。——第170页。
- 米尔纳·基卜生——见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
- 米凯尔, 约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 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 六十年代起为民族自由党人。——第93、289、564页。
- 米拉波, 奥诺莱·加布里埃尔 (Mirabeau, Honoré—Gabriel 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贵族利益的代表者。——第169页。
- 米腊蒙, 米格尔 (Miramón, Miguel 1832—1867)——墨西哥将军, 保守党领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导人之一, 叛乱政府首脑 (1859—1860); 1862—1867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儡马克西米利安, 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毙。——第237页。
- 密契尔, 奥姆斯比·马克奈特 (Mitchell, Ormsby MacKnight 1809—1862)——美国天文学家, 辛辛那提天文台台长 (1845—1859);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的将军 (1861—1862)。——第247页。
- 密斯腊达特六世·优帕托尔 (Mithradates VI Eupator 公元前132—63)——本都王国 (在小亚细亚) 的国王, 曾三次与

- 罗马进行战争;在第三次战争中(公元前74—63)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起初败给鲁库鲁斯,后来败给庞培。——第160页。
-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俄国军事家和国家活动家,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1853—1855)。——第224、225页。
- 缪格,泰奥多尔(Mügge, Theodor 1806—1861)——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167页。
- 缪拉特,拿破仑·律西安·沙尔(Murat, Napoleon—Lucien—Charles 1803—1878)——亲王,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拿破仑第三的堂兄。——第574页。
- 摩里耳,杰斯丁·史密斯(Morrill, Justin Smith 1810—1898)——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议员(1855—1867),起草了保护关税制的税则(1861)。——第245页。
- 默里,约翰(Murray, John 1808—1892)——英国出版者,伦敦一家大出版公司的经理。——第429页。
- 莫尔,弗里德里希(Moll, Friedrich 1835左右—1871)——佐林根的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1864年流亡美国,在纽约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创办人之一;后回到德国为第一国际的成员,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第395、396、406页。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立法团议长(1854—1856、1857—1865)。——第237页。
- 莫卡尔,让·弗朗斯瓦·孔斯坦(Mo—cquard, Jean—François—Constant 1791—186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1848年起为路易·波拿巴的办公厅厅长和私人秘书。——第512页。
- 莫克尔,约翰娜——见金克尔,约翰娜。
- 莫帕,沙尔勒曼·艾米尔(Maupas, Charlemagne—Emil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警务大臣(1852—1853)。——第541、542页。
-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398页。
- 穆苏卢斯—帕沙(康斯坦丁)(Musurus—Pasha (Konstantin) 1807—1891)——土耳其外交家,希腊人,曾任驻伦敦公使,后为大使(1851—1885)。——第478页。
- 穆赞比尼(Muzembini)——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478页。
- 穆赞比尼(Muzembini)——前者的妻子。——第478页。

N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 (1804—1814和1815)。——第299、329、365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12、19、23、32、34、48、53、64、65、77、84、89、91、92、95、96、102、103、109、120、127、140、141、147、157、205、226、235、237、245、260、300、325、329、332、341、350、365、368、372、379、386、401、402、415、417、430、458、459、478、490、496、503、506—508、512、519、534、536、539、548、550、552、558、561、562、566、601、648页。
-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 奈斯密斯,詹姆斯(Nasmy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第282页。
-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 Barthole Georg 1776—1831)——德国古代史学家。——第618页。
- 涅果累夫斯基,弗拉基斯拉夫(Niegolewski, Wladyslaw 1819—1885)——波兰政治活动家和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起是普鲁士众议院的波兹南议员。——第65页。
- 诺曼比侯爵,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Normanby, Constantin Henry Phipps 1797—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爱尔兰总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内务大臣(1839—1841);1846—1852年任驻巴黎大使。——第13页。
- 诺斯提茨(Nostitz)——普鲁士军官,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外甥。——第162页。
- 诺斯提茨,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斐迪南(Nostitz August Ludwig Ferdinand 1777—1866)——伯爵,普鲁士将军,威廉一世的亲信之一;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姐夫。——第162页。
-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3左右—1866)——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第514、539页。
- 诺伊霍夫,泰奥多尔·斯蒂凡(Neuhoff, Theodor Stephan 1694—1756)——男爵,冒险分子,威斯特伐里亚贵族的儿子;1736年被宣布为科西嘉国王,称泰奥多尔一世,但不久就被推翻,1738、1743和1744年又几次企图取得科西嘉王位,但都没有成功。——第105页。

O

- * 欧门,哥特弗利德(Ermen, Gottfried)——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第44、55—58、118、256、283、284、315、412、413、417、511、524、527、578、581、660页。
- 欧仁妮——见蒙蒂霍,欧仁妮。
- 欧文,理查(Owen, Richard 1804—1892)——英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理论的反对者。——第335页。
-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522页。

P

- 帕茨克(Patzke)——普鲁士警官,柏林警

- 察局局长。——第89、162页。
- 帕腊策耳斯, 菲力浦·奥雷奥耳·泰奥弗腊斯特·博姆巴斯特(真姓是霍亨海姆)(Paracelsus, Philippus Aureolus P.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1493—1541)——著名的德国医生和自然科学家。——第366页。
- 帕累斯克, 艾米尔(Palleske, Emil 1823—1880)——德国演员和作家。——第444页。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12、47、53、78、125、157、165—166、179、212—214、220、224、237、245、332、337、357、365、367、368、372、384、385、387、401、402、413、417、463、489、507、537、546、547、550、599、663、664页。
- 帕特库耳, 约翰·莱茵霍尔特(Patkul, Johann Reinhold 1660—1707)——里夫兰贵族, 1702年起在俄国任枢密顾问和将军。——第341、407页。
- 派克, 萨拉(Parker, Sarah)——恩格斯家里的女佣。——第218页。
- 庞培(格奈尤斯·庞培·马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106—48)——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160页。
- 培尔西尼, 让·日尔贝尔·维克多(Per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 驻伦敦大使(1855—1858、1859—1860)。——第125、605页。
- * 佩尔采尔, 摩里茨(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将军,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1851年侨居英国。——第517、526、527、551页。
- 佩里埃, 约翰(Perrier, John)——瑞士政治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大会议员(1852和1856—1860), 法济的拥护者。——第53页。
- 佩利科, 西耳维奥(Pellico, Silvio 1789—1854)——意大利爱国主义作家, 反对奥地利的统治; 1820年因同烧炭党有联系而被逮捕并判处二十年徒刑; 1830年被释放, 1832年发表了一本描写囚犯在奥地利监狱遭受折磨的书; 后来脱离政治斗争。——第380页。
- 佩奇, 阿尔伯特(Petsch, Albert)——伦敦的出版商和书商, 1860年末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在他的出版社出版。——第49、51、90、95、96、98、101、103、109、114、121、123、124、133、134、136、138、139、141、153、203、210、215、520、571页。
- 彭斯, 罗伯特(Burns, Robert 1759—1796)——伟大的苏格兰诗人, 民主主义者。——第488、634页。
- 皮阿, 费里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 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起侨居瑞士, 比利时和英国; 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 1871年国民会议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41页。
- 皮尔斯,埃本尼泽·韦弗(Peirce, Ebenezer Weaver 生于1822年)——美国将军,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2年是弗吉尼亚部队的指挥官。——第180页。
- 皮尔斯,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美国总统(1853—1857);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190页。
- 皮佩尔,威廉(Pieper, Wilhelm 约生于1826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侨居伦敦;五十年代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82、415页。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273、291页。
-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Karl 1818—187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画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3、399、639页。
- 普富尔,恩斯特(Pfuel, Ernst 1779—1866)——普鲁士将军,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3月为柏林卫戍司令,5月曾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第162、585页。
- 普劳,帕尔莫·卡尔(Ploug, Parmo Carl 1813—1894)——丹麦诗人,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民族自由党,《祖国报》的编辑,丹麦国会上的议员。——第416页。
- 普勒斯堡,马丁(Presburg, Martin)——尼姆韦根的商人,马克思的舅父。——第641页。
-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Q

- 威美尔曼,恩斯特·威廉·爱德华(Zimmermann, Ernst Wilhelm Eduard)——施潘道市长,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41、84、88、130、134、203、573、582页。
- 秦恩(Zinn)——德国印刷工人,流亡伦敦,希尔什菲尔德印刷厂的排字工人,1858年创立流亡者的“德国好男儿联合会”。——第6、106页。
-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他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第31、408、415、416、485、486、498、507、549、598、658页。

R

- 热克尔,让·巴蒂斯特(Jecker, Jean-Baptiste 1810左右—1871)——瑞士银行家,1862年入法国国籍;与波拿巴法国统治集团勾结在一起,策动法国武装干

涉墨西哥;是被巴黎公社社员枪毙的一批人质中的一个。——第237、325页。

日斯凯,昂利·约瑟夫(Gisquet, Henri Joseph 1792—1866)——法国商业家和政治活动家,巴黎警察局局长(1831—1836),残酷地镇压共和运动。——第479页。

瑞日卡,扬(Zizka, Jan 1360左右—1424)——杰出的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胡斯运动领袖之一,塔博尔派军事首领,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134页。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四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498、506、511、512页。

S

萨拉——见派克,萨拉。

萨马科纳,曼努埃尔(Zamacona, Manuel)——墨西哥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61年是外交部长。——第225页。

萨姆纳,爱得文·沃斯(Sumner, Edwin Vose 1797—1863)——美国将军,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2年在弗雷德里克斯伯格战役中是两个军的指挥官。——第303、304页。

萨姆纳,约翰·伯德(Sumner, John Bird 1780—1862)——英国教士,坎特伯雷大主教(1848—1862)。——第335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162页。

萨宗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Саз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

国新闻工作者,自由主义者,四十年代初流亡国外,为各种杂志和报纸撰稿。——第314、552页。

扫罗(公元前十一世纪)——以色列—犹太王国的第一个国王。——第407页。

塞登,詹姆斯·亚历山大(Seddon, James Alexander 1815—1880)——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第424页。

赛德(Seyd)——伦敦一家旅馆的老板。——第182页。

赛尔托里乌斯(昆塔斯·赛尔托里乌斯)(Quintus Sertorius 公元前123左右—72)——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奴隶主民主派的领袖之一,公元前80—72年领导伊比利亚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斗争。——第160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é,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32、53—56、112、118、126—128、429、431、434、510、516、526、549—551、556、568、569页。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60、384、678页。

沙贝利茨,雅科布(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471、483、501页。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

- 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13、35、54、141、297、469、470、475、492、494、495、498、540页。
- 沙伊伯勒，卡尔·亨利希 (Schaible, Karl Heinrich 1824—1899)——德国医生和作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第43、159、445、447、458、459、463、485、487、509页。
- 舍尔瓦尔，茹利安 (Cherval, Julien) (真名约瑟夫·克列美尔 Joseph Crämer)——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1853—1854年化名纽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第101、442、463、470、472、477、495、496、515、529、539—542、545页。
- 舍勒尔，丽娜 (Schöler, Lina)——女教师，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70页。
- 圣西门，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452页。
- 施蒂林 (Stierlin)——德国自由派新闻工作者，闵斯特民主联合会的会员，《新莱茵报》的通讯员。——第170页。
- 施拉姆，康拉德 (Schramm, Konrad 1822左右—1858)——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97、500、501页。
- 施拉姆，鲁道夫 (Schramm, Rudolf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拥护俾斯麦；康拉德·施拉姆的哥哥。——第241页。
- 施莱登，马提阿斯·雅科布 (Schleiden, Mathias Jakob 1804—1881)——德国大植物学家，1838年提出从旧细胞中产生新细胞的理论。——第410、415页。
-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 (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第82、599页。
- 施勒德尔 (Schröder, E.)——欧门—恩格斯公司驻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第221页。
- 施勒德尔 (Schröder)——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6页。
- 施累津格尔，麦克斯 (Schlesinger, Max 1822—1881)——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1848年流亡伦敦，是《科伦日报》在伦敦的通讯员。——第47、48、124页。
-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德尔堡学派首脑。——第159页。
- 施马尔豪森，索菲娅 (Schmalhausen, Sophie 1816—1883以后)——马克思的姐姐，威廉·罗伯特·施马尔豪森的妻

- 子。——第641页。
- 施马尔豪森, 威廉·罗伯特 (Schmalhausen, Wilhelm 1817—1862)——马斯特里赫特的律师, 马克思的姐夫, 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的丈夫。——第582、635页。
- 施梅林, 安东 (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1848年任帝国内务大臣 (7—12月), 首相兼外交大臣 (9—12月); 奥地利首相兼内务大臣 (1860—1865)。——第196、199页。
- 施梅林, 菲利浦·沙尔 (Schmerling, Philipp Charles 1791—1836)——比利时医生和古生物学家。——第345页。
- 施米特 (Schmidt)——一个航运公司的代理人, 在伦敦的“德国好男儿联合会”的主席, 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委员。——第191、192页。
- 施米特, 亨利希·尤利安·奥雷尔 (Schmidt, Heinrich Julian 1818—1886)——德国批评家和文学史家, 温和的自由党人; 1866年起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623页。
-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 (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辩护人; 以后脱离政治活动。——第170、470、495、496、538、544、545页。
- 施佩克 (Speck)——《人民报》编辑部营业处主任。——第47页。
- 施普尔茨海姆, 约翰·克利斯托夫 (Spurheim, Johann Christoph 1776—1832)——德国颅相相士。——第410页。
- 施塔耳, 阿道夫·威廉·泰奥多尔 (Stahr, Adolf Wilhelm Theodor 1805—1876)——德国作家, 著有一些历史小说和一些有关文学艺术史问题的学术著作。——第493页。
- 施塔耳, 芬尼 (Stahr, Fanny 1811—1889) (父姓列伐尔特 Lewald)——德国女作家, 阿道夫·施塔耳的妻子。——第493页。
- 施泰翰, 哥特利勃·路德维希 (Stechan Gottlieb Ludwig 约生于1814年)——德国汉诺威的细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1年12月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从1852年1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第540页。
- 施泰歇尔 (Stecher, G. K.)——前巴登实科中学校长,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 从事石印工作。——第529页。
- 施泰因, 马克西米利安 (Stein, Maximilian 1811—1860)——奥地利军官,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任革命军参谋长;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改名费尔哈德—帕沙; 曾在切尔克斯亚同俄国作战 (1857—1858)。——第369页。
- 施泰因, 尤利乌斯 (Stein, Julius 1813—1889)——西里西亚的教师, 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 1862年起是《布勒斯劳报》的编辑。——第164、165、466、467页。
- 施泰因塔耳 (Steinthal)——曼彻斯特一贸易公司老板, 1852—1856年格奥尔格·维尔特曾在该公司做过事。——第411、

- 656页。
- 施坦道, 尤利乌斯 (Standau, Julius)——德国教师,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俾尔 (瑞士) 军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1860年为《人民呼声报》的编辑之一。——第85页。
- 施特芬, 威廉 (Steffen, Wilhelm)——前普鲁士军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人, 1853年流亡英国, 后迁美国; 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第250、287、507页。
- 施特龙, 威廉 (Strohn, Wilhelm)——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 侨居布莱得弗德。——第39、240、241、407、658页。
- 施特塞尔 (Stössel)——曼彻斯特席勒俱乐部的图书室管理员。——第592页。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1850—1860)。——第18、23、95、140、145、167、430、442、449、470、471、479、495、534、535、538—545、560页。
- 施图克尔 (Stücker)——宫廷顾问。——第262页。
- 施托夫雷根, 路德维希 (Stoffregen, Ludwig 生于1815年)——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年起流亡英国。——第511、517页。
- 施瓦伯 (Schwabe)——曼彻斯特的商人。——第656页。
- 施瓦尔克 (Schwarck)——普鲁士王国上
诉法院检察长。——第530、538页。
- 施万贝克, 欧根·阿列克西斯 (Schwanbeck, Eugen Alexis 1821—1850)——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1848—1849年为《科伦日报》编委。——第140页。
- 施旺, 泰奥多尔 (Schwann, Theodor 1810—1882)——杰出的德国生物学家, 1839年发表有机体由细胞构成的理论。——第410页。
- 施韦格尔特, 路德维希 (Schweigert, Ludwig)——前奥地利军官, 民族联盟盟员, 六十年代初为德国的后备军同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第254页。
- 施韦林, 马克西米利安 (Schwerin; Maximilien 1804—1872)——伯爵, 普鲁士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 曾任宗教、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 (1848年3—6月),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内务大臣 (1859—1862);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68、186、604页。
- *什瓦尔茨, 威廉 (Schwarz, Wilhelm)——1862年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会的成员。——第629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 (Schulze-Dehlitzsch, Hermann 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始人之一;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 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289、337、340、352、423页。
- 叔尔茨, 卡尔 (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曾流亡瑞士, 后迁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 后为国家活动家。——第237页。

- 斯巴达克 (Spartakus 死于公元前 71 年)——罗马角斗士,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公元前 73—71 年)。——第 159 页。
-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 392、662 页。
- 斯宾斯,詹姆斯 (Spence, James)——利物浦商人,《泰晤士报》通讯员;美国内战时期积极支持南部奴隶主。——第 246、248、300、365 页。
- 斯科维尔,约瑟夫·阿尔弗勒德 (Scoville, Joseph Alfred) (笔名:曼哈顿 Manhattan 1815—1864)——美国新闻工作者,民主党的拥护者,美国内战时期为伦敦《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驻纽约通讯员;反对林肯政府的政策。——第 235 页。
- 斯莱德耳,约翰 (Slidell, John 1793—1871)——美国政治活动家,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1861 年秋被南部同盟派往法国执行外交使命;1862—1865 年为同盟驻巴黎代表。——第 213 页。
-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226、268、276、282、352、358 页。
- 斯皮特霍恩,沙尔·路易 (Spilthoorn, Charles—Louis 1804—1872)——比利时律师,民主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30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布鲁塞爾民主协会会员,根特民主协会主席。——第 512 页。
- 斯坦伯里 (Stanbury)——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第 542 页。
- 斯坦顿,爱得文·麦克马斯特斯 (Stanton, Edwin M cMasters 1814—1869)——美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曾任首席检察官 (1860—1861),美国陆军部长 (1862 年 1 月—1868),拥护对南部奴隶主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第 248、249、256、257 页。
- 斯通,查理·波美罗伊 (Stone, Charles Pomeroy 1824—1887)——美国将军,1861 年为弗吉尼亚的北军指挥官,在博耳斯—布拉夫失败后 (1861 年 10 月),以叛国罪被捕,1862 年底获释。——第 219 页。
- 司各脱,温菲尔德 (Scott, Winfield 1786—1866)——美国将军,曾参加 1812—1815 年英美战争;美国陆军总司令 (1841—1861 年 11 月)。——第 178、184 页。
- 苏格拉底 (Sokrates 约公元前 469—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第 623 页。
- 苏拉 (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 138—78)——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曾为执政官 (公元前 88),独裁者 (公元前 82—79)。——第 160 页。
- 苏路克,法斯廷 (Soulouque, Faustin 1782 左右—1867)——黑人,海地共和国总统,1849 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世;反波拿巴报刊称拿破仑第三为苏路克。——第 386 页。

T

- 塔索,托尔克瓦托 (Tasso, Torquato 1544—1595)——著名的意大利诗人,《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一诗的作者。——第 185 页。

- 塔韦尔尼埃 (Tavernier)——伯爵, 炮兵军官。——第162页。
-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Ts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柏林1848年革命事变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瑞士“革命集中”流亡者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第16、23、54、101、122、446、453、490、499—502、554、673页。
- 泰勒, 汤姆 (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 许多期刊物的撰稿人, 1874—1880年为讽刺性杂志《笨拙》的编辑。——第325页。
- 泰伦齐安·摩尔 (Maurus Terentianus 二世纪后半期)——古罗马文法学家。——第21页。
- 汤普逊, 杰科布 (Thompson, Jacob 1810—1885)——美国国家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布坎南政府的内政部长 (1857—1861)。——第188页。
- 特腊勒 (Tralle)——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82页。
- 特吕布纳, 尼古劳斯 (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121、177页。
- 特韦斯顿, 卡尔 (Twesten, Karl 1820—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职业是法学家,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1861年起) 和德意志国会议员 (1867年起); 进步党领袖之一, 1866年为民族自由党创始人之一。——第235页。
- 忒伦底乌斯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 (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185左右—159)——著名的罗马喜剧作家。——第135、237、451页。
- 提茨, 弗里德里希·威廉 (Tietz, Friedrich Wilhelm 约生于1823年)——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541页。
- 提姆, 弗兰茨 (Thimm, Franz)——曼彻斯特的书商。——第153页。
- 图迪希乌姆, 弗里德里希·沃尔弗干格·卡尔 (Thudichum, Friedrich Wolfgang Karl 1831—1913)——德国法律史学家, 1862年起为杜宾根的教授。——第374页。
- 图尔, 伊什特万 (Tür, 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军官, 意大利和德国的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站在联军一边;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1861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第84、104、197、236、369、617页。
- 图西, 艾萨克 (Toucey, Isaac 1796—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属于民主党; 首席检察官 (1848—1849), 参议员 (1852—1857), 布坎南政府的海军部长 (1857—1861)。——第188页。

W

- 瓦茨, 约翰 (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 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慈善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1853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会”, 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会。——第310—312、314页。
- 瓦德西, 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 (Walderssee, Friedrich Gustav 1795—1864)——

- 伯爵,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陆军大臣(1854—1858)。——第99页。
-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W 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议会下院议员(1861年起)和德意志国会议员(1867年起),进步党的领袖之一。——第169页。
- 瓦盖纳,海耳曼(W agener, 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新普各士报》编辑(1848—1854),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俾斯麦的拥护者。——第168、169、370页。
- 瓦勒斯罗德,路德维希·莱茵霍尔特(W alesrode, Ludwig Reinhold 1810—1889)——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60—1881年曾出版《民主研究》文集。——第49、90、149、575页。
- *瓦托,路易(W atteau, Louis 生于1824年)(笔名:德农维尔 Denonville)——法国政论家,四十至五十年代法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后来侨居比利时;布朗基的近友。——第178、609、611页。
- 万哈根·冯·恩塞,卡尔·奥古斯特(V 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85—1858)——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文学批评家。——第205、586、619页。
- 微耳和,鲁道夫(V irchow, Rudolf 1821—1902)——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1871年以后成为反动分子,社会主义的激烈反对者。——第289、370页。
- 威尔逊,詹姆斯(W 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853—1858年为财政部秘书长;1859—1860年为印度财务大臣。——第70页。
- 威廉(1845—1913)——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的儿子,希腊国王,称乔治一世(1863—1913)。——第663页。
- 威廉斯(W illiams)——伦敦的书商。——第643页。
- 威廉一世(W 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65、79、89、95、140、145、155、158、162、163、169、195、201、204、207、235、249、288、297、300、379、386、401、548、585、604、606、664页。
- 威纳尔,敏娜(W erner, Minna)——第157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W 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474、485、496页。
- 韦利斯,罗伯特(W illis, Robert 1800—1875)——英国学者,机械师、工艺师和考古学家;1854—1867年给工人讲课。——第317页。
- *维贝尔(W eber)——普鲁士法学家(法律顾问),1860年柏林《国民报》诉讼案件中马克思的律师。——第40、41、42、45、46、49、52、71、72、75、81、83、86、106、107、115、437、446、454、475、476、

- 482、494、508、515、517、525、528、530、531、553、555、560、568页。
- 维贝尔,约瑟夫·瓦伦亨(W eber, Josef Valentin 1815—1895)——普法尔茨的钟表匠,1848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流亡瑞士,后到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176、180、183、384、476、613、639页。
- 维耳耳豪斯和布什(W iebelhaus & Busch)(银号)——利物浦的一家银号。——第660页。
- 维克多,弗朗斯瓦·欧仁(V idocq, François 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事犯,秘密警探;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字手的代名词。——第479页。
- 维多利亚(V 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47、48、205、398、401、537页。
- 维尔穆特(W ermuth)——汉诺威警察厅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与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540页。
- 维尔特,格奥尔格(W 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22、676页。
- 维干德,奥托(W igand, Otto 1795—1870)——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101页。
- 维科,卓万尼·巴蒂斯特(V ico, Giovanni Battista 1668—1744)——意大利杰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他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230、617、616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 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99、104、260、566、574页。
- 维利希,奥古斯特(W 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6、54、105、157、180、246、287、469、470、477、490、492、500—503、523、540、543页。
- 维斯(W iß, C.)——德国医生和新闻记者,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侨居美国;金克尔的拥护者。——第490、491页。
- 维耶(W iehé)——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的妻子。——第36、436页。
- 维耶,约翰·弗里德里希(W iehé, Johann-Friedrich)——排字工人;1859年在伦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工作。——第30、32、35—39、41、44、435—437、439、447、456—459、485、486、509、561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168、320、348、597页。
- 魏德迈,约瑟夫(W 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上校;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 46、49、77、85、86、250、441、490、503、518、520、522、523页。
- 魏克, 查理·伦诺克斯 (W yke, Charles Lennox 1815—1897)——英国外交家, 驻墨西哥公使 (1860—1861) 和特派代表 (1862—1863)。——第224、225页。
- 魏特林, 威廉 (W eitling, W 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491页。
- 文特尔 (W inter)——普鲁士官吏, 1861年年中起是柏林警察总监。——第186、604页。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 (V 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曾批评过法国的税收制度。——第352页。
- 沃尔夫, 伯恩哈特 (W olff, Bernhard 1811—1879)——德国新闻工作者, 1848年起为柏林《国民报》所有人, 德国第一个电讯社 (1849) 的创办人。——第48、167、168页。
- 沃尔夫, 斐迪南 (W olf, Ferdinand 1812—1895) (“红色沃尔夫” der rote W olf)——德国政论家, 1846—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国外;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69、313、363、514、677页。
- 沃尔夫,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W olf, Friedrich August 1759—1824)——德国语文学家, 古希腊罗马文化, 特别是荷马史诗的研究者。——第618页。
- *沃尔夫, 威廉 (W olff, W ilhelm 1809—1864) (鲁普斯 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0、13、17、20、21、25—27、50、58、76、82、103、108、112、114、116、119、122、126、136、164—166、173、178—180、183、185、186、195、198、221、227、231、236、243、247、250、252、254、255、263、264、274、288、292、302、313、321、340、341、345、348、366、369、372、377、379、381、382、385、386、388—392、395、398—400、405、407、411、414、445、464、465、489、533、563、564、615、622、631、652、655—657、675、683页。
- 沃尔弗斯, 弗兰茨·安东 (W olffers, Franz Anton 生于1813年)——德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比利时人, 1847—1849年是《科伦日报》撰稿人和编委, 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的奸细。——第140页。
- 沃康松, 雅克·德 (V aucanson, Jacques de 1709—1782)——法国机械师, 曾改进织布机的构造。——第319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 (U 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 议会议员 (1847—1852); 《自由新闻》报的创办人和编辑。——第10、12、13、22、

- 27、41、61、80、217、223、232、321、322、357、367、368、373、399、401、424、459、498、507、546—549、613、679页。
- 乌尔麦尔, 约翰(Ulmer, Johann)——德国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543页。
- 乌朗特, 路德维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66、68页。
- 乌伦多夫(Uhlendorf)——德国民主主义者,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第491页。
- 乌洛阿, 吉罗拉莫(Ulloa, Girolamo 1810—1891)——那不勒斯将军, 1848—184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 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为托斯卡纳军队指挥官。——第79页。
- 伍德(Wood)——曼彻斯特的律师。——第399页。
- X
- 西华德, 威廉·亨利(Seward, William Henry 1801—1872)——美国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右翼领袖之一; 纽约州州长(1839—1843), 1849年起为参议员, 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曾任美国国务卿(1861—1869),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331页。
- 西蒙, 爱德华(Simon, Edouard 1824—1897)——法国政论家, 生在柏林, 波拿巴的密探。——第119、122页。
- 西蒙, 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1872)——特利尔的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曾流亡瑞士。——第110、126、131、133、179、483、561页。
- 西蒙斯, 路德维希(Simons, Ludwig 1803—1870)——德国法学家, 反动分子;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曾任司法大臣(1849—1860)。——第145页。
- 西姆桑, 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1810—1899)——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48年11月为驻柏林的帝国专员, 1848年12月—1849年5月任该会议议长,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9年起), 后为议长(1860—1861)。——第168页。
-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160页。
- 希尔(Hill)——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职员。——第263、302、315、406页。
- 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 1814—1903)(真名尼古拉斯·贝伊茨 Nicolaas Beets)——荷兰诗人和作家。——第590、645、651页。
- 希尔施, 威廉(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警探。——第18、25、472、480、538—545页。
- 希尔什菲尔德(Hirschfeld)——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 曾承印《新时代》和金克尔创办的《海尔曼》周刊, 1860年还承印了

-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第90、98、101、106、108、123、133、135、177页。
- 希尔泽门策尔, 卡尔·克利斯提安·爱德华 (Hiersemenzel, Karl ChristianEduard 1825—1869)——德国法学家, 1859年起是柏林市法官和《普鲁士法庭报》编辑, 拉萨尔的朋友。——第165页。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34、65、123、134、135、363、415、450、480、590、592—594、620、655页。
- 席利, 维克多 (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第一国际会员。——第29、32、42、53、54、58、62、63、84、102、137、194、197、200、226、236、290、336、468、502、551、552、572、575、617、673页。
-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历山大 (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为流亡者, 追随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6、54页。
- 夏邦提埃, 热尔韦 (Charpentier, Gervais 1805—1871)——法国出版者和书商。——第618页。
- 夏韦, 奥诺莱·约瑟夫 (Chavée, Honoré—Joseph 1815—1877)——比利时的语文学家。——第406页。
- 谢尔策尔, 安得列阿斯 (Scherzer, Andreas 1807—1879)——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 所谓1852年2月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 后流亡英国,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第481页。
- 谢努, 阿道夫 (Chenu, Adolphe 约生于1817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奸细和密探。——第17、431页。
- 辛凯尔迪, 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普鲁士政府官员, 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 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第167、472、542页。
- 修昔的底斯 (Thukydidēs 约公元前460—395)——古希腊最大的历史学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第602页。
- 薛尔曼, 托马斯·威斯特 (Sherman, Thomas West 1813—1879)——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1年10月—1862年3月为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的讨伐军总指挥。——第234、235、420、423页。
- 雪恩贝尔格 (Schönberg)——伯爵夫人。——第541页。

Y

- 雅科比, 阿伯拉罕 (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后流亡美国, 在美国工人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

- 内战;美国许多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作。——第407、490、503页。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608页。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7、325页。
- 亚历山得拉(Alexandra 1844—1925)——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之女,1863年嫁给威尔士亲王,亲王于1901年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世。——第663页。
- 杨格(Young)——第217页。
-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213、341、401页。
-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341—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651页。
- 伊丽莎白(Elizabeth 1801—1873)——普鲁士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妻子。——第297页。
- 伊曼特,彼得(Imandt, Peter)——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18、32、111、200、270、273、290、468页。
- 尤尔,安德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第226页。
- 尤赫,海尔曼(Juch, Hermann)——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金克尔的拥护者,1859年7月起为《海尔曼》报的编辑。——第18、35、176、181、182、231、479、538页。
- 尤利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331左右—363)(背教者)——罗马皇帝(361—363)。——第623页。
- 尤塔,路易莎(Juta, Louise 1821—1893)——马克思的妹妹,约翰·卡尔·尤塔的妻子。——第139、641页。
- 尤塔,约翰·卡尔(Juta, Johan Carel 生于1824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第139、641页。
-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纪六十年代,死于127年后)——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202页。
-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386页。
- 约翰斯顿,约瑟夫·埃格斯顿(Johnston, Joseph Eggleston 1807—1891)——美国将军,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曾指挥弗吉尼亚的南军(1861—1862),后指挥田纳西和密西西比的南军。——第221页。

Z

- 扎莫伊斯基,弗拉基斯拉夫(Zamoyski, Wladyslaw)——伯爵,波兰地主和将军,曾参加1830—1831年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克里木战争时企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357、367页。
- 赞格,奥古斯特(Zang, August 1807—

- 1888)——奥地利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新闻报》的创办者和出版者;下奥地利邦议会的议员。——第199页。
- 藻伦海美尔(Sauernheimer)——德国制刷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瑞士,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第87、468页。
- 泽耳(Seel),理查——德国讽刺画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的熟人。——第170页。
- 泽尔菲,古斯塔夫(Zerffi, Gustav 生于1820年左右)(真姓希尔施Hirsch)——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起侨居巴黎,1853年初侨居伦敦;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保持联系;后为金克尔的拥护者,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委员。——第177、182、191、195页。
- 詹姆斯,爱得文·约翰(James, Edwin John 1812—1882)——英国律师,议员,1858年奥尔西尼谋杀拿破仑第三的审判案中为西蒙·贝尔纳的辩护人;1860年秋曾到加里波第的兵营。——第31、102页。
- 征服者威廉一世(William I, The Conqueror 1027—1087)——英国国王(1066—1087)。——第401、664页。
- 佐尔姆斯,玛丽·勒蒂齐娅·斯图多耳米娜(Solms, Marie-Lotitia-Studolmine 1833—1902)——法国女作家和自由派政论家,路易·波拿巴的侄女。——第325页。
- 佐美尔(Sommer)——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第541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阿基里斯是由于被箭射中了他的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而死去。——第669页。
- 阿莉阿德尼——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女儿,提修斯在迷宫中杀死怪物明诺托尔之后,由她帮助走出迷宫;提修斯把她带走,而后来遗弃在纳克索斯岛上,她成了女祭司和巴考士神的妻子。——第591页。
- 埃吉丽亚——按罗马神话是一位聪慧的有预知能力的女神,常暗中向罗马王努玛·庞皮利乌斯出谋献策。——第590页。
- 安斐特里昂——古希腊神话中梯林斯的国王;在新的文学中,由于莫里哀对这个人物的解释,而成为殷勤好客的主人的同义语。——第597页。
-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忒拜城志中的主人公,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主要角色;据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第534页。
- 奥列斯特和皮拉德——古希腊神话中的两位英雄的名字,成了表示忠实友谊的代名词。——第381页。

奥路夫——古丹麦民间叙事诗中的主人公。——第66—68页。

B

巴考士——古罗马人的酒神和欢乐神。——第591页。

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塔索的长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的主人公，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中的一个理想化的首领形象。——第185页。

C

参孙——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第168—169页。

D

大洋神——古希腊神话中诸神的始祖之一，海洋力量的化身。——第413页。

邓德里厄里——泰勒讽刺喜剧《我们的美国亲戚》的主人公，无聊、游闲的英国贵族的形象。——第370、386页。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第410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第76页。

佛陀——据传说是佛教学说的神话式的创始人古印度王子乔答摩的尊称。——第164、600页。

H

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德国民间讽刺所谓十六世纪粗野文学的同名歌谣

中的人物。——第580页。

J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192页。

K

库尼贡达——伏尔泰哲学小说《老实人》中的女主人公。——第131、133页。

L

拉撒路——圣经《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的名字。他患 疯病，而靠生活奢侈的有钱人的残羹剩饭过活。——第166、381页。

拉萨里耳奥——十六世纪中叶问世的一部匿名西班牙中篇小说《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及其种种不幸》中的人物；狡猾骗手手的典型。——第365页。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第679页。

M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第615页。

摩西——据圣经说，摩西是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出埃及记》）。——第166、261、620页。

P

排字工人的妻子——拉萨尔《文学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一书中的一个人物。——第262页。

皮彭布林克——弗莱塔格的喜剧《新闻界人士》中的人物。——第169页。

S

- 瑟西——古希腊神话中亚耶亚岛的女魔法师；她将乌利斯的同伴变成猪，而把乌利斯本人留在她的岛上一年；用瑟西的名字譬喻诱人的美女。——第589页。
- 山姆大叔——美国资产阶级的谑称，由英语“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开头字母组成，流传很广。——第245页。
-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第534页。
- 斯库伊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主人公，是残忍、贪婪无知和虚伪的典型。——第34页。

T

-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169、523页。
- 唐璜——莫扎特的同名歌剧中的主要角色。——第260、419页。
- 提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最主要英雄之一，传说中的雅典国王，人们认为雅典国家是他奠基的。——第591页。

W

-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门生；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第625页。
- 维尔德曼——约翰娜·金克尔的小说《汉

斯·伊贝勒斯》中的人物。——第157页。

乌利斯，或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首领之一，以大胆、机智和善辩著称。——第589页。

X

西缅——据圣经传说，是雅各的儿子之一，古希伯来族西缅支系的祖先。——第407页。

Y

-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希伯来族的始祖。——第407页。
-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古希伯来族的族长。——第307、407页。
-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古希伯来族的族长，亚伯拉罕的儿子。——第407页。
- 以斯拉——据传说是圣经五书的著者。——第407页。
-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作为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顺驯服，因之得到上帝赐福的典型。——第144页。
-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年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10、213、223、224、245、331、384页。
-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第407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报刊述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4—695页)。
- Gatherings from the press.
载于1859年6月4日和25日,7月9日和16日《人民报》第5、8、10和11号。——第177页。
- 《北美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6—356页)。
- Der nordamerikanische Bürgerkrieg.
载于1861年10月25日《新闻报》第293号。——第199页。
-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4—246页)。
- Die Berliner Nationalzeitung andie Urwähler.
载于1849年1月26日和28日《新莱茵报》第205号和第207号增刊。——第502页。
- 《不列颠的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15卷第172—176页)。
- British commerce.
载于1860年9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63号。——第70、87页。
- 《不列颠的棉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31—334页)。
- The British cotton trade.
载于1861年10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05号。——第196、199页。
- 《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致〈自由新闻〉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2—764页)。
- Prosecution of the Augsburg Gazette. To the Editor of the《Free Press》. [London, 1860].
1860年在伦敦以传单形式印行。——第22、28—30、32、34—36、38、41、435、447、457、458、486、487、508、509页。
- 《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2—195页)。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Russia using Austria. The meeting at Warsaw.
载于1860年10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72号。——第113页。
-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
- Hert Vogt. London, 1860—第62、75、76、81—84、91、95—98、101、103、106—109、114、117—126、129—133、137、138、140、141、143、144、146、149、153、159、165、166、171、196、200、203、210、236、432、483、518、521、523、526、530、533、554、555、559—562、566、568、570—572、583、587、599、605、615、673、674页。
- 《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 Der Ritter vom edelmüthigen Bewußtsein. [New York, 1854].——第445、453、489、498、500—502、507、513、515、518页。
- 《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7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Telegraph.——第29、31、473、474页。
-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5页)。
- 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第439、456、462页。
-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
- Lohnarbeit und Kapital.
载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第397、505页。
-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4—646页)。
- 载于1853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报》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482、483页。
-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Bruxelles, 1848]——第505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 - 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第445、469—472、479、482、483、492、494、501页。
- [Boston, 1853].——第138、139、141、203、430、445、453、454、471、472、474、479、482、492、494、501、515、538、539、544页。
- 1853年3—4月《新英格兰报》。——第501页。
- 《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42—243页)。
- A Money stringency.
载于1860年1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11号。——第113页。
-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0—567页)。
- Kossuth and Louis Napoleon.
载于1859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48号。——第431、434、511、

- 526页。
- Particulars of Kossuth's transaction with Louis Napoleon.
载于1859年9月28日《自由新闻》第7卷第10号。——第431、434、511、526页。
- 《历史上有趣的一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08—515页)。
- A Curious piece of history.
载于1858年6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52号。——第484页。
- *《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57—162页)。
载于1860年9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46号。——第87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Napoleon.
载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第101、126、129、203、506—507页。
-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
- Proklamation des deutschen Arbeiter Bildungs-Verein in London [London, 1863].
1863年在伦敦以传单形式印行。——第323、327、328、680、681页。
- 《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35—340页)。
- The London Times and lord Palmerston.
载于1861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11号。——第198、201页。
- 《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1—345页)。
- The London Times on the Orleansprinces in America.
载于1861年11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26号。——第198页。
- 《美国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7—366页)。
- Der Bürgerkrie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载于1861年11月7日《新闻报》第306号。——第198页。
- 《美国问题在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21—330页)。
- The American question in England.
载于1861年10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03号。——第196、198页。
-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
- Lord Palmerston.
载于1853年10月22日和29日, 11月5、12和19日, 12月10、17和24日《人民报》第77、78、79、80、81、84、85和86号。——第12页。
- Palmerston: Palmerston and Russia: A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England and Russia.
载于1853年10月19日, 11月4日和21日及1854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3916、3930和3973号。——第507、546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1 edition. London, 1853. 2 edition. London, 1854.——第507页。
-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y. London, 1854.——第507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y. London, 1855.——第507页。
- 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
- 载于1859—1860年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第1、2卷(摘要)。——第12页。
- 《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6—200页)。
- A ffairs in Prussia.
- 载于1860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76号。——第84、113页。
-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79—180页)。
- A Traitor in Circassia.
- 载于1857年4月1日《自由新闻》第4卷第34号。——第484、617页。
- 《三月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4—396页)。
- Der Märzverein.
- 载于1849年3月11日《新莱茵报》第243号。——第504页。
-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364页。
-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 载于1856年8月16日和23日, 9月13日和20日, 10月4日, 11月8日和29日, 12月6日和20日, 1857年2月4、18和25日, 4月1日《自由新闻》第3—4卷第1、2、5、6、8、13、16、17、19、26、28、29和34号; 1856年6月28日, 7月5日和12日, 8月2日《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不全)。——第507、546页。
- 《“特伦特号”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08—411页)。
- Der Trent— Fall.
- 载于1861年12月2日《新闻报》第331号。——第209页。
- 《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00—104页。)
- Interesting from Sicily. —Garibaldi's quarrel with La Farina. —A letter from Garibaldi.
- 载于1860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18号。——第78页。
- *《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6—140页)。
- 载于1860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5号。——第673页。
- 《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92—599页)。
- A nother strange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 载于1858年9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6号。——第484页。
- 《英国的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9—14页)。

- English politics.
 载于1860年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68号。——第9页。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a la philosophie de la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 ——第505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 ——第15、90、210、364、480、507、512、551、563、618、636、638页。
- 序言。——第505页。
- 《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5—766页）。
-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2月10日《人民报》第35号；1860年2月10日《科伦日报》第41号；1860年2月11日《改革报》第18号；1860年2月17日《总汇报》第48号附刊和其他德国报纸。——第30、32、39、41、114、434、435、520页。
-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
- Erklärung.
 载于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第325号附刊。——第11、14、439、440、449、457、510页。
- 《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71—772页）。
-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12月1日《总汇报》第336号附刊。——第114、570页。

弗·恩格斯

- 《奥地利病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41—144页）。
- The Sick man of Austria.
 载于1860年9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9号。——第554页。
- 《奥地利革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49—252页）。
- Austria.—Progress of the revolution.
 载于1861年1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52号。——第127、136页。
- 《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7—299页）。
- Po und Rhein. Berlin, 1859. ——第6、14、15、26、96、136、162、327、445、508、513、557、569页。
- 《不列颠的国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05—109页）。
- British defenses.
 载于1860年8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0号。——第70、78、80页。
- 《步枪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09—241页）。
- The History of the rifle.
 载于1860年11月3日和17日、12月8、15和29日、1861年1月5、12和19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9、11、14、15、17、18、19和20期。——第82—83页。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
- German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载于1851年10月25日和28日, 11月6、7、12和28日, 1852年2月27日, 3月5、15、18和19日, 4月9、17和24日, 7月27日, 8月19日, 9月18日, 10月2日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2页。
- 《德国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53—256页)。
- German movements.
载于1861年2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78号。——第147页。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
-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1、2、3号。——第577页。
-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36—642页)。
- Progress of Russian in the East.
载于1858年11月24日《自由新闻》第6卷第23号。——第546页。
- 《法国的武装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57—261页)。
- French armaments.
载于1861年2月2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2期。——第120、155页。
- 《关于招贴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18—530页)。
- Die Debatte über das Plakatgesetz.
载于1849年4月22日和27日《新莱茵报》第279号增刊和第283号。——第502页。
- 《海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82—396页)。
- Navy.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1年版第12卷。——第94、97、106、112页。
- 《加里波第的进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63—167页)。
- Garibaldi's progress.
载于1860年9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56号。——第84、87页。
- 《加里波第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2—135页)。
- Garibaldi movements.
载于1860年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1号。——第70、82、83页。
- 《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68—171页)。
- Garibaldi in Calabria.
载于1860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58号。——第84页。
-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9—73页)。
- Garibaldi in Sicily.
载于1860年6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79号。——第62页。
- 《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15—120页)。
- Could the french sack London?
载于1860年8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1号。——第80页。

- 《炮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93—220页)。
—Artillery.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100页。
- 《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33—680页)。
—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Berlin, 1860. ——第14、22、26、30、38、45、46、49、53、55、56、61、62、74、84、96、137、443—445、513、537、558页。
- 《萨瓦与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22—626页)。
—Savoy and Nice.
载于1860年2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74号。——第13、17页。
- 《英国的志愿兵部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80—82页)。
—The British volunteer force.
载于1860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94号。——第75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第7、334、338、366页。
-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49—156页)。
—Eine Musterung englischer freiwilliger Jäger.
载于1860年9月8日《军事总汇报》第36号。——第92、557—558、565页。
- A Review of english volunteerri-flement.
载于1860年9月14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期。——第92、102、104、558、565页。
- A German account of the volunteers.
载于1860年9月24日《泰晤士报》第23733号。(摘要)。——第104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页)。
—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
载于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分卷和第2分卷。——第277页。
- 《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曼彻斯特版。
—Essays addressed to volunteers. ——第155、157页。
- 《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
—The Late trial at Cologne.
载于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45号。——第445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er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 第505页。
- *《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第505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 — 第320、370、396页。
- 《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
- Revue. Mai bis Oktober.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第638页。
- 《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
- 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 第20页。
- 《美国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13—523页）。
- Der amerikanische Bürgerkrieg. 载于1862年3月26日和27日《新闻报》第84和85号。——第227、228、230页。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
-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845. — 第505页。
-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497页。
- 《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1—542页）。
- Erklärung. — 第441页。
- 《〈新莱茵报〉审判案》；《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306页）。
- 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Köln, 1849. — 第498、503页。
- 《御前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75—381页）。
- Die Thronrede. 载于1849年3月1日和2日《新莱茵报》第234和235号。——第502页。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29—430页）。
- 载于1852年10月28日《旁观者》第1270号、1852年10月30日《人民报》第26号、1852年10月30日《晨报》、1852年10月30日《先驱》第136号和1852年10月30日《观察家》第2335号。——第482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
- 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和1851年7月1日《科伦日报》第156号。——第25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恩·德朗克、路·博尔夏特、爱·龚佩尔特《关于威廉·沃尔弗逝世的讣告》。

载于1864年5月23日《总汇报》第144号附刊。——第661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贝尔, 卡]《奥地利的报界帮凶》

([Abel, K.] The Journalisticauxiliaries of Austria), 载于1860年2月6日《每日电讯》。——第28、29、31、62、438、450、453、469、472、473、485、490、498、538页。

[阿贝尔, 卡] ([Abel, K.])《答马克思》, 载于1860年2月13日《每日电讯》。——第43、62、473、498页。

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内战史》

(Appianus Alexandrinus. De Civilibus Romanorum bellis historia — rum)。——第159页。

阿布, 艾·《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1860年巴黎版(About, E. La Prusse en 1860. Paris, 1860)。——第64、66、134、552页。

阿布特《卡尔·福格特和卡尔·马克思或制刷匠帮》(Abt. Carl Vogt und Carl Marx oder die Bürstenheimer), 载于1861年《时代呼声》杂志第39期附刊。——第196、200页。

阿尔坦赫费尔, 奥·约·《辟谣》(Alten-

höfer, A. J. Zur Entgegnung), 载于1860年1月28日《总汇报》第28号附刊。——第19页。

[埃尔斯纳, 卡·弗·摩·]《囚室中的沃尔弗》([Elsner, K. F. M.] Kasemat-ten-Wolff), 载于1864年5月24日《布勒斯劳报》(上午版); 1864年5月26日《莱茵报》第145号。——第395、397、683页。

[艾韦贝克, 海·]《巴枯宁》([Ewerbeck, H.] Bakunin), 载于1848年7月6日《新莱茵报》第36号。——第492页。

艾希霍夫, 威·《柏林警察剪影》1860年柏林版(Eichhoff, W. Berliner Polizei-Silhouetten. Berlin, 1860), 1860—1861年该书在柏林和伦敦出四集。——第89、91、93、564页。
——1860年柏林版第二集。——第575页。

[艾希霍夫, 威·]《施梯伯》([Eichhoff, W.] Stieber), 载于1859年9月10、17和24日, 10月1、8、15、22和29日《海耳曼》周报第36、37、38、39、40、41、42和43号。——第18、479页。

奥本海姆, 亨·伯·《我们对法国和英国的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和文章的作者的名字。

- 理想和失望》(Oppenheim, H. B. Unsere Ideale und Enttäuschungen in Frankreich und England),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90、110页。
- 奥尔格斯, 海·《声明》(Orges, H.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1月12日《总汇报》第12号。——第13、15页。
- 奥斯本, 拉·(Osborne, R.) 1864年4月4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64年4月5日《泰晤士报》第24838号。——第384页。
- ### B
- 巴枯宁, 米·《华沙中央委员会和俄国军事委员会。答梅洛斯拉夫斯基》1862年伦敦版 (Bacounine, M. Le comité central de Varsovie et le comité militaire russe. Réponse au général Mieroslawski. London, 1862)。——第324页。
- 巴枯宁, 米·《声明》(Bakunin, M. Erklärung), 载于1848年《东德意志雅典神殿。新奥得报艺术科学和文学附刊》第151号; 1848年7月16日《新莱茵报》第46号附刊。——第492页。
- 巴斯提安, 阿·《人在历史中》第1—3卷, 1860年莱比锡版 (Bastian, A. 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 Bände I—III, Leipzig, 1860)。——第131、574页。
- 班贝尔格尔, 路·《米哈埃尔“赞成”和托马斯“反对”在1859年的通讯》(Bamberger, L. Des Michael ProSchriftenwechsel mit Thomas Contra, aus dem Jahr 1859),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90、110、561页。
- [班贝尔格尔, 路·]《去意大利, 好啊!》1859年伯尔尼和日内瓦福格特出版社出版 ([Bamberger, L.] Juchhe nach Italia! Bern u. Genf; Vogt's Verlag, 1859)。——第13、110页。
- 鲍威尔, 布·《德国和俄国人》1854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Deutschland und das Russ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4)。——第264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Die jetzige Stellung Ruß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第264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和德国人》1853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3)。——第264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和德国人。第二部。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Zweite Abtheilung. Die deutsche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Charlottenburg, 1853)。——第264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和英国》, 译自德文, 1854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La Russie et l'Angleterre. Traduit de l'allemand. Charlottenburg, 1854)。——第264页。
- 贝克尔, 海·《我作为议员候选人》1862年多特蒙特版 (Becker, H. Meine Candidatur zum Abgeordneten-hause. Dortmund, 1862)。——第621页。
- 贝克尔, 约·菲·《怎样与何时?关于当代的问题和任务的严肃见解》1862年日内

- 瓦、伦敦、曼彻斯特出版 (Becker, J. Ph. *Wie und Wann? Ein ernster Ort über die Fragen und Aufgaben der Zeit.* Genf, London, Manchester, 1862)。——第614页。
- [贝塔, 亨·]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Beta, H.) *Ferdinand Freiligrath*, 载于1859年《凉亭》杂志第43期。——第143、450页。
- 贝塔, 亨·《卡尔·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Beta, H. *Herr Vogt von Karl Marx*), 载于1861年1月9日《外国文学杂志》第2期。——第143页。
- 贝塔, 亨·《一个未被赦免者》(Beta, H. *Ein Nichtamnestirter*), 载于1862年《凉亭》杂志第2和第3期。——第231页。
- [比斯康普, 埃·] 《帝国摄政》(Biscamp, E.) *Der Reichsregent*, 载于1859年5月14日《人民报》第2号。——第70、460、462页。
- 比斯康普, 埃·《声明》(Biscamp, E.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2月15日《总汇报》第46号附刊。——第445、465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冯·拉登堡先生和人民学校的教师](Bürgers, H.) *Hr. v. Ladenberg und die Volksschullehrer*, 载于1848年12月30日《新莱茵报》第182号。——第563、564页。
- 毕尔格尔斯, 亨·(Bürgers, H.) 1860年9月5日在科堡民族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1860年9月7日《国民报》第420号; 1860年9月12日《总汇报》第256号。——第563、564页。
- 毕希纳, 路·《力和物质》(Büchner, L. *Kraft und Stoff*), 185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第一版。——第76页。
- 卞尼格先, 鲁·(Bennigsen, R.) 1860年9月3日在科堡民族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1860年9月7日《总汇报》第251号。——第564页。
- 博埃齐, 阿·托·赛·《论算术》(Boetius, A. *T. S. De institutione arithmetica*)。——第650页。
- 博丹, 让·《论共和国》(Bodin, J. *Derepublica*), 1584年出第一版。——第352页。
- 波克罕, 西·路·[《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艾德门·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的回答》1860年伦敦版](Borkheim, S. L.) *Napoleon III und Preussen. Antwort eines deutschen Flüchtlings auf Preussen in 1860* von Edmond About. London, 1860)。——第96页。
- 波克罕, 西·路·[《评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一书》, 载于1860年4月7日《海耳曼》报。——第46、47页。
- 波特尔, 艾·《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Potter, E.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第24514号。——第333页。
- 布阿吉尔贝尔, 比·《法国详情》(Boisguillebert, P. *Le détail de la France*), 1695年出第一版。——第352页。
- 布拉斯, 奥·《我们需要什么?》1860年日内瓦版 (Brass, A. *Was Noth ist.* Genf, 1860)。——第105页。

- 布拉斯, 奥·(Brass, A.) 一篇反对福格特的文章, 载于1859年11月12日《新瑞士报》。——第510页。
- 布莱特, 约·(Bright J.) 1863年3月26日在伦敦工联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1863年3月27日《泰晤士报》第24517号。——第338页。
- 布林德, 卡·《德国和波兰》(Blind, K. Deutschland und Polen), 载于1863年《观察家报》; 1863年4月8日《先驱者》第15号。——第323页。
- 布林德, 卡·《反对卡尔·福格特》(Blind, K. Gegen Karl Vogt), 载于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第445、453、458、463、485、487页。
- [布林德, 卡·]《警告》([Blind K.]) Zur Warnung [1859年伦敦版]。
- 传单。——第36、86、136、435—437、445、449、454—463、487、554、561页。
- 载于1859年6月22日《总汇报》第173号附刊。——第449、460—462页。
- 载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号。——第37、437、455、456页。
- [布林德, 卡·]《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Blind, K.]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 载于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报第7卷第5号。——第439、454、461页。
- 布林德, 卡·《声明》(Blind K. Erklärung), 载于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第313号。——第44、436、438、456—458、486、509页。
- [布林德, 卡·]([Blind K.]) 一篇关于席勒纪念活动的文章, 载于1859年11月11日《晨报》。——第450页。
- 布林德, 卡·(Blind, K.)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附刊。——第35、436、438、450、457、458、486、509页。

D

-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第131、251、574页。
- 德拉奥德, 律·《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De La Hodde L.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第17页。
-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64年4月18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64年4月19日《泰晤士报》第24850号。——第384页。
- 赛尼盖斯, 威·《九五一年至九七三年国王和皇帝奥托一世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Doenniges, W. 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r Herrschaft König und Kaiser Ottos I. von 951 bis 973), 载于《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 列奥波特·兰克出版, 1839年柏林版第1卷第3篇(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m Sächsischen Hause. Herausgegeben von Leopold Ranke. Band I. Dritte Abtheilung. Berlin, 1839)。——第423页。

多济, 莱·《麦加城的以色列人》1864年哈勒姆版 (Dozy, R. De israëlieten te Mekka. Haarlem, 1864)。——第407、661页。

E

恩格尔《人口调查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和历史中的作用。1862年2月15日在柏林音乐学院作的报告》(Engel. Die Volkszählungen, ihre Stellung zur Wissenschaft und ihre Aufgabe in der Geschichte. Ein Vortrag, gehalten in der Singakademie zu Berlin, den 15. Februar 1862), 载于1862年2月《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第2期。——第353页。

F

菲塞林, 西·《实用国民经济手册》1860—1862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3部 (Vissering, S. Handboek van praktische staathuishoudkunde. Delen I—III. Amsterdam, 1860—1862)。——第645页。

费格勒, 阿·(Vögele, A.) 1859年9月17日的声明, 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第439、455—457、461、462页。

费格勒, 阿·(Vögele, A.) 1860年2月11日的宣誓证词 (Affidavit) 载于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第36—42、447、458、459、485、487页。

费奈迭, 雅·《为了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 (Venedey, J. Pro domo und Pro patria gegen Karl

Vogt. Hannover, 1860)。——第70页。

费舍, 爱·《布伦的远征和俄国佬》(Fischel, E. Brennszug und Moskowitertum)。——第547页。

[费舍, 爱·]《革命者成为俄国人》([Fischel E.] The Revolutionists become russian), 载于1860年1月4日《自由新闻》报第8卷第1号。——第10页。

费舍, 爱·《科堡公爵的抨击性小册子》1859年伦敦版 (Fischel, E. The Duke of Coburg's pamphlet London 1859)。——第547—548页。

[费舍, 爱·]《作为革命者的暴君》1859年柏林版 ([Fischel, E.] Die Despoten als Revolutionäre. Berlin, 1859)。——第10、547页。

费希特, 约, 哥·《一八〇七年和一八一三年的政治片断》(Fichte, J. G. Politische Fragmente aus den Jahren 1807 und 1813), 载于《费希特文集》第7卷1846年柏林版, (J. G. Fichte's Sammtliche Werke. Band VII. Berlin, 1846)。——第529、530页。

[福格特, 卡·]《警告》([Vogt C.] Zur Warnung), 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第23、24、462页。

福格特, 卡·《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 (Vogt, C.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第70、76、96、101、459、490页。

福格特, 卡·《声明》(Vogt, C. Erklärung), 载于1859年6月16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62号号外。——第70、

- 71页。
- 福格特, 卡·《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日内瓦出版 (Vogt, C.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im December 1859)。——第8、11、17—21、24、25、28、38、40、42、47、71、115、148、431—433、435、444、450、452、456、457、460、462、464、466、470、475、476、478、485、489、493、498—504、511、520、521、560页。
- 福格特, 卡·《现今的日内瓦一瞥》(Vogt, C. Ein Blick auf das jetzige Genf),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74、90、561页。
- 孚赫, 尤·(Faucher, J.) 1863年12月1日在众议院的发言, 载于1863年12月4日《总汇报》第338号。——第379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斐·(Freiligrath, F.)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1859年11月15日《总汇报》第319号附刊。——第450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斐·(Freiligrath, F.)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附刊。——第35、450页。
- 弗兰德, 威·(Ferrand, W.) 1864年6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4年6月17日《晨邮报》第28238号。——第664页。
- 弗里德里希-卡尔·《军事笔记》186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Friedrich-Karl Eine militärische Denkschrift. Frankfurt am Main, 1806)。——第99页。
- 弗吕贝尔, 尤·《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反对卡尔·福格特》(Fröbel, J. Julius Fröbel gegen Karl Vogt)。载于1860年1月24日《总汇报》第24号。——第20、21页。
- ### G
- [戈德曼]《欧洲的内阁和联盟。(五头政治)的作者文集》1862年莱比锡版 ([Goldmann]. Europa's Cabinetts und Allianzen. V. om Verfasser der Pentarchie. Leipzig, 1862)。——第264页。
- [戈德曼]《欧洲五头政治》1839年莱比锡版 ([Goldmann]. Die europäische Pentarchie. Leipzig, 1839)。——第264页。
- 格伦尼, 约·斯·《致〈泰晤士报〉编辑的信》(Glennie, J. 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62年6月18日《泰晤士报》第24275号。——第252页。
- 格罗夫, 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Grove, W. R.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 第4版1862年在伦敦出版。——第415、666页。
- [格里斯海姆, 卡·古·]《只有士兵有助于反对民主派》1848年11月底柏林版 ([Griesheim, K. G.] Gegen Demokraten helfen nur Soldaten. Berlin, Ende November, 1848)。——第204页。
- 格律恩, 卡·《法国最新的文学运动》(Grün, K. Die jüngste Literatur-Bewegung in Frankreich),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90、561页。
- [格律恩, 卡·]《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 法国皇帝宝座上的斯芬克斯》(Grün, K.) Louis Napoleon Bonapart, die Sphinx auf dem französischen Kaiserthron)。——第58、534页。
- 《革命编年史:美国大事记,附文献、故事、插图和诗篇,等等》。编者F·穆尔,第1—11卷,1861—1868年纽约版(The Rebellion record: a diary of american events, with documents, narratives, illustrative incidents, poetry, etc. Edited by F. Moore. Volumes I—XI. New York, 1861—1868)。——第397—398页。
- 《国家社会词典》。编者:海尔曼·瓦盖纳,第1—23卷,1859—1867年柏林版(Staats- und Gesellschafts-Lexikon. Herausgegeben von Herrmann Wagner. Bände I—XXIII. Berlin, 1859—1867)。——第168页。
- ### H
- 哈特曼,摩·《给〈去意大利,好啊!〉一书作者的意大利来信》(Hartmann, M. Ein Brief aus Italien an den Verfasser des „Junchhe nach Italia“),载于《民主研究》文选,1860年汉堡出版。——第110页。
- 海弗纳尔,列·(Häfer, L.)给《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60年1月28日《总汇报》第28号附刊。——第19、32页。
- 赫胥黎,托·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年伦敦—爱丁堡版(Huxley, Th. H. 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 London—Edinburgh, 1863)。——第334、335页。
- 墨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载于《黑格尔全集》第2卷,1841年柏林第2版(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G. W. F. Hegel. Werke, Band II. Zweite Auflage)。——第159、252、410页。
-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载于《黑格尔全集》第3、4、5卷,1841年柏林第2版(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n: G. W. F. Hegel Werke. Bände III, IV, V.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116、159页。
-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缩写本》,载于《黑格尔全集》第6—7卷,1842—1843年柏林第2版(Hegel, G. W. F. 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In: G. W. F. Hegel Werke. Bände VI—VII.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2—1843)。——第116页。
- 洪堡,亚·《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1860年莱比锡版(Humboldt, A. 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 Leipzig, 1860)。——第518、529、586页。
-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Hobbes, Th.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1651年出第1版。——第252页。
- 霍林格尔,菲·(Hollinger, F.) 11月2日的声明,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

报)的诉讼》一书, 1859年12月日内瓦出版。——第435、436、439、456、459页。

J

加思里, 詹·《肯塔基州詹姆士·加思里阁下赞成联邦的演说》(Guthrie, J. Speech of the hon. James Guthrie of Kentucky, in favour of the union), 载于1861年3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210号。——第190页。

捷列林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Tellerling. 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k und Engels. Köln 1850)。——第11、430、481、484页。

金克尔, 哥·《关于促进革命的德国公债的札记》(Kinkel, G. Denkschrift über das deutsche Nationalanlehn zur Förderung der Revolution)。——第501页。

金克尔, 哥·《1859年11月10日在水晶宫席勒纪念会上的祝词》[1859年伦敦版](Kinkel, G. Festrede bei der Schillerfeier im Krystallpalast, 10. November 1959. [London, 1959])。——第136页。

金累克, 亚·威·《入侵克里木: 入侵的开始和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世时的发展》第1—2卷, 1862—1863年爱丁堡和伦敦版(Kinglake, A. W.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Volumes I—II. Edinburgh and London, 1862—1863)。全书共出八卷。——第351、355页。

金累克, 亚·威·(Kinglake, A. W.) 1860

年7月12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0年7月15日《总汇通报》第197号。——第79—81、325页。

金累克, 亚·威·(Kinglake A. W.) 1864年4月1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4年4月16日《泰晤士报》第24848号。——第384页。

K

卡本特尔, 威·本·《一般生理学和比较生理学的原理》1839年伦敦版(Carpenter, W. B. Principles of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physiology. London, 1839)。——第410页。

卡腊季奇, 武·斯·《塞尔维亚民歌集》第1—4卷(Karadzic, B. C. Народне српске pjesme. Knjige I—VI)。1823—1833年在莱比锡和贝奇出第1版。——第345页。

科贝特, 威·《波旁王朝的战争和伦敦的报纸》(Cobbett, W. Bourbon war and the London newspaper press), 载于1823年2月8日《科贝特氏纪事周报》第45卷第6号。——第365页。

科本, 卡·弗·《佛陀的宗教及其起源》第1—2卷1857—1859年柏林版(Koepen, C. F. Die Religion des Buddha und ihre Entstehung. Bände I—II. Berlin, 1857—1859)。——第167页。

科拉切克, 阿·]《欢呼者》(Kolatschek, A.] Die Juchheisten), 载于1860年10月《时代呼声》杂志。——第105、106、109、110、113页。

克劳塞维茨, 卡·《论战争》, 载于全集: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着: 论战

- 争和军事学术》第1—3卷, 1832—1834年柏林版 (Clausewitz, K. Vom Kriege. In: 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K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Bände 1—3. Berlin, 1832—1834)。克劳塞维茨军事著作全书共十卷, 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第233页。
- 科勒特, 查·多·]《巴枯宁》([Collet, Ch. D.] Bakunin), 载于1862年3月5日《自由新闻》报第10卷第3号。——第217页。
- 科勒特, 查·多·]《俄国对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任何要求都是无根据的》([Collet, Ch. D.] Groudlessness of any claim of Russia to Holstein—Gottorp), 载于1864年5月4日《自由新闻》报第12卷第5号。——第414页。
- 克利克尔, 阿·《人体组织研究手册》(Kölliker, A. Handbuch der Gewebelehre des Menschen), 1852年在莱比锡出第1版。——第410页。
- 魁奈, 弗·《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 载于《重农学派》, 附欧·德尔关于重农学派学说的绪论、评注和史料第1部, 1846年巴黎版 (Quesnay, F. 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1766). In: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entaires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46)。——第252、358、363页。
- L
- 拉布累, 爱·]—勒弗夫尔, 勒·《美国的巴黎》, 第7版, 1863年巴黎出版 ([Laboulaye, E.]—Lefebvre, R. Paris en Amérique. Septième édition. Paris, 1863)。——第376页。
- 拉萨尔, 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根据新收集的他的著作片断和古代作者的证言阐述》第1—2卷, 1858年柏林版 (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t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ände 1—2. Berlin, 1858)。——第60、163页。
- 拉萨尔, 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 经济的尤利安, 或者: 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 (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s: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第396页。
- 拉萨尔, 斐·《法院对我的判决和我为上诉而提出的批判性意见》[1863年莱比锡版] (Lassalle, F. Das Criminal—Urtheil wider mich mit kritischen Randnoten zum Zweck der Appellation—srechtfertigung. [Leipzig, 1863]。——第336页。
- 拉萨尔, 斐·《费希特的哲学和德国人民精神的意义》1862年柏林版 (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Fichte's und die Bedeutung des Deutschen Volksgeistes. Berlin, 1862)。——第254、255、622页。
- 拉萨尔, 斐·《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Lassalle, F. Fichte's Politisches Vermächtniß und die neueste Gegen-

- wart),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49、73、90、530、561页。
- 拉萨尔, 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Offenes Antwortsch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 Zürich, 1863)。——第336、339页。
- 拉萨尔, 斐·《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日和19日拉萨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Lassalle, F. Arbeiterlesebuch. Rede Lassalle's zu Frankfurt am Main am 17. und 19. Mai 1863 nach de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1863)。——第357页。
- 拉萨尔, 斐·《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Arbeiterprogramm. Ueber den besonder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s. Zürich, 1863)。——第320、321页。
- 拉萨尔, 斐·《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2年柏林版 (Lassalle, F. Ueber den besonder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Berlin, 1862)。——第290、320、353页。
- 拉萨尔, 斐·(Lassalle, F.) 关于威廉·沃尔夫的演说, 载于1864年5月28日《北极星》报第259号。——第395页。
- 拉萨尔, 斐·《既得权利体系》, 共两册, 1861年莱比锡版 (Lassalle, F. 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In zwei Theilen. Leipzig, 1861)。——第131、154、166—167、172、178、183、194、198、202、206、207、209、217、220、602、605、607、610、617、634页。
- 拉萨尔, 斐·《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在柏林王国上诉法院的辩护词》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Die indirecte Steuer und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Eine Verteidigungsrede vor dem K. Kammergericht zu Berlin, Zürich, 1863)。——第351、352页。
- 拉萨尔, 斐·《科学和工人。在柏林刑事法庭上的辩护词》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Die Wissenschaft und die Arbeiter. Eine Verteidigungsrede vor dem Berliner Criminalgericht. Zürich, 1863)。——第320、321页。
- 拉萨尔, 斐·《拉萨尔的刑事诉讼。第二册。审讯的速记报告》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Der Lassallesche Criminalprozeß. Zweites Heft. Die mündliche Verhandlung nach de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 Zürich, 1863) ——第336页。
- 拉萨尔, 斐·《论宪法的实质》1862年柏林版 (Lassalle, F. Ueber Verfassungswesen. Berlin, 1862)。——第254、255、307、622页。
- 拉萨尔, 斐·《庆祝会、报刊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社会精神的三个征候》[1863

- 年] 杜塞尔多夫版 (Lassalle, F. Die Feste, Die Presse und der Frankfurter Abgeordnetentag. Drei Symptome des öffentlichen Geistes. Düsseldorf, [1863]).——第370页。
- 拉萨尔, 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1859年柏林版 (Lassalle, F.) 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 Berlin, 1859)。——第261、444、445页。
- 拉萨尔, 斐·《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1862年柏林版 (Lassalle, F. Herr Julian Schmidt der Literarhistoriker. Berlin, 1862)。——第250、252、260、262、622页。
- 拉萨尔, 斐·《现在怎么办?再论宪法的实质的讲话》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Was nun? Zweiter Vortrag über Verfassungswesen. Zürich, 1863)。——第307页。
- 赖尔, 查·《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1863年伦敦版 (Lyell, Ch. The 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 London, 1863)。——第334、345页。
- 劳, 卡·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卷, 《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 第6版 (增订版), 1860年于莱比锡和海得尔堡出版 (Rau, K. H.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and I: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Sechs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sgabe.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60)。——第162页。
- 勒南, 厄·《耶稣传》(Renan, E. Vie de Jésus) 1863年于巴黎出第1版。——第381页。
- 累普济乌斯, 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文献》第1—12卷, 1849—1859年柏林版 (Lepsius, R. Denkmäler aus Agypten und Aethiopien. Bände I—XII. Berlin, 1849—1859)。——第166页。
- 里普利, 罗·萨·《同墨西哥交战》, 两卷集, 1849年纽约版 (Ripley, R. S. The War with Mexico. In two volumes. New York, 1849)。——第178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声明》(Liebknecht, W.) Erklärung, 载于1859年11月23日《总汇报》第327号附刊。——第450页。
- 罗斯利埃斯 (Roselius) 1861年3月21日在路易西安纳州代表大会的发言, 载于1861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217号。——第190页。
- 罗雪尔, 威·《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 《国民经济学原理》, 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 (Roscher, W.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Band I: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Drit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flage.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8)。1854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第1版。——第307、600、624、634页。
- 洛贝尔图斯, 冯·贝尔格和布赫尔, 洛·《声明》(Rodbertus, v. berg und Bucher, L. Erklärung), 载于1861年1月13日《总汇报》第13号附刊; 1861年1月20、22和23日《观察家报》第17、18和19号。——第146、149页。
- 洛贝尔图斯, 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

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新的地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 J. 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第599、624页。

洛德, 珀·巴·《通俗生理学》(Lord, P. B. Popular physiology) 1834年于伦敦出第1版。——第410页。

洛 [美尔], 格·《在幕后。近代历史政治情况》第1部 (1847年10月至1848年5月), 1859年日内瓦和纽约版 (L [ommel], G. Hinter den Coullissen. Historisch-politische Bilder aus der Neuzeit. Erster Theil. Vom Oktober 1847bis Mai 1848. Gend und Newyork, 1859)。——第49、51、108、125、203、519、523页。

[吕宁, 奥·] ([Lüning O.] 评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4期 (N^o N^o 1—4《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载于1850年6月22、23、25、26日《新德意志报》第148、149、150、151号。——第23—24页。

吕斯托夫, 威·《米兰旅》(Rüstow, W. Die Brigade Milano),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1年汉堡出版。——第264页。

M

马志尼《意大利和德国》, 马志尼给卡·布林德的一封信 (Mazzini. Itlien und Deutschland. Ein Brief von Mazzini an

K. Blind), 载于1861年2月23日《海耳曼》报。——第158页。

迈尔, 米·《真正的发明, 或德国首先作出的贡献, 不是象某个诽谤者以怀疑的态度诋毁的那样, 是靠了酒, 而是靠了精神和身体的力量, 并由它传播于世界各地》1619年法兰克福版 (Mierus, M. Verum inventum, hoc est Munera Germaniae, ab ipsa primitus reperta (non ex vino, ut calumniator quidam sceptice invehit, sed vi animi et corporis) et reliquo Orbi communicata. Francofurti, 1619)。——第366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给巴枯宁先生的最后答复》1863年巴黎版 (Mieroslawski, L. La dernière réponse M. Baccounine. Paris, 1863)。——第324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 (Mieroslawski, L. De La nationalité polonaise dans l'équilibre européen. Paris, 1856)。——第336页。

梅特勒, 约·亨·《宇宙的奇妙结构, 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 (Mädler J. H. Der Wunderbau des Weltalls, oder Populäre Astro-nomie. Fünfte, gänzlich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Berlin, 1861)。1841年在柏林出第1版。——第230页。

梅因, 爱·]《柏林来信》([Meyen, E.] Berliner Briefe), 载于1861年4月23、30日和5月5日《自由射手》第49、52和55号以及以后几号。——第599、622页。

梅因, 爱·《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

- 揭露) (Meyen, E. Die neue Denunciation Karl Vogt's durch K. Marx), 载于1860年12月27、29日《自由射手》第155、156号和1861年1月1日《自由射手》第1号。——第138、139、141、572页。
- 《美国新百科全书. 通俗百科辞典》, 出版者乔治·里普利和查理·安·德纳, 共十六卷, 1858—1863年纽约版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general knowledge. Edited by George Ripley and Charles A. Dana. In 16 volumes. New - York, 1858—1863)。——第94、465、580、587页。
- 蒙台居, 罗· (Montagu, R.) 1861年6月18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61年6月19日《泰晤士报》第23963号。——第179页。
- 米凯尔, 约· (Miquel, J.) 1860年9月5日在科堡民族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1860年9月12日《总汇报》第256号。——第564页。
- 《民主研究》, 在路·班贝尔格尔、卡尔·格律恩、摩里茨·哈特曼、弗里德里希·卡普、斐·拉萨尔、米希勒、亨·伯·奥本海姆、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阿道夫·施塔尔和卡尔·福格特等人参加下由路德维希·瓦勒斯罗德出版, 1860年汉堡版 (Demokratische Studien. Unter Mitwirkung von L. Bamberger, Karl Grün, Moritz Hartmann, Friedrich Kapp, F. Lassalle, Michele, H. B. Oppenheim, Ludwig Simon aus Trier, Adolf Stahr, Carl Vogt u. A.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Walesrode. Hamburg, 1860)。——第49、73、90、100、110、561页。
- 《民主研究》, 在路·班贝尔格尔、摩里茨·哈特曼、弗里德里希·卡普、斐·拉萨尔、亨·伯·奥本海姆、阿尔诺德·卢格、威·吕斯托夫、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等人的参加下由路德维希·瓦勒斯罗德出版, 1861年汉堡版 (Demokratische Studien. Unter Mitwirkung von L. Bamberger, Moritz Hartmann, Friedrich Kapp, F. Lassalle, H. B. Oppenheim, Arnold Ruge, W. Rüstow, Ludwig Simon aus Trier u. A.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Walesrode. Hamburg, 1861)。——第264页。

N

- 奈斯密斯, 詹· (Nasmyth, J.) 给工厂视察员霍纳的信 (1852年), 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截止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报告》1857年伦敦版。——第282页。
- 尼布尔, 巴·格·《罗马史》 (Niebuhr, B. G. Römische Geschichte). 1811—1832年出第1版, 共三卷。——第618页。
- 诺曼比, 康·亨· (Normanby, C. H.) 1860年1月27日在上院的发言, 载于1860年1月28日《泰晤士报》第23528号。——第13页。

P

- 帕麦斯顿, 约· (Palmerston, J.) 1831年8月8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31年8月9日《泰晤士报》第14612号。——第332页。
- 帕麦斯顿, 约· (Palmerston, J.) 1860年

7月23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60年7月24日《泰晤士报》第23680号。——第78页。

帕麦斯顿, 约·(Palmerston, J.) 1861年4月26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61年4月27日《泰晤士报》第23918号。——第599页。

帕麦斯顿, 约·(Palmerston, J.) 1863年3月23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第24514号。——第332页。

帕特库尔, 约·莱·《莫斯科沙皇内阁驻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治下公使给内阁的报告》第1—3册, 1792—1797年柏林版 (Patkul, J. R. Berichte an das Zaarische Cabinet in Moscau, von seinem Gesandtschafts-Posten bei August II. Könige von Polen. Theile I—III. Berlin, 1792—1797)。——第341、407页。

Q

乔治·桑 (George Sand) 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信,载于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第64号。——第492页。

S

《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 列奥波特·兰克编辑, 第1—3卷, 1837—1840年柏林版 (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m Sächsischen Hause. Herausgegeben von Leopold Ranke. Bände I—III. Berlin, 1837—1840)。——第423页。

瑟美列, 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1860年伦敦版 (Szemere, B.

Hungary, from 1848 to 1860. London, 1860)。——第429、432页。

瑟美列, 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1860年巴黎版 (Szemere, B. La Question hongroise (1848—1860). Paris, 1860)。——第53、127、510、511、516、550页。

沙伊伯勒, 卡·《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致(每日电讯)编辑》(Schaible, Ch. The Vogt pamphlet. To the Editor of《The Daily Telegraph》), 载于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第4344、445—446、447、458、459、463、485、487、509页。

施拉姆, 鲁·《一八四八年的红旗和一八六三年的黑白旗》1863年柏林版 (Schramm, R. Die rote. Fahne von 1848 und Die schwarzweiße Fahne von 1863. Berlin, 1863)。——第373页。

施莱登, 马·雅·《关于植物起源的资料》(Schleiden, M. J. Beiträge zur Phyto-genesis), 载于《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学术文库》年鉴 (Archiv für Anatomie, Physiologie und wissen — tschaftliche Medicin, in Verbin — dung mit mehreren Gelehrten), 1838年柏林出版。——第410页。

施梅林, 菲·沙·《关于在列日地区山洞中发现的骨化石的科学研究著作》第1—2卷, 1833—1834年列日版 (Schmerling, Ph. Ch. Recherches sur les osse — ments fossiles découverts dans les cavernes de la province de Liège. Volumes I—II. Liège, 1833—1834)。——第345页。

施普尔茨海姆, 约·克·《整个神经系统, 特别是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

第1—4卷, 1810—1820年巴黎版 (Spurzheim, J. Ch. Anatom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 en général et du cerveau en particulier. Volumes I—IV. Paris, 1810—1820)。——第410页。

施旺, 泰·《用显微镜考察动植物的构造和生长的协调一致》1847年伦敦版, 亨利·斯密斯译自德文 (Schwann, Th. Microscopical researches into the accordance in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animals and plante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enry Smith. London, 1847)。——第410页。

《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 附欧·德尔编写的作者史略、评注和注解, 1843年巴黎版 (Economistes-financiers du XV^{III}°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M.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第159页。

斯宾诺莎, 巴·]《神学政治论文, 文章的几个论点认为, 允许哲学研究的自由, 不仅无害于宗教信仰和国家安宁, 而且取消这种自由会使国家安宁和宗教信仰本身一道被取消》(Spinoza, B.]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ontinens deffertationes aliquot, quibus ostenditur literatam philosophandi non tantum falva pietate, et reipublicae pace posse concedi: sed eandem nisi cum pace reipublicae, ipsaque pietate tolli non posse)。1670年出第1版。——第662页。

斯宾斯, 詹·]《致〈泰晤士报〉编辑》(S [pence, J.]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62年5月29日《泰晤士报》第24258号。——第246页。

斯宾斯, 詹·]《致〈泰晤士报〉编辑》(S [pence, J.]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62年6月4日《泰晤士报》第24263号。——第248页。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两卷集, 1776年伦敦版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wo volumes. London, 1776)。——第226页。

T

泰霍夫, 古·阿· (Techow, G. A.] 1850年8月26日给希梅尔普芬尼希的信, 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日内瓦出版。——第23、54、101、446、453、499—503、554、673页。

[图迪希乌姆]《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Tudichum].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63年12月4日《泰晤士报》第24733号, 文章署名: “一个讲究实际的德国人”。——第374页。

W

瓦德西, 弗·古·《步兵及其指挥人员在野战勤务情况下的实战训练方法》1860年柏林版 (W aldersee, F. G. Die Methode zur kriegsgemäßen Ausbildung der Infanterie und ihrer Führer im Felddienste. Berlin, 1860)。——第99页。

- 瓦盖纳, 海·(W agener, H.) 1863年11月19日在众议院的发言, 载于1863年11月22日《总汇报》第326号。——第370页。
- 瓦勒斯罗德, 路·《论爱国思潮的痛苦》(W alesrode, L. Ueber vaterländische Gesinnungs— Leiden),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90页。
- [瓦勒斯罗德, 路·]《死人的政治检阅》1859年基尔版 (W alesrode, L.] Eine politische T odtschau. Kiel, 1859)。——第575页。
- 万哈根·冯·恩赛, 卡·奥·《日记》(V arnhagen von Ense, K. A. Tage— bücher) 1861—1870年出版, 共十四卷。——第205、619页。
- 维科, 卓·《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V ico, G. Principj di scienza nuova d' intorno alla comune natura delle nazioni), 1725年于那不勒斯出第1版。——第230、617、618页。
- 维科, 卓·《新科学。论天主教教条的形成一书的作者译》, 1844年巴黎版 (V ico, G. La Science nouvelle. Traduite par l' auteur de l'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u dogme catholique. Paris, 1844)。——第618页。
- 维利希, 奥·《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W illich, A. 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 载于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和34号。——第490、501—503页。
- 维斯, 克·《当代的基本趋向》(wiß, C. Die elementaren Richtungen der Zeit), 载于1854年3月18和25日, 4月1、8、15、22和29日, 5月6、13、20和27日, 6月10日《工人共和国报》第12、13、14、15、16、17、18、19、20、21、22和24号。——第491页。
- 维耶, 约·弗·(W iehe, J. F.) 1859年11月2日证实霍林格声明的声明, 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 1859年12月日内瓦版。——第24、30、456、457、459、487、509、561页。
- 维耶, 约·弗·(W iehe, J. F.) 1860年2月8日的宣誓证词 (A ffidavit), 载于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 1860年伦敦版。——第24、30、35—37、39、44、435—437、447、458、459、485—487页。
- 魏德迈, 约·、克罗斯, 阿·、雅科比, 阿·《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W eyde— meyer, J., Cluß, A., Jacobi, A. A n die Redaction der New— Yorker Criminal— Zeitung), 载于1853年11月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7号。——第490、503页。
- 沃邦, 塞·《王国什一税草案》(Vauban, S. Projet d' une dixme royale), 1707年出第1版。——第352页。
- 沃尔弗, 弗·奥·《荷马绪论, 或论荷马著作的最初的真本的形式, 兼论各种修订本和更正的可能根据》第1卷, 1795年萨克森的哈雷版 (W olff, F. A. Prolegomena ad Homerum sive de operum homerorum prisca et genuina forma variisque mutationibus et probabili ratione emendandi. Volumen I. Halis saxonum, 1795)。——第618页。
- 沃尔弗, 威·《声明》(W olff, W.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2月11日《改革报》第18号, 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

- 第44号附刊, 1860年2月24日《人民报》第47号。——第26、445页。
- 沃尔弗, 威·(W olff, W .) 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发言, 载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制宪国民会的会议速记记录》第9卷第229期, 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05页。
- 乌尔卡尔特, 戴·《乌尔卡尔特先生论入侵英国》(Urquhart, D. Mr. Urquhart on the invasion of England), 载于1860年7月4日《自由新闻》第8卷第7号。——第80页。
- 乌洛阿《1848—1849年意大利独立战争》第1—2卷, 1859年巴黎版(Ulloa, Guerre de l' indépendance italienne en 1848 et en 1849. Tomes I—II. Paris, 1859)。——第79页。

X

- 希尔施, 威·《间谍活动的受害者》(Hirsch, W . Die Opfer der M oucharderie), 载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4、5和6号。——第472页。
- 西蒙, 爱·《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Simon, E. Le procès de M . Vogt avec la Gazette d' A ugsbourg), 载于1860年2月15日《现代评论》第13卷第2集。——第122页。

- 西蒙, 路·《德意志和它的两个大国》(Simon, L. Deutschland und seine beiden Großmächte),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06年汉堡出版。——第110、561页。
- 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 1844年布鲁塞尔版(Chavée. Essai d' étymologie philosophique. Bruxelles, 1844)。——第406页。
- 谢努, 阿·《密谋家。秘密组织; 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 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Chenu, A. Les Conspir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 francs. Paris, 1850)。——第17页。
-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De bello Peloponnesiaco)。——第602页。

Y

- 尤尔, 安·《工厂哲学: 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Ure, A.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第226页。
- 雨果, 维·《小拿破仑》1852年伦敦版(Hugo, V. Napoléon le Petit. Londres, 1852)。——第386、417、648页。

文 件

《调查联合王国国防工事的特派员的报告; 附证词记录和附录》, 1860年伦敦版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defences of the Unit-

- ed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London, 1860)。——第80页。
-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1855—1859年。——第7页。
- 《关于计划由法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文件以及关于瑞士和中立地区萨瓦之间关系的备忘录》共三卷, 1860年伦敦版(Papers relating to proposed annexation of Savoy and Nice to France and memorial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Savoy as a neutral. 3 parts. London, 1860)。——第50页。
- 《关于一八六一年一年内(到12月31日止)贸易和通航的报告》(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1861), 载于1862年3月1日《经济学家》杂志第20卷第966期附刊。——第220、223页。
- 《科伦陪审法庭的一个共产党人大案件的审理记录》(Die Verhandlungen des großen Kommunistenprozess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 载于1852年10—11月《福斯报》。——第534页。
- 《民法典, 或拿破仑法典》(Code civil), 1804年通过。——第351页。
- 《墨西哥问题信件汇编》共三册, 1862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Mexico. 3 parts. London, 1862)。——第224页。
- 《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控告他们参与叛国性的密谋》(Assisen-Procu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 Complottes), 载于1852年10—11月《科伦日报》。——第534页。
-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一号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London, 1863)。——第366页。
- 《一八五四年防止贿选法施行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词、附件和索引》1860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 1854.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London, 1860)。——第484页。
- 《印度军队组织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59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indian army. London, 1859)。——第233页。
-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载于1851年6月22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和1851年6月24日《科伦日报》第150号。——第26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A

《爱丁堡评论, 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 伦敦和爱丁堡出版, 1863年4月第240期。
《赫胥黎教授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Professor Huxley on mans' place in nature)。——第335页。

B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rform》), 汉堡出版
—1863年4月10日第83号。——第339页。
—1863年10月1日第229号。9月28日佐林根通讯。——第680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柏林出版, 1852年10—11月。
《科伦陪审法庭的一个共产党人大案件的审理记录》(Die Verhandlungen des großen Kommunistenprozess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第534页。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 伦敦出版
—1862年5月5日。——第234页。
—1863年1月28日。——第321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 伦敦出版, 1864年5月30日第28222号。5月30日伦敦通讯。——第394页。

D

《德国博物馆。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杂志》(《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otur, Kunst und öffentliches Leben》), 莱比锡出版, 1860年12月27日第52号。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25页。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äftszweige》), 莱比锡出版, 1860年12月5日第150号第2553页; 1860年12月7日第151号第2569页; 1860年12月12日第153号第2607页。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24页。

F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G

《改革报》(《Die Reform》), 汉堡出版
—1860年12月10日第148号。——第133页。
—1860年12月15日第150号附刊。

- 第133、141页。
- 1860年12月19日第152号。——第133页。
- 1860年12月19日第152号附刊。
- 第133、141页。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 柏林出版
- 1860年1月22日第37号。《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Karl Vogt und die Allgemeine Zeitung)。——第8、29、31、38、40、115、438、440、443、450、457、464、466、467、469、470、472、489、493、497—499、503、567页。
- 1860年1月25日第41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Wie man radikale Flugblätter macht)。——第1723、27、29、31、38、40、115、438、439、442、443、447、450、454、457、463、464、469、470、472、489、493、497—499、567页。
- 《国外消息. 政治和文学杂志》(《Grenzböt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 莱比锡出版, 1864年上半年第2卷。《回忆共产主义者沃尔弗》(Eine Erinnerung an den Communisten Wolff)。——第407页。
- H
- 《海尔曼》(《Hermann》), 1860年12月1日在伦敦出版。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14页。
- J
-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伦敦出版, 1862年5月24日第20卷第978期。《联邦派胜利的性质和原因》(Extent and bearing of federal successes)。——第245页。
-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 达姆斯塔德出版, 1859年11月26日第95—96号。对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一书的评论。——第6、557页。
- K
-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 1852年10月24日。——第538、540页。
- 1852年10—11月。《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控告他们参与叛国性的密谋》。——第534页。
- 1859年第349号附刊。——第5页。
- 1860年12月8日第341号。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40页。
- 1864年9月1日关于拉萨尔逝世的通告。——第420页。
- L
-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杜塞尔多夫出版。1864年5月30日《封建的社会主义》(Feudaler Sozialismus)。——第395页。
- M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860年11月12日。——第111页。
- 《民族联盟周报》(《Wochenschrift des Nationalvereins》), 科堡出版, 1860年12月28日第35号, 12月21日海得尔堡通

讯。——第140页。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9年12月30日第5830号第4版。——第7页。

—1860年1月11日第5839号第7版，《商业问题》栏，莱特公司关于棉花情况的报道。——第9页。

—1861年10月11日第6403号第4版。——第199页。

—1861年10月21日第6411号第4版。——第201页。

P

《普鲁士司法报》（《Preußische Gerichts-Zeitung》），柏林出版，1861年5月1日第26号。《关于1861年1月12日大赦令的解释》（Zur Auslegung des Amnestie-Erlasses von 12. Januar 1861）。——第165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伦敦出版，1862年5月5日。——第235页。

R

《人民报》（《Das Volk》），伦敦出版，1859年6月11日第6号。——第464页。

《日内瓦国境通报》（《Genfer Grenzpost》）1860年12月22日第12号，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32、141页。

S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

Petersbourg》）1864年12月26、27和28日（1月7、8和9日）第293号。《记录》（Protocole）。——第381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

—1860年1月26日第23526号第9版，1月13日阿兹密尔河兵营通讯。——第8页。

—1860年2月3日第23533号第9版，1月30日维也纳通讯。——第24、26页。

—1860年10月1日第23739号第6版。——第102页。

—1861年9月27日第24049号第8版，9月23日维也纳通讯。——第196页。

—1862年5月27日第24256号第11版。——第245页。

—1863年2月19日第24486号第9版，2月18日柏林通讯。——第330页。

—1864年5月25日第24881号第8版。——第392页。

—1864年5月26日第24882号第8版。——第392页。

—1864年6月7日第24892号第10—11版。——第402页。

X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1862年5月5日。——第235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1848年8月3日第64号，登在“法兰西共和国”栏的7月31

- 日巴黎通讯。——第492页。
- 《星期日邮报》(《Courrier du Dimanche》), 巴黎出版, 1860年11月18日, 1860年11月14日维也纳通讯。——第569页。
- 《喧声》(《Kladderadatsch》), 柏林出版, 1861年6月30日第29期和30期, 《德国的人物。咬文嚼字者的玩具》(Der deutsche Mann. Ein Spielzeug für Wortklauber)。——第193页。
- Y
-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 伦敦出版
- 1860年11月24日第1726号。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14页。
- 1864年4月9日第1902号。——第384页。
- Z
- 《政论家》(《Publicist》), 柏林出版, 1860年12月15日和16日第295号和296号附刊。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41页。
-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 汉堡出版, 1860年12月15日第150号, 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41页。
-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 伦敦出版
- 1861年4月3日第9卷第4号。——第165页。
- 1863年2月4日第11卷第2号。《美国骚动的起因和目的》(Origin and objects of the treason in the United States)。——第321页。
- 1863年7月1日第11卷第7号。《对波兰的干涉》(The Intervention in Poland)。——第357页。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奥格斯堡出版
- 1859年12月11日第345号附刊。编辑部对布林德的《声明》的按语。——第457页。
- 1860年2月2日第33号。日内瓦通讯。——第26页。
- 1860年6月8日第160号。6月5日伯尔尼通讯。——第64页。
- 1861年1月1日第1号。12月30日斯特拉斯堡通讯。——第140页。
- 1861年1月1日第1号附刊。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44页。
- 1861年4月19日第109号。4月17日巴黎通讯。——第171、605、615页。

文学著作

- B
- 《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 (老鼠与青蛙之战)》。——第192页。
- F
- 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

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122页。
 弗莱里格拉特《不管这一切》。——第488、634页。
 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
 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第123、134、135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第441、483页。
 弗莱塔格《新闻界人士》。——第169、585页。

G

歌德《浮士德》。——第281、625页。
 歌德《完整无缺》。——第380页。
 歌德《致祖莱卡》。——第651页。
 格林兄弟《勇敢的小裁缝》。——第180页。

H

海涅《安心》。——第615页。
 海涅《掉包的怪孩子》。——第331页。
 贺雷西《诗论》。——第230页。
 贺雷西《颂歌》。——第321、493页。

J

济贝耳《宗教和爱情》。——第48页。
 金克尔，约翰娜《汉斯·伊贝勒斯在伦敦》。——第156—157页。

L

《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第365页。
 琉善《谐趣歌》。——第242页。

P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35、237页。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451页。

S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160页。
 莎士比亚《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第385页。

T

塔索《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第185页。
 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贺雷西的韵律》。——第21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68、320、348、597页。

X

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第590、645、651页。
 西塞罗《关于利加里的演说》。——第160页。
 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363页。
 席勒《人质之歌》。——第415页。
 席勒《威廉·退尔》。——第590页。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202页。
 * * *
 圣经。——第166、262、662页。

期 刊 索 引

A

- 《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 1834年至1904年在爱北斐特出版;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第631页。
- 《爱丁堡评论, 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
——英国自由派的文学政治刊物, 1802年至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第335页。
- 《奥古斯塔纪事和哨兵报》(《The Augusta Chronicle and Sentinel》)
——美国的一家日报, 从1785年至1877年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州)用这个名称出版; 是民主党的机关报。——第189页。

B

- 《巴门日报》(《Barmer Zeitung》)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 1834年起在巴门出版。——第631页。
- 《旁观者》(《The Spectator》)
——英国自由派周刊, 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82页。
- 《北不列颠每日邮报》(《North British Daily Mail》)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 1847年在格拉斯哥创刊, 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37页。

-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
——德国自由派的报纸, 1848—1872年在汉诺威出版。——第125、236、571页。
- 《北极星》(《Nordstern》)
——德国的一家周报; 1860—1866年在汉堡出版; 从1863年起为拉萨尔派报纸。——第159、364页。
- 《北亚拉巴马人报》(《The North Alabamian》)
——美国的一家周刊, 1831年至1907年在塔斯甘比亚(亚拉巴马州)用这个名称出版。——第189页。
- 《波罗的海月刊》(《Baltische Monats-schrift》)
——在里加出版。——第53页。
-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
——一家日报,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 1861年至1868年在柏林出版。——第198、339页。
- 《柏林评论. 社会和政治周刊》(《Berliner Revue. Social — politische Wochenschrift》)
——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杂志, 从1855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155页。
-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德国日报, 从1785年起在柏林出版, 该报也用它的所有人之名,

以《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著称。——第518、534页。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获拉夫)创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持保守倾向。——第125、164、395、661、683页。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至1934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36、450、482、486页。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32、234、235、321、573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394、664页。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1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第277、504、505页。

《德国博物馆。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杂志》(《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öffentliches Leben》)——德国民主派的周刊,1851年至1867年在莱比锡出版。——第125页。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äftszweige》)——德国书商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34年至1926年在莱比锡出版。——第124、141、341页。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一家日报,后改为周报,1847年至1907年在新奥尔良出版;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第47、157页。

《德意志历史月刊》(《Historische Deutsche Monatschrift》)——德国的一家杂志,在不伦瑞克出版。——第125页。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1845年4月至1851年2月该报在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物质支持下出版。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1849—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此外,它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3月)、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1850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1851年2月)以及许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497页。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从1843年至1879年在莱比锡出版。——第125页。

《地球报》(《Globe》)——见《地球和旅行家》。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日报,1803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在该党

- 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 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159页。
-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奥地利的一家温和自由派的日报, 1848年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25页。
- ### F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从十七世纪起到190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0、125、434页。
-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 ### G
- 《改革报》(《Die Reform》)——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 1848—1892年在汉堡出版。——第30、54、72、114、125、132、133、141、434、510页。
- 《格里芬联邦报》(《The Griffin Union》)——见《美利坚联邦报》。
-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杂志。在1月6日和13日出版两期周刊, 而5月和6月作为“不定期刊物”继续出版两期。——第441页。
-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1850—1855年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 该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第491页。
- 《官报》(《Gazette》)——见《伦敦官报》。
-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 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482页。
-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 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02页。
- 《观察家报。士瓦本人民报》(《Der Beobachter. 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德国的一家日报, 从183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159页。
-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 《国境通报》(《Grenzpost》)——见《日内瓦国境通报》。
-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 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523页。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48—1915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第8、17、21、23、27、29—33、38、40、41、48、72、74、75、82、92、101、114、115、125、167、430、431、434、438—443、447、448、450、454、457、459、463—467、469—474、476、478、480、487、489、493、495、497—499、501—503、511、515、518、520、538、548、559、560页。
- 《国外消息。政治和文学杂志》(《Grenzbot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自由派的周刊, 1841年至1922年在莱比锡出版。——第407页。
- ### H
-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

——一家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9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1859年1月至7月该报编辑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第18、33、34、42、46、114、125、149、159、176、181、182、430、455、479、534、53B、615页。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92年在汉堡创刊。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它反映了拥护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125页。

《汉诺威日报》（《Hannoversche Zeitung》）——一家日报，汉诺威政府的机关报，1832年创刊。——第26页。

《画报》（《Illustrierte Zeitung》）——德国的一家周报，1843—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十九世纪中叶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第125页。

J

《杰克逊密西西比人报》（《The Jackson Mississippi》）——美国的一家报纸，1832年至1865年在杰克逊（密西西比州）出版。——第189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70、245页。

《军事报》（《Militärische Blätter》）——德国的一家周刊，186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第11页。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一家专谈军事问题的德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

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第6、31、92、104、275、557、558、565页。

K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巴登政府的机关报，1757年起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第25、125页。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激进派的周报，1802年至1835年用不同名称在伦敦出版。——第213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采取敌对态度；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1831年起该报出版者为杜蒙。——第5、30、39、41、47、69、125、140、147、420、434、456、458、467、534、538、540、571、661页。

《科伦通报和莱茵商业报》（《Kölnischer Anzeiger und Rheinische Handel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用这个名称出版。——第571页。

《科尼斯堡哈通报》（《Königsberger Hartung'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50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尼斯堡出版；1752年创刊，用《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平日报》（《Königlich-Preussische Staats-kriegs- und Friedens-Zeitung》）的名称出版到1850年。——第125页。

L

-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63年至186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867年至1874年在科伦出版。——第395页。
-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504、505页。
-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1860—1862年在曼彻斯特出版。1860年8月至1862年3月恩格斯曾为该刊撰稿。——第104、155、157、565页。
- 《雷诺新闻》（《Reynolds' s Newspaper》）——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的一家英国工人周刊，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619页。
- 《里昂进步报》（《Le Progrès de Lyon》）——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60年起在里昂出版。——第236页。
- 《里士满观察家报》（《Richmond Examiner》）——美国的一家报纸，1848年至1866年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出版。——第424页。
- 《里士满消息报》（《Richmond Enquirer》）——美国的一家报纸，1804年至1877年用不同名称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出版。——第365页。
- 《联邦报》（《Der Bund》）——瑞士的一家日报，自由思想的民主党机关报，从1850年起在伯尔尼出版。——第64、

125、236页。

-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1853年至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年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第143、231、450页。
-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英国政府的机关报；1666年起用这个名称每周出版两次。——第399页。
- 《伦敦石印通讯》（《Londoner Litographierte Korrespondenz》）——施累津格尔在伦敦出版的新闻通报。——第124页。
-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的一家画报，1842年起在伦敦出版；曾用其他文字出版。——第125页。
-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罗斯托克报》（《Rostock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711年创刊；1847年至1927年用不同名称在罗斯托克出版。——第125页。

M

- 《马尔克区人民报》（《Märkische 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在哈根出版。——第631页。
-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该报是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第232页。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37、107、111、125、150、197、204、325、379页。
- 《曼海姆报》（《Mannheim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于1790年创刊；1837年至1887年用这个名称在曼海姆出版。——第125页。
- 《梅肯报和通报》（《The Macon Journal and Messenger》）——美国的一家日报，在梅肯（乔治亚州）出版。——第188页。
-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28、29、31、32、38、43、62、438、447、450、453、458、459、469、472—474、476、478、485—487、489、493、496、497、509、511、530、538页。
- 《美利坚联邦报》（《The American Union》）——美国的一家周报，在乔治亚州（1848年至1867年在格里芬，1867年至1873年在梅肯）出版。——第188页。
-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53年3月18日至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1853年该报刊登了诽谤马克思以及与他有关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文章。——第125、472、501、503页。
- 《美因兹报》（《Mainz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1802年起在美因兹出版；1848年该报编辑是班贝尔格尔。——第110页。
- 《民论报》（《L'Opinion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59年至1874年在巴黎出版。——第102页。
- 《民族.政治日报》（《La Nazione. Giornale politico quotidiano》）——1859年起在佛罗伦茨出版。——第152、157页。
- 《民族联盟周报》（《Wochenschrift des Nationalvereins》）——德国的一家周刊，民族同盟的机关报；1860年至1865年用这个名称在科堡出版。——第125、140、155页。
- 《谋比耳记事报》（《Mobile Advertiser and Register》）——美国的一家报纸，1861年至1863年用这个名称在谋比耳（亚拉巴马州）出版。——第189页。

N

- 《南德报》（《Süddeut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1859年至1862年用这个名称在慕尼黑出版。——第125页。
- 《您好!》（《How do you do?》）——德国的一家幽默周刊，由路易·德鲁克尔在伦敦出版，贝塔（贝特齐希）负责编辑。——第143页。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

- 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7、8、32、46、62、70、78、82、94、107、113、128、146、147、154、155、159、179、194、196、198、199、201—203、211、218、219、223、226、229、232、237、265、274、306、432、465、467、483、488、492、498、501、507、510、512、515、526、568、577、580、587、616、636页。
-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51年创刊。——第512页。
- 《纽约晚报》（《New-Yorker Abendzeitung》）——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出版。——第125页。
-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219页。
-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日报，1834年开始出版；后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47、125页。
- P
- 《批评。英国和外国文学和艺术杂志》（《Critic. Journal of British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英国杂志，1844年至1863年在伦敦出版。——第125页。
- 《评论》（《Revue》）——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 《普鲁士报》（《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在柏林出版的报纸。——第168、585页。
- 《普鲁士司法报》（《Preußische Gerichts-Zeitung》）——自由派的日报，1859年至1866年在柏林出版；从1861年第44号起用《德国司法报》（《Deutsche Gerichts-Zeitung》）名称出版。该报主编是希尔泽门策尔。——第145、165页。
-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51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168页。
- 《普鲁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德国保守派的周刊，1851—1861年在柏林出版。——第155页。
- Q
-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于伦敦创刊。——第146、149—150、235页。
- R
-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一家周报，1852—1858年在伦敦由厄·琼斯出版，革命宪章派的机关报；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第482、507、549页。
-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其他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

- 的编辑。——第13、35、37、177、437、443、455、460、462、464、465、496、510、572页。
-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11、30、32、41、92、125、147、159、431、444、445、515、548、570、571页。
- 《人民呼声》（《Stimme des Volkes》）——一家工人日报，1860年在芝加哥（美国）用德文出版，该报编辑为约·魏德迈。——第85、518、520、522页。
- 《日报》（《Dagbladet》）——丹麦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从1851年起在哥本哈根出版。——第386、395、400、406、409、416页。
- 《日内瓦国境通报。政治、科学和艺术问题周报》（《Genfer Grenzpost. Eine-Wöchenschrift für 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Kunst》）——一家德文周刊，1860—1861年在日内瓦出版；主编是布拉斯。——第132、138、141、153页。
-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资产阶级的日报，在瑞士的俾尔城（伯尔尼州）出版。1853年至1909年以此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它持波拿巴主义观点；该报编辑部和福格特有密切联系。——第23、462页。
- S
- 《商业信使报》（《Handels-Courier》）——见《瑞士商业信使报》。
-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年至1914年以这个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381页。
- 《斯特拉斯堡记者》（《Straßburger Korrespondent》）——一家德文报纸，1860年起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第51、53、140页。
- 《时报》（《Le Temps》）——法国保守派的日报，大资产阶级的刊物；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第236页。
- 《时代呼声》（《Stimmen der Zeit》）——德国的一家月刊，后为小资产阶级的周刊，1858年至1862年由科拉切克在哥达出版，后来在魏玛、莱比锡和海德尔堡出版（同时出版），又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出版（同时出版）。——第105、106、109、110、196、200页。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士瓦本信使报》（《Schwäbischer Merkur》）——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85年至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125页。
-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236页。
- 《书报业行市报》（《Buchhändlerbörsenblatt》）——见《德国书报业行市报》。
-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在伦敦创刊。——第8、13、26、102、104、125、144、145、149、196、209、237、244、246、252、306、321、330、332、333、365、374、379、392、399、402、528、539、663页。
-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1815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第125页。

《图斯涅尔达。条顿社会琐闻讽刺幽默小报》（《T husnelda. Teutonisch—satyrisch — humoristisches Klatschblatt》）——一家讽刺杂志，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1861年在伦敦出版。——第195页。

W

《外国》（《Das Ausland》）——德国的一家地理学、民族学和博物学问题杂志，起初是日刊，从1853年起改为周刊，从1828年至1893年出版，起初在奥格斯堡，1873年迁往斯图加特。——第125页。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美国的一家日报，1801年至1934年在纽约出版；从1856年起是共和党的机关报；从1934年起用《邮报》（《The Post》）的名称出版。——第265、277、627页。

《威塞尔报》（《W 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44年至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第432页。

《维克斯堡辉格党人报》（《The V icksburg W hig》）——美国的一家报纸，1839年至1863年在维克斯堡（密西西比州）出版。——第189页。

《卫报》（《Guardian》）——见《曼彻斯特卫报》。

X

《希望报》（《L' Espérance》）——波拿巴派报纸，1859年至1862年在日内瓦出版。——第63页。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42年起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1848—1849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是立宪君主派

的机关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保守派报纸。——第164页。

《下莱茵人民报。杜塞尔多夫小报》（《N iederrheinische V olks—Zeitung. Düsseldorf 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至1862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863年起用《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名称出版。——第631页。

《先驱》（《The Leader》）——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在伦敦创刊。——第482页。

《先驱晨报》（《The Mornig Heral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235、321页。

《新奥得报》（《N eue O d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用这个名称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1855年马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441、466、492页。

《新奥尔良真三角洲报》（《The N ew—O rleans T rue Delta》）——美国的一家报纸，1835年至1866年在新奥尔良（路易西安纳州）出版。——第189页。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 eue Deutsche Zeitung. O rgan der Demokra—tie》）——一家民主派的日报，1848—1850年在达姆斯塔德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9年10月起约·魏德迈为该报编辑之一。——第503、520页。

《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 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 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乌尔卡尔特出

- 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定期刊物，1859—1860年在柏林用德文出版，主编是费舍。——第12、546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70、101、149、169、170、397、409、488、491、492、495、502—504、506、508、518、526、563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版到1850年11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500、506、577页。
- 《新南德》（《Neue Süddeutsche》）——见《南德报》。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报》而闻名，因报头上印有十字章图样。——第90、125、140、146、168、205、307、351、474、486、571、573页。
- 《新瑞士报》（《Neue Schweizer Zeitung》）——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刊，1859—1860年由德国流亡者奥·布拉斯在日内瓦出版。——第510、519页。
- 《新时代》（《Die Neue Zeit》）——一家工人报纸，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1858年6月至1859年4月在伦敦出版。——第481页。
-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Zeitung》）——瑞士资产阶级的报纸；1821年开始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采取了亲波拿巴的立场。——第125页。
- 《新闻报》（《Press》）——见《自由新闻》。
- 《新闻报》（《D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1861年至1862年期间，该报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经刊载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125、161、162、172、196、199、203、208、209、215—217、219、223、226、230、246、259、265、596、629页。
- 《新英格兰报》（《New-England-Zeitung》）——德国流亡者在波士顿（美国）用德文出版的民主主义报纸，创办于1852年。约·魏德迈曾为该报撰稿。——第501页。
- 《星报》（《Star》）——见《晨星报》。
- 《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周刊，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125页。
- 《星期日邮报》（《Courrier du Dimanche》）——法国反波拿巴派的资产阶级杂志，1858年至1866年在巴黎出版。——第152、569页。
- 《喧声》（《Kladderatsch》）——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193页。

Y

-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第114、125、384页。
- 《伊利诺斯州报》（《Illinois Staats-

Zeitung)》——一家日报,1851年至1922年在伊利诺斯(美国)用德文出版。——第520页。

Z

《政论家》(《Publicist》)——德国的一家报纸,1845年起在柏林出版。——第18、30、41、125、141、434页。

《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德国的一家文学日报,1807年至1865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1840年至1841年该报刊登了恩格斯的几篇关于文学和艺术的通讯。——第125、441页。

《中莱茵报》(《Mittelrhei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48年3月创刊;1851年至1874年用这个名称在维斯巴登出版。——第55、533页。

《钟声》(《Колоко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322、324页。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偏重文学和艺术,1825—1878年在汉堡出版。——第125、138、141、526、572、599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

资产阶级的报纸;1855年至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10、80、165、217、219、222、227、233、236、254、298、300、370、399、413、439、454、457、461、467、507、546、617、679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9、11、14、16、19、26、30、32、35、44、46、63、64、70、71、99、109、125、133、140、144、152、156、171、246、351、400、431—435、438—440、442、447、449、450、452、453、455—463、465、466、485—487、509、561、568、571、605、643、661页。

《总汇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80、332页。

《祖国报》(《Fædrelandet》)——丹麦的一家报纸,1834年至1839年在哥本哈根每周出一次,以后改为每天出版;在1848年是丹麦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保守派报纸。——第416页。